

编者按:2019年11月2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联合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省文联主办,河南省作家协会、大象出版社、弘润华夏文学艺术中心承办的“田中禾文学创作60年暨《同石斋札记》新书研讨会”在郑州弘润华夏大酒店举行。来自全国文学界的知名学者、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共90多人,以田中禾60年来的文学创作为切入点,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文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文学,极具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田中禾原名张其华,河南省唐河县人。年轻时代的田中禾,对大学文科的教学很失望,已读大三的他,不顾家人劝阻,从兰州大学中文系依然退学,把户口迁回农村,当了农民,目的是更有效地阅读、写作和生活,当然,这也让他尝到了底层生活的千滋百味。在后来艰苦的岁月中,他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经典。纵观田中禾60年来的漫漫文学生涯,这个性情化的作家,始终没有被现实同化,他创造现实而不是被现实改造。在以社会现实为生活和写作基调的中国作家中,这样坚守理想的作家极其罕见,他像镜子一样照亮了我们,因此,田中禾先生备受文学界同仁的由衷钦佩。

从1959年始,田中禾以一部长诗《仙丹花》开启自己的创作生涯,1985年以短篇小说《五月》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后陆续出版长篇小说《匪首》《父亲和她们》《十七岁》《模糊》等,最新出版的四卷本《同石斋札记》散文、随笔文集,彰显了田中禾先生60年来孜孜不倦的文学追求和文学成就,他超前的创新意识和人性视角,个性立场和批判意识,语言的诗性品格等,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难得的兼具文学理想、独立思想和文体意识的优秀“纯文学”作家;同时他的部分作品以英、日、阿拉伯等语译介国外。

记忆的动机、途径与伦理

——从《十七岁》到《模糊》

张翼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摘要:记忆书写是田中禾始终坚持的创作方向之一,尤其是近十年来,从《十七岁》到《模糊》,他的创作逐渐由细腻的记忆呈现深入到对记忆伦理的本质思辨。梳理田中禾记忆书写的动机、途径与伦理,既是对作家记忆书写特征的总结,也将打开对文学是否应该记忆历史,又应如何变历史记录为文学“记忆”,如何处理差异化的“记忆”等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田中禾;《十七岁》;《模糊》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01-06

田中禾是个现实感十足的作家,他擅长从纷繁的现象中抽取关键问题,代表作《五月》《枸杞树》直击农村改革中存在的“卖粮难”“资源短缺”“青年出

路”等诸多实际问题,通过现实问题的探讨向人情、人性的深处掘进。田中禾也是一个关注记忆的作家,在直面现实的同时,他不断追忆个人的往昔与历

收稿日期:2019-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期小说的时间问题”(15BZW168)

作者简介:张翼(1978—),女,河南新乡人,文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小说批评。

史的过往,尤其是行至人生暮年,回忆逐渐成为作家创作的重心。从2011年的《十七岁》,到2013年的《父亲和她们》,直至新作《模糊》,田中禾沉浸于对亲人和往事的追怀。因为这些独特的个体的记忆追溯总与“历史”保持着微妙联系,在个人经历、经验的光影闪回中,一桩桩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抗战、内战、建国、“反右”等等也纷至沓来、借机登场,历史因此成了以文字为载体、糅合诸多经验的“记忆”。

田中禾的记忆书写事实上触及了新世纪非常重要的文学史、思想史命题,即面对20世纪中国这样一段容量丰富、脉络稠密的历史,文学是否有义务记住过去的人与事?又应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使严谨的历史记录成为有质感、有弹性的历史“记忆”?此外,由于在历史结构中的位置不同,不同的人对于同一历史的记忆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相互抵牾的,那么又该如何认识、交流差异化的“记忆”?我们或许可以田中禾近十年的写作为切入口,打开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一、记忆历史的冲动

文学与记忆的关联深刻细密,有作家曾经指出,文学本质而言就是记忆。如果以此解释田中禾近年来的写作与记忆的缱绻,也是有效的。但这一常识性答案可以解释田中禾为什么写记忆,却不足以阐释他的记忆及记忆书写的特征,无法回答他何以反复记忆某些东西却并没有记住另外一些东西,何以某个人、某桩事、某段历史在他的记忆中是如此这般而非其他模样。记忆的成型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记忆之所以发生的动机至关重要。动机触发了回溯,特定的动机从最初就已经决定了记忆的独特走向与特殊纹理。

田中禾的频频回首源于个人的情感伤痛。他在长篇小说《十七岁》中以日记为序言,解释了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追怀之作,那是因为:“此时此刻我才明白,从此以后我要独立承受人世降临的一切,我真的要做大人了。在甲子年二月初七这天之前,我并不知道人世究竟是什么。母亲离开我的时候世界还像往日一样,可我知道往日已经不复存在。”^[1]亲人的离去成为个人生活史中的一个转折点,构成了生命观念的断裂,“我”的记忆之门由痛苦而开启。痛楚将离去的一切推向笔端,通过一遍遍重现往昔、回味过去,作家的写作事实上也是情感的宣泄,他自觉或是不自觉地以移情的方式抚慰自身的情感重创。正如《父亲和她们》中的“我”所言,“让自己在述说

中得到安慰”^[2]。不得不面对的告别,也使作家较之常人对正在流逝的、不可挽留的诸种人事更为敏感。同时,相对于变动不居的现在和难以预测的未来,过往即便再多繁乱也已是固定了的,它总能使人经由怀想寻找到安适感、意义感,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一切终将是美好的”,也是所谓的“诗意的栖息地”因何而生。田中禾之所以一再书写记忆,或许也可循此心理线索找到答案。因情感创伤而开启的记忆总是细节饱满、情绪充沛,也常常因物是人非、流逝不止流露出沧桑感慨,并隐隐掺杂着时不我待的内在紧张感。

除了情感的因素之外,对现实的困惑、不适也督促作家有意识地追根溯源,追问来路,通过审视来路辨析“现在”如何成为“现在”,思考“现在”应该成为怎样的“现在”。简而言之,所有向过去的回望都关联着尖锐的“现在”的问题。田中禾在新作《模糊》中,有意识地安排两个叙事者讲述二哥张书铭的故事,其中“我”作为主要的叙事者,把握全文的叙述基调。两次叙述的起初,“我”都会特意向读者说明,之所以执意回顾并不愉快的过去,是希望借此与现实中的缺陷形成对抗。“当金钱、享乐成为时代主流,人们忙于赚钱、忙于购物、忙于旅游、忙于性享受,沉醉于花花世界的时候,谁愿意陪你为陈年旧事感叹,被过往的伤痛扫兴,耽搁了当下的快乐时光?”^[3]¹¹⁰“忧伤是人类情感中高贵的情愫,我不敢滥用它。在这物欲横流、追求金钱享乐的时代,忧伤非但不合时宜,还会被人讥为有病。”^[3]¹⁸⁴两段表述虽然存在反问与陈述的语气差异,但内在的逻辑却保持一致,都是要构筑过去——现在、记忆——遗忘、忧伤——享乐、沉重——轻松的落差张力,以此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立场倾向,是要以记忆对抗遗忘,以沉重质疑轻松,以伤痛警醒快乐。作者借叙事者激烈地发声,有力地展示出作者介入现实、探索历史的意志力,使读者感受到写作者内在的使命感。正是因为使命感的贯穿,文本中情绪的经验的个人回忆,繁复却并不破碎,伤感却并不空泛,它们仍是有质感、有深度的文化记忆。

作家个人的情感与责任,驱动其创作不断回望往昔、书写记忆,这为作家的记忆刻下了鲜明的个人标识。同时也应注意到,记忆的产生既源于个体的情绪与体验,也潜在地受到时代语境、文学传统的影响与规约。田中禾寻找自己的方式,书写个人的记忆,但他始终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处于特定的历史结构之中,作为写作者处于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的传统之中,某些既定的机制、规律注定会对他的记

忆有所触动,也有所示范。以文学传统为例,中国文学中向来就有非常强烈的史传传统,这促使中国的写作者回顾过去时总是不由自主地以“历史”为鹄的。当代文学在历史书写方面的积累也十分丰厚。十七年文学致力于革命历史合法性的叙述,新时期文学对共和国历史的反思,90年代以个体、欲望解构宏大历史观念等等,近年来逐渐形成了以个人史写大历史的写作趋势。纵观田中禾近十年来关于记忆的思考 and 书写,发现他也在这样的思想延长线上与文学脉络之中。

二、历史如何成为记忆

人生活在“历史”之中,也以自己的方式叙述“历史”,但人对“历史”的叙述并不完全受制于“历史”本身,或者可以这么说,人叙述“历史”的过程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叙述历史的方法有很多种,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其中一种,并不取决于它对“历史”的拓印,而在于它对“历史”的再认识、再创造,即遵循文学特有的逻辑与方法,以情感之维、思想之维对事件、史实进行重新观照,如此才能变记录为“记忆”,丰富并超越历史。文学记忆历史不存在绝对完美的方法,各种方法的优点与缺陷也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以下将主要从特征的角度出发,探讨田中禾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把历史记录转换为文学“记忆”,于此提供了哪些路径,并尝试指出这些方法具体的功能。

其一是以细节恢复历史实感。田中禾的记忆伴随着20世纪中国的诸多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作者并没有采取正面强攻的方式去写时代风云的变幻,多沉潜在日常生活的细处、深处,以细节还原历史现场,以细节展现历史运行的细密轨迹与隐秘褶皱。《十七岁》对乡间生活的描绘,既注重审美意义上的细腻描写,以场院旁飞扬着的雾一般的蚊虫,池塘里小树与灌木的倒影,从林子里飞奔而出的肥大的黄狗,黄狗滴着口水的热乎乎的舌头,石碾上密布着的星星点点的麻坑等渲染田园风光;也选取具有时代标志的细节,如土地上铁轮车的辙印,洗脸用的铁面盆与家织布方巾,疗伤用的墨鱼骨等等为田园生活烙下旧日的标记,提醒读者这田园、乡村的时代属性。与此相似,《模糊》中章明所穿的“苏联花布衬衫”“毛料中山装”,所使用的“蘸笔”,所读的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屠格涅夫的《初恋》,假日里所去的工人俱乐部、舞会等等,共同营造出建国初期特有的生活景观与时代精神氛围。

除了描绘可触可观的生活景观细节,作者还把

握到了语言作为细节所凸显历史的阶段性特征,并由此展示历史更迭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根本性改造。谈及20世纪的中国,无法回避绵延不绝的战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捻军起义,20世纪初的军阀混战,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40年代中后期的国内革命战争,50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在田中禾的创作中都有涉及。频繁战争,使人们无法安守家园,四处流散,躲避战乱成为生活常态,人们为此特意启用了一个新词“跑反”。作者在文本中写过战争中尸横遍野,也描述日本军机轰炸中国平民的惨烈场面,然而当他抓住人们的语言系统中出现了“跑反”并将之熟练地运用于交流的时候,才真正剥出了战争的残酷,将战争对人的生存、精神的渗透控制全息式地推至读者眼前。长篇新作《模糊》中,“下放”“审查”“材料”“检查”“批判”等词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广泛辐射,同样起到了构筑历史实感的作用。

其二是以经验丰盈历史维度。由于细节的灌注,历史不再仅仅是遥远的过去事件、抽象的宏大规律,而是有实感的,可触摸的。又由于细节往往建立在个体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之上,因此数量庞大、类型庞杂的经验也得以汇入有关历史的记忆之中。各种经验从各自的角度、立场出发,叙述自己对于过去的印象与感觉。在被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反复描述之后,历史不再是单一的、平面的,而成为多维的、立体的。《十七岁》通过叙事时间的横纵组合,将经验化这一方法发挥至极致。文本的叙事时间既没有以历史的物理时间为序,也没有单独地围绕某一个个体的成长经历推进,而是巧妙地将“十七岁”设为时间节点,通过讲述母亲、大姐、六姐、大哥、二哥,以及“我”的“十七岁”,以点阵的方式在推动时间前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与个体特殊成长经验的微妙关联。由于历史被不同的个体经验叙述、勾勒,它的演进不再是清晰的线索,而是交叉、重叠,它的不同侧面得以显现、打开。

譬如在如何认识战争的问题上,战争的残酷毋庸置疑,它随意掠夺人的生命,迫使人们不得不在跌宕起伏中艰难求生。但残酷、暴虐远非战争的全部,还有许多难言的悲欣交集。如“我”的家道因战局莫测而中落,却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通过囤积食盐再次积累了财富。战争使人颠沛流离,但动荡也使原本坚固的礼教秩序有所松动,六姐与订婚对象因此有了接触的机会,二人逐渐建立起扎实的感情基础,避免了像大姐一样因包办婚姻不如意而抑郁身故的悲剧。战争是集体的罪恶,但罪恶的集体中也存在

着无辜的个人。作品在铺陈日本兵残暴荒淫行径的同时,还从孩子的视角写一个爱和街坊邻居开玩笑的“老头太君”,在孩子的眼里他除了是日本人之外与乡邻并无差别。“老头太君”的存在解释了——为什么当母亲目睹日本人战败撤退枪毙伤员时,几乎忘记了日本人是怎样毁了自己的生活与家园,对这些垂死之人表示出了同情而不是感到一朝雪耻,大快人心。经验的驳杂,立场的交错,帮助叙事者打开了探讨战争性质的众多角度与空间,战争不再只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暴力对抗,也不仅只用来激发读者的憎恨、厌恶,它还蕴含着人性复杂、命运无常等等难解的命题,推动读者由此展开对自身与他人,个体与众人的深思。

其三是以想象补充历史留白。在田中禾的记忆书写中,时常出现另外一个词“想象”。如:“我想象着民国十二年的那一天,那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从前的日子……”^[1]“在我从小长大的过程中,老家经常诱发我的想象。我想象着在很早很早以前……”^[1]“以我的想象,父亲和母亲当年走过的路,应该是由伏牛山南麓逆汉水北上……”^[2]“对于我,库尔喀拉是一个牵系着半生惦记、诱发着我的想象的地方,在我的心底留下了不堪触碰的记忆。”^[3]虽然人们总强调记忆是对过去实有之事、实存之人的再现,但记忆实质上是想象之一种,或者说记忆就是幻象。过去的一切无法克服时间、空间的局限再次真实地发生,却可在人的头脑中、通过对所储存的既有形象进行再次加工,使前尘旧事得以复活。独特的想象机制决定了记忆是自由的,它不会被时空所局限,更不会被动地接受现实逻辑的解释,而是穿梭自如、自成体系的。

记忆的自由特质赋予它虚构的特权,使它以虚构填补“真相”“规律”无法笼罩的“历史”的留白与间隙。记忆之于历史的想象、虚构不单指填充真实发生过的历史的细节,还有可能弥补未曾发生过的历史的遗憾。概括地说,记忆在解释历史的已然、必然之外,也尝试解决历史的未然、或然。如《十七岁》中关于早逝的大姐的想象。大姐因包办婚姻不如所愿郁郁而终,生命永远停留在了十七岁。为了避免难过,她并不被家人经常提起,并且大姐去世时,我尚在襁褓之中,对她本应该没有太多印象,可是大姐却奇迹般地存活在了我的记忆之中。我对她的记忆远非印象,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在“我”的记忆里,她不仅笑颜如花、青春永驻,还在我的想象中不断成长——我常常在现实人生中寻找与她相似之人,也在脑海里为她假设种种不同的生活走向,

推测她倘若还活着将会在随后的时代风云中经历怎样的人生。关于大姐的记忆与想象是全书的精华所在,这段并不能够被“如实”所阐释的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的叙述,细腻而灵动,感人至深;也使对大姐的记忆得以漫漶为对这一代女性、这一类型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的描摹与思考。充分发挥记忆的想象与虚构这一具体的叙述行为,已经彰显了作者的历史观,他并不想一丝不苟地搬运历史,而是要对历史做出猜想性的解释。作家田中禾已经不仅仅是探索历史的规律,他还关心历史的诸多可能性。关于历史记忆中真实与虚构的微妙辩证,是一个可以无限阐释的话题,田中禾以自己的创作,对这一话题做出了精妙而独特的回答。

三、历史记忆的差异与融合

如果仅从记忆呈现的效果考量,《十七岁》已然显示了记忆书写所能够到达的高度,它所描述的历史记忆实感、质感与立体感兼备,个体经验与宏大历史交相辉映,文本情绪饱满、细节丰沛、叙事灵动。可如果从对记忆的本质思考来看,《模糊》却较《十七岁》更深一层。《模糊》仍诉说往事,但呈现记忆、借记忆抒情怀旧、思考现实已经不是文本叙事的全部目的,文本围绕记忆所展开的叙事行为是技巧,更是一种观念——它要讲过去的故事,更要提取“记忆”本身,要将“记忆”拉到一定的高度对它进行审视和追问。这事实上已经深入到了记忆的伦理层面。

文本叙事结构的变化,体现了作者由记忆结果向记忆伦理的深入。和以前的作品相比,《模糊》在结构上有明显不同。

首先,叙事重心发生了转移,出现了由回忆过去到现实求证的转换。虽然如前所述,所有向过去的回望都包含着现实的、现在的需要,但此前田中禾的记忆书写基本是过去时态的,无论是《十七岁》还是《父亲和她们》的叙事都专注于讲述往事,而将“现在”作为讲述往事的背景,是为“过去”建立的叙述的角度。《模糊》的基本叙事结构却是“过去+现在”,且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叠加。它由两个故事构成,第一个故事是章明的故事,主要是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历;第二个是“我”对章明的原型——“我”的二哥张书铭的回忆与寻找,具体涉及“我”如何因神秘邮包唤醒被刻意封闭的记忆,如何将作为“记忆”的章明与“真实”的张书铭进行比照、阐释,又如何通过探访张书铭的旧迹、故人尝试解开他的失踪之谜,期间更遭遇了是否应该以过去的

“记忆”打扰现实生活秩序的问题。虽然从篇幅来看,章明的故事占据了整部小说的三分之二,但这一段“过去”却被有意识地处理成“戏中戏”“书中书”,使它嵌套在“我”的现实行动之中,章明的“过去”故事始终被“我”的“现在”行动所统摄。同时,还应该注意,章明的故事虽曲折坎坷,但对于读者而言,由于既有阅读经验的影响,并没有构成“陌生”的惊异感。章明遭遇种种不公,成为右派的故事,事实上在《黑骏马》《绿化树》等小说中已经有了成熟的叙事形态,其中的常见元素在《模糊》的“书中书”里都有所体现,比如章明的英俊潇洒、谈吐不俗、不凡见识等等都吻合此类型作品中卡里斯玛式的主人公设定。再如章明在社会生活中的浮沉总伴随着私人领域中的爱情、婚姻的分合,也遵循这类小说以爱情、情爱等私人情感解说时代风云、社会事功的叙述模式。相较而言,“我”的现实寻找篇幅虽然不长,但对于读者而言却是陌生的、难解的,尤其是其中头绪庞杂,歧义丛生,给读者造成困惑,也吸引他们思考有关记忆的一系列问题。借助“过去+现在”的叙事结构,并通过“过去”“现在”的比重差异,作品将叙事重心放置在“我”如何在当下的语境中处置过去的“记忆”,而不是“我”通过回顾过往看到了什么。“现在”在这样的结构安排中脱颖而出,不再是背景或者角度。

其次,叙事立场出现位移,出现了由推崇往事正义到向辨析记忆话语结构的过渡。在之前的创作中,“往事”占据天然优势,感伤含混也美好难忘,是情感所系,是探索历史的思想沉积层;但在《模糊》中,作者对待“过去”的态度已经有所保留。他已经意识到了“记忆”,尤其是文学的“记忆”是被叙述的。这同样可以从“戏中戏”“书中书”的结构安排里得到展示。虽然作为主要叙事人的“我”,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一再强调“过去”之于现在的重要性,但作品并没有采取线性的叙事方式,由过去写到现在;也没有按照作家之前的叙事习惯,由过去的某一个时间发散开来;而是将过去与现在通过“戏中戏”“书中书”的结构设置,放置在了两个不同的叙事层级上,有意识地使之在叙述立场上表现出分裂。“戏中戏”往往与主线构成互文,发挥对主线故事进行提示、解释、类比、渲染等功能,但这也使戏中之戏多是主线故事的衍生物。具体到《模糊》中的“书中书”来看,章明的“过去”事实上是被多次叙述的对象。在神秘的书稿里,它被叙事者用第三人称叙述了一次,而这本书又是以被“我”阅读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因此它还同时被“我”进行了第二次叙述。双

重叙述使章明与“过去”成为叙述中的叙述,是被叙述的对象的对象。“过去”的自我叙述能力较之前已经明显减弱。“戏中戏”的另一个功能是制造间离,提示读者文本中所有的戏剧性冲突及由此所构成的故事是被叙述出来的,它实际上是由叙述背后的话语及话语结构决定的。饶有意味的是,这部“书中书”的作者是匿名的,书也并无题名,是“无名作者的无名书稿”,由“英雄”到“无名”的转换,稀释了“书中书”浓郁的悲情和理想的情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书”是个未竟的故事,停止于章明恢复工作。《模糊》的后半部分,“我”的一系列行为,虽强调是想寻找二哥的下落,解开二哥失踪之谜,但事实上通过真实人物与虚构形象的对照、真实档案的呈现、故人访谈的引入等多种形式,文本真正完成的是对章明故事的修正。在这个过程中,诸多与二哥有关联的人物纷纷讲述了自己对他以及那个时代的感受,章明这一苦难英雄、落难才子的形象,逐渐被二哥鲜活却也复杂的面貌所模糊。

《模糊》之所以将叙述重心由过去转向现在,将叙述立场由推崇过去正义转向辨析记忆话语结构,是因为作者发现记忆是什么固然重要,但记忆本身尤其是如何处置“记忆”及如何对待“记忆”的差异也已经迫在眉睫。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对“现在”的寻找中,“我”遭遇了一系列有关“记忆”伦理的问题。首先是“小说里的事儿,能当真吗”^{[3]186},即记忆的真实性问题。对此,文本中的“我”寻找记忆、尝试解开谜团的执着,以及作者写作的行为本身,已经做出了回答。真实并非记忆的唯一要义,记忆之所以生成更多地在于给人提供情感慰藉。在真实性问题之后,“我”马上遭遇了记忆的差异化问题,这个问题对“我”造成的困扰,远超记忆的真实性问题。文本中叙述了这样一个场面,在安葬母亲、为父母合坟的时候,父亲的骨殖因种种原因散乱不全,众人都小心翼翼地予以回避,可是二哥却捧着父亲的一颗牙齿放声痛哭,让众人陷入尴尬之中,引来我的伤心与埋怨。这个场面既写实也充满隐喻的意味,它实际上指出记忆更多是个体的。正如同为儿女,如何缅怀逝去的父母,存在巨大差异一样。事件之所以能够成为记忆,依赖的是人与事件之间的个人性联系。人可以共享记忆,但未必有完全一致的共同记忆;并且,共享记忆也远远不是诸多个人记忆的简单组合,而是重叠、交错、抵牾的,是盘根错节的。对于同一事件的记忆,并不取决于事件本身,而取决于人们对事件的阐释。

在明确了记忆因个人性而存在差异的事实之后,文本很快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假如记忆没有达成共识,那么是否存在一种记忆优先于其他记忆?又该如何处理各种记忆之间的差异?在“我”的寻找过程中,“我”找到了二哥的两个女儿,在“我”看来,她们是二哥的孩子,是“我”的亲人,理应知晓自己的血缘。而二哥的两个女儿,一个对二哥还有稀薄的印象,愿意相认;另一个却因为当时年幼,已经完全遗忘了二哥,不愿意被打扰。认还是不认,这是文本中人物的困境,也是作者面对存在巨大差异的“记忆”时的困惑与焦虑。这个情节也同样充满了隐喻。

因个体所处具体语境的差异,即便对同一人、同一事的记忆,也存在着精度与强度上的巨大差别。当记忆有冲突之时,到底应该如何取舍?差异化的记忆是否存在融合的可能?又该如何融合?虽然文本中因亲情,三个亲人终于得以团聚相认,然而这一解决方案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作者充满善意的假想?文本中的多个情节都涉及记忆的竞争与冲突的问题,比如二嫂李春梅与二哥,薛兰英与二哥,赵苑民

与二哥等等。这些冲突较之上述情节不那么具有戏剧性,却更难解,亲情、人性显然难以完全将之解释清楚、处置得当。这些未解的难题恰恰是《模糊》的可贵之处。

四、结语

正如俄罗斯小说家希什金曾就记忆、语言与文学所做的思考,当记忆不再是记忆,语言不再是语言,小说就诞生了。记忆书写中的种种问题迷人也难解,从《十七岁》到《模糊》,田中禾有效地变历史记录为历史“记忆”,并有意识地由记忆呈现深入至记忆伦理的探索,他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书写记忆提供了经验。

参考文献:

- [1] 田中禾. 十七岁[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 [2] 田中禾. 父亲和她们[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 [3] 田中禾. 模糊[J]. 中国作家 2017(12):110-221.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Motive, Approach and Ethics of Memory

——From *Seventeens* to *Vague*

ZHANG Y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China)

Abstract: Writing memory is one of the creative directions that Tian Zhonghe insists on all the time, especially in the past ten years, from *Seventeens* to *Vague*, his creation gradually deepens from the delicating memory to exploration of essence of memory. To sort out the motive, approach and ethics of Tian Zhonghe's memory-writing is not only a summary of the writer's memory-writing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a reflection on whether literature should remember history, how to change historical records into literary "memory", and how to deal with differentiated "memory".

Key words: Tian Zhonghe; *Seventeens*; *Vague*

历史延展中的人性呈现

——谈田中禾长篇小说《模糊》中的人性叙述

刘宏志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田中禾的长篇新作《模糊》采用故事中套故事的叙事模式,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极左”年代的往事。小说看上去写的是历史,但是更多的却想表达对人性的反思。借助这种独特的文本结构方式,小说拉开了历史距离,让人性在一个更为长久的历史空间中呈现,从而呈现出人性的复杂,也呈现了环境、话语等对个体生命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田中禾;《模糊》;历史;人性;环境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07-06

田中禾的长篇新作《模糊》^[1]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结构方式——小说是由一部小说手稿和叙事者对小说手稿书写地方的实地探访组成。故事中套故事,这种写作模式并不稀奇。《一千零一夜》中,山鲁佐德就是用这种方式让她的故事无限期地延宕下去的。田中禾这部小说的有趣之处在于,利用这种结构方式,建构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从而给人性的呈现提供了一个更为阔大的舞台。

一、拉开的历史时空与真实人性之问

《模糊》的第一部分是一部小说手稿。叙事者某天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包裹,这个包裹中就是一部小说手稿。而且,有趣的是,这部小说手稿中的主人公章明,显然就是叙事者失踪的二哥张书铭。这部小说手稿,就讲述了章明离开家乡之后的几十年的详细经历。小说手稿是从章明来到库尔喀拉开始故事叙述的。此时的章明,也已经是犯了错误的人,是被下放到库尔喀拉的。但是,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显然还没有伤害到他。他依然还是风度翩翩,在工作上,也是技术骨干。此时的章明,除了在家乡有一个妻子,在库尔喀拉还有几个不同的女孩在喜欢他。接下来,章明开始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在遭受政治打击的过程中,他的妻子也反戈一击,检举揭发了他,而且嫁给了主持打击他的领导老耿。喜欢他的女孩,或者被迫离开,或者受到牵连自杀。不断被朋友欺骗、被劳改的章明,依然被女孩子喜欢。老家的姑娘小六,千里迢迢来到边疆,嫁给了章明,并且给章明生了两个孩子。但是,在章明被通知解除“右派”身份的当天,他却发现了小六和一个盲流的奸情。这直接导致了他婚姻的破裂。之后,蹉跎半生的章明,显然已经不再有当年的锐气,在又一次婚恋无果之后,从单位神秘地消失了。

小说的第二部分是叙事者“我”对二哥的寻找。“我”读到小说手稿后,立刻意识到小说中的章明,就是自己的二哥——“我”的二哥也是神秘失踪的。于是,“我”立刻踏上了去库尔喀拉的道路,去寻找二哥。在这一部分,小说叙述了“我”对上半部中涉及的一些关键人物的探访,如对二哥的两任妻子的探访,对二哥当年同学的探访,等等。

从小说叙事来看,这个小说很容易被理解成是一部对特定历史年代反思的作品,而且,毋庸置疑,小说的第一部分即手稿部分,关于章明的命运的叙述和呈现,也的确非常精彩、形象。事实上,对这部小说做出这样的理解显然也并没有太大问题。不

收稿日期:2019-12-26

作者简介:刘宏志(1976—),男,河南延津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过,这样理解作品,却也显然把这部小说的价值限定在了对一个特定时代的反映,而忽略了其对人性更为深刻的发掘。事实上,小说通过设置第二部分,即对小说第一部分中历史当事人的实地探访,和小说的第一部分一起,有效建构起了一个复杂的历史时空。在这个被拉长的复杂的历史时空中,人性的复杂性也被呈现了出来。

在“我”寻访二哥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二哥当年的同学赵宛民。赵宛民是二哥的同学,也是一起从河南走出的同乡。他们怀着报国志向主动来到新疆落户。在小说第二部分的叙述中,“我”所见到的赵宛民,是一个慈眉善目的长者,他同情二哥的遭遇,对那个时代也进行批判,同时也主动给予我很多帮助。赵宛民也对“我”讲过他和二哥的关系。在赵宛民的讲述中,他和二哥的关系良好,而且赵宛民对二哥也是称赞有加。这是当下时空中的赵宛民,显然,这是一个善良的,而且有着强烈正义感的长者形象。但是,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也曾经提到,二哥张书铭之所以来到库尔喀拉,在这个地方一步步开启他的悲剧人生,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原来的单位犯了错误。当年,张书铭从学校毕业之后,主动申请到新疆工作,被分配到了省交通厅。在省交通厅,章明和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组建了红山文学社。但是,不幸的是,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的这个文学社很快被定性为小团体,而且遭到批判。在这种高压局面下,一群曾经志同道合的同伴,开始互相揭发。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就是在这个时候到来的——他被他曾经深深相信的同学揭发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空中,揭发张书铭的,正是后来曾经热情称赞张书铭的赵宛民。

在叙事者后来找到的当时的历史资料中,非常清晰地写道:“赵宛民详细交代了文学社几次活动的内容,把责任推给了张书铭和另外一位同学。他说张书铭特别崇拜反革命集团里的作家,把某某的小说和某某的诗歌推荐给大家阅读。社友给北京的杂志投稿,都是张书铭提供地址。他们为他提供方格稿纸,帮他们到邮局寄发。”为了能让自己立功,他甚至不惜对曾经的伙伴恶毒攻击——“赵宛民材料里的一个细节让我禁不住心跳骤停:‘文学社最后一次聚会,大家传看报纸上登的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和编者按。张书铭上厕所,把这张报纸带去擦屁股了。’”赵宛民当年对二哥的这个揭发,显然非常恶毒,它已经远远超出了自保的意味,而更多带有打击别人让自己获利的特点。我们可以说,张书铭当年遭遇的坎坷,肯定是和赵宛民的揭发有关的。

这就是历史资料中的赵宛民:他曾经受害,但他也曾经害人。那么,这个历史资料中的赵宛民和现在“我”所见到的慈眉善目的赵宛民,哪一个是真实的赵宛民呢?两个赵宛民,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呈现出不同的形象,这充分呈现了人性的复杂性。

在小说中,伤害章明最深的,显然应该就是他前后两任妻子,因为他也在这两个人身上用情最深。小说中章明的第一任妻子——李梅,是在章明受到围攻的关头,突然反戈一击,背叛了章明的,而且她还嫁给了主持打击章明的领导老耿。小说以另外一个人物宋丽英的视角,描述了章明遭遇到李梅的背叛的经过。因为章明的不识时务,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无法承受这个压力的李梅背叛了章明,主动向组织靠拢了。而且,在李梅背叛章明之后,章明还不知情的情况下,老耿主持召开了批判章明的辩论会。所谓辩论会,不过是对一个批判对象进行集中打击的另一种方式而已。当别人揭发检举章明,或者和章明辩论的时候,章明显然早已做好了准备。“有时候发言人点名要章明回答质问,章明就在原地站起来回答。丽英……从上午到下午,她对章明的表现很满意,别看他平时不爱说话,可每次发言都很精彩,不但能说到点子上,还很文明,一句脏话也不说,一个脏词儿也不带。她满心为他高兴,深深为他自豪。”显然,章明的很文明,一句脏话也不说,背后隐含的是他对这辩论会的蔑视,或者说,这种打击对他而言,已经不是什么打击。他早已做好了准备。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辩论的高潮出现在晚上。一个娇小的女人手里拿着一摞东西走上台,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会场里顿时鸦雀无声。……从李梅走上台的一刻起,章明的脸变得惨白……丽英看见章明的手和腿开始颤抖,腮帮上的咬肌绷紧,整个脸扭歪了。”在这最关键的时候,来自曾经最亲密的爱人的攻击,给了章明最沉重的打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李梅对章明的攻击,不是敷衍了事,不是应付差事,而是毫不留情地选取了对章明来说最脆弱的点,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李梅把章明私下说的牢骚话、反动话一条条揭发出来,用革命道理分析、批判,这女人的口才不错,理论水平也很高……他把我们党的干部比成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大家看看,他对我们人民政权有多么深的仇恨,用心有多么恶毒……他不知道这女人啥时候把他的日记拿走了。她肯定把它交给老耿看过了,有问题的地方都折了页,现在可以有条不紊地一篇一篇读给大家听,一边读一边解释,再加上激烈的批判。”显然,李梅对章明的批判,对于章明来说,是沉

重的打击。从此时李梅对章明的批判来看,似乎她对章明没有爱,只有恨。但是,在叙事者“我”去寻访当年二哥的历史的时候,却发现小说中李梅的原型,即二哥的第一任妻子李春梅其实后来也悄悄帮助过二哥。二哥在下放劳动的时候,因为无法忍受艰苦的生活,曾经给李春梅写信,想让李春梅帮他说话,调回原单位。二哥的这个举动,在当时也可以算是严重的问题。如果李春梅举报二哥,那么等待二哥的将是更为沉重的打击。但是,李春梅没有举报二哥,而且还偷偷给他寄了五斤粮票。之后,在二哥失踪之后,李梅也积极去寻找二哥。显然,李春梅的这一切举动,都说明了她对二哥不是没有感情的。可是,既然如此,在当年对二哥反戈一击的时候,李春梅又为什么那么绝情?

显然,赵宛民也好,李春梅也好,以及书中其他很多人物,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中,都曾经深深伤害过二哥;但是,也正是他们,似乎又对二哥怀有感情。那么,哪一个赵宛民是真实的赵宛民?哪一个李春梅是真实的李春梅?帕斯卡尔曾经谈过人性的复杂:“当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会奇怪我们有病时怎么能做出那些事;但当我们有病时,我们就高高兴兴地服药了;病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再也没有兴致和愿望去进行健康所给予我们的但与疾病的需要不适合的娱乐和漫游了。”^{[2]63} 似乎,在不同的境遇下,人性会自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如果仅仅看二哥在特定年代的遭遇,我们似乎很容易就把赵宛民、李春梅定性为坏人。但是,如果把历史拉长,看到之后他们的举动,我们似乎又很难给他们贴上一个简单的坏人标签。毫无疑问,人性是复杂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表现。《模糊》用拉长的历史时空,给小说中的人性以充分的呈现空间,从而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关于人性可能性的思考。

二、环境、话语与人性的呈现

在《模糊》的上半部中,李梅在检举揭发章明的时候,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把人性之恶呈现了出来。作为章明曾经最亲密的爱人,李梅把章明所有对她说过话,对其他人的讽刺等等,都说了出来,而且还把章明的日记给拿了出来,以现场批读的方式对章明展开批判。之所以说李梅在这时淋漓尽致地呈现了人性之恶,是因为,此时如果她是不得不检举揭发章明的话,她其实是不需要把章明私下给她谈论过的、在别人看来罪大恶极的私人言语完全揭发出来的,因为别人并不知道章明说过这样的话。从她当时检举揭发的坚决和彻底来看,似乎是要置

章明于死地而后快。但是,在小说的下半部,我们发现,李梅的原型李春梅似乎对章明的原型——“我”的二哥张书铭,并无恶意,甚至还有感情。比如,在张书铭向她求援的时候,她并没有落井下石——把张书铭的这封信举报上去,反而悄悄给张书铭寄了五斤粮票。在张书铭失踪之后,她也积极去寻找张书铭。李春梅的女儿董红旗也对“我”说,其实李春梅对她原来的婆婆——张书铭的母亲很有感情。显然,李春梅检举揭发张书铭时候呈现出来的极端的人性之恶,并非来自她对张书铭,或者对张书铭的家庭的恨——她其实对这些人还是很有感情的。那么,李春梅的人性之恶的来源是什么?

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李春梅通过检举揭发张书铭,通过嫁给张书铭单位的领导,保证了自己的安全——她不再是一个被批斗对象的妻子,而是一个检举揭发者,进而成为一个革命领导的妻子。事实上,保护自己,显然也正是李春梅在检举揭发张书铭时表现出极端的恶的很重要的原因。阅读小说,我们也会很容易找到李春梅如此紧张地保护自己的原因——她的父亲曾经担任过伪职。在那样一个阶级斗争意识统辖一切的年代,她父亲的这个经历很容易给她的整个家庭带来灭顶之灾。显然,在恐惧中长大的李春梅,在那个特殊年代,要比那个一开始受了打击还坚持理想的张书铭成熟得多,当然,这也是她和张书铭矛盾的根源。因为自己出身不好,所以李春梅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显得积极向上。也许,直到嫁给单位领导——老革命老董后,李春梅才感觉到了安全。显然,恐惧,以及强烈的自保的愿望,会激发起人性深处的恶——只要是为了保护自己,一切的恶都是可以做的。在这里,环境是促使人性中的恶被激发出来的关键原因。当年赵宛民检举揭发张书铭,那种人性之恶的原初出发点,显然也是出于自保。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被动之恶,而不是主动之恶,或许,这也正是他们很容易忘掉自己过去的恶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是主动为恶的,所以,似乎也不需要为这个恶承担责任。

饶有意味的是李春梅的命运。在张书铭被批判的时候,李春梅突然反戈一击,通过检举揭发张书铭,保护了自己。此时李春梅的行为,是为了保护自己,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她的家人——因为一旦她被张书铭的事件牵连进去,她的曾经担任过伪职的家人毫无疑问会成为首先被打击的对象。在嫁给老董后,她把自己的爹妈、弟弟从河南老家接过来和她一起生活。显然,她通过背叛张书铭,嫁给老董,似乎获得了保护自己父母的能力,似乎让自己从恐惧中

逃离。不过，在她嫁给老董之后，她还是没能保护好她的父母。老董趁着清查盲流，把李春梅的父母、弟弟妹妹都交给了遣送队。两个老人被遣送回原籍后，连批斗带冻饿，很快就死了。也就是说，其实李春梅最终也没有保护好她的父母。老董之所以把李春梅父母遣送回原籍，是因为李春梅喜欢上了另外一个人——小于，而和他闹离婚。两个人的关系闹僵了。当然，这里有趣的地方在于，当李春梅喜欢上另外一个人，要和老董闹离婚的时候，她其实应该知道，老董依然有着毁灭她、毁灭她父母的能力——事实上，李春梅父母后面遭遇的悲剧也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同样是面对来自老董的压力，李春梅此时为什么没有原来和张书铭在一起时的那种强烈的恐惧？她此时为什么能直面来自老董的压力，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显然，李春梅前后表现出的差异，和她前后期所处的环境不同，所面临的话语压力不同有关。在成为老董的妻子之后，和老董成为仇人，李春梅虽然知道老董仍然有能力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她进行打击，但是在她生活的外部环境中，却并没有各种话语时时刻刻对她进行提醒或者强调，因此也无法让她恐慌。但是，在批斗张书铭的时候，她所面临的环境却不仅仅是来自老董一人的压力。当时的情况是：老董打击张书铭的意愿，已经化作了单位中几乎所有工作人员的意愿，并且通过这些入不断张贴出来的批判张书铭的大字报呈现出来。此时，张书铭和李春梅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来自领导的打压，而且还是无所不在的来自各个方面的强大的精神压力。这种无所不在的大字报，无所不在的强大的批判话语，无时无刻不在向李春梅暗示着之后可怕的处境：张书铭将会被批判，张书铭将会被斗倒，李春梅会被张书铭牵连，李春梅父亲曾经担任伪职的事情会被发现并且张扬出来……对抗这种环境，显然需要极大的心理定力。张书铭之所以还能坦然面对，更多的是源于他在某种程度上的无知。但是，一直对自己父亲身份极其敏感的李春梅，显然就无法承受这种来自环境的巨大压力了。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巨大的威压之下，李春梅心理崩溃，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父母，背叛张书铭似乎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无所不在的又似乎是漫无止头的攻击性话语，似乎比真实的打击更让人无法承受。当年批判张书铭时候，李春梅人性中的恶，也正是在这无尽的攻击性话语的挤压之下，彻底迸发出来了。显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性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存在，它和环境有关，和话语有关。

三、人性的弱点：遗忘，扭曲的记忆与对自我的原谅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特殊高压年代就是一个人性的试验场。在这个试验场中，人性中极端的恶与善都会迸发出来。这时候呈现出来的人性之恶，或者人性之善，都具有人性标本的价值。不过，人如何去面对自己曾经的恶，显然又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有趣的话题，而这个，似乎也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模糊》这部小说设置了一个拉长的时空，在完成了特殊年代人性的极端呈现之后，又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软弱。

当叙事者“我”刚见到赵宛民时，“我”的眼中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先生。他热情善良，助人为乐，很热情地招待我。他谈起了他在“极左”年代所受的打击，但是有没有因为这打击而失去对生活的爱——他依然对生活抱有热情，而且现在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了。如果没有“我”得到的关于赵宛民的历史资料，显然，我们会难以相信这样一个人居然曾经利用恶毒举报别人来谋取自己立功。小说写到，赵宛民正在写自己的回忆录，而叙事者“我”也看到了他回忆录的第一部分。在这个回忆录的叙事中，赵宛民并没有对自身展开反思。那么，问题在于，在接下来的回忆录的书写中，在涉及红山文学社这段历史的时候，赵宛民会书写自己曾经冷酷地检举揭发同伴么？至少，在叙事者“我”看来，是不会的。“我猜想，赵宛民正在写的回忆录里，大约不会有这些内容。人的回忆录之所以不可靠，就是因为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在赵宛民这里，我们似乎根本无法看到任何的愧疚或者自责。他很干净利索地把自己曾经构陷同伴的令人不齿的事情从自己的脑海中抹去了。“我”见到赵宛民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热情、坦诚是真实的，而且，还力所能及地为“我”寻找二哥提供帮助。他似乎并没有担心我可能会找到他当年举报二哥的资料，或许，在他的脑海中，他已经把这一段历史剔除了。当然，在这里，也显示出赵宛民这个形象更值得深入反思的地方，即他在反思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反思自我。他用遗忘帮助了自己，彻底忘记了自己过往不堪的行为，从而在自己心目中塑造出自我的健康、善良的形象。

事实上，不仅仅是赵宛民用遗忘来保护自己。值得深思的是，叙事者“我”也展开了对自我的反思和批判。“一个亲人，当你失去他时，才会意识到对他亏欠了很多，此生无法弥补。这部书稿不仅唤起我对亲人的怀念，也唤起了我心底深深的愧疚。张

书铭每次探亲回来,为什么我不能多花费点时间陪陪他,耐心听听他那些啰啰唆唆的倾诉?为什么不能多给他一点亲情,多给他一点温暖?我自以为对他够宽厚够仁爱,其实那只是一种怜悯和施舍。读那些荒唐的来信时,为什么我心里没有同情,只有埋怨和不耐烦?以至于把他的失踪看作是我和大哥的解脱,还觉得对他已经仁至义尽?”小说中“我”的二哥张书铭是多年以前就失踪了的,但是“我”却没有想到去寻找二哥;而是相反,“我”已经忘记了生命中还曾经有过一个二哥,正是这部小说书稿,让我不得不重新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我”曾经有过一个二哥,他现在失踪了,而且,他失踪好多年,我也从来没有认真去找过他。为什么“我”会遗忘曾经饱经磨难的二哥,因为“我”曾经对他所经历的苦难极其冷漠,因为“我”曾经把二哥看作自己生命的累赘。所以,当听到二哥失踪的消息时,“我”本能的感觉是解脱。但是,“我”的良知又告诉自己,自己对二哥做的是不对的。于是,为了逃避自我良知的审判,二哥便被“我”遗忘了。

这种选择性遗忘,还可以扭曲记忆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小说上半部关于二哥历史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任妻子小六的背叛,对于章明来说打击重大。章明怀着“右派”被改正的喜悦,披星戴月回家找妻儿报喜,但是看到的却是一个盲流已经成为自己这个家中的主人。然后,两个人就分开了,而这次妻子的背叛,显然也给了章明沉重的打击。我们当然可以给小六的出轨找出一系列的理由,比如章明作为一个书生,现实生存能力太弱,所以这个家庭需要小六承担太多的责任;比如章明长期在外面劳动,经常不在家里,所以,家里的重体力活儿需要有人承担,等等。我们可以对小六的出轨给予很多理解,甚至同情,但是,毕竟这无法改变小六出轨的事实。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在两个人的关系上,她是对不起章明的。那么,若干年后,历史中的小六,会如何看待章明,看待自己和章明的关系呢?

小说的后半部分,在叙事者“我”探寻二哥的时候,也找到了曾经的二嫂,上半部小说中小六的原型——叶玉珍。在见到“我”的时候,叶玉珍首先发起了对二哥的批判,说二哥无能,除了能在单位上班,什么也干不了;说二哥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需要她出面保护他……而且,在谈到两人离婚的原因的时候,她轻描淡写地说:“笨蛋,窝囊废,还是个小心眼儿!人家谁个女人打火墙?他连个火墙也不会打,我请人帮忙打火墙,他就说我跟人家有什么什么关系。……闹得像八辈子仇人似的,手里掂着铁锨,

捧着跟我拼命。”显然,在这里,她把自己的出轨,对二哥的背叛,解读成了二哥小心眼。当然,言外之意即是,她是没有错误的,只是二哥误会了而已。而且,她把两人离婚的原因,推到了二哥身上,“他改正了,到库尔喀拉去上班了,我带着孩子去找他,他把箱子柜子锁上,像防贼一样防着我。户口、粮食关系都攥在他手里不给我,连饭也不管。我跑去找他们领导,他才给我饭吃。他上了班,有了工作,就不想要我们了,嫌我们拖累他,想离了婚再找个有工作、有工资的。”换言之,历史上原本曾经给予了二哥沉重打击的来自妻子的背叛、离婚,在曾经的妻子的话语中,成了二哥无能、小心眼,以及有意嫌弃妻子。叶玉珍自然是清楚历史的真相的,否则,也不会在“我”针对她对二哥的批判做出回击之后而哑口无言。人性的复杂在叶玉珍这里又呈现出来。对于这种状况,帕斯卡尔曾经有过一个有趣的说法——人对真理充满仇恨。他认为,人类的本性是爱自己,“其本性就是只爱自己并且只考虑自己”。然而,如果自己并不完美甚至充满错误,“他就要尽可能地摧毁他自己认识中的以及别人认识中的真理;这就是说,他要费尽苦心既向别人也向他自己遮蔽起自己的缺点,他既不能忍受别人使他看到这些缺点,也不能忍受别人看到这些缺点”^{[2]53}。某种程度上,或许叶玉珍对二哥还心怀愧疚,但是,她必须要有合适的理由来给自己和二哥的离婚做出一个解释;用这个解释,对自己,对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所交代。于是,在她的叙述中,她和二哥的关系,就完全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换言之,叶玉珍是通过故意扭曲记忆的方式,来有意对历史中自己不光彩的行为进行了选择性遗忘。从叶玉珍对二哥的抱怨,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性的另一面,即人总是在有意无意地修改着自己的记忆,从而可以让自己回避掉自己在历史中的难堪,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这个世界。人总是习惯于原谅自己。

其实,无论选择性的遗忘也罢,还是更加强调对自己的原谅也罢,背后折射的可能都是人性的软弱。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即人对自我无法面对的东西的有意无意地逃避。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人性的软弱。叙事者“我”是软弱的,所以,我有意无意地把二哥给遗忘掉了;二哥自己也是软弱的,他曾经那么勇敢,但是在生活的困境中,他给自己曾经深深痛恨的背叛自己的李春梅去信,希望她能帮助自己,甚至还向那个夺去自己妻子的人问好;小说中李春梅和二哥的女儿董红梅也是软弱的,虽然她是一个成功的女商人,虽然她

因为丈夫出轨也愤而和丈夫离婚,但是她却始终无法放下对已经离婚的丈夫的爱,而甘愿成为前夫的提款机。但是,人性的这种软弱显然不应该成为人原谅自己的理由。在这部书的开头,叙事者说,中国人是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从赵宛民、小六这些形象,印证了作者的这个判断。但是,显然不仅仅如此。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仅仅善于忘记,而且还缺乏反思精神,缺乏自省精神。在反观历史的时候,他们都努力去指责别人,展示自己的伤疤,却都忘记了反思自我,批判自我。的确,在强大力量面前,人也许如同一棵芦苇,是柔软的、无力的。但是,人毕竟是会思想的芦苇。如果思想的锋芒从来不指向自身,没有对自我的反思,那么,永远就不会有人类自身的进步。

四、结语

显然,我们可以将《模糊》理解为对特定历史年代进行反思的一部小说。小说中对二哥的历史的叙述,毫无疑问能够达到这个效果——通过对二哥历史的阅读和思考,我们会反思这个时代的问题。但

是,以这种方式看小说,显然也会限制作品意义的可能性。事实上,因为小说是不被授权的话语,所以,无论对某个时代的精神刻画是如何的深刻,也总不能将之作为历史来看待。小说的价值,尤其是伟大作品的价值,在于让每一个读者从中看到自己的人生,在于让每一个读者对社会、对人性有更多的思考。所以,我们显然也可以忽略小说与特定历史年代的对应,去观察、分析小说中所蕴含的一般性原则。那么,在这部小说中,除了对特定历史年代的反思之外,我们更能发现作家展开的对于人性的深入的思考——也正是在这样漫长的时空对比中,人性的多面性才能如此毫发毕现地呈现出来。显然,《模糊》是对历史的反思,更是对人性的观照。

参考文献:

[1] 田中禾. 模糊[J]. 中国作家, 2017(12).

[2] 帕斯卡尔. 帕斯卡尔思想录[M]. 何兆武, 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Representation of Human Nature in the Extension of History

——On the Narration of Human Nature in Tian Zhonghe's Novel *Vague*

LIU Hongzh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Tian Zhonghe's new novel *Vague* adopts the narrative mode of story within story, telling the story of a young man in the era of "extreme - left". The novel seems to write about history, but it wants to express reflection on human nature more. With the help of this unique text structure, the novel opens up the historical distance and allows human nature to be presented in a longer historical space, thus presenting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nature as well as the great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and discourse on individual people.

Key words: Tian Zhonghe; *Vague*; history; human nature; environment

苏轼的家园意识

刘 晗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苏轼一生宦宦沉浮,无论如何困窘,总会营造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家园,在可行、可居、可游的家园中获得身心安放,在真实而困苦的田园生活中,走向性命自得的精神家园。他还将家园扩展至大化流行的自然全体,一生仁爱万物。苏轼的家园意识已超越了单纯地缘意义上对故乡的体认,而体现为更为宏阔的生存本源性意识,蕴涵着浓厚的生态情怀和深刻的生存智慧。

关键词:苏轼;家园意识;生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03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13-05

苏轼一生宦宦沉浮,漂泊不定,每到一处,总会布置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家园,有房舍、庭院、水榭,还有植物、动物,栖居在自然、人文完美交融的时空场域中,尽享生命的本真与存在的意趣。苏轼的家园总与大地有关,它始终在自然中存在,这是中国古人普通而日常的家居观念,但今天看来,却有着历久弥新的价值。无家之感,也许是当代人普遍的生存体验。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将人类赶进逼仄的都市,居住在远离大地的钢筋水泥里,有房而无家,居住而不栖居,身心无处安放的焦虑、孤独,蔓延在世界的角角落落。苏轼在自然之中营造的家园,也许会帮助当代人走出命如浮蓬的生存困境,重新回到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存在之初。因为,中国古人的家园是鲜活的,房舍、庭院、邻里、村落,构成了生动而温馨的生命场景。它又是本体意义上的存在之源,四季轮回的大地山水,以及晴耕雨读的日常生活,流淌着生命本初的真淳和诗意。它更是古人安放身心的精神空间,安居其中,随缘自适,清心素谣。由此可知,中国古人的家园是一个多维度的立体存在,是与整个生存大地息息相关的。

一、家园,总与故乡有关

故乡中的远山、近水,田园、牛羊,还有那方小小的庭院,前后遍植林木,院内花木扶疏,这一切定格

为温馨而浪漫的时空场景,给予生命个体最原初、最新奇的生命体验。无论以后身在何方,哪怕故乡的山河、草木早已模糊,甚或再也无法返回曾经的故土,但故乡始终是个体生命家园意识的起点。正如托尔斯泰在晚年时讲:“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他们在上帝的世界里发出它的光辉的、绿色的嫩芽。”^{[1]24}故乡,承载着生命个体最初的生命悸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人浓厚的家园意识首先指向对故乡的依恋和怀念,“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等诗句俯拾皆是,文人一次次在精神层面完成着对故乡的重构和怀想。故乡,不仅仅是生命个体的原点,更是人类永恒的精神栖息地。苏轼一生历经贬谪,漂泊不定,回望故乡成为他诗词文赋中反复吟咏的主题。诗曰:“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君不见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苏轼尽情吟唱着对故乡的怀念和眷恋之情,峨眉、蜀江成为故乡的代名词。同时,故乡不仅仅有蜀江、峨眉,还有素朴、真挚的乡邻关系,以及浓郁的风土人情,“人闲正好路傍饮,麦短未怕游车轮。城中居人厌城郭,喧阗晓出空四

收稿日期:2019-12-10

作者简介:刘晗(1978—),女,河南遂平人,文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跨学科研究。

邻。”^{[2]162}描写的是“踏青”时节的盛况。“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2]162}展现了“蚕市”的热闹场景。此外，还有“馈岁”“别岁”等，“农功各已收，岁事得相佐。为欢恐不及，假物不论货。”^{[2]159}“东邻酒初熟，西舍豕亦肥。且为一日欢，慰此穷年悲。”^{[2]160}在苏轼心中，故乡是一幅丰富多彩的三维画面，山水草木、左邻右舍、农耕生活勾勒着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

在苏轼的心目中，故乡不仅仅是具体的、生动的，更是身心回归、灵魂安放的栖息地。回归，不仅是走向现实的故土、田野、山林，更是回归一种与自然息息相关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自然精神相流转的精神境界。如果说茅舍、庭院、山水构成了苏轼家园意识的时空场域，那么，农耕生活则是其回归家园的直接路径。“农业劳动均在田野上露天进行，头上是蓝天，脚下是大地，视界是青山绿水、碧树繁花、农家村舍；耳旁是大自然的各种声响：水声、风声、雨声，还有人的笑语、歌声及劳动工具发出的声音。”^{[3]113}农耕生活是一派自然、质朴、甚至带有野性的田园生活。苏轼被贬黄州后，脱下文人长袍，穿上农夫的短衣，自己动手开荒种地，俨然一位农夫。“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此等诗文既写出了苏轼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的农耕生活的艰辛，又流淌着平静、充实、朴素的快乐，在与良苗、嘉木、清泉相摩荡中，人与自然本为一体的密码得以澄明，人类重新返回到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后来苏轼身居要职，生活富足，却常常怀念黄州时期的生活，“屡梦东坡笑语，觉后惘然也”^{[4]1583}。“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4]1711}“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帘外百舌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5]1169}京都的亭台楼阁，比不上黄州的小桥流水，再三叮嘱好友潘彦明照料好东坡：“朴暂出苟禄耳，终不久客尘间，东坡不可令荒废，终当作主，与诸君游，如昔日也。”^{[4]1584}曾登临过人生之巅的苏轼再次被贬到更为荒远的惠州、儋州时，他对人生的体悟更为本真、通透，此时，本色、诗意的苏轼才真正完成。

相较于繁华的都市生活，田园生活显得质朴、粗陋，有着天然的野趣。在苏轼的诗文中，充满野趣的意象随处可见，如“野气”“野阔”“野水”等等，他还自称为“野人”，即使身处繁华的帝都，依然渴望穿越喧嚣寻找那抹诗意：“春色已盛，但块然独处，无与为乐。所居厅前有小花圃，课童种菜，亦有少佳趣。傍宜秋门，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便野性也。”^{[4]1809}生活的野性化意味着生命原初的天然与

直率。程大昌在《演繁露续集》中写道：“古无村名，今之村，即古之鄙野也。凡地在国中、邑中，则名之为都。都，美也，言其人物衣制皆雅丽也……及在郊外，则名之为野，为鄙，言其朴拙无文也。”^{[6]38}在一定意义上，“野”与“文”相对。与文明的“都邑”而言，“郊外”更接近田野，朴拙，鄙陋，但郊野枝丫交缠，盘根错节，形态各异而又相互依存，更具有生命的质朴，保存了自然的多样和统一，呈现为生机盎然、大化流行的气象。正因此，中国文人才有着对故乡永恒的眷恋、对自然不变的渴盼。在一定意义上讲，远离都市的田园村舍为人类提供了最佳的精神栖居地。“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陶渊明一生困顿，但田野、庐舍、耕种、读书又何尝不是试图于喧嚣、伪饰的文明生活中张开自然之网、生命之网，以抵抗人的异化，回归生命原初的诗意。苏轼一生钟情并追随陶渊明，常常“欲示范其万一”，甚至认为自己是陶渊明之“后身”，“只渊明。是前生”^{[5]1160}。苏轼与陶渊明的相遇，显然不仅仅是人生际遇的相似，而是有着更为内在的精神契合。“半醉半醒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2]2322}此诗乃苏轼在儋州所作，并非和陶诗，但全诗流淌着陶渊明自然的生命气息，却又全然东坡性情；卸去了繁华与纷扰后，自然、真淳、天然的本性才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也许，从荒野中走出的人类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其生命的根源处还在那远山、碧水、林莽、沧海中，渴望始终保持着同自然的亲密联系，过着和山水融为一体的自在生活。

二、家园，具化为安居之所

但苏轼终未归乡。作为官员，苏轼是不能“任便居住”的，又屡遭贬谪，其人身自由颇受限制。同时，其父苏洵也表达了不愿回蜀、家族迁徙中原的愿望。对于大多数中国文人而言，故乡，实际上成了永远回不去的地方。在人生如寄的生存境遇面前，我们的家园到底在哪里？生命个体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园。苏轼最终悟得“此心安处是吾乡”，将对故乡的皈依置换为任何可以“安心”的所在。如果说，故乡是苏轼家园意识的起点和终点，安居之地的庭院则建构了此在的家园，它是个体生命展开的具体场域。朱刚曾说：“对于北宋士人来说，宦游也好，贬谪也好，总要不断迁徙，在一个地方长住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贬谪中的士人也经常是赁屋而居，随时准备离开的。”^{[7]286}但苏轼欢喜买田筑屋，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每到一处，苏轼总是忙着营造真正属于自己的一方家园，即使遭贬期间，面临巨大的生

存困境,依然在黄州开东坡,建雪堂,“雪堂之前后兮,春草齐。雪堂之左右兮,斜径微。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硕硕”^{[4]412}。在惠州,“某又买得数亩地,在白鹤峰上,古白鹤峰观基也。已令砍木陶瓦,作屋三十许间”^{[8]73}。“雨后晴和,起居佳胜。花木悉佳品,又根拔不伤,遂成幽居之趣。”^{[8]73}在儋州,“买地筑室……为屋三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5]3425}。苏轼对此甚为开心,诗曰:“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2]2311}有庐,有园,有建筑,有植物,有山水,应该是苏轼对家园的基本诉求,理想中的安居之所,就是与自然相亲相和的生命之所,它有温情的建筑,绕屋的植物,还有刻在庭院中的生命印迹。

《说文解字》释曰:“家,居也。”“家”本义为门内的居室,属于建筑形制之一。按照徐中舒的解读,“人之所居”的地方为“家”。《尔雅·释宫第五》:“牖户之间谓之扃,其内谓之家。”^{[9]204}很明显,“家”乃被区隔的私人化空间,用于人身的安排和停顿。王耘曾说:“家所适应的是‘居’的概念,居家居家,所居即其家,室内即是家。没有屋室,没有居所,无家可言。”^{[10]7}建筑从来且永远都是家的必需品,没有“室”,何来“家”。苏轼想方设法建造房屋,实乃生命个体身心安顿的前提和保证。“家宅是身体居住的地方。它是空间定位的一个原点,是个体生活世界的中心,是相对安全、宁静、幸福的原初承诺。”^{[11]189}有了房舍,人类不再“穴居而野处”,才有了家园之感。同时,苏轼营造房舍,更是敞开了诗意居住的场域。苏轼躬耕于东坡,作雪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4]412}。“趣”在哪里?在雪堂与荒野之间。“雪堂之前后兮,春草齐……考槃于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机。负顷筐兮,行歌儿采薇。”^{[4]412}如果我们乐意作一幅画,画中有春草,有清泉,有斜径,有陶瓮,还有身穿葛衣芒鞋的人,唱着歌儿采摘野菜。苏轼通过“室”“堂”的布置,将蓝天、白云、草木、虫鸟等等引入房舍之中,从而营构了没有中心、没有目的、浑整统一的生命整体,自然万物(包括人)皆自我绽放,自我圆满,共同营造出心心相印的生态世界。建筑终归被心灵化了,被情趣化了,家园终究带着天然的温情和浪漫。

在阐释海德格尔的“栖居”概念时,鲁枢元从诗学意义的层面将其高度概括为“筑造、居处、栖居”,三者是同为一体的。人生于天地之间,筑造居处必然在自然环境中展开。因此,“园林”,在我看来就是‘家园’与‘山林’的有机整合……‘居家’与‘在

野’同时成趣,人与自然和谐相得,这便是‘园林’内涵的价值和意义。‘园林’差不多就等于海德格尔梦寐以求的‘栖居’”^{[12]311}。鲁枢元认为,“囿”“圃”“园”等居家之所已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重新将山石、湖水、林木等请入其中,自然野趣与人文情致相得益彰,共同组成人类的栖居之所。“园林”就是通向“诗意栖居”的林中之路,模山范水成为回归本真的天然诉求,房舍与园林的有机结合就成为理想的生存居所。中国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方式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古人的居住观念,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将山水草木引入其中,饮食起居皆在生机盎然的自然中徐徐展开,池、水、堂、亭、廊、轩窗、曲槛,还有鱼、莲、桃、李等动植物,自然天成的野趣与层级分明的人文融为一体,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人诗意栖居的生动画卷,人安居于斯,劳作于斯。这也许就是农耕文明的诗意。

“文人构园,其主题思想就在于求得人与自然的理想的关系。”^{[13]341}身处天地万物之中,不一定就能获得“心远”的生命体验,但自然山水确实有效阻隔了世间的喧嚣,在社会秩序和个体存在之间铺设了一条天然的缓冲带,士人可以盘旋、流连,与天合一。其实,大部分士人并不能拥有一座曲水流觞、亭台成趣的私家园林,更多的居所只是普通的住处,但无论房舍的样式,庭院的布置,还是草木的栽种,都有着精心的设计和安排,既有着合乎自然风水的要求,又有着怡情悦志的考虑。苏轼,可谓出色的园林设计师。嘉祐七年,苏轼在凤翔新葺小园,园中开三池,皆引泔水,化生出短桥、轩窗、曲槛、莲鱼、桃李等,且和亭、堂、厅、廊相得益彰,既有着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又有着内在的生机和情趣。在密州,苏轼营造“西园”,园内有西斋、西轩等建筑,并广植花木、叠山理水,还有菜圃、鱼池和种粮之地,集起居、休闲、农耕于一体。有着浪漫情怀和生存智慧的苏轼,对居住场所的设计和布置,既有着栽种瓜果蔬菜满足生活所需的实际考虑,也有着引入亭台楼榭满足赏心悦目、心神俱佳的情感需求,更有着对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追思与渴慕,自觉将生命个体安置于天空之下、大地之上,极力营造良好的栖居环境,缔结“好的因缘”,彰显出超前的生态意识和深刻的生存智慧。

三、家园,永远在大地上

在《水调歌头》中,苏轼如此慨叹:“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5]1150}苏轼是浪漫的,他渴望摆脱身体的局限,自由遨游于天地之间。他又是高度理性的,始终将家园深深地扎根于大地之上。苏轼的家园从来不是凌虚高蹈的,而是有着

坚实的大地依托。“大地不是身体活动的背景，而是其生命空间。”^{[11]203}大地成为一种象征和隐喻，意味着生命、存在、诗意，是人类家园的承载和依托，人、房舍、动物、植物皆在大地上生长、延宕、周转、圆熟，尤其对于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华民族来说，更是如此。曾繁仁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古典形态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中国的原生性文化”^{[14]3}。可谓洞见深刻。中国古人相信，人类生存于大地之上，大地是养育万物的唯一家园。《周易》将大地提升至人类母亲的高度，充满了对大地的敬畏与歌颂。“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15]37}“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15]43}《周易》从大地的地位、品性、作用等层面进行了阐发，可以看作中国古代大地伦理观念的素朴表达。中国古人的家园与大地有着天然的联系，与整个自然存在紧密相关。“农民祖祖辈辈生活、耕作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既是这片土地的所有者，又是这片土地的劳作者，这里是他们的家，是他们生命的根。可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不仅联系着他们的收成、他们的生活状况，而且还联系着他们的情感记忆，联系着他们的精神生命。”^{[3]113}中华民族对于土地的热爱和守护，应该是由衷而本然的。

正因为有着浓郁而强烈的家园之感，才有不忍之心，才有对大地本然的热爱和敬畏。苏轼在《东坡八首》中写道：“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2]1081}苏轼还说道：“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而地方得完。其食足而有余，则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4]339}苏轼认为，如果过分盘剥土地，就会破坏土地的自然恢复能力，终致土地日益贫瘠。人类不能一味地索取，而需要善待大地，使其休养生息，才能充分发挥大地的生养作用。这应该是农业文明时代极其宝贵的有机生命观。人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就隐含着保护大地的本然诉求，人类只有努力守护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营造一方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美好地生存于大地之上、世界之中。曾繁仁曾说：“中国古代的‘家园之美’是紧密地与自然生态之风调雨顺、万物繁茂、物产丰富、国泰民安等联系在一起的，更多地包含了自然生态的亲而形成的人的美好生存。”^{[14]9}美好的家园等同于谷物丰登，草木繁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始终是三位一体的，只有这样才形成有机统一的生态整体，才能呈现鸢飞鱼跃、人鸟相呼的家园之美。因此，守护大地，就是

守护我们的家园。如此素朴的情感却需要当今生态伦理的介入被强制唤醒，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利奥波德强烈呼吁“土地伦理”，即把道德关怀推及至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他认为，整个自然存在是普遍联系的生命共同体，不仅仅有人类，还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16]193}。而由土地、水、植物和动物等组成的大地是人类的家园，善待大地就是保护人类唯一的家园。如此，对于土地的尊重和保护，就是对于万千生命的保护和对人类家园的守护。

“一个热爱土地的民族，他所热爱的绝不仅仅是土地本身，而是从土地出发，向这大地上生长的动植物延伸。自然界的动植物以其生机盎然形象表征着大地的生殖力，暗示着它存在根基的坚实和深邃。”^{[17]325}因为，人类生存的家园，不仅仅是脚下的这片黄土、红土或黑土，而且还包括所有由这片土地生养的植物、动物，乃至空气、水、岩石等。“言说大地时，我们时常遗忘了属于大地的事物——树木，山脉，建筑，河流，动物。它们并非位于大地之上，不是可以脱离大地的事物，而是大地的一部分。它们的高度就是大地的高度。大地是一世界。我们在此世界之中。在大地一世界之中，这才是表述大地的恰当方式。甚至，天空也属于这个世界。”^{[11]205}鸟儿飞，鱼儿跃，竹子在拔节，小草在破土，白云在嬉戏，如此鸢飞鱼跃、生机盎然的世界，怎不引发人类的欢喜之心和热爱之心呢？对于人类而言，一个活跃的生命世界更加充满温情和诗意，“白云被看成天使的翅膀，星辰被看成调皮的精灵，月亮更是人类空间想象的集结区域”^{[17]166}。从大量诗文可以看出，苏轼毫不掩饰他对这一生命世界的热爱之情。“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一生惜生、爱生，从不以异己的态度对待天地万物，而是将自我消融于山水之间，使自己的生命情感与大自然亲密融合。苏轼曾曰：“杀之以时，而用之有节，是待禽兽之仁也。”^{[4]114}充分体现了苏轼的仁爱情怀。“以时”和“节用”是人类对动植物的仁德，就是要节制人类过分膨胀的欲望，充分尊重动植物自然的生命历程，不滥伐植物，不过度捕杀动物。“生命应是自然的基本存在样态。自然的魅力来自生命的魅力。当我们努力捍卫自然时，我们也在试图拯救生命。”^{[18]20}人类与自然万物同处一个生态系统中，“‘家园之美’就是一种包括人类在内的稳定、和谐与美丽的生态共同体”^{[14]9}。大地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场所，是人类唯一的家园，同时也是万千有机体的家园，人类只有

爱护自己的家园,使之具有“稳定、和谐与美丽”,才能获得“在家之感”。如此,苏轼的“家园意识”体现为较为宏阔的生存本源性意识,其家园不仅仅是安居身心的那所房屋,及环绕四周的动物、植物,还有更为辽阔的山川石木、云雨风雷,它们皆在家园中,所有存在构成了彼此联系、共生共荣的生命环链。

人类的家园在哪里?应在那山、那水、那人中,应在天朗气清、草长莺飞中,应在晨起锄禾、暮归炊烟中,可当“城市”与“乡村”、“人文”与“自然”日益作为相互对立的术语风行全球时,乡土、田野、茅舍日益成为文明竭力要规避和抛弃的存在时,人类必定要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人类文明,将何去何从?苏轼对家园的体认也许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苏轼终其一生躬行于天地之间,其家园早已遍布于广阔的天地之间。苏轼对家园的认知,早已超越了单纯地缘层面的厘定,体现出深邃、阔大的大地意识,此始终与存在有关,既包括房舍、动植物、田园等具体的场所,更指向生命的真意,存在的本然,以及自然、自得、自适的人格境界。如此,苏轼对具体生存场所的营造,及对天地万物的仁爱,构成了其家园意识的显在层面;对本真存在、自然人性的回归则构成了较为隐秘的存在,二者互为表里,须臾不可分离。海德格尔曾说:“‘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惟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予。”^[19]人的存在就是“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历经文明淬炼的人类终将回归大化流行的自然生命,回归自然真淳的生命自我,回归最切近人类真实生存状态的诗意,重新走入自然,摆脱对大地的征服与控制,在生生不息的自然万物中敞开身心,感受山川草木的荣枯盛衰,体悟自然内在的秩序与圆满,从而遵从“生”的意志和目的,美好地生存于大地之上,抵达与天合一的生存胜境。

参考文献:

- [1] 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M]. 宋蜀碧,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
- [2] 苏轼. 苏轼诗集[M]. 孔凡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 陈望衡. 我们的家园:环境美学谈[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 [4] 苏轼. 苏轼文集[M]. 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 苏轼. 苏东坡全集[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 [6] 程大昌. 演繁露续集:卷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7] 朱刚. 苏轼十讲[C]. 上海:三联书店,2019.
- [8] 王如锡,编. 东坡养生集[C]. 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 [9] 胡奇光,方怀海. 尔雅译注[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10] 王耘. 中国建筑美学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
- [11] 王晓华. 身体诗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2] 鲁枢元. 生态文艺学[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 [13] 沈福煦.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4] 曾繁仁. 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5] 陈鼓应,赵建伟. 周易今注今译[C]. 北京:中华书局,2015.
- [16] 奥尔多·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M]. 侯文蕙,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 [17] 刘成纪. 自然美的哲学基础[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 [18]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 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M]. 庄晨燕,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5.
- [19]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责任编辑 刘海燕)

Su Shi's Home Consciousness

LIU H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 China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Su Shi's life is ups and downs, no matter how embarrassed, he always creates a home full of poetry and painting, and gets his body and mind settled in a viable, liveable, and swimable home. In the real and difficult rural life, he moves towards a spiritual home of self-sufficiency. He also expands his homeland to the nature, and loves all in his life. Su Shi's home consciousness has transcended the recognition of his hometown in a purely geological sense, and has been embodied in a broader sense of the origin of existence, which contains deep ecological feelings and profound living wisdom.

Key words: Su Shi; home consciousness; ecology

东野圭吾的 *Angel* 与生态悲观主义

常如瑜

(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江苏常州 213001)

摘要:作为东野圭吾“毒笑”小说系列的经典篇章,*Angel* 以怪诞离奇的内容挑逗读者的神经。小说揭开了人类虚伪的生态保护运动的伤疤,相比作者其他讽刺社会生活的短篇,该小说从人类社会中跳脱出来,回望人与整个自然的关系,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人类集体,小说的批判态度可被视作一种生态悲观主义精神。东野圭吾的生态悲观主义态度是十分激进的,他对所有由人类发起的生态保护运动本身也持保留意见。

关键词:东野圭吾;*Angel*;生态悲观主义;荣格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04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18-04

所谓生态悲观主义,即指对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这一生态理想的否定性观念。作为东野圭吾“毒笑”小说系列的经典篇章,*Angel* 以怪诞离奇的内容挑逗着读者的神经。外星生物的对话,揭开了人类虚伪的生态保护运动的伤疤:

只要对那颗星球上的统治生物此前的行为模式稍加分析,很容易就可以料想到:他们表面上摆出重视其他生物的姿态,骨子里却极端反复无常,任性妄为。是否允许一种生物存续,全视对自己的利弊而定。^{[1]126}

东野圭吾更像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生态悲观主义者,他不相信人类能够真正履行保护环境和其他动物的承诺,因为这个承诺的出发点本身就是自私自利的。在他看来,人类对环境的保护运动永远无法越过自我中心主义的精神围栏——它来自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中深度自私的集体情结。

Angel 具备生态警示类作品所共有的“奇观”性特征,夸张的想象力和成熟的写作手法让小说的情节显得既“陌生”又熟悉,故事离奇怪诞,却又令人信服,因为这类“故事”似乎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故事的发展也符合传统小说“出乎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的规范。在多次意料之外的翻转之

后,小说的悲观情绪也愈发浓烈。相比作者其他讽刺社会生活的短篇,该小说的批判性要更强,范围也更广——作家从人类社会中跳出来,回望人与整个自然的关系,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人类集体。

概括而言,作品的批判态度可被视作一种生态悲观主义精神。它是对一切生态保护运动和生态保护观念的质疑。该观念生成于面对生态问题时的悲观心理和否定性情结。在持有该观念的人看来,人类的存在本身对自然万物构成了永久性的破坏和不可逆的影响。在这个角度而言,*Angel* 更像是一种另类的生态文学的生命写作^{[2]9-14},是作家悲观主义生态观念的投射。

一、生态悲观主义的起源与演变

Angel 就像一部缩写的人类探索自然的历史,作家所写似乎并非小说,而是“致力于以生态互相依赖性为基础来阐述历史”^{[3]3}。从产生到繁衍再到濒临灭绝,*Angel* 与人类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随着叙事的深入,*Angel* 的悲剧史渐次展开。

最初被发现的时候,*Angel* 这种美丽的动物被赋予神圣的美感,它被誉为天使般的存在物,它的名字也证明 *Angel* 的美对发现者灵魂的震慑。对 *Angel* 的欣赏同人类设立自然保护区的动机是一致的,

收稿日期:2019-12-10

基金项目:江苏理工学院人才引进项目(KYY18554)

作者简介:常如瑜(1982—),男,山西太谷人,文学博士,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跨学科研究。

最早一批的自然保护区便是源于人类自然审美的需要,因为秀丽环境能够让人类享受到审美的愉悦和心灵的宁静。

接下来,它的美便逐步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它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它丰富的表情,不仅能够感染受众,还能让观者在它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它是按照人类的需要创造出的完美生物,长相与人接近:

Angel 拥有五官,但依学者的看法,那并非五官,而是头部的突起。实际上它没有眼睛和鼻子,只有一张嘴巴,但嘴巴上方凹凸不平,凹处很像眼睛,凸起则俨如鼻子,头顶还长有头发。所有这一切组成的面孔,同传说中的天使别无二致,而它那雪白柔软的躯体也极像人类的婴儿。^{[1]86}

在外貌上,Angel 拥有与生俱来的亲和感,它被认为是所有生物中最接近人类的物种,同时,它又拥有超越人类、被人羡慕的特征——天使羽翼般的鳍(象征神)。因而,它被命名为 Angel 完全符合人类集体的心理需要。即便它的出现与核辐射之间的关系令人质疑和担忧,大多数人也宁愿欺瞒自己,相信这种生物是自然的馈赠。

Angel 的审美属性混杂着人类自私自利的天性,参观者对它的欣赏不止于赞叹和远观,在人类本性的驱动下,它很快成为某些人的私属品,成为区分身份地位的象征。当需求量不断增大之后,自然生长的 Angel 注定被人工养殖的 Angel 所取代,它的命运也同其他生物一样不可避免地自然栖息地走向城市。在发现 Angel 以塑料为食之后,它的悲剧如期而至。因为食物容易获取,Angel 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普通家庭豢养的宠物;久而久之,有些人对它的兴趣从单纯的审美和感官愉悦,转变为食欲。对人类而言,变成食品的 Angel 退化为自然中的一种普通生物,它与其他生物并没有本质差别,它在食物链中的地位也并没有因其出众的外观而高于其他生物,它一样可以成为人类的盘中餐。

从审美到实用,Angel 顺理成章地成为服务人类欲望的工具。Angel 的作用越多,它们的命运就越悲惨。它们原本就产生于变异,又不得不接受人为控制下的进一步变异。那些食用了塑料或化学制品之后的 Angel,已经不再像原始的 Angel 具有自然甜美的味道,相反,却充满了令人恶心的汽油味。

直到发现 Angel 能够吸收核辐射,它的命运似乎才峰回路转,但是它的地位仍旧无法与其最初呈现在人类面前时相比。推而广之,如果从生态发展

史的角度来看,Angel 与人类的关系变化生动地反映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演进。对此种关系的前景,东野圭吾持否定的态度。在故事中,人与 Angel 的关系就是在反复的对抗与妥协中不断恶化,最终走向死胡同。Angel 因此具有史诗般的生态隐喻意义,人类对 Angel 态度的变化同人对自然态度的演变是一致的。

总之,人类对 Angel 的情感即人类对自然的情感,其历史可以概括为:从审美主义到实用主义,再到审美与实用的复杂结合,最后演变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第二个阶段是最关键的转折期,自然物对人类的意义一旦从审美下降到实用,温情脉脉便被功利和实用所取代,最终走向对立。因审美引发的灵光一现的亲 and 感,也很难疏解人类集体的自我中心主义心理和无休止的欲望。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社会主流观念面前,审美和伦理的需要显得弱不禁风,美与善很快就被贪欲所吞噬,甚至被自我中心主义观念所利用,成为证明人类拥有高于自然万物的智慧和权力的证据。人类成为“唯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之环境的生物”^{[4]13},所有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描绘从一开始便蒙上悲观主义的色彩。

二、反复失败的调适

在人与 Angel 的关系的复杂变化中,Angel 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人类却在不停地变化。人类始终是主动的——主动去接受 Angel,主动改变 Angel,并不断修正自我认知。作为讽刺小说,人类的自我认知并没有带来环境的改善,相反,随着人类对 Angel 态度的变化,小说的悲观气氛愈发浓重。

贪婪自私的人类和无辜天真的动物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是人类食用 Angel 的行为,更让读者不堪忍受。东野圭吾却将这个过程写得荒诞不经,他用对话的方式来描绘两人残忍地肢解并吞食 Angel 的情节,他们吃掉 Angel 的目的仅仅是出于好奇,另一个人的口头阻止更像是幸灾乐祸的怂恿。他们象征着人类的原始欲望,在那一瞬间,建立在本能欲望之上的猎奇心和物欲战胜了美的愉悦和伦理的底线。这两人的对话同《等待戈多》中两个流浪汉的对话如出一辙,只不过后者更隐晦,而前者更直接,也更血腥。为了适应自然,人类不断调适自我,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吞食 Angel 成为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唤醒了人类集体心灵深处贪婪和自私的本性,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继核污染之后,人类再次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态危机。

人吞食 Angel 的行为,让这一天使般的生物的

美蒙上了浓重的阴霾,它不再是纯粹的美和纯洁的象征,而被赋予了可怕的实用价值。接下来,人类与 Angel 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人类希望发掘 Angel 身上的每一种价值,Angel 则为了自身的生存努力与人类进行“搏斗”。

关于 Angel 能否被食用的投票,看起来也体现出人类社会的自我调适机制:

食用 Angel 究竟是对是错,即将揭开分晓。结果是反对派占了多数,从此 Angel 被指定为特别保护动物,严禁食用。^{[1]106}

但是,被“过度”保护的 Angel 很快又成为人类的“敌人”,它们吞食各种化学制品,成为人类新的灾难。对 Angel 的保护运动也成为笑料,“环境保护团体和动物保护组织之间的争论永无尽头”^{[1]115}。喋喋不休的争论无法解决围绕 Angel 产生的生态问题,“认定 Angel 为人类历史上危害最严重的生物,此时距制定它为特别保护动物还不足十年”^{[1]112}。随着 Angel 数量的减少,屠夫又换上了保护主义者的外衣;Angel 仍旧是那个看上去如同天使的生物,而人类的自私和精神困境却暴露无遗。

其实,这样的调适也无法使问题得到解决,相反却产生了更多的问题。人为区分食用化学制品变异后的 Angel 和原生的 Angel 的做法只是自欺欺人,原本主张保护 Angel 的环境组织甚至要求连原生的 Angel 也都铲除掉。这表明,人类从来没有真心热爱过这种生物,只是把它当作延续自我生命和种族的工具,所谓的环境组织也不过是掩盖人类自私本性的遮羞布。推而广之,人类对待 Angel 如此,对待其他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态度也莫不如此。

尽管 Angel 中部分生态保护主义者像环境伦理学家那样,强调动物的权利和人类的责任,但是他们的立场仍然没有走出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仍然只是因为保护 Angel 这件事是符合人类“长远利益而达成的协议(契约)”^{[5]148};或者说,是人类为了维护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而进行的妥协,即汤姆·雷根所批评的人类对动物的“间接义务”。

总之,在东野圭吾看来,人类对自我的调适是失败的。自然始终如一,并未因人类历史的变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类却始终未能如其所愿地融入自然。同其他生物相比,人类似乎总是显得格格不入,即便是声势浩大的生态保护运动,也只是加剧了人与自然万物的矛盾,以至于成为人类认清自我的障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态保护运动反而促使人类的虚荣心过度膨胀,自诩为自然守护者让人类陷入可

笑的“统治者般”的自我沉醉中。

三、作为他者的反思

Angel 无法解决 Angel 造成的生态灾难,在小说行将结束的时候,东野圭吾选择跳出人类世界,远离充满欲望的、残忍的地球,站在他者的立场表达愤怒和担忧。外星生物的出现降低了 Angel 结局的悲剧性,让原本难以接受的恐惧转化成一种深度的反思。东野圭吾带着读者逃离地球,让陷入忧虑的读者获得短暂的喘息。

Angel 在开头便暗示悲剧结局的必然性:造成人类陷入环境困局的原因正是人类自身。Angel 本身就是核辐射过量而产生的变异生物,又因为能够吸收核辐射而受到人类的重视。科学家可以探知 Angel 产生的原因,却不愿研究人类制造核能的心理动机。外星生物将其解释为“他们在环境方面的最大追求,就是尽量让自己居住得舒适,也因此才会去清除放射性物质”^{[1]127}。自我中心主义的观念始终是人类社会认识自然的出发点和主流观念,人类总是在犯下一个错误之后,用更多的错误来弥补。

在外星生物看来,人类并非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有的生物,如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揭示的,智人诞生于七万年前,而此时距离宇宙大爆炸过去了 130 多亿年,地球也已经形成了 30 多亿年。^{[6]3}人类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消失的生物,因为无论人类多么努力,还是无法“打破生物因素的限制”^{[6]389},不仅个体死亡,群体也会随着自然的演进逐渐消亡,甚至会被新的物种所代替^{[6]396},况且人类的欲望正在将自己推向危险的深渊。因此,人类只不过是自然变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从他者的眼光,人类的辉煌历史被东野圭吾描绘得可笑而幼稚,使小说的悲剧性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Angel 曾是人类的试验品,为了更充分地利用这种生物的价值,人类不断探索和发现它的用途,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确如愿以偿,并以此为荣。只是人类却不知道,其实自己也是他人的试验品。Angel 就像实验室中测试小白鼠各项机能的药物,而被测试者就是人类社会,实验员则是遥远的外太空里拥有更高智慧的生物。

在东野圭吾看来,生态保护运动也只是人类延缓族群生命、进一步满足贪欲的手段而已。在自我中心主义的精神困局中,无法自拔的人类是不可能真正考虑到其他生物以及整个自然的,生态保护行为很容易成为满足人类物欲的方法,成为实现另一种经济价值或权利的工具。在这种前提下,生态保护运动只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可怕循环——产生生态保护观念的源头便是对生态的破坏,而生态保护的

结果却只能对自然造成更大的损害。Angel 的出现,就是人类为了保护环境、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减少污染而广泛开发核能之后的“副产品”,它虽然能够吸收核污染,却无法吸收人类内心的贪欲。在人类没有逃脱自我中心主义的精神樊笼之前,生态问题是永远无法彻底解决的。即便核污染被 Angel 控制了,但是谁又能料到下一种污染何时来到,而且下一种污染方式对人类的影响可能更加可怕。

总之,东野圭吾辛辣的讽刺和悲观的幽默让读者感到绝望。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很少就故事本身发表任何评论或暴露作者的感情,但是在 Angel 的结尾,他却忍不住宣泄自己的情绪——借外星生物之口,痛快地宣泄了他对人类的不满,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存在的意义。对于生态保护运动和生态组织,他也表达出强烈的失望之情。在 Angel 中,读者似乎看不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能。

四、余论

在 Angel 中,东野圭吾表达了彻底的生态悲观主义态度,其观念是十分激进的,他对所有由人类发起的生态保护运动本身均持保留意见,他揭穿了以生态保护为名却对自然进行二度破坏的伪善者的面纱。相比作者的其他批判小说,Angel 对人性之恶的抨击最为炽烈:它毫不留情面地否定人类的未来,对人类所有调适自我与环境关系的努力都嗤之以鼻,它无视一切以生态保护为名的行动,因为它看不到这些行为背后的真诚。

在这部弥漫着嘲讽意味和悲观情怀的小说里,东野圭吾的毒笑声恣意蔓延,从个体扩散到人类群体,从轻佻的戏谑走向绝望的否定。这笑声就像 Angel 被人屠戮时愤恨的眼神一样,令人毛骨悚然。Angel 曾一次又一次帮助人类走出堕落,它们曾像天使一样浸染观者的心灵,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能

通过吸收辐射以减少核污染对人类的伤害,甚至能满足人类膨胀的食欲,却始终无法度化人类、改变人类贪婪和自私的本性。小说证明,即便是生态保护者对 Angel 的热爱也只是出于私利,人类社会似乎永远也无法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愿望。

在奇观性叙事的伪装下,Angel 的真正面貌是悲情下的冷漠——只呈现事实,却不解决问题。这也是东野圭吾的毒笑、怪笑、坏笑等系列小说的一大特色,可以将之概括为一种“东野圭吾式”的冷漠。远离地球的外星生物就像古罗马决斗场上的看客,人类则是那些为了生存相互残杀的奴隶。读者在唏嘘,作者却在一旁含着泪冷笑,因为他既看不到希望,也无法指明出路。假若依照 Angel 的逻辑,人类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现在他们正在拼命苟延残喘,清除辐射能是最后的挣扎了……进入某个时期后,将会再度爆发肆意滥用辐射能的大战,这次连清除的余地都没有,将直接导致他们灭绝。”^{[1]128}

参考文献:

- [1] 东野圭吾. Angel// 毒笑小说[C]. 李盈春,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
- [2] 胡伯特·扎普夫. 文化生态、文学与生命写作[M]. 蒋林,聂咏华,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3] Anthony N. Penna. 人类的足迹:一部地球环境的历史[M]. 张新,王兆润,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 [4] 克莱夫·庞廷. 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M]. 王毅,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 [5] 汤姆·雷根. 动物权利研究[M]. 李曦,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6] 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M]. 林俊宏,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刘海燕)

Angel and Ecological Pessimism of Higashino Keigo

CHANG Ruyu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01, China)

Abstract: As the classic chapter of the novel series “poisonous smile” by Higashino Keigo, *Angel* teases readers’ nerves with grotesque contents. The novel reveals the scars of the hypocritical movemen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satirical short stories about social life, the novel leaps out of human society, looks back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points the criticism directly. The critical attitude is regarded as a spirit of ecological pessimism. Keigo’s pessimistic attitude is radical, and he has reservations about all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movements initiated by human beings.

Key words: Keigo Higashino; *Angel*; ecological pessimism; C. G. Jung

人工智能在家庭服务业的应用问题及趋势研究

朱 涛,董 凡

(河南大学 经济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在家庭服务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在家庭服务业的应用问题及趋势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存在技术突破不足、伪智能化等问题;提出智能家居存在智能化、简便化、安全化等发展趋势。

关键词:人工智能;家庭服务业;应用问题;发展趋势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05

中图分类号:F426.6;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22-05

一、引言

国内有很多学者都对智能家居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研究,陈柏霖(2019)认为智能家居的快速发展是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之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快速发展的背后,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国内智能家居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高润鑫(2019)认为国内人工智能的发展缺乏理论和人才的支撑,而且需要用到的数据资源并不集中;郑昕怡(2019)认为智能家居产品应该更多关注“421家庭模式”,适度降低适用门槛,拓展更多适合老年人和儿童的智能化应用;赵瑞等(2019)指出智能家居应该展现人性化的特点,进而才能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李山(2019)通过分析得出我国智能家居市场中的产品生产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平台化运作还未成形;薛鸿彬等(2019)基于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的现实背景,并结合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的特点进行分析,得出未来智能家居系统会拥有更加强大的感知能力,而且感知能力的重要性也会愈加凸显;曹杰等(2018)发现我国智能家居行业存在产品成本偏高,消费门槛过于局限,产品人性化程度不高等问题;芮靓(2018)认为智能家居之所以尚未普及,正是因为卖家宣传不足、销售渠道不合理和技术突破的不足。

虽然国内对于智能家居行业发展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这些研究对于智能家居行业发展趋势的分析却很少,本文不仅对智能家居行业的现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而且对家庭服务业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可以为智能家居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些方向,以期让更多的消费者体会到家庭智能化的益处。

二、人工智能在家庭服务业的应用现状

智能家居最早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首个智能型建筑的建成揭开了全世界智能家居研究和探索的序幕。然而,由于当时我们国家的计算机技术还不够发达,计算机人才也不够多,导致了中国的智能家居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萌芽。截止到现在,智能家居在中国的发展经过了萌芽期、开创期、徘徊期和快速发展期这四个时期。当前,我国在智能家居上的研发和生产正处于快速发展期,特别是在“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支持下,许多从事家电和电子设备制造的公司不断创新生产,在智能家电、智能安防、智能连接与控制等产品的研发上都颇有成效,无一不体现了智能家居行业的快速发展。总的来说,这些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智能家居行业竞争激烈,市场风口即将来临。

收稿日期:2019-12-30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人工智能对传统服务业外溢效应、路径及对策研究”(2019BJJ023)

作者简介:朱涛(1972—),男,河南柘城人,博士,河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发展与公司成长。

目前我国的智能家居竞争格局呈现出金字塔的形状,其中,处于金字塔最顶尖的第一大类是包括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在内的中国三大互联网公司“BAT”,这些互联网公司与传统的家电厂商相互合作,在智能家居产品的软件、硬件和内容等方面都有所涉及,形成了互联网巨头公司与传统家电厂商融合发展、相互促进的局面。处于金字塔中间的第二大类是小米、京东、华为这些专注于生产电子设备的企业,这些公司也与传统家电厂商进行合作,致力于解决智能家居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问题,将传统家电与智能电子设备结合起来,实现智能电子设备对智能家居使用上的总体操控,比如使用手机 APP 远程控制智能家电的运行。处于金字塔最低端的第三大类是海尔、美的、格力、海信等这些专注于生产智能冰箱、电视、空调、洗衣机等传统家电类企业,他们在原有的家电产品上增加了智能化的元素,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给传统的家电产品赋予了“活力”,使得智能家电产品更加便利人们的生活,最典型的就是智能家电的语音控制系统。

第二,智能家居行业发展态势良好,市场规模总量正在不断扩大。

研究表明,中国的智能家居市场规模正在逐年扩大,如图 1 所示,2014 年我国的智能家居市场规模为 720 亿元,当时正处于快速发展初期,智能家居行业各个方面的基础都不扎实。到 2017 年我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为 1428 亿元,同比增长 25.26%。2018 年我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已经达到 1707 亿元,同比增长 19.54%,虽然同比增长率与 2017 年相比有所下降,但是总的市场规模增长量仍然在上升,智能家居市场规模依旧不断扩大。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2019 年中国智能家居的市场规模将会达到 1985 亿元,同比增长率为 16.29%,这样的规模将会是 2014 年规模的三倍。短短五年的时间,我国智能家居行业的市场规模就能实现三倍的增速,这充分地说明了我国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态势良好。

第三,智能家居产品种类多种多样。

如今市场上出现的智能家居产品种类繁多,大到空调冰箱洗衣机,小到开关插座电灯泡,这些智能家居产品大致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娱乐产品,比如智能手机、智能音箱、智能电视;二、安防产品,主要有智能门锁、智能监控、智能开关;三、厨卫家电产品,例如扫地机器人、智能冰箱、智能洗衣机;四、健康医疗产品,包括智能手环、空气净化器、智能水杯;五、室内环境产品,主要是智能电灯、智能窗帘、智能空调等。这些产品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

生活,不仅能够让用户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还能够让现代生活更加便利、安全和环保。但是,这些多种多样的智能家居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比以及受欢迎程度不同。据报告显示,如图 2,智能家居市场上占比最多的是智能空调,高达 27.7%,其次是智能冰箱和智能洗衣机,分别占比 24.7% 和 19.8%,占比较少的是家用摄像头和运动与健康监测产品,只有 0.9% 和 0.2%。



图 1 2014 - 2019 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统计情况及预测
数据来源:2019 年中国智能家居设备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策略规划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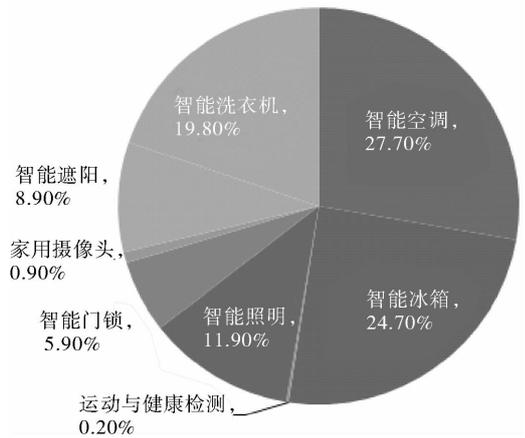


图 2 中国智能家居产品市场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2019 年中国智能家居行业分析报告 - 行业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预测

然而,虽然最近几年国内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速度很快,智能家居产品也越来越多样化和智能化,但是纵观整个智能家居行业,会发现其在研发、生产和使用方面依旧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智能家居技术突破不足,产品兼容性不强。

智能家居的发展需要依靠人工智能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使得计算机拥有人的思维和行动能力,而物联网技术则可以使得家居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目前最为流行的智

能家居就是语音对话产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是小米公司生产的小爱同学和百度公司生产的小度智能音箱,在使用过程中用户可以随时与它们进行语音交流,从而实现影音娱乐、信息查询、生活服务等几百种多项功能的操作。虽然我国目前的智能家居发展速度已经很快,但是由于我国智能家居行业起步晚、发展慢、技术弱,所以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智能家居市场发展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在产品与产品之间的联系之间存在很大问题,每家公司基本只生产自己公司设计的产品,而没有考虑到其他公司产品的特性,导致各智能家居产品之间的兼容性不够强,因此用户在选择时只能选择一个品牌的产品,而无法选择众多品牌的不同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第二,智能家居产品概念化、伪智能化现象严重。

智能家居作为一个现代化科技发展的产物,应该以实用性、智能化、高质量为目标,而现实中的智能家居大多数只停留在概念化阶段,各智能家居公司对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在宣传时偏向于如何用高端华丽的语言描述该产品的外表和特性,但缺少对智能家居产品实用性的解释,导致不少智能家居爱好者在用过某些产品之后的用户体验感极差。另外一方面,目前的某些智能家居存在伪智能化现象,即智能家居缺少智能性,只停留在概念上的智能化,而且相比传统家电产品来说,后者在使用过程中的操作程序更加复杂,尤其对于老年人,使用这些“伪智能化”产品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例如市场上的某些智能热水器,这些智能热水器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住宅之外提前打开,使得用户一回到家就可以用上热水,但是与传统热水器只需打开遥控器按钮相比,使用手机 APP 操作更加复杂,部分老年人由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会更加青睐传统热水器,这也就意味着如此的智能化是多此一举了。

第三,智能家居行业的安全性及可靠性需提升。

由于智能家居需要依靠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调查,每一位购买智能家居产品的用户的个人信息都会通过各种渠道被收集到,并且在网络上进行保存。众所周知,网络是一个相对不安全的地方,因此消费者的私人信息就极有可能被泄露,甚至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为了一己私利盗用。而且,由于现在的智能家居产品刚刚兴起,智能家居的各个方面发展都不太成熟,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快,所以许多产品的技术和质量都有待加强。不仅如此,多数智能家居产品的后期维护和升级服务

也比较差,大部分消费者在发现产品出现问题时因为过了保修期或者维护成本高而选择丢弃这些智能家居产品,使得用户对智能家居产品的不信任感加强,降低对智能家居产品的好感度。

第四,智能家居行业的统一标准体系尚未建立。

我国的智能家居行业虽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准确来说是最近五年才逐渐扩大起来的,之前的十几年间由于技术和人们接受能力的限制,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一直十分缓慢,因此智能家居行业的各方面体系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厂家互相之间没有存在技术的联系,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互不兼容,各厂家生产出来的同质化产品的价格也都差异甚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智能家居市场的进步。统一的行业标准体系是一个成熟行业发展的标志,是一个成熟行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更是一个成熟行业发展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因此,建立起适合我国智能家居市场发展的行业标准是今后智能家居市场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只有建立健全了国内智能家居行业发展的制度体系,我国的智能家居行业才能拥有更加蓬勃的发展。

第五,智能家居市场的用户过度集中于年轻人。

年轻人群体的接受能力高、对新鲜事物的好奇感强,因此智能家居产品主要被 80、90 后的年轻人购买,然而对于中年人、老年人和特殊人群来说,他们对于智能家居的了解还不够,甚至还不了解什么是智能家居。在他们看来,智能家居的使用方法还不如传统家居使用起来方便,这充分说明了智能家居厂家忽略了智能家居行业的初衷是让用户生活更加便捷、舒适,因此对于产品的宣传力度不够大,导致许多接受能力差的人群对于智能家居望而却步。

第六,智能家居市场上人才储备过少。

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时代,一个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可以大大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尤其是能够大大提高科技创新的频率和规模,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永不衰竭的强劲动力。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看,科技兴国和人才强国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拥有更多的人才储备,才会有科技创新和科技强国的机会。应该清楚的是,我国目前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储备还不够,产品创新能力也不够高,某些产品的核心技术还需要从国外进口才能得到,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而且不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核心竞争力。

三、人工智能在家庭服务业的发展趋势

未来几年智能家居产品出台数量的波动增加也

从侧面反映出了智能家居市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阻碍,而这些阻碍必然包括目前所存在的技术创新不够、操作复杂、安全性低、行业标准未建立、客户过于集中等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成为智能家居行业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重视的。所以,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趋势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智能家居技术更加数字化、网络化。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产品的前途和命运。智能家居产品的智能化特征必须依靠高水平、高层次的人工智能技术来实现,这样才能生产出个性化、数字化、网络化的高质量产品。5G 技术的普及将会是智能家居市场发展的一个转折点,5G 技术高速率、大容量和低时延的特点也将会使得智能家居产品有更广泛的普及。各公司和厂家要抓住这个机遇,将 5G 技术和智能家居产品融合在一起,努力解决智能家居产品现存的质量差、卡顿死机等问题,研发出让客户满意的高质量智能化家居产品。

第二,智能家居产品更加兼容化,操作更加简便化。

现有的智能家居产品之间兼容性很差,一款产品通常需要一个手机软件进行操控,这样的结果就是用户手机上必须安装众多软件才能使用相应的产品,而且一些产品操作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个错误操作就有可能造成产品的系统性问题。在未来的发展和研发过程中,必须简化产品的操作过程,比如可以在第一次使用某些产品时就设定好当用户距住宅多远时自动打开该产品,从而减少操作过程,也会避免用户因忘记而无法使用该产品。同时,产品之间的兼容性也必须提高,各品牌的产品之间要实现互通,最终达到只需在手机上安装一个软件就可以操作家中所有智能家居产品的目的。

第三,智能家居产品更加安全化。

大数据社会下的个人隐私安全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虽然各公司宣称用户输入的信息不会被泄露,但是“黑客”们还是会想尽各种办法获取私人信息,这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个不小的阻碍。所以,用户个人信息的安全有必要得到保障,国家有关部门必须出台更严格的法律政策,各厂家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在生产产品时加入可以防止被盗取个人信息的程序。除此之外,相关体系必须向用户宣传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提升用户的安全意识,使得用户隐私有所保障。

第四,智能家居产品更加普及化。

目前,智能家居产品普及程度不高,其主要受年

轻人的喜欢,然而年长人群却因为认知程度低和不会操作而对这些产品有所顾虑,部分接受程度高的年长人群也只是对健康医疗这类智能家居产品有兴趣。未来的智能家居产品不仅会继续方便年轻人的生活,也将会根据年长人群的特点生产出适合他们使用的智能家居产品,甚至能够研发出使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在同一空间下共同使用的智能化产品,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第五,智能家居产品的性价比更高,维护成本更加合理化。

由于智能家居在我国的发展时间有限,大部分智能家居还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这也是导致智能家居产品无法完全普及的问题之一,同时,较高的维修成本使得大多数用户选择丢弃坏掉的产品,从而对这些产品的质量产生怀疑。但是在未来的几年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提高,智能家居产品的生产成本会明显减少,产品价格也会有所下降,产品性价比会有所提高,用户体验感会不断增强。

第六,健康医疗产品更加功能化,测量更加精准化。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的好坏,智能家居市场上现有的健康医疗产品最受喜欢的是可以检测用户身体状况的手环,然而这些手环智能准确检测到用户的心率、步数,对于用户的血压和突发状况等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的手环需要准确测量用户的血压水平和其他身体健康指数,同时,对于用户的突发状况检测也必须包括,并且在发生突发状况时及时通过已经绑定的联系方式通知家属,以防错过最好的治疗时间。另外,手环在检测用户的身体状况的同时,还通过手机软件向用户推荐适合他们身体状况的饮食计划,从而更好地保护用户的身体健康。

第七,智能家居行业发展更加制度化。

与国外智能家居市场相比较,我国的智能家居行业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较慢,国家对于智能家居市场的发展重视程度还不够。因此,国内对于智能家居市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运行标准和制度体系,各个企业也就没有了统一的生产规则需要执行,这就造成了智能家居市场秩序混乱的问题。在未来,国家相关部门会积极完善和发展智能家居行业的各种制度,包括企业管理制度、行业生产制度、产品销售制度等等,同时也会与时俱进地推进智能家居行业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建设,积极稳妥地推动智能家居行业制度化发展,促进我国的智能家居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语

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家庭服务业的应用范围还比较小,智能家居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存在技术水平低、伪智能化现象严重、安全性和可靠性低、行业标准未建立、用户年龄段过于集中等问题,怎样整合有效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使得智能家居市场快速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应该看好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期待人工智能技术的提升给智能家居行业发展带来的改变,在抓住机遇的同时应对好各种挑战。

参考文献:

- [1]陈柏霖,石浦.智能家居的普及以及受众分析[J].住宅与房地产,2019(24):43.
- [2]高润鑫.人工智能与社会生活[J/OL].科技经济市场,2019(8):21-22[2019-10-28].
- [3]辛佳颖,许宁.论智能化家居对现代家居生活的影响[J].居舍,2019(21):21.
- [4]赵瑞,许晨露,成志杰.中国智能家居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计算机产品与流通,2019(6):99.
- [5]李山.智能家居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J].工业设计,2019(4):152-153.
- [6]薛鸿彬,吴娟,王思谦.人工智能、物联网背景下智能家居系统的思考[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19(12):154-155.
- [7]曹杰,王春梅.浅谈智能家居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电子世界,2018(23):90-91.

- [8]芮靓.智能家居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J].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2018(3):52-54.
- [9]许靖雯,陶瑶瑶,吕红.我国智能家居的发展前景及市场预测[J].北方经贸,2019(9):46-48.
- [10]郑昕怡.江苏地区421家庭智能家居产品调研与消费者评价因子分析[J].设计,2019(17):116-118.
- [11]李奕玥,黄思钊,田雨晨.AI+智能家居技术及其趋势研究[J].电子世界,2019(7):108.
- [12]王颖,韩永红.探析智能化家居对现代家居生活的影响[J].大众文艺,2019(6):140.
- [13]王秀贵,薛书敏.当前我国家庭服务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J].现代农业研究,2019(3):129-130,133.
- [14]张醒.人工智能背景下现代家居产品发展探析[J].中国农村教育,2019(32):99-100.
- [15]熊先青,吴智慧.家居产业智能制造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林业工程学报,2018,3(6):11-18.
- [16]贾宗衡,李常青.浅析中国智能家居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J].中国高新区,2017(18):39.
- [17]吴智慧,张雪颖,徐伟,等.智能家具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J].林产工业,2017,44(5):5-8,13.
- [18]楼志坤.智能家居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J].信息通信,2017(03):283-284.
- [19]李锦诗,黄彦蓉,刘隼.智能家居现状调查与未来发展[J].科技经济导刊,2017(1):13-15.
- [20]朱涛,黄夏.人工智能对传媒业影响及趋势分析[J].中州大学学报,2019(6):1-4.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Problems and Tren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Family Service Industry

ZHU Tao, DONG Fan

(School of Economic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family service industry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Based on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problems in application and tren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home service industry, we find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home industry, such as insufficient technology breakthrough, pseudo-intelligence and so on.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mart homes such as intelligence, simplicity and security.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amily service industry; application problems; development trends

“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南省服务业扩大开放环境分析

杨雪,杨娟,刘银双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服务贸易跃身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必要途径。运用PEST分析和SWOT分析方法,从宏观政策、经济、社会、技术环境及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等方面结合河南省服务贸易现状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以促进河南省服务贸易的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服务贸易;PEST分析;SWOT分析;环境分析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06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27-05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服务贸易在波折中前行,发展呈现跌宕起伏态势,但总体增速快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了贸易与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引擎。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总体目标。2018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指出应通过取消或放宽对交通运输、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领域外资准入的限制,不断推进服务业开放,借鉴北京扩大服务业开放的综合试点经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河南省工业化程度低,地处工业相对集中的平原,服务业发展相对全面。作为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凭借自身在交通网络上的优势,河南省已成为第一个纳入国家战略的机场经济发展先导区,随着物流业的发展,带动其服务业的发展。近年来,地处内陆、不依海傍边的

河南,以建设交通枢纽为出发点,围绕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进行了创新发展。以建设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为突破口,以郑州机场经济综合实验区为开放平台,打通了“空中丝绸之路”,带动了“网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对接了“海上丝绸之路”,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了四路协同并进的开放格局。

河南省作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和支撑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的重要经济板块,是我国第三批获批自贸区,其经济的增长对于提高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随着“服务经济时代”替代“工业经济时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动力,分析服务贸易的环境现状以更好地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提升服务贸易的质量,对于加快经济增长,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意义非凡。

服务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有着关键的作用,因此研究其发展环境以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尤为重要。曹清等(2019)^[1]通过对我国服务贸易现状、趋势进行研究,结合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实践提出了在大环境下树立服务型管理思想,完善服务贸易法

收稿日期:2019-12-16

基金项目:河南省自贸试验区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南服务业扩大开放发展研究”(2019-ZM-T26-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危行业员工不安全情绪的预防、控制与疏导——基于情感事件、情绪承受与情绪承载管理的实证研究”(71573086)

作者简介:杨雪(1966—),女,河南光山人,河南省特聘教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经济学等相关研究。

规体系等适应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林晨(2014)^[2]通过对我国服务贸易形势下的环境分析,提出促进服务贸易与低碳经济共同发展,提升服务业工作效率等措施。鉴于此,本文通过 PEST 和 SWOT 方法,对河南省服务贸易环境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改善服务贸易环境的建议。

二、河南省服务贸易发展概况

2018 年,河南省 GDP 总额达 4.8 万亿元,增速 7.6%,经济总量继续稳居全国第五,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9.2%,较上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在 2013—2018 年年均增长率近 10%,GDP 中

第三产业占比逼近第二产业占比。据 2019 年河南省商务会议报告,2018 年全省服务贸易超 80 亿美元,其中服务出口超 14 亿美元,增长 30% 以上,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 8.7 亿美元,增长 153.5%,其中离岸外包执行额 2.7 亿美元,增长 213.6%。

2001—2018 年河南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如图 1 所示)。其中 2016 年服务贸易进口额达到近 20 年历史新高,比上一年增长 8.8%;进口额达到历史最高,比上一年增长 8.95%;逆差总额达到 292775.5752 万美元,比上一年增长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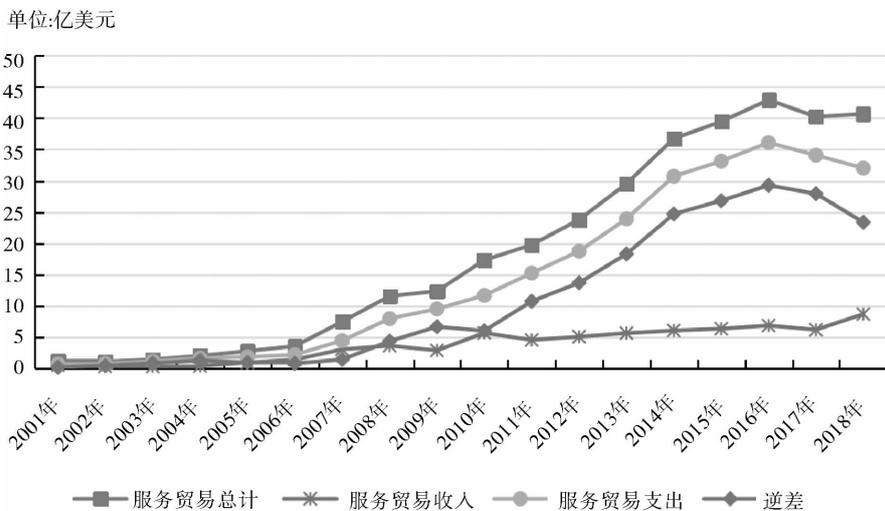


图 1 2001—2018 年河南省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变化情况

三、河南省服务贸易环境分析

(一) PEST 分析

1. 政策环境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顺应当今经济全球化潮流趋势的“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地区间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以及经济上的密切合作。我国服务贸易因为该倡议的提出拥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谋求了更多新的发展机遇。服务贸易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前景极其广阔,将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又一次重大飞跃^[3]。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河南省经济优化转型及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对河南省而言,借力“一带一路”倡议契机,通过改革创新提升河南省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优势以加快建设贸易强省,利用自身市场规模吸引外商为服务业发展注入更大的活力。

2016 年 5 月 25 日,河南省政府第 89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实施意见》,建议优化服务贸易结构,不断增加传统服务贸易出口,逐年提高高附加值服务贸易比重,基本形成具有明显区域特色的服务贸易产业

体系。河南将继续扩大服务贸易规模,力争到 2020 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 200 亿美元,年均增长 15%。一是充分利用国家和河南省发展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专项资金,加大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积极落实与服务出口相关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二是鼓励金融机构和保险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创新金融保险产品和服务。三是探索服务贸易进出口检查机制,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简化审批程序,积极推进服务贸易进出口。这些扶持性政策将有效发挥政策导向、优化环境、提高服务质量、水平和效率的作用。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与物流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2019 年 1 月 22 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1 号)精神,提高河南省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水平,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加快制度创新,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管理水平,提高协调效率,促进绿色发展,进一步提高河南省电子商务和快递

物流的协调发展水平,更好地适应和满足网上购物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一是优化协调发展的政策环境。二是完善电子商务快递物流基础设施。三是促进配送车辆的标准化运行和便捷通行。四是提高快递物流的终端服务能力。五是促进智能标准化的协调发展。六是发展绿色安全的生态链。河南省对服务贸易发展方向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表述,从政策方面对河南省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大力支持。由此可见河南省对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视程度之大。

2. 经济环境

目前河南省产业结构仍以第一、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仍然很低。河南省服务贸易规模较小,但近年来的发展速度较快。新型服务业起步晚且发展缓慢,高附加值类服务产业,如金融、教育等相对落后,仍然处于传统服务贸易发展阶段,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地区间服务贸易发展不均衡、政策体系和统计体系不完善,所以目前服务贸易发展中面临的产业环境较为严峻。

2018年,河南省商务系统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克服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影响,“稳”字当头积极应对,全省商务运行整体平稳,质量效益提升,跨境电商、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居民消费、对外贸易、引进境外省外资金稳步增长,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有力支撑。尤其是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河南省诠释“中原实力”,近8000家豫企选品采购,河南交易团备受客商“青睐”,签约近380亿元。

3. 社会环境

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在影响未来服务需求构成和专业化格局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决定服务需求构成的一个本质要素便是人口年龄结构:不同经济体的人口年龄结构将对服务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发达经济体不断增加的老龄人口需要更多的是卫生、保险服务,发展中经济体不断增长的年轻人口将需要更多的是数字、金融和教育等类型的创新服务,那么满足这些需求的有效途径便是发展服务贸易。

社交媒体平台越来越受到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青睐,“90后”与“00后”这两个群体的用户目前占全社会社交媒体平台主要用户的一半还多,每天平均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也要超过两个半小时,所以衍生出的对创意产品的需求是足够旺盛的。这种需求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特别是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服务提供者,例如河南省的创意产业。

收入水平决定了货物和服务需求的构成,同时也决定了对不同类型服务的需求。另外,随着总体收入的增长,人们的消费行为、消费结构也在产生相应的变化。例如,人们会越来越追求新产品、高质量产品,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富裕的消费者在技术密集型服务(如金融和保险服务)上的支出越来越大,而经济发达的国家往往专门从事这些服务的生产。如今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发展中经济体,以河南省为例,发展势头良好,也都在努力转向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这些必将促使河南省更好地参与到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中去。

4. 技术环境

当前的服务经济时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国民经济随着服务跨境贸易的日益增长,打开了新的机遇。全球在数字等新兴技术层面的进步正在使服务贸易发展上升为更高更深的层次,同时也使服务贸易变得越来越重要。新技术还为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参与服务贸易提供了便利,新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的环境变化同样也对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数字技术也在进一步影响未来的服务贸易。作为最早提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规划的国家之一,中国已建立相对完善的人工智能发展政策体系^[4]。2019年世界贸易报告^[5]指出:首先,数字技术通过为传统上需要面对面互动的服务提供跨境贸易,可能会降低服务贸易的成本。其次,数字技术将使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接触到更多的数字连接的客户,并为服务外包提供便利。最后,数字化使得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之间的区别愈发的模糊。技术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似乎在使基于服务的中小型企业更快进入国际市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中小型企业经常参与的服务贸易类型是数字化服务,例如专业和科学活动。这些趋势将会使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加强力度。

2019年3月26日,河南省郑东新区智慧岛大数据实验区党工委召开2019年度工作会议,指出151家大数据企业通过评审落地智慧岛,涵盖了金融大数据、农业大数据、物流大数据、医疗大数据、教育大数据等多个领域,在河南省数字经济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逐步成长为政策洼地、服务高地、创新宝地、创业福地。2019年5月17日,“智慧岛5G智能公交项目”在郑州市智慧岛公开道路上试运行。由此可见,河南省的数字技术正在逐步加强,技术环境良好,前景明朗。

(二)SWOT 分析

1. 优势

(1)政策支持:2012年5月8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国家商务示范城市电子商务试点专项的通知》,郑州被列为全国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城市。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使河南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从而为河南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而有利的外部环境。2017年6月8日,为加快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促进外贸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实施意见》(豫政办〔2017〕59号),从金融、海关、检验检疫、出口退税、外汇管理、金融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提出了对省外龙头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在河南省新设立独立法人公司实行“一事一议”。

(2)劳动力资源充足:河南省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省份,劳动力资源充足,并且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劳动力价格也相对较低,从而形成了劳动力供应的绝对优势,其中富士康工厂搬迁至郑州便是鲜明的体现。富士康企业的引进,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进入河南省,促进了劳动力增加。

(3)优越的地理位置:河南位于中原,介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之间。它是通往西北五省的门户,也是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一站。它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并作为交通枢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作为地处内陆的河南,围绕打造内陆开放高地这一目标充分结合其交通优势而不断创新,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了四路协同并进的开放格局。

(4)品牌树立意识强:双汇、思念等食品加工以及宇通客车、中信重工、森源重工、郑州航空港、富士康等品牌响亮,已成为河南的特色风景线。除此之外,龙子湖智慧岛引进大数据人才,建立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同时,华为云运营创新服务中心、华为软件开发云创新中心、诺基亚全球交付中心等企业登陆智慧岛,阿里巴巴等国内外知名高端信息通信企业在河南设立了总部或区域基地,这一系列的引进来措施将为河南品牌的走出去以及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服务质量的提高带来积极效应。

2. 劣势

(1)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在河南省进出口贸易中,服务贸易一直是一块短板,以往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以旅游、运输、建筑劳务服务承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从郑州市服务贸易数据来看,2017年一

季度进出口总额达7.25亿美元,同比增长10%,其中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高达50%以上,但以金融、教育、信息服务、计算机等为主的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收入仅为20%,服务贸易结构不均衡。

(2)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河南省服务贸易主要以郑州、洛阳、濮阳、漯河等地区为主,而周口、南阳、信阳等地区服务贸易规模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南省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总体来说,中原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优于全省平均水平,豫北经济区域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第三产业比重较低。豫西、豫西南经济区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三产业比重较低。黄淮经济区产业结构相对滞后。

(3)高质量人才资源匮乏:目前河南省人才流出严重,人才资源紧缺,“985”“211”和“双一流”高校数量少,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高校和培训机构对服务贸易人才的培养意识不强,服务中高端人才缺失,中高端人才培养体系落后,缺乏技术型服务人才。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吸引更多的人才留在河南,为河南的快速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4)品牌集聚效应较低:树立一个好的品牌能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河南省虽然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品牌,比如思念、莲花、三全、宇通客车、中国洛玻集团、中信重工等,但未能与其他品牌产生良好的集聚效应,形成一条完整产业链,从而未能及时拓展国内外市场规模以促进服务贸易的“引进来”与“走出去”。

3. 机会

(1)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已获国务院批准,是全国首个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航空港项目为河南对外开放提供了又一个重要平台,利用物流业发展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促进河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战略定位是国际航空物流中心、航空经济带动的现代工业基地、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现代航空城市、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试验区,形成引领中原经济区发展、服务全国、连接世界的开放高地。国家在港口通关、航空公司权利、金融、税收、土地管理和外包等方面对试验区给予政策支持。

(2)“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河南省经济的优化转型及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利用合作平台,积极建立与沿线地区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利益共同体,为实现互利共赢、服务贸易积极发展、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而努力,为产业结构

优化和贸易质量提高注入动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为河南省充分利用其优势抓住平台机遇这一“助力剂”,扩大招商引资,拓展服务贸易渠道,推进产业转型优化升级,提高其竞争力及服务贸易质量提供了契机。

4. 威胁

(1)如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处于疲软状态,企业发展积极性不高,这样的大环境对以加工贸易业为主的河南来说是极其不利的。服务贸易相关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为服务贸易过程的顺利进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使得当前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贸易其发展尤其艰难。

(2)周边城市教育力量雄厚,比如武汉、西安,其教育水平发达,“211”“985”“双一流”高校林立,吸引了大量人才集聚,而河南省教育水平与周边城市存在一定差距,这便导致人才流失严重,中高端人才缺乏。其他以教育、金融、通信技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省份,比如江苏、广东等,产业基础好且发展势头迅猛,而河南作为农业大省,技术密集型产业起步晚、基础薄弱,在企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3)河南省的服务业增加值不高,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经济发展带动人们提高生活水平、改变消费方式,越来越多人追求高质量、创新类产品和服务。同时,高附加值类产品和服务更新换代快,替代商品的出现仅仅使得大众的需求得到了部分满足,并未缓解高附加值类产品和服务供需关系,由此服务贸易出口带来一定负面效应。

四、加快河南省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第一,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以增大服务贸易规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河南省经济的优化转型及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河南省在传统的服务贸易上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劳务的需求对工程项目承包具有重要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提高河南省服务贸易的出口。总之,借力“一带一路”建设契机,抓住沿线各国的资源禀赋,顺应经济发展新趋势,借鉴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做大做强服务贸易的有益经验,对标世界高水准对外开放与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精准而深入地嵌入国际服务贸易产业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市场,把农业大省变为农业强省,进行更深层次的开放,对扩大规模意义重大。

第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以适应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环境下,及时淘汰具有滞后性的政策制度以及地方性法规,出台原有

领域缺乏的且适应新兴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法规,鼓励服务贸易的出口,重视中小型服务企业的发展并予以一定的融资支持,使得服务贸易的发展环境更加完善,服务贸易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时代化的潮流之路。

第三,加强服务业品牌意识的树立,使河南省服务贸易“走出去”。虽然河南省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品牌,但是知名品牌还是相对匮乏,特别是服务贸易方面,导致服务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竞争力不突出。因此,打造一批“信誉好、大规模、大品牌”的企业,提高服务业出口产品档次和附加值,形成植根本地、辐射全国、全球贸易服务网络将继续创造有利于服务贸易竞争的新优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河南省服务品牌,推动产业集聚区提质,对提升“河南服务”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带动力具有深远意义。

第四,加强教育投资,引进和培育一批高级服务贸易人才。河南劳动力资源充足相对来说在传统产业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缺乏中高端人才,技术性高端人才是目前服务业所必需的,服务贸易因其无形性需要具有专业知识和经过专业训练的优质人才。要树立“人才兴业”的思想,政府要支持在高校内设立服务贸易方面紧缺人才的相应学科,将人力资源变为人力资本。

第五,建立健全服务贸易统计机制。河南省服务贸易相关的数据在搜集过程中十分困难,只能找到近几年的服务贸易收入和支出总额,并未找到按照商务部分类的具体分类数据。在对河南省服务贸易环境分析过程中的总体分析和结构性分析具有一定的困难。故在之后的工作中要建立健全服务贸易统计机制。

参考文献:

- [1]曹清,王宁,李琳.服务贸易发展现状、趋势与对策建议[J].金融纵横,2019(8):21-27.
- [2]林晨.中国服务贸易环境效应分析[J].当代经济,2014(14):6-7.
- [3]汪越,杨雪莲,张晶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服务贸易现状及发展方向分析[J].财富时代,2019(8):160.
- [4]张鑫,王明辉.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及其促进策略[J].改革,2019(9):31-44.
- [5]世界贸易组织.2019年世界贸易报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责任编辑 刘成贺)

(下转第42页)

新时代视域下河南省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研究

赵 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新时代,在国家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家发展战略有了新的调整,各地纷纷出台相应的政策及措施以推动各产业契合国家战略的要求。河南省旅游业如何在国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居民消费结构加速升级的背景下,成功实现转型升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从构建大旅游产业集群、规划布局精准定位、融合智能技术、建立有效政策机制等角度提出意见建议,以期助力河南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脱贫攻坚新引擎、经济增长新极点、区域形象新代表。

关键词:河南省;旅游业;转型升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07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32-05

党的十九大顺应时代前进潮流,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对河南旅游而言既有希望也有困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既展现广阔空间也充满崎岖坎坷。在国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居民消费结构加速升级的背景下,不断开发高层次旅游产品契合旅游者需求,优化完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效,推动旅游产业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双转型”,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从产业链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转移的“双跨越”,使河南旅游产业成为脱贫攻坚新引擎、经济增长新极点、区域形象新代表,在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同时,推动我省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实力整体跃升,是当前我们需要积极研究的全新课题。

近年来,河南旅游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旅游产业发展各项指标实现倍增,不仅增速比全国平均增速高出百分之十几,而且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中部地区之首。通过创新旅游发展模式,摸索出诸如“三点一线”开发、“焦作现象”“栾川模式”“西峡经验”等成功举措,吸引了许多省市前来考察学习。但后来的发展中,河南旅游没能紧跟市场变化,被许

多省份超越,在市场竞争中退出了领先的位置。整体来讲,河南旅游产业还处于结构调整期,既存在规模扩张的现实需要,也面临效益提升的迫切需求,可以说是机遇挑战并存、矛盾风险交织,迫切需要加快推动河南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一、河南省旅游业发展现状

随着国家发展新理念和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河南省旅游业得到了高度重视和重点培育,展现出了强劲发展势头,也取得了巨大成果。一方面,政策制定者编制完善科学、前瞻性的旅游发展规划,出台相应推动扶持旅游发展政策措施,为河南省旅游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旅游从业者紧紧把握行业发展新趋势,推陈出新、迭代开发出新的旅游产品,科学优化拉长旅游产业链,打造具有鲜明河南特色的旅游品牌,形成了河南省旅游发展的大区域和大格局。2013—2017年,河南省旅游总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均超过12%且稳步增长。更为可喜的是,2018年河南省共接待海内外游客78582.95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8.2%。河南省旅游产业逐步成长为本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然而当前河南省旅游业发展也面临着四大矛

收稿日期:2019-12-28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河南省科协项目“新时代河南省旅游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对策”(HNKJZK-2019-34B)

作者简介:赵鑫(1978—),女,河南漯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旅游经济、旅游规划。

盾:一是效益提升与规模扩张的矛盾,整体看旅游产业虽体量增长迅速,但有效投资规模还不够大,景区门票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偏高,餐饮消费、购物消费水平有待提高;二是丰富旅游资源与挖掘营销力度不够的矛盾,河南省历史、文化、自然资源之丰富自不必说,但营销方式还侧重于传统方式,现代化传播手段运用不够,线上线下结合不紧;三是开发点多面广与整合配套不够的矛盾,旅游开发层次偏低、规模偏小、同质化严重,景区配套服务、基础设施信息化以及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水平均有待进一步提升;四是产业发展与融合发展不够深的矛盾,旅游产业发展相对独立,与工业、农业、文化等产业融合发展程度低,关联带动作用发挥不够。

二、河南省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政策因素

旅游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产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总体规划、投资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旅游产业的作用、地位也在不断变化,政府对旅游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引导其转型升级。2009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将旅游业定位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从放宽旅游市场准入、优化旅游消费环境等五方面进行了安排部署,明确了发展目标。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重点任务、责任分工和进度安排,对进一步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作出部署。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首次将旅游业的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旅游产业发展成为国家重点专项规划。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发展全域旅游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对加快旅游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作出部署。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从深化文化和旅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提出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和活力,增强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主持召开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国家战略,体现了总书记对河南发展的高度重视、对河南人民的亲切关怀。

与国家政策相配套,河南省也制定出台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意见》《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行动方案(2017—2020年)的通知》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十三五”旅游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提出建设郑汴洛旅游产业发展核心区、沿黄旅游带、南水北调中线旅游带和南太行旅游区、伏牛山旅游区、桐柏—大别山旅游区、豫东平原旅游区,构建河南省“一核两带四区”旅游产业发展格局,加大土地、财政、税费、金融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推动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经济因素

旅游业的发展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良好的经济基础意味着具备较好的出行、住宿、购物等硬件设施和较高的旅游消费水平,能够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升级优化提供有力支持。反过来,旅游业又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能优化当地产业结构,影响和带动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河南省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五大国家发展战略形成了推动河南省快速发展的战略体系。2018年,河南全年生产总值48055.86亿元,比上年增长7.6%;财政总收入5875.8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763.9亿元,增长10.5%;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9%;旅游总收入增长20.3%,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5.2%。2019年,全省生产总值跃上5万亿元台阶,粮食总产量达到669.54千克,财政总收入突破6000亿元,实现了“三个同步”“三个高于”目标。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加,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2019年,河南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路径,要举全省之力,聚各方资源,全力推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这些都为河南省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强大支撑。

(三)文化因素

中原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中华民族的和魂。河南省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既有殷商文化、神农文化、周易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丝路文化等传统文化,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还形成了以愚公移山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其中,“根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一张名片,每年农历“三月三”在新郑举办的祭拜黄帝的仪式,突出中华民族寻根拜祖的主题,缅怀先祖功

德,在全球华人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提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原更加出彩。”总书记把河南更高层次的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深挖我省丰厚的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弘扬中原文化、黄河文化,是增强凝聚力、引领中原人民自强不息奋斗的需要,是增强文化自信、体现文化软实力的需要,是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需要。我们要担负起文化使命、文化担当,讲好“黄河故事”,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凝聚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四) 法治因素

古今中外,社会管理者都非常重视法治的作用。古人云“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将社会认可的行为规则通过立法机关确认,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形成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约束力,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我国非常重视法治,制定出台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系列法律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

我国旅游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也加快推进。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公布实施;2014—2016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等相继出台,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旅。2019年,《河南省旅游条例》已经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审议通过,将于2020年4月1日起施行,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利用文化和旅游资源,促进融合发展,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协调统一。

三、河南省旅游业转型升级的策略

(一) 构建大旅游产业集群,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大旅游产业集群是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为导向,形成集旅游业、旅游文化产业、旅游产品的加工制造业、娱乐服务业、旅游房地产业等相关产业的

群体产业。新形势下,河南省旅游业发展需要在在大旅游产业集群中实现转型,才能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1. 加强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

依托河南省域内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形成追溯华夏文明之旅;借助嵩山少林寺少林功夫和温县陈家沟太极拳影响力,再掀“爱上功夫”浪潮。深度挖掘郑州、开封、洛阳、安阳等古都城市的文化魅力,规划设计具有特色创意的古都文化之旅。采取多种形式、利用智慧技术,使具有“中国历史天然博物馆”之称的河南真正做到“让国宝活起来”。

2. 加快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加快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不仅能够拓展新型旅游业态、优化旅游产品结构,更能促进一、二、三产业的升级,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一是利用花卉种植、果园采摘等方式发展体验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发挥河南作为农业大省、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的优势,不断深化农业改革,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积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二是以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建设引领旅游业发展,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努力引进社会资本,开发一批特色突出的旅游产品,建设一批工业旅游园区,培育一批旅游商品生产和旅游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壮大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旅游产业集群。三是构建完善旅游服务体系,加强旅游与医疗卫生、健康养老、文化教育等行业的深度融合,改善旅游环境的软件和硬件,优化旅游功能的产业和空间布局。

3. 加快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中央、国务院和河南省委、省政府相继制定出台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摆在党和政府工作的优先位置,在政策、资金、土地、人员等方面获得巨大的支持。旅游业要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趋势,加快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既能依托大势促进行业发展,更能精准地谋划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一是发展乡村自然风光旅游,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保护好山水林田湖,综合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层次提升,以环境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的原生态吸引游客。二是发展具有浓郁河南历史文化特色的乡村游,河南不少乡村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建筑、民风民俗保存较为完整,可以采取开发与保护并重、改变与传承兼顾的策略,科学推进公共设施和生态环境改造升级,

尽可能对生态环境和原有格局改变少,尽可能对居民生活和传统习俗影响小。三是将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起来,河南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三山一滩”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村人口脱贫事关精准扶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可以加大对扶贫重点区域、重点乡村的环境整治力度,将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旅游开发整体规划、整体推进,实现资源开发与村庄发展良性互动,以旅游发展带动贫困群众走上脱贫致富之路。四是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旅游,不少乡村依托资源优势,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产业,发展出了一批农业生产龙头企业,既具有乡村特色也具有工业特征,既是经济优势也是旅游资源优势,有效拓展其价值链,提升影响力,增加附加值。五是开发养生养老和休闲体验游,依托中心城市,利用交通、科技、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农业、康复、健身、养生及休闲娱乐等产业融合,发展新型旅游业态。

(二) 规划布局精准定位,促进区域旅游协同发展

当前,旅游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全国范围普遍存在,河南省也不例外。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旅游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平衡,洛阳、安阳、开封等地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南阳、信阳等地自然风光优美,但部分区域旅游资源匮乏或缺少特色;景区开发不平衡,热门景点时时人山人海,冷门景区即使在五一、十一长假等旅游旺季游客仍然屈指可数;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依托便利的交通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优先获得投资和建设开发;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体量悬殊,财政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较大,直接影响和制约旅游消费能力和旅游业发展。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就要深化河南省旅游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把全省各种旅游资源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把全省旅游发展当成一盘棋来抓。

1. 加强科学规划布局

制定总体发展规划,综合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城乡统筹建设多方面因素,最大限度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率,以高质量的规划引领河南省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一是树立全域旅游理念,科学、准确分析判断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准确定位发展目标 and 方向,细分客户群体和潜在市场,打破地域利益壁垒,促进强强联合,优化整合全省旅游资源,做大做强河南旅游品牌。二是深度挖掘不同旅游资源的潜力,突出差异化、个性化特色,调整产品结构,推进旅游产业各要素科学配置、协调发展,提高产品

层次和质量。三是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开发中高端消费领域,如休闲度假、康体养生、自驾营地等方面的体验游、深度游,充分挖掘旅游消费者的消费潜力,形成新的增长点。四是实行源头把控,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可持续发展,既合理开发又全面保护,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2. 促进区域旅游协同发展

根据河南省旅游资源分布特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交通设施规划格局、宏观政策引导方向,围绕郑州大都市区、洛阳副中心城市、南阳等三个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做强郑州大都市旅游圈、做大中原城市群旅游圈、构建跨区域旅游协作圈,既有资源整合、服务管理、宣传推广的协同,也有产品开发、结构调整、投资消费的协同,形成功能细分、定位明确、集成高效、优势互补、携手并进的发展新局面。

(三) 融合智能技术,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当前,全球范围内,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方面新的技术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向经济社会各领域不断延伸并深度融合,技术与商业模式在互联网的影响下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创新成果层出不穷。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政策加快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步伐,我国也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旅游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旅游产业与智能技术的融合是顺应大势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在具体举措上,一是加强基础教学培训,积极在学校相关旅游或规划专业中设置相应课程,使受训者准确把握智能技术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了解智能技术在旅游设计规划方面的应用现状,培养具备一定智能运用能力的旅游规划人才。二是加大旅游规划部门智能融合技术运用力度,使用大数据进行可行性分析,提高旅游规划方案的视觉直观性和可操作性,而不只是停留在效果图和文本描述的层面。三是建设旅游行业大数据中心,以河南省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建立旅游数据中心,规范化、标准化数据的采集、储存、交换,加大与交通、公安等相关部门和通讯、电力等企业的合作力度,形成旅游数据“全覆盖”。四是打造旅游设施和服务的智能化,加大机场、车站、宾馆、饭店和景区内部设施的网络化、信息化建设力度,智能调节游客流量,智能导游和讲解,运用VR、AR技术提高可视化程度,针对不同人群推送个性化甚至定制化的产品,让游客获得更好的场景和体验。五是推进智慧旅游生态圈建设,以全域旅游的视角,进行不同平台旅游资源、数据和资金的整合,打破区域壁

垒,关联生态圈内旅游全产业链条,拓宽产业格局,打造新经济模式,实现优势互补、交互动、互惠互利,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相对统一。

(四)建立有效的政策机制,保障旅游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旅游业实现了大发展、大跨越,逐步融入全省发展的战略体系,目前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只为当下利益忽视长远发展、只为局部好处无视整体利益,导致旅游建设开发无序和服务质量不高,甚至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大促进河南省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制度供给,加大旅游规划顶层设计,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完善统筹推进的协调机制,保障河南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一是认真落实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年),依托其中关于黄河中下游生态旅游片区、陕蒙晋豫黄河大峡谷生态旅游协作区的规划政策,科学开发河南省黄河沿线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和太行山、伏牛山等地的生态旅游资源,打造黄河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叫响黄河旅游品牌。二是制定出台河南省关于全域旅游的实施办法,建立上下联动的政策体系,区域发展统筹协调、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旅游与其他产业的融合顺畅高效,以政策制度引领河南省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三是在旅游开发建

设中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充分的研究论证和环境影响评价,实施类型准入、空间规制,停车场、步道、厕所全部实现生态化,加大景区新能源交通工具的使用力度。四是在全社会倡导绿色旅游的理念,积极宣传推广公共交通、骑行、徒步等出行方式,鼓励引导旅游者低碳出行、绿色出行、环保出行,减少酒店水电、一次性用品的消耗,建设新型旅游文化。

参考文献:

- [1]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行动方案(2017—2020年)的通知。(2017-08-26)[2019-10-21][EB/OL]. <http://www.henan.gov.cn/2017/09-06/249118.html>.
- [2]李少华.新技术与互联网创新推动新时代旅游产业发展[J].旅游学刊,2018(2):8-10.
- [3]马勇,徐圣.全域旅游规划要契合新时代需要[N].中国旅游报,2017-12-12.
- [4]张文娟.云南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策略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5.
- [5]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局关于印发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通知[EB/OL].(2016-08-22)[2019-11-12].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94900.htm.

(责任编辑 刘成贺)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Henan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ZHAO Xin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in the event of changes in the country's main contradictions,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a new adjustment, and various regions have introduced corresponding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each industr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How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Henan tourism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untry's vigorous promotion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accelera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structure is a major problem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structing a large tourism industrial cluster, planning and layout, precise positioning, integrat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nd establishing effective policy mechanisms,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enan tourism and make it a new engin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 new pol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a new representative of regional image.

Key words: Henan province; tourism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借用原作元素的知识产权问题新论

蹇佳伶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上海 200042)

摘要:非演绎类同人作品通常只借用原作知名元素,并不对原作中具体的情节、语言或视觉表达进行精确复制,一般不认定为对原作构成著作权侵权。法院通常认为原作对于上述元素的创造性劳动是民法上的权益,因此从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等角度对其提供保护。但是,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并非绝对与原作形成竞争关系,更多构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一般不应认定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同人作品通常不涉及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商品化权益目前在国内也无法可依。在著作权法框架内对作品进行体系化建设,给予知名作品区别于一般作品的层级化保护,对知名作品具有标志性的知名元素的保护将更加合理。

关键词: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商品化权益;知名作品;著作权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08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37-06

同人作品是“同好者在原作或原型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活动之产物”^[1],根据是否保留原作的基本表达分为演绎类同人作品和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前者本质属于现有著作权理论框架中的演绎权可控制的范畴,本文不做过多讨论;后者又称为狭义的同人作品,其对原作的基本表达利用不多,一般利用原作的作品名称、人物名称、人物形象和性格、人物关系、场景或道具设置等元素,而增加的新内容的独创性程度较高,构成独立的新作品,一般不构成对原作的著作权侵权,这一观点典型地体现在著名的“金庸诉江南”案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学界也认为,单纯地对角色名称和经历进行利用不构成表达上的实质性相似,尚难构成著作权侵权。^[2]目前针对同人作品借用原作元素的行为,尚且存在几个疑点:首先,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即使不使用原作的元素也可以构成独立的作品,但使用原作元素的行为无法摆脱搭便车的嫌疑,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其次,无论原作元素是否可以单独脱离原作获得保护,不可否认原作者创作这些元素的创造性劳动,那么在现行知识产权法框架下,应当如何对

原作元素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

一、“作者之死”: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对原作意义生发的贡献

“金庸诉江南”案中,法院审理认为《此间的少年》不构成著作权侵权,但是江南与其他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理由是同人作品一般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地与原作形成良性互动,江南在首次出版《此间的少年》时使用“射雕英雄的大学生涯”这样的副标题,搭借金庸作品影响力进而获利的意图尤为明显,背离文化产业公认的商业道德,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江南在其作品完成后对原作进行超过必要限度的利用行为确实难逃搭便车嫌疑,但是如果江南没有使用“射雕英雄的大学生涯”这样的副标题作为宣传的噱头,其同人作品单纯以营利为目的的发行出版行为就一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吗?沿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的裁判思路,其遵循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适用条件的解读,即“有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受损害——违反诚实信用而破坏竞争秩序”。实际上,在原作合法权益受损害这一点上并

收稿日期:2019-09-28

作者简介:蹇佳伶(1996—),女,四川广元人,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硕士研究生。

非盖棺定论。首先,原作作者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合法权益使得其足以阻碍公众进行二次创作?在美国,角色名称和形象虽然通过判例确立的“充分描述与展开标准”“构成被叙述的故事标准”等规则承认了其版权法保护客体的地位,但在中国,尤其是在“金庸诉江南”案中原作的人物名称和关系、形象性格和爱好目前都不构成著作权法上独立的表达,尚难构成著作权法客体,那么给予其“权益”地位的保护有何依据?其次,“除涉嫌剽窃、抄袭的作品外,同人作品大多与在先作品是相互支撑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关系”^[3],同人作品的广泛传播反而可以有助于原作的进一步传播,甚至有可能形成“同人逆迷”^①现象反哺原作,即原作的市场利益并非定然受损害。

巴特的《作者之死》和福柯的《作者是什么》对浪漫作者观念的解构,给予了看待上述两个问题的新视角。浪漫作者观念萌芽于英国,印刷出版商们为了巩固和稳定自己的利益,利用洛克劳动财产权理论论证了版权是给予作者劳动的自然财产权利,将写作的本质界定为作者的个性体现,即是作者让作品意义无限增生扩散,这促使“作者是作品的所有者”这一浪漫观念传播开来。^[4]然而,巴特和福柯从结构主义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作者这个角色,认为这种观念没有严格地反映现代写作实践。他们认为“作者是一位近现代人物”^[5],作者是启蒙运动和个人主义高涨的结果^[6]。在这样的作者权威之下,作者是暴君,文本是作者的附庸,作者完全决定了文本对读者的意义。话语压迫之下,读者没有任何的阅读和理解文本的自由,只能被动接受作者认定的唯一客观内涵。网络时代来临,这种固化的作者支配读者的观念已然不符合现代社会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更加频繁的动态交互关系,所以“作者之死”,就是要求作者走下神坛,使得文本和读者从作者的创作意图中解放出来,创作一旦结束,读者可以主动对文本的内涵进行千面解读。简单来说,对于作品的内涵的生发,读者的参与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用“作者之死,读者之生”的观念来理解同人作品与原作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并非定然呈现竞争的关系。尤其对于非演绎类同人作品来说,原作作者创造了独特的元素尚且难以构成著作权法上独立可以保护的作品,便更多以思想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读者们利用这些元素进行更广泛规模的意义生发,且并未复制原作的具体表达,读者们创作了全新的作品。“作者死了”,才能有读者的狂欢,才能有更多的作者。如果文本的自由流动受到阻碍,

将如何促进文化和文学的繁荣?史学家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7]在社会科学上的普适意义也揭示出:任何一部作品的创作都具有“同人”性质,或多或少都是通过先人留下来的简单故事不断“层累”,逐步进行完善和丰富,形成带有复杂情节和鲜明人物的鸿篇巨制。从文化生成的意义上来看,同人创作历来就是文化传承和生成的主要方式,所以同人作品和原作是相互支撑的关系,共同参与文化创造。^[3]英国法院审理的“达·芬奇密码”案^②尤其类似于“金庸诉江南”案,美国学者认为该案的同人作品并不能构成原作的替代品,而是一种互补品^[8],事实也证明互补同人小说的销售会增加原作的销售,而非侵占原作市场份额导致其销量下降。的确,“金庸诉江南”案中,武侠小说和校园青春爱情小说分属于不同的小说市场,二者井水不犯河水,江南独辟蹊径,将看似毫无瓜葛的二者通过相似却不同的人物元素结合起来,在不贬损原作品品质和原作者人格的情况下,无疑增加了青春文学爱好者探寻原作真意的可能性。金庸对郭靖、黄蓉、欧阳克等武侠角色的创造和塑造不可否认,但江南对这些角色多面性的挖掘也值得肯定。同人作品和原作并非绝对的竞争关系,它们共同为文化和意义生成作出了贡献。作者需要“死亡”,读者需要空间,才能更好地实现促进文化艺术繁荣的目的。

二、用商标法规制非演绎类同人作品的问题

上文已论述,无法将原作元素作为著作权法的客体予以保护,有学者提出通过商标法来保护原作元素,即将其注册为商标或者通过驰名商标制度予以保护。的确,可视化人物形象具有自己独特的线条、色彩和其组合,构成美术作品时,作为一个商标予以注册是完全可能的,商标权人可以将其使用在原作品各种跨媒介的互动设计和衍生产品上,进一步强化该标志与原作者之间的识别性。文字作品中的这些元素虽然不构成我国著作权法上作品,但读者们在看到这些元素时确实可能将其与原作者相联系,具有一定的识别性,然而这仍然难以有效地从商标法角度对其予以保护。

(一)将原作元素注册为商标保护

受商标法保护的注册商标首先要满足显著性要求,对于文字作品来说,能够进行注册的虚拟元素无非是具有独立含义的可脱离原作的词语,除了完全臆造的词语,其他的名称一般要考虑是否满足固有显著性的要求。因为文字形象需要结合故事情节和语言描述才能具体化,如果该名字本身的独立性不强,公众能够对该词汇进行多义性解读的,需要考量

是否侵占公有领域的概念,很可能因为缺乏显著性而不能获得注册。无论是文字作品还是可视性作品,将其注册为商标保护都需要投入巨大的维权成本,而同人作品并不一定陷入侵权风险。因为,利用原作元素创作非演绎类同人作品的门槛是非常低的,只需要在不复制原作具体表达的情形下去创作新的故事情节和表达即可。然而,注册商标侵权要求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行为,商标必须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进行使用,如果非演绎类同人作品没有与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结合起来,很难进一步认定造成消费者混淆。如此,虽然将原作元素注册为商标是合法可行的,但通过这种方式来防止同人创作对原作元素的使用是不合理的,不仅成本高,而且不一定能达到禁止使用的目标。

(二)将原作元素作为驰名商标保护

当原作的知名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其中的元素不可否认地具有了“识别来源”的能力,使得相关读者在看到这些元素时立刻能够联想到出自原作者的作品。但是,首先要考虑的是此时的这些元素是否能构成驰名商标。《商标法》第14条第1款规定的驰名商标认定因素中的“相关公众”和“知晓程度”,与该元素是否满足《商标法》第48条规定的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行为有关,如果该元素并未注册,仅在作品中出现,不满足“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使用行为要求,即使产生了事实上的识别来源作用,也不能径直认定其构成未注册驰名商标。因此,原作元素作为驰名商标保护的前提是对其进行商标性使用,可惜的是我国目前的IP运营意识并未成熟,多数优秀的原创作品产生之后并未考虑将其中的标志性元素进行商标法意义上的商业性使用。其次,如果原作元素构成驰名商标,通过反淡化制度予以保护比较困难。第一,使用了原作元素的同人作品一般不构成弱化,原因是单纯的同人创作行为并不会稀释原作元素商标与原作或商标使用人之间的唯一联想。第二,越是知名作品越容易因为自己的商业推广而造成元素作为标志的退化,沦为通用词语。比如《哈利·波特》中的“麻瓜”原本指魔法世界中的普通人,后普遍用于指代超自然世界中没有特殊能力的凡人;再如明代《二郎宝卷》中的“缚妖索”之后被普遍用于各类游戏、小说、电视剧中指代能够束缚住妖怪的绳索。第三,驰名商标的丑化,分为在不良环境中使用驰名商标和将驰名商标使用在低劣或普通商品上。^[9]同理,单纯的同人创作行为很难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美国赋予了迪士尼公

司禁止他人将《白雪公主》《睡美人》等作品中的虚构角色使用在色情情节中的权利^[10],日本也禁止同人作品作者对《口袋妖怪》的“皮卡丘”等角色进行色情创作^[11],这是因为在美国和日本都有对原作虚拟角色提供法律保护的判例渊源,而在我国并无此先例。

(三)将原作元素作为商品化权益保护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率先引入“商品化权益”这一概念,认为作品名称和作品角色名称是一种“商品化权益”,属于《商标法》第32条前段“在先权利”,在非演绎类同人作品的语境下,保护的是不构成作品的元素进行商业利用时产生的利益。^[12]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葵花宝典”案的二审判决^③中明确否定了这一概念,认为其不属于“民事主体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权益”范畴,理由是缺乏法律上给予直接保护的法律依据,在著作权法之外对作品构成元素给予保护,妨碍了社会公众行为自由,增加了法律的不可预见性。虽然法院赞成金庸对“葵花宝典”这一词语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需要保护,但却不赞成商评委使用“商品化权益”来解释《商标法》第32条所规定的“在先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第2款^④仅对作品名称和作品角色名称作出了规定,没有对其他作品元素作出规定,且要求商标性使用,这意味着该条只能规范到同人作品进行作品之外的商业性利用行为,而非演绎类同人作品本身的出版发行行为并不受此款限制。实际上,同人作品要使用原作元素进行商业性利用,引起相关公众误认时,可以直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制,而且因为该法的规制所产生的反射性利益属于民法上规定的民事权益,便能因此援引《商标法》第32条“在先权利”。因此,使用“商品化权益”不仅多此一举,收效甚微,还容易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混乱,目前尚无引入我国立法体系的必要。

三、知名作品体系化:化解非演绎类同人作品与原作的冲突关系

目前,学界有倡导采用“知识共享协议”(简称为“CC协议”)的方式来解决互联网时代著作权与公众自由之间的冲突关系,它赋予作者在意思自治范围内对需要保护的著作权权利进行选择的自由,放弃一部分著作权权利可以更大程度上促进自己的作品在公众领域内的传播和使用,保留的著作权权利仍然受法律的保护。根据CC协议不同的类型^⑤,其他人就可以更自由地使用原作的元素进行二次创

作而不陷入侵权风险。但是,CC 协议无非是一种开放式许可协议,由于我国《著作权法》已经有了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作为对著作权的限制,在实践中也能实现同等效果,所以是否有引入的必要仍有争议。

演绎类同人作品受原作演绎权的制约,需要获得原作者的许可并付费才能作为新的作品使用。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并非基于原作的具体情节和语言表达进行演绎而形成,其独创性程度更高,抛开所借鉴的原作的元素完全是一部与原作没有任何关联的新作品,读者可以在不阅读原作的情况下流畅、清晰地明了其故事情节和人物个性。但又正是因为其借鉴了原作的元素,使得阅读过原作的读者在阅读同人作品的时候先入为主地代入了对原作的印象,这种印象可以是对原作写作品质的评价,也可以是对原作具体人物性格和关系的偏好,总而言之都会刺激读者阅读同人作品的兴趣,不可否认同人作品借搭了原作者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当然,同人作品也可能反哺原作增加未接触过原作的群体对原作的兴趣。因此,原作者和非演绎类同人作品作者都对作品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促进了二次创作市场的繁荣,将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创作也纳入原作演绎权的制约明显使得著作权过度扩张,不经原作者授权但需要付费的方式更为合理,也体现出了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在演绎类同人作品与原作品之间的本质差异。那么,如何为这样的方式寻求一个合理的法理基础呢?

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体系中,商标法根据知名程度的不同,分别对驰名商标、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普通注册商标提供不同程度的保护;专利法根据创造性的高低,将发明创造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分别提供不同程度的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则是单独对“有一定影响的商品”的商业标志提供保护,实质上区别于普通商业标志的保护;但是在著作权法框架中,没有对作品进行体系化分类,只是统一概括性地进行保护,这样就造成了著作权法和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衔接和协调上的问题。比如,涉及同人创作利用原作元素而诉诸利益受害的作品一般是知名程度较高的作品,而著作权法并未对知名作品进行区分性保护,导致司法实践中法院只能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者商标法对于知名作品的知名元素提供保护,这实质上否定了这些知名元素本身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知名作品与一般作品不同,由于其广泛的知名度和独特的美学价值,需要得到比一般作品更强的保护才能

体现著作权法对作品保护的层次性。知名作品本身分为智力成果部分和标志性部分,前者对独创性高低要求区分保护,体现其艺术价值所在;后者主要是在发挥识别来源的作用时兼体现智力劳动成果,比如作品名称、人物形象等,其识别性的发挥也离不开智力劳动内含的美学价值彰显的作用。因此,知名作品保护不可脱离二者,应当以《著作权法》作为知名作品保护的主要法律依据,辅之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对标志性部分进行补充保护。^[13]

(一)建立知名作品的评价标准和区别于普通作品的保护体系

对作品层级化保护主要是由于知名作品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对其中的元素未经许可地进行利用极有可能影响到原作的市场价值,这也是商标法体系内对商标和驰名商标区分保护的理由之一。因此,参考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知名作品的认定也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该作品是否经相关作品登记机关予以有效登记、登记的年数;
2. 该作品是否在相关市场上深受相关读者喜爱;
3. 该作品是否发行出版及其销量、销售区域大小、相关市场占有率;
4. 相关读者对该作品的评价;
5. 该作品是否有任何改编情形及其相关版权费用的数额大小;
6. 该作品在相关市场上的宣传情况;
7. 该作品被著作权侵权的情形等。

同时,根据作品市场的不同、时间的变化、读者的不同,“知名作品”的定性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同驰名商标一样,不能在司法上建立绝对的知名作品的认定标准,采用“行政认定和司法被动个案认定”双轨并行的方式更有利于二次创作中信息的自由流动。目前我国国家版权局和各省版权行政管理部门是作品的登记机关,只就作品进行登记,还没有评价作品的职能。因此,知名作品的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都需要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进一步细化。

作品层级化保护方面需要体现对知名作品的“知名”程度给予更多保护。受作品演绎权的控制,他人要对作品进行演绎类二次创作且进行商业化利用必须经过作者的许可且付费,这对于普通作品和知名作品是一视同仁的。对于非演绎类二次创作,比如利用原作元素,由于涉及的原作利益并非传统著作权法定权利类型,对于普通作品来说其并无著作权法上的利益可以保护,因为其不知名,可推知他

人利用其元素时接触其作品的可能较小,相似更多出于偶然,原作受此非演绎类二次创作的影响更小;而对于知名作品来说,可推知同类市场上的其他作者应当存在接触原作的可能,对于原作元素的利用则更多出于搭便车的意图,原作的相关读者很可能出于对原作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喜欢而阅读同人作品,原作既可能遭受市场份额损失,也可能受益于“同人逆迷”现象而扩展市场。此时,正是由于非演绎类同人创作的两面性,用原作者演绎权限制原作元素的自由流动是不可能且不经济的,通过“可以不经原作者许可但应当主动向其支付费用”的方式向大众开放原作元素的使用,不仅有助于二次创作的繁荣,也体现了著作权法对知名作品的更强保护,鼓舞广大创作群体创作更多的知名作品。

(二)在《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之间就知名作品保护上建立联系

我国目前的《商标法》仅保护商标,对于其他能够产生识别性的商业外观标志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给予保护。同理,对于知名作品来说,其知名元素同样能够起到为作品宣传的作用,让相关读者一看到就能联想到相关作品甚至作者,这种市场优势源于作者的知识产权劳动成果,更有保护的价值,共同体现在《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如果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和原作分属于不同的作品市场,二者不具有竞争关系和竞争可能时,《著作权法》对知名作品的分层化保护足以使同人作品作者通过付费的方式自由利用原作元素来实现保护创造和鼓励创新的功能;但如果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和原作同属一个作品市场,二者具有竞争关系,此时同人作品作者仅通过付费的方式自由使用原作元素即可能对原作造成损害,就需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协调原作和同人作品的关系,在存在竞争关系的前提下,同人作品作者必须经过原作者同意且付费才能使用原作元素进行商业化利用。

同时,《商标法》上关于驰名商标的规定也可以适用到知名作品元素标志化的场合中。原作的某些元素在改编的过程中即可能演化成衍生产品的商标,比如米老鼠头部的外形就从整个“米老鼠”形象的部分元素发展成一个独立商标,如果该元素予以注册,则比较好判断是否予以商标法保护;但若没有注册就商业化投入到衍生产品的开发中,只能通过未注册驰名商标的方式寻求保护。由于我国目前还未在著作权法体系中体现对知名作品的保护,所以未来应当协调《著作权法》体系下认定知名作品的标准和《商标法》体系下认定驰名商标的因素,使得

整个知识产权体系相互配合,合理地对待知名作品中的知识产权提供相对完整的保护。

四、结语

“金庸诉江南”案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法学界对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借用原作元素的热烈讨论。金庸在创造独特人物形象上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以及江南对汴京大学所发生的校园青春故事的描绘都不可否认,虽然不构成著作权侵权,法院却认为江南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此举忽视了同人作品对原作的促进、互补作用,对竞争关系的认定稍显粗略。对于原作元素的保护,从商标法视域下的注册商标、驰名商标、商品化权益入手存在保护不足或者保护混乱的问题。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借鉴原作品元素产生利益纠纷的,多为原作知名程度较高的情形,在目前知识产权其他法律体系都呈现出层级化、区分性保护的态势下,推动著作权法框架下的知名作品体系化保护,明确知名作品的地位,才能进一步对知名作品的知名元素界定合适的保护范围,进而廓清非演绎类同人作品的权利界限,才能更好地解决同人作品与原作之间的冲突问题。

注释:

- ①“迷”是因为喜爱原作品而创作同人作品,“逆迷”是因为喜爱同人作品而喜欢原作。
- ②爱情故事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大量借鉴了另一部非小说类著作《圣血与圣杯》,前者出版之后,后者的销量飙升并一度重登英国畅销书榜单。《圣血与圣杯》出版商起诉《达·芬奇密码》侵犯其著作权,被法院驳回。
- 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6240号行政判决书。
- ④对于著作权保护期限内的作品,如果作品名称、作品中的角色名称等具有较高知名度,将其作为商标使用在相关商品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其经过权利人许可或者与权利人存在特定联系,当事人以此主张构成在先权益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 ⑤CC协议分别根据by(署名)、sa(以相同方式共享)、nc(非商业用途)、nd(演绎禁止)这几个不同的要素进行组合,主要有六种许可类型:by-nc-nd,by-nc-sa,by-nc,by-nd,by-sa,by。详情参见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官网:<http://creativecommons.net.cn>。

参考文献:

- [1]王铮. 同人的世界:对一种网络小众文化的研究[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 3.
- [2]王迁. 同人作品著作权侵权问题初探[J]. 中国版权, 2017(3): 9.
- [3]龙文懋. 同人作品的文化层累功能及其与在先作品竞争法上的法益关系:以《此间的少年》为例[J]. 电子知识产

权,2016(12):11.

- [4] 黄海峰. 知识产权的话语与现实: 版权、专利与商标史论 [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1: 33 - 37.
- [5] 周启超. 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第3辑)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 147 - 148.
- [6] 刁克利. “作者之死”与作家重建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4): 134.
- [7] 赵吉惠, 毛曦, 顾颖刚. “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现代意义 [J]. 史学理论研究, 1999(2): 51.
- [8] 克里斯蒂娜·博翰楠, 赫伯特·霍温坎普. 创造无界限: 促进创新中的自由与竞争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6: 61 - 62.

[9] 黄晖. 商标权利范围的比较研究 [D].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54.

- [10] 黄颖. 同人作品的知识产权冲突研究 [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18.
- [11] 徐微微. 同人作品知识产权冲突问题研究 [D]. 上海: 上海大学, 2014: 16.
- [12] 袁秀挺. 同人作品知识产权问题迷思: 由金庸诉江南案引出 [J]. 电子知识产权, 2017(Z1): 59.
- [13] 刘强, 刘忠优. 论知名作品的体系化保护 [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79 - 8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 New Discussion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of Borrowing Original Elements in Non - deductive Peer Works

JIAN Jialing

(Schoo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Non - deductive peer works usually only use the original well - known elements, and do not accurately copy the specific plot, language or visual expression in the original work, and generally do not constitut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The court usually thinks that the original work of creative labor for the above elements is a civil law right, and therefore protects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i - unfair competition law and trademark law. However, non - deductive peer works are not absolutely competitive with the original one, and more constitute a mutually reinforcing relationship. Generally, they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to violate the anti - unfair competition law. Secondly, non - deductive peer works usually do not involve the use under trademark law,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rights are currently not available in China.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work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pyright which gives the hierarchical protection of well - known work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works, and the protection of well - known elements with well - known works will be more reasonable.

Key words: Non - deductive peer works; commercialization rights; well - known works; copyrights

(上接第 31 页)

An Analysis of the Opening - up Environment of Henan's Service Industry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YANG Xue, YANG Juan, LIU Yinshu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ervice trade has become the most dynamic part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nd opening up the service industry to the outside world which has become a necessary way to promote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uses PEST analysis and SWOT analysis methods to discuss the macro - policy, economy, society,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threats and other aspects of Henan province's service trade. The article also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in Henan province.

Key words: service trade; PEST analysis; SWOT analysis; environmental analysis

执行转破产程序“启动难”的解构与应对

祝 祎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执行转破产作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一项新设的制度,是执行案件与破产案件衔接的核心,对解决执行难、消化僵尸企业,推动市场资源再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执行转破产程序面临“启动难”的困境,具体原因在于债权人、债务人启动动力不足,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存在困境,相关制度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应当激发相关主体启动破产程序的动力,优化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条件,完善执行转破产相关制度,从而解决执行转破产程序“启动难”的问题。

关键词:执行转破产;启动主体;繁简分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09

中图分类号:D92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43-05

目前我国正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具体而言,就是要淘汰落后产能,清理与市场竞争不相适应的主体。执行过程中,对执行不能的企业启动破产程序,将“僵尸企业”清除出市场,从而释放更多优质的资源投入于更有活力的新领域、新产业上,这不仅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的正常运行,还适应了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从司法上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中,“执行难”已成为影响法院公信力的一大因素,困扰着司法的良性运作。而执行转破产程序能够为此带来突破口,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执行案件的积压,提高工作效率,还有利于控制并减少债权人、债务人利益的损失,公平地保护双方的利益。但是,目前我国执行转破产程序面临着“启动难”的窘境。

一、执行转破产“启动难”之现状

(一)立法现状

关于“执行转破产”的概念,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3条中已经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即在执行过程中,当企业法人(被执行人)具备破产条件时,经被执行人或者申请执行人之一同意,裁定中止执行程序,将执行案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由只对个别

债权人进行清偿转变为对债权人集中公平清偿。

近年来,为解决执行转破产存在的问题,一些与执行转破产程序相关的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相继出台。2015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第513条至516条规定了执行不能移送破产审查的内容,确立了“执行转破产”这一新的程序模型。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就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如何退出以及执行与破产如何有序衔接等问题作出规定,完善了执行程序的相关制度。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就执行转破产适用条件、管辖权确定等事项作出了规定。2018年《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中,第七部分“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首先强调了执行转破产工作的重要意义,然后对一些关键程序节点如执行法院的审查告知义务、移送职责及执行法院与受移送法院之间的移送接收等予以重申。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中提出要完善执行转破产工作机制,并提出了规范相关工作流程的指导方向。

收稿日期:2019-10-23

作者简介:祝祎(1996—),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

（二）实施现状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分别以“执行案件”“破产”“执行案件、破产”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在2012至2018年期间,执行案件共计13921773件,破产案件共计328235件,执行转破产案件共计114064件。其中,执行转破产案件占执行案件总数的0.82%,占破产案件总数的34.75%。具体数据汇总如下^①,见表1。

表1 2012—2018年执行转破产案件数据分析

年份	执行案件 总数	执行转破产 案件总数	执行转破产 案件占执行 案件的百分比	破产案件 总数	执行转破产 案件占破产 案件的百分比
2018	4470628	64147	1.43%	126795	50.59%
2017	3973775	27993	0.70%	83333	33.59%
2016	2970556	13201	0.44%	57036	23.15%
2015	1434880	5224	0.36%	30469	17.15%
2014	903214	3040	0.34%	24091	12.62%
2013	130188	371	0.28%	5105	7.27%
2012	38532	88	0.23%	1406	6.26%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12年至2018年期间,我国执行案件、破产案件、执行转破产案件均逐年增加,执行转破产案件占执行案件的百分比、执行转破产案件占破产案件的百分比也均呈现增长趋势。我国执行案件自2012年的38532件锐增至2018年的4470628件,特别是2015年后执行案件的数量明显增长,说明在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口号的指引下,“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国的破产案件自2012年的1406件锐增至2018年的126795件,特别在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导向出台后,破产案件的数量大幅上升。我国执行转破产案件自2012年的88件增长至2018年的64147件,虽然从增长速度上来看十分迅速,尤其是在2015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了“执行转破产”后,相关案件大幅上涨,但从总数上来看仍然较少。尤其是执行转破产案件占执行案件的百分比,仅由2012年的0.23%增长至2018年的1.43%,不仅基数较少,增长速度也十分缓慢,说明我国目前执行案件转为破产案件仍面临很多阻力,执行转破产程序存在“启动难”的困境。

二、执行转破产“启动难”之原因

（一）执行转破产启动动力不足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执行转破产需要经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的同意。^②但是在司法实务中,此项主观要件很难实现,不管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都愿申请破产。

1. 债权人

对于债权人而言,一方面,常具有“只要被破产企业还在,就有获偿的机会”的心态。^[1]虽然被执行人无现有财产可供执行,倘若其将来恢复了偿债能力,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先前未得以清偿的部分就仍有受偿的可能性。但是经法院宣告破产后,债务人的剩余债务也将全部免除,债权人未得到足额清偿的部分也就基本丧失了获得后续清偿的可能性,这也是债权人不愿接受的。另一方面,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将比进入破产程序获益更多。虽然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在执行阶段可能无法得到全部清偿,但是基于执行程序中有着先申请先执行的保护机制^[2],其通常也能得到部分清偿,并且执行程序具有成本低、效率高、审理期限短的特点,债权人无须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便可受益。一旦执行案件进入到破产程序并最终由法院宣告破产,申请执行人则要按照破产管理人拟定的破产分配方案同其他债权人公平受偿,其所得比例将会大幅度降低。^[3]破产程序启动后费时费力,且难以预料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清偿结果,因此追求自身债权利益最大化的债权人主观上不愿意进入破产程序。

2. 债务人

相对于债权人,债务人对企业的经营状况、所欠债务等具有信息优势,因此更适合申请破产。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债务人也缺乏启动破产的意愿。对于经营已经陷入窘况的企业来说,当然希望能够采取一定的措施扭亏为盈。如果进入破产程序,则意味着企业法人主体资格的丧失,企业将再无生机可言,股东个人财产也会受到波及。破产管理人会在公司被申请破产后对其进行全面的调查,一些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光彩”行为也可能随之被发现。这些行为一旦被社会所知晓,将会对企业产生不良社会影响进而造成难以挽回的局面。倘若管理人员或者法人代表存在违法行为,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甚至还要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当前我国的失信惩罚制度尚不完善,相对于申请破产只免除部分剩余债务,一些诚信缺失的债权人更愿意选择隐匿、毁损财产或直接被注销从而逃避债务。^[4]因此,出于以上各种因素的考虑,债务人往往不愿主动申请破产。

（二）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存在窘境

1. 部门之间协调不力加大了执行转破产的阻力
破产案件往往涉及人员安置、资金调查等多方面的工作,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银行的帮助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配合,仅有法院主导处置是很难完成的。然而,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仅对

法院间在移送过程中的配合加以规定,《指导意见》中也只对法院内部部门之间提出了“依法有序、协调配合、高效便捷”的工作原则,但对与法院之外相关的机关、银行等之间如何协调未进行规定。因此,在司法实务中由于协调配合机制的不全面导致各部门间协调不力,加大了执行转破产的难度。

2. 执行转破产案件复杂导致法院积极性不高

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若有案件拟从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法院不但要在移送前期对被执行企业进行全面的调查、审查,并对结果进行汇总、整合,还要对恶意破产的行为进行鉴别以及承担移送后被退回导致“无用功”的风险。因此,考虑到执行案多人少、相关资源紧张、绩效考核等多重因素,执行人员主动引导案件从执行程序移送破产程序的积极性不高。^[5]

3. 专业化人员缺乏导致案件审理困难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执行转破产案件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相应地对人民法院的审理工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由于破产案件专业性强,审理时不仅涉及《企业破产法》还会涉及其他诸多部门法的综合应用,对法官的综合业务素质要求较高。然而人民法院长期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且具有高水平的办案人员不多,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三) 相关制度存在缺陷

1. 参与分配制度的扩大化适用影响破产程序的启动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96条规定,未经清理或清算而撤销、注销或歇业,且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企业法人,应当参照本规定对各债权人的债权按比例清偿。司法实务中,当事人、法院倾向于对该条规定从宽把握,即认为是对企业法人扩大化适用参与分配制度的肯定。该规定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被作为类破产程序,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部分破产功能,严重影响了破产程序的适用。^[6]通过上文的分析,破产程序的条件要求高,花费成本多且操作也较为复杂;而参与分配制度的适用条件相对简单,执行效率高,且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参与分配能够基于优先主义得到更高比例的受偿。^[7]因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债权人更愿意选择适用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来保护自己的债权。这显然对破产程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2. 制度适用主体相对狭窄导致提起破产程序的可能性降低

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可以申请执行转

破产的是被执行人和执行申请人。因此,一部分债权人虽享有债权,但因其处于尚未终结的诉讼中而无法申请启动破产程序。这也导致了该部分债权人在债权受偿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虽然他们的债权未经生效裁判确认,权利属性和数额尚不能明确,但是他们可能更愿意启动破产程序来保证受偿的公平性。此外,《指导意见》在实施过程中提高了适用执行转破产程序的主体条件,主体范围也被限定为企业法人,其目的是解决大量执行案件被积压的现状。目前的实施现状是否达到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尚不做定论,但由于立法上未将其他类型的法人规定为执行转破产程序的适用主体,因此即使他们符合《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可以适用破产制度,但在执行转破产程序上由于主体不适格也难以实现相关程序的移送。

三、执行转破产“启动难”之对策

(一) 激发相关主体启动破产程序的动力

1. 提高债权人申请执行转破产的积极性

债权人在破产程序和执行程序之间优先选择执行程序的原因,除了破产程序的清偿率低、费用高及耗时长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执行程序中的优先主义原则可以使其消耗较低的成本、获得更高的清偿率。虽然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人能够得到公平清偿,但对于申请执行转破产的债权人来说,其积极行使权利的行为换来的是其他债权人“搭便车”,这显然不公平。因此,在执行转破产程序中,可以借鉴执行程序中的优先主义原则,如经法院释明后对提出破产申请的债权人给予其高于其他同一清偿顺位债权人的清偿比例,以此提升债权人申请执行转破产的积极性。此外,政府还应当加大资金投入,完善信息平台,让债权人及时了解债务人的相关信息,维护其知情权、程序参与权;同时加大普法力度,使债权人充分了解该程序,转变其“望而生畏”的理念。

2. 推动债务人破产义务化

破产申请在我国《企业破产法》只是被作为债权人、债务人的一项权利,《公司法》也只规定了“破产清算人”这一主体的破产申请义务^③,而债权人、债务人申请破产目前并不在我国法律规定的义务范围之内。虽然破产申请应当尊重债权人、债务人的意思自治,但由于只有经营者最清楚其是否达到破产条件,也最有条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因此,笔者建议完善执行转破产的相关法律法规,在一定条件下实行债务人破产义务化。即在大量难以清偿的债务出现的情况下,应当规定在满足破产条件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负有向法院申请企业退出市场的义

务;若怠于履行申请义务,则要以个人资产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5]以此种倒逼的方式敦促企业经营者申请破产,不仅有利于及时将“僵尸企业”清除出市场,还有利于债务的及时清偿,保障众多债权人的利益。

(二) 优化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条件

1. 加强法院与相关部门之间协调配合

良好的协调有利于提高执行转破产效率、缩短审理周期。企业自设立开始直至最终退出市场,其登记注销、财产处置等相关工作与政府的职能部门等密不可分。在破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倘若没有相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仅凭法院之力是难以解决的。由于《指导意见》中只有对法院内部协调机制的规定,缺乏法院与其他部门如何协调合作的相关制度,因此有必要细化法院与其他部门在执行转破产程序上的法律规定,如指派专业人员参与破产案件的跟进工作,对案件提出专业性意见,以期通过调动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减少工作中的纰漏,从而高效、专业地推进执行转破产程序。

2. 推动破产案件审理繁简分流

《会议纪要》第29条强调,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应当提升审判效率,建立破产案件审理的繁简分流机制。推动破产案件审理繁简分流,实现案件的难易与程序的繁简相匹配,做到“繁案精办”“简案快审”^[8],有利于执行转破产案件的顺利推进,提高审判绩效,减轻破产审判工作压力。为此,应当建立简易执行转破产案件的识别机制,综合考虑债务人企业可供分配的财产总额、债权数额、债权人数量等因素,对执行案件的复杂程度进行初步判断,对于法律关系复杂等情形的案件,按照普通破产审判程序予以审理;对一些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事实清楚且争议不大的破产案件,简化执行转破产案件中破产管理人的选定、案件的公告、债权申报等程序,推动破产案件快速审理。

3. 走破产案件审判专业化道路

破产案件之所以审理难度大,在于其涉及较多专业知识,再加上破产案件多属涉众案件,极易涉及地方利益,此时法官除了要考虑破产案件本身的复杂性,还需要对其中涉及的社会利益进行把握。^[9]因此,审理破产案件对法官的专业素养、从业经验、社会敏感度等方面提出了较高要求,这就需要破产案件的审判走规范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培养审判人员的专业性,定期进行破产专业知识的培训,切实增强其处理破产案件的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尝试在破产案件较多或者潜在破产企业

较多的地方试点设置专门的破产审判庭,对破产案件进行集中管辖和审判,减轻普通法院的工作压力。

(三) 完善执行转破产相关制度

1. 逐步取消企业法人适用参与分配制度

参与分配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除企业法人之外的与其他债务人有关的纠纷,即适用主体不包括企业法人。既然我国《企业破产法》已明确规定其调整对象为企业法人,倘若再允许企业法人适用参与分配制度,必将导致在立法上不统一,在司法实务操作中产生矛盾。为了尽可能避免参与分配制度在破产程序中的不当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参与分配的有关规定做出了相应的修改,设置了执行转破产制度及严格限制企业法人适用参与分配制度^④,但在实践中仍常对《执行规定》第96条扩大化适用。笔者认为,应当严格限制直至逐步取消企业法人适用参与分配制度,在立法上对参与分配制度和破产程序的适用条件、功能定位等方面加以界定与区分,明确参与分配制度的适用对象是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有关企业法人的债权债务纠纷应以《企业破产法》为准。

2. 扩大执行转破产制度的适用主体

根据上文所述,因诉讼程序尚未终结而无法启动破产程序的债权人,可能更愿意启动破产程序来保证受偿公平性。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债权人只要符合第7条第2款规定并按照第8条提交破产申请书及有关证据,即可作为适格申请人。^⑤可见,在破产法规定的有权申请破产程序的债权人条件中,获得生效裁判或其他强制执行依据并不是必需的。^[2]据此,可以赋予该部分债权人申请执行转破产程序的权利,而是否进入破产程序仍需相关法院依法审查后予以裁决。针对《指导意见》中将适用执行转破产程序的主体范围限定为企业法人,而其他类型的法人如何实现破产程序移送立法上未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参照一些国外立法,扩大适用主体范围。事实上,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对非企业法人适用执行转破产制度进行了探索,2016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若干意见》就可供借鉴和参考。^⑥其他地区可以参照广东省的实践经验,制定相关地方性司法文件,并逐步在我国推广开来,进而形成统一的规范。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访问日期2019年6月20日。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 513 条。

- ③《企业破产法》第 7 条,《公司法》第 187 条。
- 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513 条至第 516 条。
- ⑤《企业破产法》第 7 条第 2 款:“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 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若干意见》第 2 条:企业法人及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参照适用破产程序的其他组织适用本意见。

参考文献:

- [1] 蒋屹. 从 10 份判决书看“执转破”为什么难[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18(2): 51 - 55.
- [2] 张伊扬. 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转破产机制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8.
- [3] 丁学武. 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制度研究[D]. 南昌: 南昌

大学, 2018.

- [4] 龙亮. 民事执行中破产程序启动难困境与突破[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172 - 177.
- [5] 王雪丹. 试论破产程序与执行程序的竞争与共生[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5): 124 - 133.
- [6] 江必新.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专题讲座[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
- [7] 谢源成. 执行与破产衔接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法制与社会, 2017(30): 205 - 206.
- [8] 李蕊. 执行转破产工作的推进路径[N]. 人民法院报, 2018 - 08 - 01(7).
- [9] 廖丽环. 执行转破产制度的路径优化[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2): 146 - 154.

(责任编辑 刘成贺)

On the “Difficulty in Starting” of the Transition from Execution Procedure to Bankruptcy Procedure in China

ZHU Yi

(School of Law,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As a new system in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al Law*, “execution - to - bankruptcy” is the core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xecution cases and bankruptcy cas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olve the difficulty in execution, digest zombie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re - allocation of market resources and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owever, at present,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execution procedure to the bankruptcy procedure is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difficult in starting”. The specific reasons are that the creditor and debtor have insufficient start - up motivation, the court has difficulties to accept the bankruptcy case, and relevant system is not perfec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imulate the motivation of relevant subjects to start the bankruptcy procedure, optimiz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ourt to hear the bankruptcy cases, and perfect the relevant system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bankruptcy procedure, so a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in starting” of the execution of the bankruptcy procedure.

Key words: execution procedure to bankruptcy procedure; subject of start - up; cumbersome and simplify shunt

国内网络抗争研究的学术图景

——基于 CNKI 数据库的计量与可视化分析

王凤仙, 刘 艺

(江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运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的分析方法,对国内网络抗争研究文献进行全面扫描。研究发现,该研究领域处于稳定发展时期,合作网络稀疏、团队薄弱但不乏中坚力量,研究热点在于处置公共危机和保护公民权利两大焦点问题,知识谱系由社会学向管理学转移。基于量化分析,研究认为:目前网络抗争研究版图包括社会学范式、管理学范式、政治学范式三种面向;研究焦点在于公共危机和公民权利;研究范式从社会学转向管理学,从理论型研究转向应用型、对策型研究;学科结构由多学科向跨学科演进。

关键词:线上表达;网络行动;网络舆论;网络抗争;知识图谱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10

中图分类号:G206;G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48-06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法是以学术文献为对象,采用数学与统计学方法来描述、评价和预测的学术研究方法,从定量的角度分析文献规律,展现学科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1]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原理,借助陈超美教授开发的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作为分析工具,对文献的作者、机构、关键词、引用关系等进行共现、聚类等技术分析,并绘制可视化网络知识图谱,尝试描绘国内网络抗争研究领域的热点领域、知识结构以及演进路径。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简称 CNKI)作为数据来源,因为 CNKI 数据库涵盖了最为丰富的国内文献,能为本研究提供扎实全面的数据支撑。设定检索式为:主题=(“网络”or“互联网”or“在线”or“新媒体”);AND 主题=(“抗争”or“抵抗”or“行动”or“事件”);文献分类=(“基础科学”and

“哲学与人文科学”and“社会科学 I 辑”and“社会科学 II 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共检索到网络抗争研究文献 17733 篇。

二、研究发现

(一)文献增长:处于稳定发展时期

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内,科学文献的数量变化直接反映了科学知识量的变化。^[2]⁴⁴文献增长规律的研究,一般以文献累积数据为依据。^[2]¹⁰¹据此,我们将网络抗争研究文献的年度累积情况绘制如图 1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库文献录入的滞后,2018 年发表的部分相关文献可能不在检索文献中。

整体来看,文献累积线条为一条平滑的上扬曲线,表明文献数量呈指数增长,符合指数增长规律。由此可判断,网络抗争研究在我国还处于知识积累阶段,属于科学的“发展时期”,未来的文献数量还将保持持续增长。网络抗争研究的发展进程中,按照文献产出量的变化,可以发现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收稿日期:2019-10-18

基金项目: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网民消极话语抗争及其疏导研究”(17CXW029);2016 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对话理论的网络舆论引导研究——一种超越主体的间性视角”(16XW09);江西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王凤仙(1982—),女,湖北武汉人,传播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政治传播。

2003年,文献数量猛增至79篇,此前文献产出量十分平稳,年均约19篇。此后,关于抗争研究逐渐多起来,主要集中于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农业税、计划生育等严厉的政策背景下,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始终处于较为紧张的状态,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常常遭到部分基层政府官员、强势企业等利益集团的侵害。^[3]中国农民所进行的维权抗争主要是对这些“集团”外部“压迫”的反应^[4]。

2008年,文献产出量达414篇,约等于2007年文献产出量的2倍,之后文献增长量保持近乎直线式增长。分析其社会背景,2008年,我国互联网基本普及,社交媒体开始发展,国内抗争事件有了新的发声渠道。2010年被称为中国的“微博元年”,当年近一半的网络舆论监督案例,经由微博曝光、微博在事件发酵过程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日记局长”、辽宁庄河千人市政府下跪事件、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我爸是李刚”等事件均在微博上发酵起来,进而扩大。

2013年开始,文献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自2013年开始,文献的年增幅从350篇减至100篇左右。在网络抗争史上,2013年也是值得注意的转折点,网络事件在频率和内容上开始发生变化。^[5]由于政府加大了对互联网的管理力度,微博大V遭遇沉重打击,官媒进军微博舆论场,积极引导舆论,再加上微信分流,微博热度开始大幅度下降。^[6]直至2018年,虽然政府治理对网络事件的发生频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学术界对网络抗争研究热度不减,文献数量依然保持上升趋势。

(二)合作网络:薄弱但不乏中坚力量

科学合作,通过作者合作和机构合作两种形式体现出来。本研究首先绘制作者共现网络如图2。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作者,节点的大小与该作者的发文篇数成正比,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与节点共现的次数成正比。该网络密度为0.0022,说明网络抗争作者合作网络比较分散和稀疏,研究的学术联系较弱,团队规模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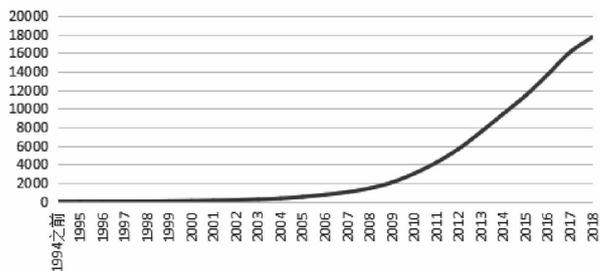


图1 网络抗争研究论文的年度累积情况

第一,从单个节点来看,图中较明显的节点只有7个,兰月新(48篇)、张鹏(34篇)、张磊(30篇)、夏一雪(23篇)、付业勤(18篇)、李国祥(16篇)、王国华(16篇),网络抗争研究作者群体虽然已形成一定的科研合作团队,但核心作者群体薄弱。第二,从科学社会学视角分析,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主要基于项目合作、学缘关系或地缘关系而形成。例如,阳晓艳、高浩、吴心灵、靳媛、吴春祥都来自大连,所发表的文献同属同一课题;王国华、郭小安、曾润喜、方付建等形成以王国华为中心的合作网络,王国华与其他诸作者之间为师生关系;兰月新、张鹏、夏一雪、李昊青等人均来自河北地区,梅松丽、寇长安、张迪、于雅琴等人均来自吉林;第三,不少媒体从业者发文数量大,在网络中较为突出。如《打好网络舆情应对主动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走好网络群众路线》等文章,篇幅较短,往往是关于宣传舆论工作目标、方法、对策等的从业体会和经验总结,缺乏理论深度。

本研究还绘制了机构共现网络图谱(如图3),同样每个节点代表一个机构,机构的发文数量与节点的大小成正比,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与节点共现的次数成正比。该网络密度为0.0016,网络抗争研究机构所形成的合作网络也比较稀疏,联系较弱。

图中较为突出的节点,有中国社会报社舆情中心(180篇)、民政部新闻办(162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80篇)、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47篇)、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36篇)、华东政法大学(35篇)、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34篇)、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28篇)等等。其中,中国社会报社舆情中心和民政部新闻办最为高产,这表明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对网络抗争问题的关注度非常高。其余重要节点均为高等院校,以上提及的几所高校是网络抗争研究的主要力量,以它们为中心形成了两大区域化的合作网络。中部地区形成以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为核心的合作网络,其分支有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等等。长三角地区形成的合作网络包括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等。区域之间的合作网络,人才流动是其合作关系形成的重要原因。另外,高校内部也存在跨学院的合作关系,比如,南京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与信息管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与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电子科技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院与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等等。跨院系的合作充分说明网络抗争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议题,其

问题往往综合涉及传播学、信息科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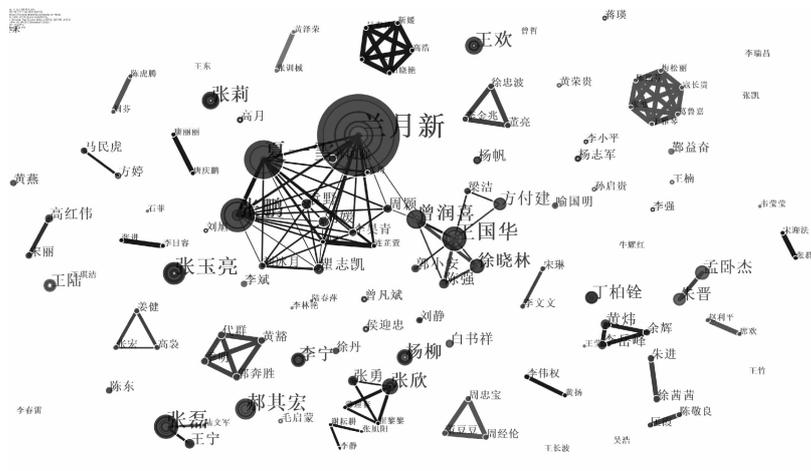


图2 网络抗争研究作者合作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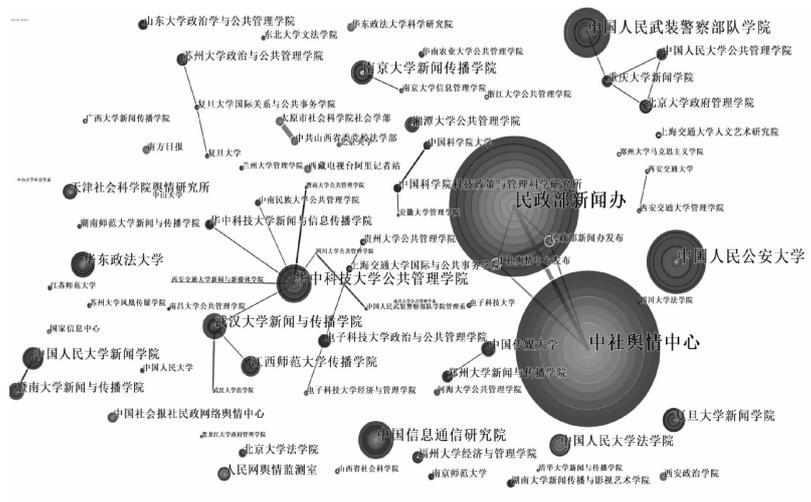


图3 网络抗争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三) 研究热点: 聚焦公共危机与公民权利

关键词的共现关系, 体现着各研究主题之间的结构关系。关键词共现的次数越多, 表明关系越密切。图4是网络抗争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每个

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 节点的大小与该词词频成正比, 节点之间的连线的粗细与共现的次数成正比。图4的网络密度为0.0285, 连线比较稀疏, 没有形成整体性的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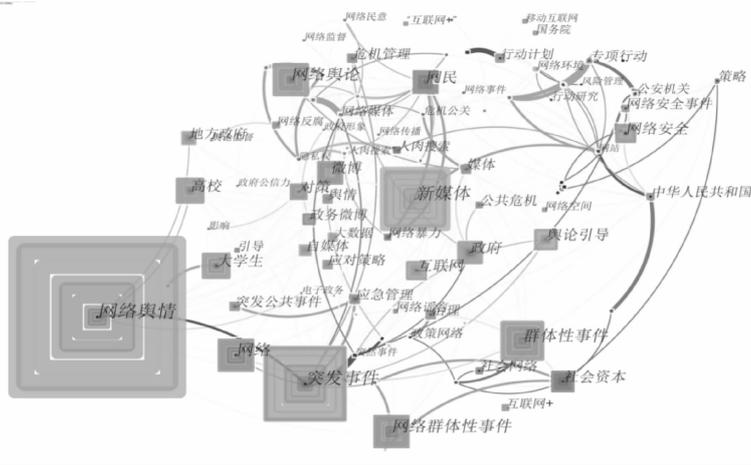


图4 网络抗争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

图谱可以直观地划分为两个区域, 一个是以“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新媒体”为核心组成的较

大的共现区域,另一个是以“网络安全”为中心的较小的共现区域。较大的共现区域中,包含几类不同的概念:指涉和界定抗争事件的有“网络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突发公共事件”“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关于抗争行动方式的有“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涉及应对和处置的有“引导”“策略”“治理”“危机管理”“舆情”;还有提及网络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公共机关”“国务院”“政府”等。通过这些概念,大体可以推测,网络抗争研究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由突发事件引发的新媒体舆情,研究问题是对危机的处置和对舆情的应对,治理主体是政府部门,重点难点是“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在较小的共现区域,关键词之间的结构关系比较单一,即以“网络安全”为目标,展开各种治理行动。

对图4关键词共现网络进行聚类并绘制 timeline 视图得到图5。图中显示了 CiteSpace 生成的5个聚类标签,自上而下,按照聚类大小排列;从左至右按照时序排列的,是各聚类中不断演进着的关键词,体现着聚类中的知识流向。该图谱中聚类的模块值(Q值)为0.5259,表明聚类模块度比较高;平均轮廓值(S值)为0.6738,说明聚类效率较高、聚类合理。“网络舆情”和“网络”是其中最大的两个聚类,节点数都为25,时间跨度也最长,大致在2001—2018年。“网络舆情”这一表达本就透露着危机传播研究的范式,在这一聚类中,依次出现了“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公共危机”“应急管理”“舆论引导”“应对”等关键词,政府面临的公共危机或突发事件的应对和舆论引导是这类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往往采取管理学或行政研究的取向。“网络”聚类的涵盖面最广,包括“社会资本”“全球化”“网络成瘾”“集体行动”“政治参与”“网络谣言”等话题,这些话题与网络抗争密切相关,也体现了网络抗争问题的复杂性。“隐私权”在2007年的讨论最为热烈,它涉及公民权利和媒介伦理问题,作为一项公民权利,也是网络抗争研究的重要关注点。“行动研究”中所讲到的“行动”,某种程度上正是“抗争”的同义词,在许多社会抗争研究中,“行动”即等同于抗争。“美国”一词被识别为聚类标签,可能与国内网络抗争研究深受西方理论资源影响的研究传统有关,同时,美国也是全球抗争研究力量中的主流,美国经验、美国案例常常被作为研究对象,也成为国内相关研究的引述对象。“专项行动”这一标签,恰好体现了国内网络舆论相关研究的管理学或行政研究范式,在互联网治理的总体目标下,各项专项行动正是被作为对策被提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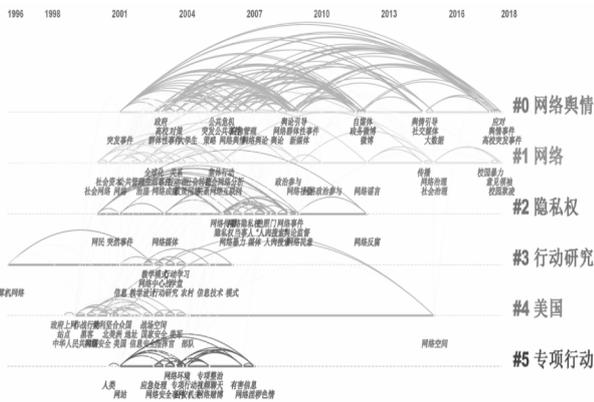


图5 关键词聚类 timeline 视图

(四)知识基础:由社会学转向管理学

CiteSpace 将知识基础概念化成被前沿文献不断引用、不断发展的共被引文献集合。由于中国知网导出的文献数据中不含被引数据,无法进行共被引分析,因而选取被引次数最高的文献进行分析,列表如表1。

文献大致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

(1)基于社会学视角进行经验研究,结合社会心理学、行为主义等将抗争行为或抗争事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结构性解析,理解和认知网络抗争。学者们首先认识到网络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区别,夏学銮辨析了网络社会的性质及其与现实社会的差异,认为线上行为与线下行为是否一致,与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进而就网络抗争的典型形态,选择事件标本进行解析,杜骏飞运用类型学的分析方法来认知网络群体事件,探讨其特征、本质形态、失范性及治理原则。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开始分析网络抗争行为的影响因素,蔡禾等发现农民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进行网络抗争,而相对剥夺感、法律认知水平、社会网络规模等都对其抗争行为产生影响。

(2)基于网络舆情应急管理,进行管理取向、行政取向的研究,提出应对网络舆情的处置对策。这类研究往往将立足于政府,以网络空间治理为目标,提出舆情应对的原则、机制、方案、办法等。史波构建了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变机理体系,从形成机理、发展机理、变异机理、作用机理和终结机理五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网络舆情的演变路径、演变表现和演变动因。鄞益奋认为网络治理需建立在价值协同、信息共享以及诱导与动员等方面的协调机制的基础上,并培育起信任关系,才有可能实现。常锐探讨了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倡导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公民社会广泛参与,协助和监督的治理模式。

(3)从政治学或法学的视角进行价值研究,主要探讨公民权益保护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政法

领域的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网络环境下社会治理正在发生的变化。罗素才等认为公共治理兴起与公法变革之间相辅相成、彼此强化,国家管理失灵直接推动着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共参与整合而成的公共治理模式的普遍兴起。王诗宗提出治理理论在

中国的适用性是有限度的——它可以在局部和地方的公共事务治理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也能触动地方政府的公共行政方式演进,但在“政治进步”方面的作用可能较为有限,不能迅速改变中国公共行政的整体面貌。

表1 国内网络抗争高被引文献 TOP25

文献名	作者	时间	被引量
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	张文宏	2003/7/20	802
网络群体事件的类型辨析	杜骏飞	2009/7/15	351
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	鄢益奋	2007/1/20	344
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防范	揭萍;熊美保	2007/9/25	302
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	罗豪才;宋功德	2005/10/9	284
社会资本: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的比较	周红云	2003/7/25	265
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	石发勇	2005/6/10	252
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	蔡禾;李超海;冯建华	2009/1/20	246
“‘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	肖林	2011/7/20	239
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基于公共行政学的视角	王诗宗	2009/6/20	230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生命周期原理及集群决策研究	谢科范;赵湜;陈刚;蔡文静	2010/8/31	219
微博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谢耘耕;徐颖	2011/4/15	217
社会资本理论述评	周红云	2002/10/15	216
社会资本及其在中国的研究与应用	周红云	2004/3/25	213
社会空间的另一种想象——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视野	李林艳	2004/5/20	201
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	王春光	2000/5/20	200
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内在演变机理研究	史波	2010/4/18	199
群体性事件多种原因的理论阐释	陈潭;黄金	2009/12/18	197
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	黄荣贵;桂勇	2009/9/20	190
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及其治理模式与机制研究	常锐	2012/12/1	184
社会资本及其主要理论研究观点综述	陈柳钦	2007/6/15	173
公民参与和当下中国的治道变革	杨光斌	2009/1/1	168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研究	马荔	2010/5/1	166
网络社会学建构	夏学銮	2004/1/20	165
从社区到社会网络——一种互联网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拓展	彭兰	2009/5/23	158

(4)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述评、反思的元研究。其中,引介西方经典理论的文献最为丰富。学者周红云通过系列论文系统述评了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等西方代表性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和使用,梳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对这种分析框架进行评估。张文宏也梳理社会资本理论,同时提出“关系”似乎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突生现象,中国社会的实证研究应该避免西方的社会资本理论和测量工具照搬到中国,忽视中国社会“关系”的真正内涵。李林艳则从方法论的视角介绍了社会网络分析,认为它能够对社会结构进行深刻洞察。

需要说明的是,除表1所列文献,还有一些高被引文献值得我们关注。由于被引次数在时间序列上是累积递增的,经典文献由于发表时间久远而积累了极高的被引次数,部分相对新近一些的文献虽被广泛引用却很难在引用次数上超越经典文献。

从时间序列上看,社会学视角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2000—2007年,管理取向的研究文献集中于2009年以后,而被引次数与前者相当甚至更高。可见,国内网络抗争研究的知识基础明显地由经验研究、理论研究转向行政研究、应用研究。

三、研究结论

通过对国内网络抗争研究文献的文献增长、合作网络、研究热点、知识基础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将该领域的研究状况概括如下:

(一)版图:三种面向

国内网络抗争研究大体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研究形式,分别对应着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三种学科范式。虽然针对的是同样的研究话题,三种学科范式却指向不同的研究目标。社会学范式继承科学主义传统,着重认识抗争事件、抗争行为背后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规律性问题。管理学立足于公共管理的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及其有序运行,以平复突发事件及舆情、提升公共管理效率为目标。政治学关注抗争中的权利与价值问题,进行公平正义等伦理探讨,最终落脚点还在于制度性问题。三种学科范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相同。社会学往往采用量化的方法进行结构性解析;管理学则通过案例解剖的方式进行比较;政治学则倾向逻辑思辨、价值探讨。

(二)焦点:公共危机与公民权利

结合研究热点并阅读梳理重要文献内容后,我们发现,在国内网络抗争研究中,“微博”“大数据”等概念被用来描述研究问题所处的媒介背景或技术

条件,“人肉搜索”“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反腐”等现象常被作为研究对象。在网络抗争中,公民权利受损或不公是抗争的起点,而保护公民权利则成为抗争的目标。网络抗争不论起源于个人维权还是公共危机,都是在引起广泛关注以后,通过舆论压力实现权力调节,进而实现利益协商。在相关研究中,伦理问题常常成为研究者争论的焦点,最终讨论基本都围绕公共危机处置和公民权利保护两大问题展开。

(三)趋势:范式转型

从时间序列上看,国内网络抗争研究在2007年左右出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型。这种转型在研究热点的演进和知识基础的转变中均有所体现。在研究热点的更迭中,自2008年起应用性、对策型的研究开始取代理论型的研究;在知识基础的谱系中,社会学范式的研究集中在2007年以前,2009年后管理学范式的研究才成为主流。在2007年之前,国内网络抗争研究还是借助“社会资本”“行动主义”等西方理论资源结合中国的在线抗争经验进行阐释性研究,延续了社会抗争研究的传统。当时,互联网技术还未如此发展,也未如此深刻地卷入社会生活,学者们并未重视这种媒介环境的变化之于抗争研究的意义。2007年之后,社会冲突事件常常在各种网络平台上发酵,形成巨大的舆论声势,给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部门造成困难和压力。政府开始重视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和调控,学者们在各种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中充当智库的角色,学术界形成了管理学范式和行政取向的研究热潮。

(四)结构:多学科向跨学科演进

在传统的媒介环境下,社会抗争已经是一个被

多门学科所关注的研究议题,它广泛地涉及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等学科。到新媒体环境下,传播学成为网络抗争研究的主力。传播学自诞生以来就是一门融合的学科、交叉的学科,施拉姆不仅把传播学描述为“十字路口”,他所认定的四位先驱人物也均来自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不仅如此,从合作网络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网络抗争研究领域,高等院校内部的跨院系合作比较频繁,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上互鉴互融。信息科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多门学科已经打破藩篱,在网络抗争这一研究议题上逐渐融汇起来。

参考文献:

- [1] 喻国明,潘佳宝.西方传媒经济学发展的学科图谱: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分析(2003—2014)[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4(1):15-28.
- [2] 邱均平.信息计量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 [3] 高新宇.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回顾与展望[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0(5):77-83,92.
- [4] 于建嵘.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研究:基于H县农民维权抗争的考察[J].学海,2006(2):26-32.
- [5] 杨国斌.情之殇:网络情感动员的文明进程[J].传播学社会季刊,2017(40):75-104.
- [6] 人民网.2013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EB/OL].(2014-03-18)[2019-05-20].[http://yuqing. people.com.cn/n/2014/0318/c64391-24662668.html](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4/0318/c64391-24662668.html).

(责任编辑 吕志远)

The Academic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Chinese Online Contention

—A Bibliometric and Visualization Analysis Based on CNKI Database

WANG Fengxian, LIU Y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bibliometrics and the knowledge mapping theory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online contention research.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search field is in a period of stable development;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is sparse, the team is weak but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backbones; the research hotspot lies in the two major issues of dealing with public crises and protecting civil rights; the knowledge pedigree has transferred from sociology to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study draws conclusions that current research on internet resistance includes three aspects, those are sociological, management and political;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public crisis and civil rights; the research paradigm shifts from sociology to management, from theoretical research to applied research; the discipline structure evolves from multidisciplinary to interdisciplinary.

Key words: internet expression; online action; online consensus; online contention;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中原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性传承研究

——以河南“猴加官”非遗项目为例

樊钢亮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文化遗产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特有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中原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猴加官”作为地域文化浓厚的传统手工艺,在当今全球文化的冲击下,该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创新,以应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对中原地区“猴加官”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分别从制作技艺、数字化保护和传播媒介等几个方面对其创新传承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猴加官;保护传承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11

中图分类号:TS19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54-04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不仅体现了各个时期不同群体或个体在历史变迁与环境变化过程中的传承和创新,同时也反映一种文化的延续和历史的发展。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如今,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原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与传承过程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为了真正做到保护与传承,守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除了适应当今社会需要,还要考虑其创新性的传承,要对中原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性、传承性、流变性、共生性特征进行研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猴加官的发展脉络

“猴加官”是中原地区一门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又被称为“活泥猴”,距今已流传了300多年。它的诞生地目前无从考证,但是经过调查研究,“猴加官”这门传统民间手工艺的文化活跃地带位于今天河南的豫中地区,“猴加官”是当地节庆上供儿童娱乐的一种杠杆结构的机械玩具。至今在这一地区还可以寻觅到它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生态遗存。

“猴加官”名字的由来一方面与其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物质载体猴子有关,另一方面和中原地区文化习俗有关,即通过迎合传统文化“讨口彩”的大众心理,获得吉祥的寓意。“猴”与中国古时的爵位“侯”同音,而“加官”二字,是指在原来官职的基础上,被统治者再授予代表一定特权的官衔,即官吏的升迁,两个字加起来变成“猴加官”,就是封侯又加官,含有加官晋爵、催人奋进的美好愿望。

随着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台,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各地广泛开展起来。2005年,我国政府出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开展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猴加官”这项传统民间手工艺也正是在此次普查过程中被发现和认定的。

2008年“猴加官”作一项重要的民间传统技艺项目被列入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2009年在郑州市非遗处的推介下,于同年又一次成功入选河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猴加官”作为中原历史文化的的一个缩影,代表了以祈福为特点的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体系。对于保

收稿日期:2019-12-12

作者简介:樊钢亮(1987—),男,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文化遗产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史及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

持中原文化的主体性、多样性,提高中华民族核心文化价值的认同,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猴加官的传承发展现状

(一)猴加官的制作技艺

猴加官的制作工艺主要是传统泥塑和布艺相结合,其中泥塑部分是整个技艺的关键,其制作和中国传统民间泥塑制作方法大体类似。一般需要经过陶土的筛检→和泥→摔泥→陈腐→猴身捏塑→布艺→组装等几个阶段。陶土筛选:首先需要挑选颗粒细密、杂质较少、黏着度较强的红泥土,挑选后的泥土要经过舂碓、过筛、浮选等步骤。和泥阶段:利用前期挑选过的泥土,加入适量的水,进行搅拌,使糊状的泥土更具有韧性,然后放入一种特殊的原料即蓬松的棉絮,目的是为了增强黏土的黏合性。摔泥阶段:将搅拌成块状的泥土放在案面上,然后利用木棍或木拍反复捶打砸揉,直到可以清晰地看到棉絮均匀地分布在泥土里。重力作用下的泥土摔制是泥土糅合比较关键的步骤,通过此步骤,可让泥土中的空气进一步排出。陈腐阶段:反复摔打后的泥土最后使用湿毛巾进行包裹,搁置3—4天,使其完成陈腐过程。泥塑阶段:熟泥制作完成后开始捏塑,在这一环节,猴子使用的面具部分主要通过事先制好的模具完成,面具在泥模的压捏下,进行简单的修饰,放到阴凉处进行凉坯,为后续的彩绘做好准备。晾干后的泥坯首先要使用白色颜料反复进行两次打底,使白色底彩均匀附着在面具上,待底彩干后开始进行彩绘。彩绘部分主要参考戏剧人物的脸谱,这一阶段也是最能考验传承人的高超技艺,在没有草稿的情况下,传承人提笔便开始创作,胸有成竹一气呵成。面具完成后便是猴身的捏塑,猴头制作过程中要预留好猴子耳朵上的穿孔,以方便后期铁质钩环的加装。布艺阶段:猴子的躯干制作主要是布艺,利用白色兔子的皮毛和各种颜色不同的布料通过沾黏和缝制完成。组装阶段:将事先准备好的铁钩环插入猴子耳朵预先留好的穿孔处,利用线、钩将各部分组装起来,组装起来的线通常利用一根T字形的木棍进行固定,到此,一件造型憨态可掬的“猴加官”就完成了。猴加官具有简单的机械构造,脸谱和猴子的爪部作为主要的两个受力点,由于脸谱较重,根据重力学和杠杆原理,可以完成以脸谱为中心的上下移动。表演时通过线和木棍的连接,猴子在左右晃动中不停完成脸谱的戴上和摘下的动作。另外布艺和泥塑的结合,从视觉上增添了猴子造型的灵巧性和可爱程度。

(二)猴加官传承发展的现状

根据田野普查,作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猴加官”,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目前掌握这门传统技艺的传承人仅剩下一名,传承人魏义民现已91岁高龄。从和老人的访谈中得知,传承人祖籍位于河南南阳市,在他14岁首次接触到这门技艺,师傅是一位走街串巷的民间艺人。当时为了学习这门手工技艺。传承人按照师徒相承的行规,经历了3年的学徒阶段。根据传承人的描述,出师后他靠着这门手工技艺在那个时期已达到丰衣足食。后来由于战争和灾荒的问题,为了生存传承人离开故土,随家人逃难到外地。由于社会的动乱,“猴加官”这门技艺在当时战争环境下已失去谋生的条件,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传承人也再没有制作过“猴加官”。随着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传承人参军,之后又参加了1951年的抗美援朝,军队转业后,传承人分配到郑州公交公司上班。退休后的传承人为了补贴家用,再一次捡起这门之前谋生的技艺,在当时的集市和庙会上进行售卖,得到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但是由于“猴加官”这门传统手工技艺工艺复杂,耗时耗力,经济效益又差,随着传承人年事已高,为其提供帮助的老伴离开人世,子女又不愿意继承这份手艺,“猴加官”的制作技艺便再次陷入失传的困境。

尽管“猴加官”已成为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在重商主义的今天,和工业化大批量生产不同。传统民间手工艺生产主要还以手工制作为主,产品的设计和生仍然需要因材施技,通过一件一件的完成”^[1]。由于经济效益低,制作过程漫长,很少有人愿意耐住寂寞,选择继承这项传统技艺。另外在认知层面上,由于文化的区域性,像“猴加官”这样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当地之外的人所认知,受众面的局限性,也使它很难形成产业。现代市场方面,虽然“猴加官”这门传统技艺具有非常深厚的艺术价值和较大的市场开发潜能,但是它至今仍然停留在游商行贩阶段,没有走出作坊式经营的固化思维。正是由于种种原因,“猴加官”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性项目面临着即将消失的危险。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猴加官传承方式创新的途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创新

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外界多种形式的文化宣传,更需要科学的创新和发展。“猴加官”作为一种民间机械性的传统玩具,

喜欢的人虽然很多,但大多数人是图一时的乐趣,真正推崇的,可谓是屈指可数。尤其是现在的青少年,随着现代文化传播方式的多样性,他们的选择范围也越来越大。这种环境下传统手工技艺势必要从创新形式上寻找突破,利用兴趣的转向来形成审美空间的重塑。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猴加官”的表现形式可以结合故事剧本,和数字技术有效的结合。通过这项传统技艺不断向外扩展,形成文化外延的创作模式,在表演中利用故事讲述的办法,突出“猴加官”的内在文化独特性,以此完成传统文化韵味的保存。另外,在保留“猴加官”显著特征的同时,对其配件或者装饰进行改进,使“猴加官”能够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以焕发出新时代的活力。总而言之,多种创新手法的联合应用,让“猴加官”这项传统技艺更富有现代气息,才能够被更多的年轻人接受。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创新

当前“猴加官”的技艺仍然是通过传统手工制作的方式完成,虽然有着传统工艺的原真性,但是也存在效率低,批量化生产无法实施的缺点。针对此种现状,在促进“猴加官”传统手工艺传承,保留其技艺特色的同时,对其工艺进行必要的创新就显得十分必要。这种技艺的创新一方面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又可以得到年轻人的喜欢。比如在“猴加官”制作工艺中,引入现代工艺技法,采用立体构成的制作方法设计出猴子的不同造型。在机械杠杆原理的基础上,适当扩展一些“猴子”肢体动作的技能,让“猴加官”更具趣味性和表演性。在脸谱制作环节,适当引入设计成分,如将一些网红的表情包植入其中,以适应“娱乐大众”的社会潮流。在制作工艺上,完成由手制到模制,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在保留手工环保性的同时,丰富“猴加官”的生产工艺和产品的设计味道,从而实现在传统技艺基础上的创新。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创新

随着时代的发展,总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因为社会变迁而离我们远去,甚至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数字化的保护措施,不仅可以给后人研究提供方便,使研究者能够更加详尽且真实的获取资料,同时也可以在科普的层面给群众带来认识和体验。开展对“猴加官”数字化的保存记录工作是当前推动其技艺传承的一项重要工作。传统的数字化保护在实施中可能更重视“保存”,简单地通过图片拍摄、影像采集和电子文档整理便完成了信息收录工作。在如今开放的传播形式下,数字化技术和

互联网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不仅可以完成上述物理结构和表现形式的记录,而且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形成条件、内在结构和纹理、三维立体信息的收集和存储也能达到全过程性和全方位性。“猴加官”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不仅具有静态的审美价值,通过提线操作,猴子不停变脸的滑稽表演,还带有较强的娱乐价值。在“猴加官”非物质传承数字化保护过程中尝试使用更能体现其艺术价值的记录形式。比如使用感官语言和交互语言的方式描述和阐释这项技艺,使年轻人能够更容易的了解它的价值内涵。除了音视频记录保存外,“猴加官”还可以通过数字媒体艺术的新手段,如利用虚拟现实、三维动画等方式丰富其保存内容。以便提升广大群众对于“猴加官”这项传统技艺的理解和感悟。

(四)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行为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形性决定了其本身传播的有限性,其传播的有限范围又决定了文化空间构造中受众面的熟悉程度。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就会造成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被广大群众知晓。由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虽受到破坏和侵袭,但外界并不知情,因为不了解,即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破坏,也不会有人采取相关措施进行保护。在文化传播中“人们对于不熟悉不了解的事物,无论好坏,进行干涉的主观能动性都不是很高,行动上比较被动”^[2]。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我们就需要借助媒体展开传播。这也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传承工作中的重要手段。“猴加官”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可以通过媒介展示,将其相关价值传播给广大受众,这种传播媒介可以包括影视、动漫、游戏、新媒体等。如“猴加官”和益智游戏的结合,将猴加官的艺术原型带入游戏中,不仅可以获得儿童群体的喜爱,还能促进其文化的传播。再如,利用新媒体,开发猴加官相关的 APP 小程序,以此延伸其“猴加官”文化资源与服务功能。

(五)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营销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主要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形态的设计、生产及商品的销售,来产生经济效益的行为。”^[3]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合适的方法进行商业化开发,以挖掘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来实现其经济价值。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工业化发展的今天,“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通过“猴加官”制作工艺我们发现,因其制作精良,在小范围内赢得

了顾客的好评。按照现代市场营销角度分析,“猴加官”目前缺乏的是合适的市场营销策略。应该尽快摆脱游商行贩的单一模式,通过借鉴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的营销案例,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商业营销之路。比如借鉴网上体验平台,“通过相关手段整合‘猴加官’传统手工技艺,形成‘线上认知、线下动手’的联动发展模式。平台还可通过提供在线学习的方式分享视频和图文,以文化社区的模式实时体验和分享手工制作的乐趣。从而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开发、制作、销售的综合服务平台”^[4]。另外开通像淘宝、当当、天猫、京东等电商销售线路,以此提高“猴加官”文化产品的曝光率和受众率。同时结合现代物流的便捷性,进行跨时间、跨区域的销售模式,多管齐下、组合营销来增加猴加官的经营收入。

四、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生物遗传一样也有自己独特的密码和独特的规律。中原地区作为中原文化形成的主阵地,它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主干思想和核心文化的发源地。在某种意义上,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在文化价值还是艺术价值的表现方面,

都具有浓郁的华夏特色。现代化的进程加快了传统文化的不断消失,以中原地区为正统思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也面临着慢慢消失的危险。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过程中,单纯的传承已无法抵御当代文化的侵蚀,文化遗产在保护的过程中也需要突出创新性。应该同当今这个时代和市场展开对话,只有通过表现形式、制作工艺以及传播媒介等多方面的创新。我们周边这些像“猴加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够不断地传承下去,中国传统文化才会更具活力和创新力。

参考文献:

- [1] 欧阳景晏. 猴加官初步研究[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 177-178
- [2] 赵虎敬.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82-23.
- [3] 王晨, 王媛. 文化遗产概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163
- [4] 赵彬. 非物质文化遗产渭南皮影商业化营销研究[D]. 西安: 西安外国语的大学, 2019.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Innovativ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entral China

—Tak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oujiaguan” in Henan as an Example

FAN Gangling

(College of Cultural Heritag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is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presented by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contains unique spiritual connotations and cultural values.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is region, “Houjiaguan” is regarded as a traditional handicraft with strong regional culture.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 culture, how to better inherit and innovate to cop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is a question worthy of attenti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Houjiaguan” development status in the central plains area are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production skills, digital protection, media and so on.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oujiaguan; protect and inherit

“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研究综述

庞广仪

(南宁师范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口岸开放是影响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学者曾经普遍认为:口岸开放促使中国传统国家建构机制解构并按“西化”模式重新整合。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受中国变迁现状的影响,国内外学者日益关注生命力顽强的中国本土因素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作用。近年来,伴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史料不断发掘,学者们更清晰地勾勒出外来和本土两大因素共同作用于近代国家建构的脉络与规律。

关键词:口岸开放;民族国家;建构;综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12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58-06

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日后工作重心之一。观诸历史,中华民族百川汇流、生生不息的背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体系长期传承是有力推手。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雏形:小农经济基础,中央集权政府,跨越民族畛域的儒家政治与文化认同,“内地一边疆”协调机制。自古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相对有限的土地上所养育的人口长期占全世界总人口比例的30%左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各民族之间都面临着巨大的共存与发展问题。为了捍卫共同的家园,协调、疏导各种矛盾以营造良好的发展秩序,历代中国人对国家建构体系进行了传承和改革,在保护各民族文化与血脉生生不息的同时,也强化了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意识。

近代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革”。西方列强以通商口岸为据点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持续渗透,影响了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

一、国外相关学术史梳理

口岸开放对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机制的影响,首先反映在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冲击上,经济基础的变化随之引发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中国小农经济基础长期

传承决定了中国社会道德基础是“家庭孝敬”,建构于其上的国家治理机制是“家国同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构成完整、严密的体系,故能屹立千年而不倒。但是,口岸开放使中国传统经济基础动摇,传统国家建构体系也将随之坍塌:“在陆地和海上打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1]

进入20世纪,西方学者更着眼于国际市场通过通商口岸指导中国城乡经济,促使传统国家建构根基的小农经济基础解构。如马札亚尔指出:开埠之后中国农民很难维持自给自足,而是在国外市场的冲击和制导下,不仅出卖了部分“剩余”商品,而且还将部分生活必需品出售。^[2]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基础解构的判断与预测,是建立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编撰的《海关十年报告》《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所提供原始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刘易斯于1950年代提出“二元经济结构”。根据该理论模式,中国近代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传统农村经济体系为“一元”,其特征是高成本、发展停滞、劳动力过剩;现代经济体系为另一“一元”,其特征是以口岸为中心,低成本、高资本、高技

收稿日期:2019-12-28

作者简介:庞广仪(1977—),广西钦州人,博士,南宁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术和持续增长;后者对于前者有着强大的引领作用。^[3]中国近代社会乃至整个国家建构都是建立在“二元经济结构”上,伴随着“二元经济”的演变而解构、重整。

1950年代之后,“现代化”模式阐述了近代中国国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重构。“现代化”因素是通过开放口岸作为窗口传递到内地的,促使中国传统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国家建构因素向着“现代化”方向转变。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和卡蒂尔的《中国南部沿海的商业城市宁波、福州和厦门》等都用“现代化”视角探索开埠后中国的发展演变。^[4]

国外学界随着对中国问题研究细化,日益关注社会土壤深处所蕴涵的民族国家建构机制恢复能力,以及外来因素的消化能力。以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为传统阵地的“加州学派”的系列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建构问题的研究。

“加州学派”可以上溯至1930年代。费正清等学者系统化地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探索西方冲击对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作用力。虽然“费正清模式”仍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但已经高度重视中国原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因素强劲的生命力,并以此构建中西方之间“冲击—回应”关系,认为中国社会深处蕴藏的强劲“回应力”使国家免于完全解构并沦为西方附庸。^[5]1970年代之后,伊懋可(Mark Elvin)系列论著系统地阐述了传统中国经济以及基于其上的国家建构模式,并指出诸多传统内涵在近代和现代一直延续。

1980年到2019年,“加州学派”随着华裔学者或者旅美英中国学者的加入而队伍日益壮大,成果体系也更加完整,万志英、彭慕兰、贡德弗兰克、康文林、王国斌、黄宗智、李中清、李伯重和王丰等“加州学派”学者研究各有专长,都从各自的学术切入点对中西发展道路的歧异交互比较,并对跨越中国政权更替历史进行长趋势研究,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前提下,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或“全球多中心论”,挑战了西方学界曾经盛行的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意义。“加州学派”注重中国本土因素在传统与现实中的一脉相承:近代口岸开放后,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体系,无论经济、政治、文化还是民族等诸多方面确实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不局限于“近代”这一历史时间节点,而是置于上至“海道大通”下至今天中西互动大历史中考察,甚至跨越朝代更替而置于中国上下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考察,

从中可以窥见中国民族建构体系有着一脉相承的核心精髓,这些精髓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等诸多方面;政权更替或者西方冲击从表面上影响了民族国家建构体制,但核心精髓不仅顽强传承,而且在吸收新鲜血液之后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1960年代至今,“施坚雅模式”一直为口岸开放后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研究提供宝贵的视角和理论基础。“施坚雅模式”强调了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不能也不会完全以“西化”为导向,传统因素依然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国家建构中发挥关键作用;特点之二是借鉴人文社科多种方法,设计“核心—边缘环带”和“城乡连续体”的理论和数据分析框架,这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在基础、微观层面的表现形式。^[6]根据“施坚雅模式”,近代开放口岸及各级“中心地”不仅辐射西方经济与文化,同样汇聚并辐射中国传统经济与文化因素,受此影响,中国近代国家的建构是中西文化因素相互影响,交替推动的。

中日一衣带水、文脉相近,所以日本学者多能结合传统与西化两大因素探讨开埠对中国近代国家构建的影响。2010年至今,日本学者佐藤仁史根据中国历史实情和制度背景,将“结构—过程”“经济—社会”等分析模式用于中国近代基层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探索国家基层建构的变化。^[7]

综之,国外学者对“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研究,从强调西化到重视中西方多种因素的历程,逐渐达成共识:中国社会土壤里蕴含的国家建构的历史文化传统虽遭到外力的强力冲击,但依然顽强地传承与修复。

二、国内相关学术史梳理

国内学者高度关注开埠后外力冲击以及本土因素回应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体系的影响。

早期学者们更多关注列强借助通商口岸动摇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民族国家建构体系其他方面。革命派学者认为西方势力对于进出口贸易、金融业、运输业、“租界与割地之赋税、地租、地价三桩”以及其他“投机事业”的垄断,令中国国家建构机制陷于崩塌。^[8]立宪派学者对此认识并无二致:在列强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压力下,中国“不徒变为十八国,并且变为四万万国矣”,国力之涣散,国权之沦丧,莫过于此。^[9]

1920—1940年代,学者们理论和实证双管齐下,对微观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进行剖析,实地考察被动走向世界背景下中国的现状及趋势。千家

驹、薛暮桥等学者深入社会考察之后,深刻地揭示:农村经济是传统中国国家建构的物质基础,但在西方强劲的经济冲击下已呈分化、解构之趋势;以小见大,不难管窥国家建构体系的大局变化。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家庭、宗族和村落是中国传统国家建构的基础单位,经济基础、政治框架、社会管控、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皆可溯源于此,开埠之后虽遭强力冲击但却顽强传承,所以国家建构的变革不得不重视社会基础因素的制约与传承。^[10]在江村调研基础上,费老于1940年代写成《乡土中国》,提出了“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建构、政治建构都是基于家庭伦理基础上的,“即以个人为中心而一伦一伦地‘推’出去的”,这是中国社会根蒂的特性,国家建构机制改革不能不遵循这一现实。^[11]费老晚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强调了国家统一又强调对各民族的尊重,从宏观与微观角度推进了当代民族国家建构机制改革的实践,这与其早年反复思索密不可分。

更多进步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事求是地探索近代国家“二元”建构:传统和外来两种因素使中国经济撕裂为“半封建经济”(以传统小农经济为主)和“半殖民地经济”(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两大体系,并进而决定了政治与社会的二元建构;二元体系构成了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的复杂有机体;代表传统因素的这一“元”植根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土壤深处,蕴涵取之不尽的动力源泉,因此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机制重新整合的规律,并不是完全由代表西化因素这一“元”引导代表传统因素的另一“元”,探索、引导后者的积极因素也将促成国家建构机制的重新整合。为了更深入论证近代中国经济基础“二元”建构及演进规律,从1950年代至2010年,学术界整理出版了丰富的史料集,其中堪称经典的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国史学会主编,1958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主编,1955年)、《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陈真、孙毓棠、汪敬虞等主编,1962年)、《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彭泽益主编,1957年)、《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李文治、章有义主编,1957年)、《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聂宝璋主编,1983年)、《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2002年)。在“二元”建构理论的指导和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学者们撰写了系列论著:《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严中平、汪敬虞主编,1989)、《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许涤新、吴承明主编,2004年)、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汪敬虞主编,2000年)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辨析》(2004年)等等。

值得说明的是,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受国外“现代化”等理论的影响,很多学者淡化了“半殖民地经济”的表述,并以“现代化”等概念表述之,认为国际经济通过商埠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引导促进了国家民族经济基础乃至国家“现代化”建构。如吴承明先生曾认为“国际经济的冲击力”和“中国传统经济基础”都有力促进了中国国家建构机制往“现代化”方向引导;而中国传统的经济与社会因素则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现代化”的阻力:封建经济的影子——“大而全”“小而全”、排拒市场、闭关自守、平均主义、行帮主义等等,直至现在也未肃清,为害之深莫过于此;而近代中国独立自强的道路只有发展资本主义,用社会化的大生产去代替封建主义的小生产,用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12]2000年之后,学术探讨、反思的深入和史料不断发掘,再加上现实中个体经济、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参照,学界更加客观评价“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这一历史问题。吴老晚年非但不完全否定传统经济因素,而且高度评价其在国家体系重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农业和手工业中,传统经济因素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但其积极、能动因素能为工业化提供强劲动力;所以从近代至今,“传统”与“现代”不是势同水火而是共融于一体的,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全盘“欧美化”,不应也不能排拒中国传统、特色因素。^[13]

思想的持续解放和学术交流的深化也使学界更好地发掘史料的同时借鉴西方学界理论探讨“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如樊卫国以中心口岸上海为中心考察点探讨近代“城乡二元市场”;^[14]杨天宏借鉴施坚雅的理论探索了口岸开放与近代基层社会发展演进的互动关系;^[15]戴鞍钢提炼了“港口—腹地”理论模式,探讨以近代上海为中心的城乡市场网络和层级的发展演变。^[16]池子华对近代流民的系列论著丰富了城市(以通商口岸为主)与乡村互动的相关研究;^[17]彭南生指出口岸辐射引发乡村手工业“半工业化”变迁,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基础的农村也随之发生变化;^[18]张仲礼对从“近代化”角度探讨了通商口岸对社会民生、民风方面的影响。^[19]

2010—2019年,学者们在经过反复思辨后,更加注重从中国社会土壤深处发掘开埠后民族国家建构的内在动力。在经济领域,学者们更注重从微观

经济元素中折射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发展走向。王翔探讨了中国传统支柱产业之一的丝绸业在国际市场冲击下艰难生存的过程。^[20]袁蓉考察了近代上海纺织业借助缝纫机而获得生机的曲折历程,揭示新工艺、新市场、新原料为传统经济所带来的生机。^[21]关永强、张东刚对开埠后农村经济发展脉络重新梳理后指出:“斯密型动力”是东亚传统经济的显著特色,近代依然是主导中国农村经济的动力;人口压力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不如市场作用明显;但“斯密型动力”并非意味着传统型农村经济停滞不前,而是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当有限。^[22]在研究社会文化建构方面,学者们也日益关注“本土”与“外力”的共同作用。如冯天瑜指出:“全盘西化主义”和“中国文化本位主义”都不能完全主导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两者在相互斗争和相互吸收中形成合力作用;^[23]黄兴涛指出:作为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家国观念”在外力冲击下严重撕裂,但现代意义国家和民族共同体观念却在历尽沧桑之后逐渐培育;^[24]苏生文强调:开埠之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单调、封闭、等级森严的社会格局虽受到强力冲击,但却依然盘根错节地存在;而西方物质文明冲击力虽强,但却具有“浮根性”,未能深入到文明根蒂的深处与中国本土因素相嫁接,并导致社会发展失却周期性而陷入混乱之中。^[25]

学者们还在研究的基础上为解决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提供智力支持。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之后,学术界更加认真审视“外力”和“本土”两大动力共同作用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规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国家统一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供良好镜鉴。从2015年到2019年,先后有“历史时期边疆地区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明清与民国时期我国城镇发展与区域经济、文化演进关系研究”“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国近代外资企业与中外经济关系研究”“‘旧海关史料’与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研究”和“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与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转型研究”等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相关的研究方向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各年度“课题指南”之中。2017年,常士闯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路径选择研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库,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探索近代以来外力和内力两大因素共同推进国家政治建构的历史脉络与规律。

在近代沿海、沿江商埠研究成果相对丰硕的情况下,学者们越来越注意边疆口岸开放对民族国

家建构的影响。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注重建立“内地—边疆”的协调机制:边疆的稳定对内地发展至关重要,而政府调动内地经济与社会资源也是边疆开发的内在动力。边疆口岸开放之后,传统的“内地—边疆”协调机制同样遭到强力冲击,但诸多治理精髓却一直顽强传承,并在外力影响下焕发强劲生命力。

作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重要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者们系列论述反复强调:清朝统治者在传承历朝治理精髓的基础上,初步建构了“大中国”“大中华”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力地抵制了近代边疆开埠后列强的经济与文化渗透。杨天宏的《清末新政时期自开商埠的设置》着重探讨了晚清政府主动开放西部地区的商埠以应对国际经济冲击的艰难历程。^[26]苏德的《试论晚清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2001)、《晚清筹边改省奏议与治边政策概论》(2002)和白贵一的《近代中国缩小省区思想的演进》《试论晚清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都强调:在边疆开埠、外力冲击所带来的国家分裂风险面前,晚清和民国的历届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改土归流”、建立行省,逐渐废除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的多元化管理体制,力图使边疆与内地在单一机制之下“联为一体”,以巩固国家边疆安全、便利国家行政与民众社会生活,而这系列政策既是当时现实的需要,也是中国古代治边智慧的传承。周平指出,近代边疆开埠之后,面对复杂情况的历届政府不断修正传统“内地—边疆”协调智慧来促进治理举措的转型。^[27]冯建勇指出,晚清朝贡体系瓦解和边疆口岸开放使中国疆域从“无边天下”到“有限疆界”的转变,历届政府针对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与民族心理的变化,不断推进边疆从安抚“四夷”到“国民”治理的转变。^[28]

辛亥鼎革后,虽然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国历届政府依然重视“内地—边疆”治理机制传承与修正。方素梅《中华民国时期的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2008年)、段金生《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的内容和方法》(2010)、《清末民初政学精英边政认识的演变——基于西南边疆史事的分析》(2019)指出:民国时期政局持续动荡,边疆口岸持续开放使得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渗透加剧,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面对领土危机而对传统的“改土归流”“羁縻”等治边举措进行了传承、借鉴与修正,推进近代治边体系的探索。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国家主权观念、边疆形态、治边方略都在治边实践中得以提炼。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趋向和有待深化之处

国内外相关研究硕果累累,指向性清晰:近代开埠后外力强烈冲击使中国传统国家建构机制面临解构危机,但中国社会土壤深处蕴涵着维系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力量体系整合的动力源泉,该动力源泉在消融外力因素后不断推进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学者,都能够拓宽历史研究的时空视野,将“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研究置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以及海道大通以来世界发展趋向的时空视野中探讨。中国本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因素的超强生命力和自我革命性在大历史视野中得到更好的勾勒,在近代国家建构的艰难历程中,本土因素并非被动地处于配角地位或者完全让位于“西化”,而是在吸取新鲜养分之后不断焕发出生命力。

冷战后直至今天,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一些曾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日不落帝国”“超级大国”分崩离析,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也正在昔日“世界中心”欧洲造成巨大社会裂痕,而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的强化却日益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些问题使学者们更加注重研究中国本土、传统和现实因素对民族国家建构历史与未来趋向的作用。

因此,关于“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学术研究,将存在着以下有待深化之处:

第一,理论提炼的力度有待深入。

“民族国家建构”是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民族关系等的多维度理论体系,很有必要根据研究实际和现实需要进行理论提炼和修正。如在口岸开放所带来的“西化”冲击下,“本土因素”传承与演进的脉络与规律就需要更清晰的学术勾勒;“西化”与本土“二元”因素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融,共同作用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本土因素的精髓与糟粕亦非泾渭分明的“二元”,而是同根共生,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今天,外部势力对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一直遗留至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今天香港和台湾出现一些危害祖国统一和“一国两制”事情。因此,对于“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相关问题剖析提炼,将进一步促进理论构建,并为今天提供镜鉴。

第二,有待运用新技术和方法推进相关研究。

研究近代口岸开放历史有着诸多优势,丰富史料、旧迹和民间遗俗都可以为还原历史现场或者修正前人研究提供良好素材。近年来,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学者们能更好地运用科学方法和工具搜

集、校对史料和数据。因此,“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这一问题前人虽成果丰硕,但我们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很有必要做深入的研究以检验和修正前人研究成果,勾勒、还原历史发展脉络并从中勾勒相关规律。

第三,研究时间视野有待拓展。

在此,国外“加州学派”不局促于具体历史事件或时间节点做研究的做法甚足借鉴。“统一—近代—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中华民族的成长历史,既有一脉相承的内涵,也是兼容并蓄、自我革命的历史。将“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置于历史长河、当今现实与未来趋向中考察,“一脉相承”“兼容并蓄”和“自我革命”等规律才能更清晰展示。

第四,研究地理视野有待拓展。

学者们更多地聚焦于位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区域的沿海和长江沿岸商埠。诚然,民族国家建构的传承与变革与重心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但是,“内地—边疆”的关系协调是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古代的“内诸夏而外夷狄”“华夷一家”“羁縻”“改土归流”,近代的“边疆设省”举措,以及今天的全面开发边疆,都既有一脉相承的内涵又有各自时代特色。近代中国口岸开放的历史与列强觊觎利权、撕裂中国传统国家建构机制的动机密切相关。边疆口岸数量虽少、规模虽小,但西方列强有目的渗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正是通过这些窗口强劲地辐射至广袤的边疆地区,严峻地挑战了中国国家力量整合机制。当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如火如荼,广袤的边疆地区成为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的前沿,同时也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带来新的考验。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日益成为新时代边疆治理和国家建构的基本指引。因此,研究近代西南、西北和东北边疆“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问题,发掘和提炼历史经验以为今鉴,成了广大史学工作者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85.
- [2] 马礼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M].北京:神州国光社,1930:287.
- [3]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0.
- [4] 西里尔·爱德华·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

- 的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 [5]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 [6]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7]佐藤仁史.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8]孙中山.民族主义[M].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4.
- [9]曾业英.蔡松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10]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 [12]吴承明.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J].晋阳学刊,1982(3):58-61.
- [13]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J].文史哲,1991(6):65-70.
- [14]樊卫国.近代中国口岸中心市场与统一市场[J].社会科学,2001(10):76-80.
- [15]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6]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M].济南:齐鲁书社,2005.
- [17]池子华.农民“离村”的社会经济效应: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背景[J].中国农史,2002(11):62-70.
- [18]彭南生.论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三种形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56-64.
- [19]张仲礼.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20]王翔.晚清丝绸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21]袁蓉.缝纫机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
- [22]关永强,张东刚.“斯密型增长”:基于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再评述[J].历史研究,2017(2):153-167.
- [23]冯天瑜.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内因与外力[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
- [24]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25]苏生文.晚清以降:西力冲击下的社会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26]杨天宏.从思想主张到政府决策:晚清“自开商埠”决策过程研究[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2(11):42-48.
- [27]周平.如何认识我国的边疆[J].理论与改革,2018(1):31-42.
- [28]冯建勇.从“无边天下”到“有限疆界”:近代中国疆域形态衍变与边疆知识体系生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6):27-3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Research Summary of “Port Open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State”

PANG Guangyi

(School of Law and Sociology,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7, China)

Abstract: Port opening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state.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once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port opening deconstructed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tate, and reintegrated according to the “Westernization” model. With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changing situation, the scholars ar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the role of native f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state.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epening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data, the scholars clearly delineate the context and law of the interaction of foreign and local f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state.

Key words: port opening; national state; construction; summary

近代新疆汉族商帮与公共卫生近代化述论

贾秀慧

(新疆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探讨近代新疆汉族商帮推动西医在新疆的发展、协助新疆省政府扑灭疫病、支持城镇的公共环境卫生建设、开设公共浴室四方面的贡献,认为汉族商帮人士在推动新疆公共卫生领域的近代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新疆民众融入近代文明的洪流,强化了新疆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心理认同感。

关键词:新疆汉族商帮;公共卫生;近代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13

中图分类号:K25;F2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64-04

近代新疆政局动荡、战争频仍、社会变迁剧烈,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处于艰难的境地。但在新疆省政府、医务工作者,以及包括汉族商帮人士^①在内的新疆民众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时期新疆的公共卫生领域仍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出现了近代化的发展趋势。

按照现代公共卫生学的定义,公共卫生是社会有组织地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健康的科学和艺术。与个人卫生相对,公共卫生落脚点是人类群体的健康,它是有组织的、系统的、满足公共健康需求的社会性事业。在近代新疆的公共卫生领域,新疆省政府起主导作用,但必须肯定的是汉族商帮在此领域有重要作为,主要表现为开设私立西医药店、诊所,积极协助政府扑灭疫情,支持公共环境卫生建设,开设公共浴室等。可以说汉族商帮人士在推动近代新疆的西医东渐、疫病防控、街道环境卫生等公共卫生领域的近代化进程方面功不可没。

一、推动西医在新疆的发展

西方医学最初于晚清年间由传教士传入近代新疆,但新疆省政府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规范的医护体系和富有人文关怀的医患关系,如医院、西医培训及医疗行政机构等。据统计,截

至1949年10月,全省共有西医医疗机构54个,其中省立医院10所,县卫生院38所,区级卫生所6所。全省有696张病床,每万人有1.6张病床和0.19名医生,卫生机构都集中在少数城市(镇)。卫生技术人员中,有西医师18人、护士115人、护理员84人^[1]。

新疆近代规范的西医体系的建立,不仅对传统的中医、维医、哈医、蒙医提出了挑战,同时医院、医疗保健制度等一系列相关事务的相继设立、推行,对新疆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启起了促发作用,是新疆公共卫生事业建立的科学基础。人们有病,开始进入集治病与护理为一体的近代西医院治疗。特别在临床的外科、眼科和妇科等方面,西医具有中医不可企及的优势。

近代新疆汉族商帮人士很早就认识到西医的科学性,民国初年就在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下同)设立西医药房及诊所,为西医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民国初年,外国教会如天主堂、福音堂在迪化兼营西医西药,进行敲诈勒索。以汉族商帮人士为主体的迪化总商会为抗衡外国教会,聘来北京医生马体仁,在迪化开设了西医诊所^[2]。后因药源不济,诊所倒闭,当时的津商刘云卿(曾任新疆总商会会长)在全市工商界的大力支持下,1927

收稿日期:2019-12-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新疆的汉族商帮研究”(12BZS089)

作者简介:贾秀慧(1973—),女,河北定州人,史学硕士,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近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研究。

年在迪化开设“民生药房”，这是迪化第一家经营西药和门诊的药店。该店中西药兼营，重视推广新药，如20世纪40年代生产的有效消炎抗菌药盘尼西林等，民生药房都组织货源、批零兼营。该药房以最低价格的收费，为患者诊病售药，遇到经济困难的患者，还免收或少收药费^{[3]77-78}。

民国后期，津商刘云卿之子刘竹溪担任了“民生药房”经理，将“民生药房”的经营业务由以前的主营西药，转变为同时经营西药和西医诊所。该药房的调剂药物业务，由于坚持正规操作、调制处方严格，得到迪化各界的广泛信任。有些著名医生如儿科医生张桐寿，经他诊治开的处方一律写明“去民生药房调配”。

津商刘竹溪主持“民生药房”业务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拓展了西医诊疗业务。该药房除门诊外还出诊，遇到危重病人则去病人家中打针、输液。该药房的西医曾于夜间去迪化南梁宁夏湾等处给小儿打针。一次一位妇女产后大出血病情危急，“民生药房”的刘竹溪兄弟同医生终夜守在病人家中，进行输液急救，终于使病人转危为安，而输液在当时的诊所中是少见的^{[3]77-88}。

可见，新疆总商会会长津商刘云卿开办的“民生药房”，奉行认真负责的医疗态度与作风，不但对新疆西医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还深深造福了广大患者。

迪化还有一家著名的西医诊所——“志光诊所”，由津帮人士王金萼与妻子郑学兰于1930年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迪化西大桥附近（今红山宾馆附近）创办^[4]。王金萼毕业于新疆军医学校，医术高超。该诊所擅长儿科，兼治性病、传染病，尤以儿科，名冠全城。所用药物都是从苏联进口或从上海的大药房购买。每天都有众多的各族患者来此就医。

除省城迪化外，汉族商帮人士还在新疆的一些地县开设西医诊所。1938年12月乌苏县的三家汉族商帮商号即“宝聚丰”经理津商王宝珊、“正兴口”号经理安维新、“运发生”经理李运成，为了当地的卫生保健事业，“不惜巨资，在乌苏筹设诊疗所，以解当地民众有钱无药、有病无医之痛苦，该所成立以后，前往看病者络绎不绝，当地民众受惠不少”^[5]。

二、协助新疆省政府扑灭疫病

民国时期的新疆曾多次爆发疫病（即大规模地流行性急性传染病），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安全。流行性急性传染病，古代称为“疠疫”“疠疾”“瘟疫”，现统称为“疫病”。面对疫病肆虐，当时新疆省政府适时采取了一些救助和预防措施，具体措施有：接种

痘苗、注射疫苗、强迫隔离等。同时还成立了卫生防疫委员会、防疫站等防疫机构，在医院成立传染科、消毒室。新疆省政府的上述举措有力地促进了新疆公共卫生领域的近代化。

不容忽视的是，民国时期新疆民众不良的卫生习惯，为疫病在近代新疆的发生和流行提供了土壤。以民国初年的迪化为例，“住户随时把脏水向大门外泼，把垃圾向大门扔。于是一到春暖解冻，……街道变为泥海”，同时，“臭气冲天，如入鲍鱼之肆，……细菌活跃，极易感染疫病”^{[6]179}。直至1933年前，新疆的“大街小巷垃圾遍地，街头巷尾便溺狼藉，零食小贩的食物上面，到处积满了苍蝇灰尘，饭馆酒肆，澡堂浴池肮脏污秽情形更不堪言状”。由于不讲究卫生，不注重公共卫生健康，“致使疫病常常发生，人民的身体蒙害甚巨”^[7]。为此，新疆省政府面向新疆民众开展了防疫宣传。1942年10月21日，和静县政府成立防治鼠疫委员会，并组织6个宣传组，分赴农牧区开展宣传活动^[8]。新疆省政府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了人们自我保健意识和利用卫生服务的能力。

面对疫情肆虐，不但官方采取了抗疫行动，从事医药行业的汉族商帮人士也积极帮助新疆省政府扑灭疫病。1918年8月，新疆瘟疫蔓延，南疆尤烈。疫情波及迪化，死亡1000余人。新疆都督杨增新拨款熬制防疫药剂，用数十口大锅放置在新疆省政府门口煎汤熬药，用大碗盛给患者，每人一碗。

当时以汉族商帮人士经营的中药店为中坚力量的迪化各药店同行公议，均要在药店门前支起大锅熬制防疫药液，免费供应居民服用；各位开业中医与业余行医者还发起义诊，为扑灭疫情尽力。迪化的汉族医生高峻嵩、高华亭、吴绶等还携药奔赴南疆疫区，为当地民众治病，以减少死亡，控制瘟疫^[9]。

汉族商帮人士在迪化创办的七八家中药店，具体有：秦商经营的“凝德堂”（1875年开业）、“元泰堂”（1876年开业），它们在内地有总店，在新疆各地有分号，有“口里口外，凝德元泰”之说；津商经营的“德生堂”（1892年开业）、“德聚堂”（1914年开业）中药店；湘商经营的“复临泰”（1886年开业）中药店、“杏林春”（1917年开业）中药店；晋商经营的“元顺西”（1894年开业）中药店、“永盛堂”（1917年开业）中药店^②等，响应同行公议，纷纷在门前用大锅熬制抗疫汤药，用大碗施给病人^{[6]173}。在大家的共同努力救助下，到1918年底天气转寒，疫情慢慢平息下来。

津商刘云卿开创的民生药房,每逢遇有疫情蔓延时,都积极组织西医专家坐诊,协助政府对抗疫情。40年代迪化各种传染病如伤寒、麻疹、肺炎、痢疾等猖獗一时,民生药房为防止传染病蔓延,于1946年增添西医门诊业务,先后聘请西医知名大夫张健生、李郁、杨维钧等坐堂接诊^{[3]77-79},每天都有100多名患者来门诊看病^[10]。

三、支持城镇的公共环境卫生建设

在公共环境卫生领域,新疆省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1912年新疆省政府始设政务厅,监理卫生行政。1928年6月,改称民政厅。后来民政厅下设了保健科,除医疗管理外,还负责全省的公共卫生行政。1944年9月,设立新疆省政府卫生处,掌管公共卫生行政^[11]和医疗行政。新疆负责公共卫生的机构终于实现了由清末警察局监管到民国时期卫生处专管的转变。

公共环境卫生事业在新疆的各城镇中,以省会迪化的建设成就最为斐然。迪化市政府进行了市政卫生设施、人员编制、卫生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建设,促使迪化向近代化卫生城市转变。1934年,迪化组织了清洁队,设立公共厕所,置办了垃圾箱与垃圾车,开设了副食市场和屠宰场。1938年,新疆省民政厅依照中央国民政府颁布的《污物去除条例》之规定,购买畜力垃圾车,安置垃圾箱,开展街道清扫及垃圾清运。1940年,迪化市政委员会招收清道夫100名,装配双套铁轮马车50辆,成立迪化市警察局卫生队,清扫市中心几条大街。1943年4月,迪化市民众清道队成立,有清道夫48人,负责迪化市区街道清扫及垃圾清运^[12]。1944年11月,迪化市民众清道队增至79人,有队长、班长、清道夫、车夫等不同分工。1949年4月,迪化市政府决定,由警察局申报经费,整修垃圾车,开动洒水车上街^[13]。

进入民国后期的1945年,迪化市政府专门设置了负责公共场所卫生的卫生警察。1945年1月21日,迪化市卫生局首次举办卫生警察训练班,有11名警察受训后任卫生警察,卫生警察负责公共场所卫生事宜^[14]。1945年12月3日,迪化市成立了公共卫生事务所,不但制定了事务所的组织规程和办事细则,还制定了清洁卫生竞赛通则,每月举行卫生竞赛活动一次。公共卫生事务所具体负责管理市容环境卫生。1945年8月间,迪化市政府扩大组织,成立了卫生局^[15]。

在新疆省政府的倡导下,近代新疆的汉族商帮人士积极支持城镇的公共环境卫生建设。新疆北部地区冬天寒冷、漫长,省会迪化的“大雪盈尺厚,春

暖遂成泥泞,将军署前深没马腹”^[16]。1938年12月迪化公安局管理处为“注意公共卫生,防止春季街道泥泞起见,……要求通令各商号住户,在冬令之际,关于城内外通衢小巷,所积灰雪要扫除净尽,运至城外,以重卫生而利交通”^[17]。迪化的汉族商帮商号认真执行公安局扫除街道积雪的通知,既保障了街道的清洁卫生,也履行了作为市民的职责。

1938年12月以汉族商帮人士为主体的新疆总商会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捐助4000万两(省票银)^③购买清理街道卫生的卫生车,此举可谓进一步完善了迪化城内的公共卫生设施建设。捐款数额按商号规模大小均摊,共分五等,甲等为“福泰成”“德昌源”等5家商号,各捐助80万两。乙等为“德聚和”“恒丰泰”等29家商号,各捐助50万两。丙等为“东立德”“华丰立”等47家商号,各捐助25万两。丁等为“义礼生”“德裕润”等53家商号。戊等为“善丰厚”“义和堂”等45家商号^[18]。在此次捐款筹办卫生车方面,汉族商帮人士起了带头捐助的示范作用,捐款最多的甲等排名第一“福泰成”为津商暨主持总商会会务的石寅甫经营,排名第二“德昌源”是津商崔善祥经营的商号,乙等排名第一的“德聚和”是津商任名武经营的商号。其余商号“恒丰泰”“东立德”“华丰立”“义礼生”“德裕润”,均为汉族商帮商号。

1939年5月,迪化南梁一带“阴沟倒塌,易生水灾”,汉族商帮人士又发起了捐款翻修活动,其中汉族商号“永德号”捐款16.4万两(省票银),汉族商号“元盛魁”捐款10万两(省票银)^[19]。

新疆各地县汉族商帮人士对于当地的公共环境卫生事宜,同样热心支持。1939年6月,以汉族商帮人士为主的绥来(今玛纳斯县)县商会,“鉴于天热,市政卫生尤要注意”,县商会召集会议,决定:“通街设置卫生水桶,大户每家一个,城内外共设卫生车两辆,特为办理街市卫生之用,所需款项全由民众捐款。”^[20]

四、设立公共浴室

近代新疆公共浴室较少,人们清洁洗浴不方便,汉族商帮人士积极创办公共澡堂,培养民众良好的卫生习惯,以预防疾病,强身健体。1936年2月,津商韩君璧计划在省城迪化修筑一座大规模新式澡堂,内分男女浴室。虽然澡堂由韩君璧负责召集股东合资开办,但合资资金仅能进行建筑房屋、修填炉灶及购置桌凳等事项,其他如汽锅、瓷盆、气管等均需要大量资金向苏联批购。汉族商帮人士领导、支持下的新疆总商会对此进行了担保,经省政府批准,

所有向苏联购办的汽锅炉、气管等费用,由政府 500 万金卢布贷款内补助借贷^[21],才终于促成了此事。津商张锡禄于 1939 年 9 月 25 日在迪化文化路开办了“新盛泉浴室”,浴室有池堂和盆堂,池塘的休息室分雅座和普通座,设有理发、搓背、修脚等服务项目^[22]。“新盛泉浴室”设备齐全,营业至今,成为“中华老字号”。汉族商人在迪化开办的“宜新澡堂”,也很有特色,浴室分特号、小号、大号,最高级“特号内设大洋瓷浴盆,毛巾、香皂、海绵、脸盆、草鞋,一应俱全,每位票价 1 元(新省币),时间 60 分。”^[23]同时,该澡堂还有理发、烫发、刮脸等服务项目。

汉族商帮人士中津商经营公共浴室的从业者较多,他们在迪化还开设有玉清池澡堂(津商李养泉 1920 年创办于衣铺街)、杨家澡堂(津商杨易斋 1940 年创办于藩台巷)、黄家澡堂(津商黄玉 1940 年创办于藩台巷)、李家澡堂(津商李某,人称李货郎子,1940 年创办于西河街)等^④。

公共卫生领域的近代化发展在新疆近代化发展进程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由于新疆省政府的大力建设,近代新疆公共卫生的近代化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如: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对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妇幼卫生、学校卫生给予了关注;积极倡导公共卫生观念、普及卫生科学知识,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得到提升;近代疫病预防体系也出现了初步萌芽等。

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汉族商帮作为近代新疆社会中的一支重要群体,通过自己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进步活动,发挥了独特社会作用。他们通过医药技术帮助新疆各族民众治愈与对抗疾病,积极捐资完善公共卫生设施、改善公共环境卫生,设立公共浴室培养公众的卫生意识与习惯,这些活动不但提高了近代新疆人们的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还有力地促进了新疆公共卫生领域的近代化进程,推动了祖国边疆地区——新疆融入近代文明生活的洪流;增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统一,强化了新疆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心理认同感。

注释:

① 汉族商帮,指的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新疆的汉族商帮发端于清乾隆年间统一新疆之初,形成于清光绪时期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之际,19 世纪 90 年代已有相当实力,形成以按地域划分的“八大商帮”,即:燕(其中京商少,津商多)、晋、秦、陇、蜀、湘、鄂、豫。至民国 30 年代,

汉族商帮有很大发展。(作者注)

② 参见咎玉林《乌鲁木齐往事漫记·悬壶与药王》,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木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 16 辑),乌鲁木齐:新疆兵团印刷厂,1993 年,第 84 页。

③ 省票银,是新疆地方货币单位。1840~1939 年以前的新疆币制极为紊乱,既有纸币(如伊帖、阿尔泰通用银券、喀票、省票),也有金属货币(如天罡、红钱、银圆、银两、铜圆等)。不但不同地区的币值兑换比例不一样,而且南北疆使用的钱币不同,互不通用。这给人们的商业贸易和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1939 年 7 月 1 日,新疆开始实行币制改革,将以“两”为单位的旧省币改为以“元”为单位的新省币,收兑旧的省票与喀票,停止使用银圆、银块、红钱、铜圆等金属货币,以统一全省币制。至 1939 年底,旧币已全部收回。从此,新疆的地方币制开始真正统一。(作者注)

④ 《天津商帮店铺情况表》(根据历年随机调查整理),天津市西青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青文史》(第 9 辑),1999 年(内部资料),第 84 页。

参考文献:

- [1] 新疆通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通志·卫生志[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272,351.
- [2] 咎玉林. 迪化总商会的成立与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木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 6 辑)[M]. 乌鲁木齐:新疆青年出版社,1983:72.
- [3] 易耀. 民生药房开设前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木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 12 辑)[M].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6.
- [4] 刘荫楠. 志光西医诊所//乌鲁木齐掌故(一)[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63.
- [5] 乌苏三商号筹设诊疗所,当地民众受惠不少[N]. 新疆日报,1938-12-13(3).
- [6] 继鹿. 民初新疆大疫及当时医药卫生情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
- [7] 李英奇. 新疆的保健事业[J]. 新新疆,1943,1(4):32.
- [8] 和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和静县志[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21.
- [9] 新疆通志编撰委员会. 新疆通志·卫生志[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14.
- [10] 刘荫楠. 民生药房//乌鲁木齐掌故(一)[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61.
- [11] 新疆通志编撰委员会. 新疆通志·民政志[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8.
- [12] 新疆通志编撰委员会. 新疆通志·卫生志[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18.
- [13] 新疆通志编撰委员会. 新疆通志·城乡建设志[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45.

(下转第 71 页)

康有为《大同书》的创作及其社会改造思想

曹发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大同书》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康有为系统阐述其构想的“大同”社会理想的著作。在这本书里,康有为从他的“仁爱”观出发,历数了人们遭受的种种苦痛,并指出“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随后,康有为又分头论述了如何去除“九界”,并勾画了未来“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为了给改造旧社会构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提供理论支持,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了辛辣的抨击。在对传统制度进行抨击的同时,康有为也详细地呈现了自己的社会改造规划。

关键词:康有为;《大同书》;大同社会愿景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14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68-04

《大同书》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康有为系统阐述其构想的“大同”社会理想的著作,乃康氏“本不忍之心,究天人之际,原《春秋》三世之说,演《礼运》天下为公之义,为众生除苦恼,为万世开太平、致极乐之作也。”^[1]2在《大同书》书中,康有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社会改造思想,希望通过社会改造,构建一个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康有为考虑到他的一些激烈的社会主张远远超越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担心该书的出版会给自己带来诸多麻烦和危险,故而在他生前没有将该书完整出版,只是在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才在学生们屡次请求下仅仅在《不忍》杂志上发表了该书的前两卷。该书的其他部分,也就是承载康有为最激烈的社会理想的章节,直到1927年,康氏去世8年后,才由他的学生钱定安送交中华书局出版。《大同书》是体现康有为政治理念的一本重要著作,也是研究康有为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笔者多年前阅读此书时,曾为该书的“奇谈怪论”所震撼,书中观点至今清晰如昨。今将该书中提出的社会改造思想简单梳理一下,提交出来和大家交流,籍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康有为及其创作的《大同书》

(一)康有为——中国近代维新变法运动的倡导者

康有为,1858年出生于晚清广东南海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幼年时期,康有为和同时代众多官僚地主家庭的孩子一样依例进入私塾学习,开启了诵读四书五经的读书生涯。由于生活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激烈交流碰撞的时代,康有为可以很便利地接触到一些来自西方的报刊书籍。在漫长的学习生涯中,在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地驱使下,康有为在诵读国学经典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广泛涉猎那些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尤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学习和研究,知识非常渊博,终成一代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强有力的“西学”背景,使康有为得以突破中国旧的思想文化的束缚,对当时的世界大局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清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康有为从改造中国以挽救民族危亡拯救万民于水火的良好愿望出发,综合中、西方思想文化,构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维新变法理论体系。康氏一生著述丰厚,

收稿日期:2019-12-16

作者简介:曹发军(1968—),男,河南信阳人,博士,中国现代史学会会员,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

粗略统计其一生撰稿超过 700 万字。他阐述维新变法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等。在这些著作中,康有为把来自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羊》“三世”说结合在一起,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进化论。他说,“《春秋》要旨分三科: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为进化,《公羊》最明”^{[2]79}。在康有为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都要经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历史时期,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据乱世”时期,必须先通过维新变法,实现君主立宪,使中国成为一个和英法美德日俄诸国并驾齐驱的强国,实现国家富强,彻底摆脱民族危机,进入“升平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奋斗,最终和世界人民一起进入民主的“太平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就康有为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来说,在中国推行变法,在不引起巨大社会动荡和不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政治转型,使中国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中国社会最终要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和各国人民一道走向“大同”世界。

(二)《大同书》及其描绘的大同社会愿景

《大同书》是康有为旨在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著作,全书共 30 卷,约 20 万字,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部是全书的总论,起着总揽全局的作用。在《大同书》的开篇甲部“入世界观众苦”里,康有为从他作为一个儒者与生俱有的“仁爱”观出发,首先历数了人们遭受的种种苦痛,并指出“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所谓“九界”,“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1]66}在这里,康有为想要说明的是要去除人们的苦痛,“即在破除九界而已”。在《大同书》的甲部以后的九部里,康有为不仅详细具体地论述了如何去除“九界”的问题,还勾画了未来“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没有阶级、民族的区分,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既无专制之君主,又无民选之总统,没有官吏,所有人都平等;也没有家庭、亲属,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自由的个人,男女“则以情好相合,而立合约,定有期限,不名夫妇”,所生儿女“均由公共之人本院、育婴院、慈幼院、小学、中学、大学院以教养之”,“人民既受公共之教养二十年后,公家又给以职业。及其老也,又有公共养老院,

疾病则有公共之医病院,考终则有公共考终院”^{[1]2}。在这个社会中,政治上实行高度的民主化,经济上实行社会化的大生产,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每人都能充分获得所需、所欲,而无痛苦或不安,生命乃是一连串之乐事。衣、食、住、行不仅提供高度的舒适,而且给与十分美感”^{[3]420}。每一个人都能在大同世界中平等地过上“其乐陶陶,不知忧患”^{[1]50}的生活。

在《大同书》里,康有为“悬想的大同社会是一个至公、至平、至仁、至治的极乐世界,它‘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表达了人类的诸多美好愿望”^{[4]70}。但是,由于康有为所勾画的大同社会蓝图和他设计的政治路线图没有立足中国实际,不能适应彼时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完成历史任务的需要,注定不会产生什么实际社会效果,以至于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5]1471}

二、《大同书》对社会改造问题的探讨

(一)《大同书》对传统制度的抨击

为了给改造旧社会构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提供理论支持,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了辛辣的抨击。康有为首先对“国界”进行了抨击,他说:“然国既立,国义遂生,人人自私其国而攻夺人之国,不至尽夺人之国而不止也。或以大国吞小,或以强国削弱,……其战争之祸以毒生民者,合大地数千年计,遂不可数,不可议。”^{[1]69}因此,国家一日存在,战争便不会停止,人民的苦难也不会停止。他把国家的存在看成是通向大同之路的第一个绊脚石,在他看来,要实现人类大同,必须首先去除“国界”。去除“国界”实“为大同之先驱耳”^{[1]87}。

“级界”是康有为抨击的第二个目标。他说“人类之苦不平等者,莫若无端立级哉!”^{[1]126}在这里,康有为尤其对印度的种姓制度大加鞭挞,并以此为例说明,“级界”的存在不仅损害了人们的平等权利,而且严重阻碍了国家社会的发展,使“其国一败涂地而不可振救”。

依康有为所见,种族歧视是人类痛苦的第三个渊源。康有为认为“人类之生,皆本于天,同为兄弟,实为平等,岂可妄分流品,而有所轻重,有所摈弃哉!”^{[1]126}但他同时也承认世界上各种族在智力、体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明确地说“银色之人种横绝地球,而金色之人种尤居多数,是黄白二物,拥有全世界。白种之强,固居优胜,而黄种之多而且智”。而“棕色者,目光黯然,面色昧然,神疲气茶,性懒心愚,耗以微哉,几与黑人近!”^{[1]134}由于人种之间在形体、智力等方面存在天然的巨大差异,这和大同世界的愿景相左,所以,康有为提出了要进行“改良人种”。

比较而言,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形界”和“家界”的抨击更为激烈。对于女子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用极强烈的字眼进行谴责,他说:“夫以男女皆为人类,同属天生,而压制女子,使不得仕宦,不得科举,不得为议员,不得为公民,不得为学者,乃至不得自立,不得自由,甚至不得出入、交接、宴会、游观,又甚至为囚,为刑,为奴,为私,为玩,不平至此,耗矣哀哉!”随后,康有为进一步将歧视、压抑妇女的行为上升到“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的高度,指出此类现象“于义不顺,于事不宜”^{[1]171}。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抨击最激烈者莫过于家庭制度,在康有为眼中,中国的家庭生活简直就是一幅凄惨的景象,“凡中国之人上自簪缨诗礼之世家,下至里巷蚩氓之众庶,视其门外,太和蒸蒸,叩其门内,怨气盈溢,盖凡有家焉无能免者”^{[1]217}。为了揭露家庭制度之罪恶,康有为总结出十四项有家之害,并得出“故家者,据乱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也”^{[1]225}。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对私有财产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将它归类为另一阻碍人类快乐的错误制度。不过,康有为抨击家庭制度主要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而他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批评大都根据他所了解的西方工业社会的情况。

(二)《大同书》的社会改造规划

在对传统制度进行抨击的同时,康有为也详细地呈现了自己的社会改造规划。康有为的社会改造方案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是一套完整的社会改造方案。

在《大同书》的乙部,在历数“有国之害”的基础上,康有为提出了“去国界合大地”的设想,其基本思路就是“消除邦国号域”,现有“诸国改为州郡,而州郡统于全地公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由公民公举议员及行政官以统之”。“各建自主州郡”在政治上“若美国、瑞士之制是也”^{[1]89}。康有为认为,“初设公议政府为大同之始”^{[1]95},设置世界性的“公议政府”乃是走向“大同”社会的第一个具体的步骤。各级公政府的建立既是实现世界“大同”的首要环节,也是推行社会改造建设大同太平世的依托。接着,在《大同书》丙部以后的各部,康有为详细论述了社会改造的各项措施。在丙部“去级界,平民族”里,康有为基于“人类之苦不平等者,莫若无端立级哉!”^{[1]126}提出在未来的大同社会,“阶级尽扫,人人皆为平民”^{[1]128}。在丁部“去种界,同人类”里,康有为认为,“欲合人类平等大同,必自人类之形状、体格相同始”^{[1]139},要通过“迁地”“杂婚”“改食”“沙汰”等措施,实施人种改造,淘汰“棕、黑人”有性情太恶,状貌太恶或有疾者”^{[1]143},消除白色、

黄色、棕色、黑色人种之间的差别。在戊部“去形界,保独立”里,康有为着重论述了男女平等的问题,设想在未来的“大同”社会“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只许订岁月交好之和约而已”,“婚姻期限,久者不许过一年”^{[1]196}。在己部“去家界,为天民”里,康有为详细设计了大同世界中社会为妇女、儿童、老人兴办的福利教育事业,他设想在未来的“大同”世界里,“人人皆直隶于天”,“生育、教养、老病、苦死、其事皆归于公”^{[1]227}。

对未来“大同”社会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康有为也做了精心的安排。在庚部“去产界,公生业”里,康有为设想未来的“大同”社会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于公”^{[1]280}。同时,由于实行了机器大生产,“机器日新,足以代人之劳”,“劳动苦役,假之机器”,人们每日只需要工作“三四时或一二时”,其余时间“皆游乐读书”^{[1]289}。

为了激励人们上进,康有为认为在未来的“大同”社会,除了实行民主政治外,还必须实行一些重大的奖惩措施。在辛部“去乱界,治太平”里,康有为除了重申,“凡大同之世,全地大同,无国土之分,无种族之异,无兵事之争”^{[1]297},“地方分治以度为界”,各地在政治上普遍设立议会,实行主权在民,地方自治,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外,还特别强调,“为公众进化计”,大同社会要实行“竞美”“奖智”“奖仁”“禁懒惰”“禁独尊”等措施。

当然,由于深受儒家的“仁爱”观和佛家慈悲为怀思想的影响,康有为将其作为一个儒者所具有的民胞物与、悲天悯人的情怀也融入到了对未来社会的规划中来。在壬部中“去类界,爱众生”里,康有为不无动情地说“乱世亲亲,升平世仁民,太平世爱物”,在未来的“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杀矣”。对于“牛、马、犬、猫”等,也应“亲之、爱之、怜之、恤之”,^{[1]336}要有仁爱之心。

在经历一系列社会改造之后,康有为不无乐观地提出“九界既去,则人之诸苦尽除矣,只有乐而已”^{[1]341}。在癸部“去苦界,至极乐”中,康有为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大同社会的“居处、舟车、饮食、衣服及其他之乐”,描绘了一幅其乐融融的太平盛世景象。

三、余论

康有为作为政治人物,晚清时倡导维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继续忠于前朝,反对共和,其政治实践与《大同书》中所倡导的政治理念反差极大。纵观康有为一生,我们会发现康有为实际上具有双重社会角色,一个是关注实际事务的社会改良运动的鼓吹者和推动者;另一个则是神驰于理论与想象领域、超脱现实的思想家。可见其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差。为什么会出

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康有为深知“社会结构不同理论的宣扬和实践应配合人类进步的不同阶段。”^{[3]39}读史使人明智，理解了康有为也许对理解康有为之后的政治人物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 [1] 康有为. 大同书[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2] 康有为著.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 康有为全集(第五集)

-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 萧公权. 近代中国与世界: 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4] 曹发军. 从《大同书》看康有为的社会下层情结[J]. 中州大学学报, 2009(4).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Writing of Kang Youwei's *Great Harmony Book* and His Thought of Society Reform

CAO Fajun

(College of Marxism,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Great Harmony Book* is a book that Kang Youwei, a modern Chinese thinker and statesman,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his thought of ideal society of “Great Harmony”. In his book, from his attitude of “kindness”, Kang Youwei enumerated all kinds of suffering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root of all the suffering was because of the “Nine Realms”. He also discussed how to remove the “Nine Realms” separately, and outlined the ideal blueprint for a future society of “Great Harmony”.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al “Great Harmony” society, Kang Youwei made a harsh attack 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that era in that book. While attacking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Kang Youwei also presented his own social transformation plan in detail.

Key words: Kang Youwei; *Great Harmony Book*; hope of great harmony society

(上接第 67 页)

- [14] 新疆通志编撰委员会. 新疆通志·卫生志[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18.
[15] 张大军. 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2册)[M]. 台北: 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0: 7022.
[16] 问天. 新疆迪化调查纪略//王云五、李圣五主编. 新疆与回族[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92.
[17] 保护马路, 扫除街道积雪, 公安局通令各商户[N]. 新疆日报, 1938-12-02(3).
[18] 总商会临时会, 选定韩君璧为新光副经理, 筹办卫生车费各商负担四千万[N]. 新疆日报, 1938-12-06(3).
[19] 捐集中巨款翻修阴沟, 南梁居民热心可嘉[N]. 新疆日报, 1939-05-27(3).

- [20] 经来民众捐助, 整顿市政. 新疆日报[N], 1939-07-06(3).
[21] 本市将建修大规模之新式浴塘一所, 商民召集股本合资筹办[N]. 新疆日报, 1936-02-24(3). 厉声.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 1600—1990[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454.
[22] 刘荫楠. 新盛泉浴室//乌鲁木齐掌故(一)[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 194.
[23] 要想得到健康身体, 快来宜新澡堂沐浴[N]. 新疆日报, 1939-05-18(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 Review of the Modern Han – nationality Commerce Group in Xinjiang and Modernization of Public Health

JIA Xiuhui

(Institute of History, Xin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rumqi, Xinjiang 830011,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tributions of Han – nationality commerce group in modern Xinjiang in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edicine, assisting government to stamp out the epidemic, supporting public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construction in towns, and opening public bath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Han – nationality commerce group promotes Xinjiang's integration to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strengthens the psychological ident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Xinjiang as members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Han – nationality commerce group; public health; modernization

语言的产业经济学阐释

毛现桩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70)

摘要: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语言资源,语言具有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等经济特性,语言也具有投入、产出和人身依附等人力资本特性。在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基础上衍生出经济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语言经济学。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与经济价值为语言产业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在对语言经济学和语言产业的定义以及内涵研究梳理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新的语言经济学定义,并对语言产业的概念和语言产业的分类进行了归纳,提出了便于在实践中操作的可行方法,最后讨论了我国语言产业的经济贡献度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语言;语言经济学;语言产业;经济贡献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15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72-07

一、引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作为人类彼此交流的一种存在符号,语言也担负着人类信息记载、文明传承的重大使命^[1]。长期以来,由于研究目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同,我们对“语言”的定义也各有不同,各有侧重。下面仅举几例以示说明:

(1)语言是一种人类重要的信息传递符号系统,是人类最重要的存在方式之一。

(2)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用于思想表达和情感交流的一种口头或文字系统。

(3)语言是指所有任何可用于表达和交际的方式,如姿势、符号、动物发声等。

然而,以上几种代表性的定义都是从信息论和符号学的视角对“语言”做的解释,突出的是语言的信息传递和能指、所指功能。随着对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出现了各类语言学科,比较成熟的有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认知语

言学、应用语言学,等等。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注意到人类语言活动的相当部分可以从经济学得到解释^[2],特别是70年代后期欧洲各国针对殖民地民族主义势力抬头的趋势,开始纷纷制定本国的官方语言政策,于是产生了对“语言经济学”的强烈需求。自此之后,对语言的研究又多了一个维度——经济学维度。本文拟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审视语言,全文基本思路是:一、经济学维度的语言阐释;二、经济产业维度的语言分析。语言的经济学分析是基础,是语言产业发展的前提,只有当语言经济发展出具有产业属性之后,语言经济学才能成长为语言产业经济学。本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认识语言的经济属性,追踪国内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前沿。此外,通过对我国语言产业概念内涵及业态分类研究的梳理,可以使我们了解掌握普遍通行的语言产业分类标准,对我们认识、研究语言产业的经济贡献度,以及对我国语言产业的稳步发展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19-12-30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河南省本科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南省新型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2019SJGLX309);2019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省属普通本科高校科研育人机制研究”(2019GGJS125);2019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课题“‘双一流’背景下省属普通本科高校科研育人机制研究”(2019-JKGYB-0086)

作者简介:毛现桩(1981—),男,河南平顶山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经济及语言服务城市经济研究。

二、语言的经济学解释

(一) 语言的经济作用

“分析语言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经济思想史上来看,应该说已是非常久远的事了。”^[3]从当代来看,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力量中,除了技术和制度外,就是文化了。文化有多种表现形式,语言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种,它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民族自我认同和个体间信息交流传递的双重使命。这就是语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体现。一般而言,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相似语言的劳动者更易聚集在一起,构建一定的社会网络,形成社会资本,从而影响该网络成员个体以及整体劳动收入的绝对数量和相对位次。^[4]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者语言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劳动者获取何种工作机会、获得何种劳动报酬,成为决定劳动者经济地位,甚至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这种劳动者语言能力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就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对语言的经济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语言被视为一种民族归属,具有民族认同的功能。操有相同特定母语的人可以组成一个特定的群落,群落之间这种语言上的差别是导致个别群落优越性的主要因素,从而造成了该群落人类社会经济地位的支配地位。该阶段的研究多是以美国黑人和白人的收入差距以及加拿大以英语和以法语为母语者的收入差别为考察对象。在第二阶段,语言被视为一种人力资源。语言技能和其他技能(汽车修理能力、会计业务能力等)一样,都是个人或社会通过投资金钱、时间和精力,从而能够为自身带来收益的经济资源。在第三阶段,基于前两个阶段的研究,语言已超越了身份标识的功能,而且也不仅仅是具有潜在价值的技能,而是一种植根于人的语言属性。这种与人密不可分的语言属性是影响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

(二) 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

“人力资本”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首先给予解释而获得特定含义的一种资本概念。与物力资本相对应,人力资本指的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具有生产性、可变性和稀缺性等属性。^[5]语言作为人力资本,具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上,它是指国民总体的语言能力,是构成一国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部分。国家的投入和语言人力资本的积累需要考虑许多问题,如语言规划、投入产出

比例等;微观上,作为个体的人力资本,是个体优化选择、投入产出的问题,与个人的就业和收入相关。

从总体出发,国民总体语言能力影响了本国的对外经济贸易。Hutchinson 研究发现,美国与他国双边贸易量与英语在该国的普及度和该国国民英语语言的掌握程度成正比。Isphording & Sebastian 为研究语言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采用通用语(lingua franca)代替母语的方法,通过对比母语与通用语的差异度,从而核算出语言距离,研究发现语言距离与贸易流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语言距离最小的两国贸易流量比语言距离最大的两国贸易流量少约4%。为探讨国民英语能力对该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张卫国、孙涛^[6]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对此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国民综合英语能力与我国对外服务贸易流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这种影响是稳健的,大体还呈现上升趋势。改善和提高国民英语能力对我国对外经贸往来的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徐珺、自正权^[7]运用引力模型,选取WALS语言指数并加权处理,搜集了中国与17个贸易国近十年双边贸易的数据,实证研究了语言距离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发现语言距离对中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影响显著,语言因素是影响中国对外贸易不可忽视的因素,国家有关部门和学者应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在微观层面,语言都是依附在一个个鲜活的人体上,具有人身依附性,外在表现为特定的语言能力和技能。作为技能,一个人的语言技能就如同焊工的焊接技能、车工的车床技能一样、会计的理账技能等一样,都是一种很重要的人力资本形式,具有成本投入性、收益产出性和人身依附性人力资本的三个要素。首先,提高语言技能需要有成本投入,需要花费代价。这里的成本既指金钱成本,也指时间或其他方面的成本。从这方面讲,语言技能具有一般资源“稀缺性”的属性。其次,语言技能具有产出性,能为拥有语言技能的人带来收益,或是经济收入的增加,或是社会地位的提升等。最后,语言技能与社会中的个体不能分割,它不能脱离人的身体而独立存在,语言技能必须依附于人体,否则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总之,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形式,个人的语言资本与本人的工资收入分配和社会经济地位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8]一般而言,一个人获得的收入与其掌握的语言种数和单种语言技能高低成正比。因此,“语言资本投资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9]。

(三) 语言经济学

语言既然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具有经济属性,这就说明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审视语言资源,解读语言学。反过来,发自20世纪初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迅速波及了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进而把经济学也成功地吸纳到了“语言转向”中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人与人的交易和交换与人们的语言密切相关。其实,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早就指出,人的交易是需要语言的,这是人类有市场交换和交易行为,并能形成习俗、惯例和制度的根本原因,即只有人类有语言。基于以上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成功地在语言学与经济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找到了语言学与经济学的对接——语言经济学。

语言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在语言经济学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0]³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于教育投资,而语言知识的习得与技能的提升是教育投资(包括正规教育与继续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们花费了金钱、时间等成本获取语言知识、提升语言技能,自然期望得到某种经济的收益。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马尔萨克(Job Marschark)所提出的语言具有价值(value)、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收益(benefit)的观点更具有了理论支撑,这也为语言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内容。语言资本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要素,是其重要的存量之一。更重要的是语言资本是获取其他人力资本的资本。我们通过语言了解、学习、掌握科技,通过语言与人沟通。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人。语言能力制约着我们对先进科技信息的获取量与摄入量,影响我们对先进技术的掌握。较低的语言技能会影响个体心态的发展,进而对人力健康资本产生负面影响。语言的特殊人力资本属性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凸显,语言经济学从此和人力资本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为突破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关于语言经济学的定义,目前存在着这样几种代表性的观点:格林^[11]认为,语言经济学是指“在对表征语言变量的关系研究中,使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它主要侧重于研究经济因素对语言各变量的影响;而有学者则认为,语言经济学“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研究语言能力的决定因素和后果”^[12],甚至还有学者认为,修辞,作为一种表达手法,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是研

究稀缺资源在市场中的分配问题,修辞是研究如何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科学,在人们无法满足倾听欲望的情况下,可借助修辞手段分配稀缺语言资源以提高表达效果。可见,对于语言经济学这一概念,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尽管上述定义存在着那样那样的瑕疵和分歧,但是经济学理论、方法和工具在其中的确占据着重要作用。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学科研究的交叉在不断地扩展和深化,语言经济学也是如此。今天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已经远远超越了20世纪60年代马尔萨克提出这一概念时的内容。

因此,我们今天如果将语言经济学仅仅定义为:“采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把语言和言语行为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学科。”^[13]未免有欠妥之处。首先,这一定义中只关注了语言的经济学研究,没有谈到经济学的语言研究;其次,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不能被习惯性地称为某一学科的一个分支,它应有其自己的学科归属。综上,我们至少应从三个维度审视语言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对象,分别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自身的问题;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学中的语言运用问题;以及二者兼而有之,即研究语言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尝试为语言经济学重新下一定义:语言经济学是一门分别运用语言学与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别研究经济学中的语言运用问题和语言运用中的经济问题的一门交叉学科。

三、语言的产业分析

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与经济价值为语言产业的形成提供了必要客观条件。构建语言产业,可以最大效度获取语言红利,促进经济绿色发展。语言产业是语言经济最直观的表现形式。李宇明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软实力,同时也是一种硬实力,它可以以产业的形式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价值,赚取“语言红利”。

(一) 语言产业的定义

“产业是指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具有相互作用的经济活动组成的集合或系统。”^[14]当语言以一种较大规模且深刻有力的方式呈现在经济活动中时,语言产业的概念就应运而生。事实上,语言产业早已存在是个不争的事实,如我们身边的语言培训、语言翻译以及语言出版等。只不过因为语言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并未察觉其存在,并敏锐地从经济产业的视角分析而已。另一个原因是语言及

其语言产业并不像第一、第二产业的多种产业类型那样,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显著地位,为经济增长带来直观效益,这也导致了语言产业被置于被忽视的角落,对语言产业问题的研究也未被重视。最近几年,随着国内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热起,对语言的产业研究也随之开始吸引学界关注。

有多位学者试图对语言产业进行概念定义。贺宏志^[15]以语言文字在语言产品和语言服务中担当的角色为标准解释语言产业,他认为语言产业可以是以语言文字作为原料和内容生产各种语言产品的产业,也可以是以语言文字作为加工处理的对象提供各种语言服务的产业。黄少安等^[16]则从语言产业的运作方式和语言服务的目标角度定义语言产业是这样一种生产和服务活动:语言产业是一种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生产语言类产品或者语言服务,从而满足国家或者个人对各种语言产品或语言服务需求的产业。该定义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析了语言产业多层次的经济服务属性。从微观上讲,各种市场化了的语言类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不同个体的多层次语言需求,提升个体语言技能,增加个体人力资本存量;从宏观上讲,某地区或一国各类语言产业的完善和发展不仅可以有效作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强该国或该地区服务其居民的能力,促使其居民拥有更高的幸福获得感,提升国家或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此外,陈鹏也认为语言产业概念的一个关键点是语言产品。从需求和消费的角度来讲,因为存在语言需求,语言服务企业为满足语言客户的语言需求,从而生产出各类语言产品或服务,导致语言消费行为的发生,而当此种语言消费行为达到一定的成熟度和规模之后便形成了语言产业。据此,他认为语言产业是以语言为内容、材料,或是以语言为加工、处理对象,生产出各种语言产品以满足各种语言需求的产业形态。^[17]

综合以上学者们对语言产业概念的研究,我们将语言产业解释为或以语言文字作为生产原料和内容,或以语言文字作为加工处理的对象,生产或提供各种语言产品或语言服务,以满足个体和社会的语言消费需求。这一解释既包含了语言产业的生产方式,也指出了语言产业的服务对象。

(二)语言产业的内涵与分类

1. 语言产业的内涵

语言作为人类信息交流和情感传递的符号而存在,同时具有历史记载和文化遗产的功能。语言本

身的特殊性体现在语言产业上,具体表征为:宽涉及面、高融合性和强环保性。

首先,语言产业的范围比较宽泛。从语言产业概念内涵和现实发展来看,语言产业不仅涉及与语言能力的提升相关产业,如语言培训、语言康复等,还涉及语言内容相关的产业,如词典编纂、语言创意等产业,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还涉及对语言的处理产业,如机器翻译、文字处理软件等产业。其次,语言产业是一个极具融合性的产业,与文化、教育、信息产业有很强的关联性。语言产业既是自身演化的结果,更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产物。随着一体化趋势的加剧,全球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愈加频繁。而语言是支撑这一切往来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媒介,一切的社会习俗、商业惯例、国际法规和制度约束实质上都是语言现象,都必须以语言为载体。因此,语言产业能统领我们所有的文化、经济生活。最后,语言产业具有极强的环保性,是一个绿色的朝阳产业。从纵向看,语言产业中对语言资源加工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语言的存储、传输、推广与应用,都是无污染的绿色产业;从横向看,语言产业与文化产业、信息产业和教育产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信息产业、文化产业本身都是新兴的绿色产业。总之,发展语言产业能够为我们带来绿色经济。

2. 语言产业的分类

前面,我们就语言产业的定义进行了讨论。下面,我们着重就语言产业的分类问题进一步分析。目前,我们较为熟悉的语言产业业态主要有语言培训、语言出版、语言翻译、语言创意、语言康复、语言会展、语言能力测评等。要对语言产业进行分类,我们需要采用某种逻辑和标准划分出各种不同类别的语言产业业态。

在此,我们不妨以语言产业形成过程中对语言处理的方式为标准,将语言产业分为涉及语言能力的产业、涉及语言内容的产业和涉及语言处理的产业三大类。语言能力产业是围绕语言能力的获得、提升和评测来展开的产业,如语言培训、语言康复、语言能力测评等业态。语言内容产业是对语言内容进行整理、复制、组合、翻译等的产业,包括语言出版、语言翻译、语言创意、语言艺术等业态。语言处理产业是利用各种软硬件技术和设备对语言进行储存、书写、传递、显示、转换、识别、理解等的产业,包括字库、输入法、文字处理软件、字形识别、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等业态。如表1。

对于上述分类,我们还可以从最终产品形态的

角度来加以理解。首先语言能力产业是围绕语言的综合服务产业,是以语言的形式开展服务,如语言培训是为有提升语言技能需求的人提供语言服务;语言测试是为有测定语言程度需求的人提供语言服务,它的最终产品不是语言设备或是语言内容,而是一种服务。其次,语言内容产业是以语言本体为最终直接产品。如语言翻译的最终产品还是语言形

式,只不过是另一种语言或是同一种语言的另一种变体;语言创意的最终产品是同种语言的不同形式;语言出版的最终产品还是语言内容,如字典词典书籍等。最后,语言处理产业是以各种语言科技设备为最终产品形态,如翻译笔、助听器、点读笔、文字处理软件等。

表1 语言产业类别

语言产业分类	内涵	业态举例	最终产品形态
语言能力产业	语言能力的习得、维护、测评	语言培训、语言康复、语言测试	综合服务;围绕语言的综合服务活动
语言内容产业	语言内容的整理、转换、创作	语言出版、语言翻译、语言创意、语言艺术	语言文字
语言处理产业	利用设备和技术对语言进行储存、复制、显示、识别、翻译等处理	输入法、屏幕书写、字形识别、语音识别、字库、文字处理软件、机器翻译	设备;处理语言信息的软件和硬件

(三)我国语言产业的经济贡献度

1. 语言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机制

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是较为成熟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数学家柯布(C. W. Cobb)和经济学家P. H. Douglas得出了劳动和资本对经济生产的作用函数,即: $Y = AK\alpha L\beta$ 。但该生产函数在测算经济增长额时出现了“余数”(residual)。之后,人力资本理论之父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认为经济增长新的因素和出现余数的原因是只计算劳动投入的数量,而忽视了质量。随后,以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M. 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学派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除资本、劳动外,技术进步也是重要因子。20世纪9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罗默(Paul. Romer)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创新。并且把劳动生产中投入的人力分为非专业化的原始劳动力和具有专业化知识的人力资本两种形式,通过人力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是内生力量,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不歇动力。

语言作为特殊的人力资本形式,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投入生产中的劳动者通过语言媒介获取技术知识,掌握技术技能,从而形成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间接影响为语言服务产业的发展和完善可以提升城市和国家形象,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吸引人力资本的聚集和企业的投资。

2. 研究语言产业经济贡献度的难题所在

发展语言产业的目标在于提升语言的经济价值,使语言形成产业,发挥规模效应,最大限度地获取语言红利。目前语言红利已经凸显。首先体现在拉动语言内需上,以出口为动力的经济推动了以英语为主导的语言教育需求、以服务外向型经济为主

的国际商务语言服务需求和处理涉外事务而需求的法律语言服务等,因此,国内近几年以文化外译、法律英语为主的外语语言产业获得了发展。其次体现在扩大语言消费上。目前,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国已与沿线65国建立经贸往来,涉及53种国家通用语,200多种民族语言及众多方言。众多繁杂的语言状况为我国语言产业的发展提供的巨大的市场空间,同时也使我国语言产业面临直接挑战。“一带一路”建设刺激了国内与国外的语言消费需求,国际商务语言服务、涉外法律语言服务、文化外译语言服务等各类语言类人才的培养亟待解决。另外,2022年冬奥会雪上项目体育语言服务人才也是今后几年语言消费的一大趋势。第三,语言经济能够促进语言就业。语言经济的发展催生出了许多新兴的语言产业业态,这些产业业态是在新的经济常态下,伴随我们对语言经济属性的认识而产生的,像文化外译产业、涉外法律服务产业、语言康复产业等,新的语言产业业态为社会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多种新兴职业,即语言职业。第四,语言经济作为文化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不但没有破坏自然环境,而且还可以伴随国民语言素质的提高、语言认同的改善,具有促进民族团结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强大现实意义。因此合理估算一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语言产业的贡献率十分必要。

测量语言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并非易事,存在的难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确定语言产业的外延问题;另一方面是数据如何统计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主要是解决语言产业的边界,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哪些产业属于语言产业,应该统计进来,哪些产业是模棱两可的,可以不统计进来;第二个问题主要解决数据的获取问题,是我们研究的关

键环节。如何确立统计口径,获取统计数据,准确度量语言产业的贡献。这两个问题是语言产业研究中普遍认为较难的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那么语言产业的经济贡献度的测算就是一句空话。

关于以上两个问题,陈鹏和黄少安等给出了推荐的解决办法。首先,对于语言产业的界定,我们要试图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涵盖更全面的语言产业概念,该概念的核心应该是满足“语言需求”的独立的语言产品。^{[18]89}何为“独立的语言产品”,与其他产品捆绑在一起,或是隶属更高级产品单位之中提供服务的语言产品不能称之为独立的语言产品,如相声表演中的台词、电影中的字幕等。这些语言产品没有单独作为一件产品而提供服务,所以不能称为独立的语言产品,在语言产业统计时就不能包含在内。此外,“语言需求”也是一个关键词,这里更多的是指语言产品能够满足我们提升“语言能力”的需求,如语言培训产业、语言康复产业、语言翻译产业等,而不是侧重指对“语言内容”需求,如新闻、广告等。

黄少安等^{[10]41}在研究了加拿大对语言产业的处理方法之后,提出建议,我们可以采用分层方法对我国的语言产业进行统计,首先在第一层次上,我们粗略地将语言产业分为:语言翻译产业、语言培训产业和语言科技产业。接下来在第二层次上,我们可以将语言翻译产业再分为语言口译产业和语言笔译产业,或是按照翻译的内容分为文学翻译产业、商务翻译产业、科技翻译产业等。按照同样的方法,将语言培训产业和语言科技产业也进行二级层次分类。最后,有可能的话还可以进行三级层次分类,从而实现产业的具体化。在数据统计时,由于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我们可以根据现有数据对相近或相似语言产业的相关数据进行推算或保守计算。这一做法对语言产业刚刚起步的我国来说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苏剑^[19]将语言培训行业纳入语言产业的统计范围,基于2000年至2012年的数据,定量估算了语言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证结果显示语言培训产业的市场产值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为0.09个百分点。陈鹏^{[18]93}综合了语言翻译、语言培训、语言出版、语言教学设备、语言测试和语言技术等几个语言产业的二级行业2010年的年产值,得出2010年语言产业合计产值1920亿,当年全国GDP为401512.8亿,第三产业增加值172596亿,从而计算出2010年我国语言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

动系数为0.47%,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中的占比约为1.11%。

四、结语

尽管各个实证研究对语言产业产值的统计和对国民经济贡献率的估算尽可能做到考虑周全、计算合理,但都不可能做到详尽和精确无误,这是任何经济实证研究都会存在的问题。但是,当几乎所有的相关实证研究都得出了一致的结果和相似的政策建议时,我们就要正视和重视这一经济现象了。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关注于语言的经济价值和语言产业的经济贡献度问题,而且已有相当数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语言对于个人劳动收入、语言产业对于国民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这就呼吁我们要重新审视语言,视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为一种普通的经济存在,挖掘并发挥语言的经济价值,树立并提升语言的产业意识,积极构建并壮大语言产业。语言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文化繁荣,提升我们的软实力,而且还可以拉动经济绿色增长,壮大我们的硬实力。

参考文献:

- [1]胡小玲.论语言产业的结构性、外部性与发展方式[J].语言文字应用,2013(3):37-44.
- [2]MARSCHAK, JACOB.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J]. Behavioral Science, 1965(10):135-140.
- [3]韦森.语言与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4]陆铭,张爽.“人以群分”:非市场互动和群分效应的文献评论[J].经济学(季刊),2007(3).
- [5]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54.
- [6]张卫国,孙涛.语言的经济力量:国民英语能力对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16(8):97-107.
- [7]徐珺,自正权.语言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之实证研究:基于17国数据的考察[J].外语电化教学,2016(8):73-78.
- [8]张卫国.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J].经济研究,2008(2):144-154.
- [9]张卫国.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初步框架[D].山东大学,2008b.
- [10]黄少安,张卫国,苏剑,等.语言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11]GRIN, FRANCOIS.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Survey, Assessment, and Prospec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996(121):17-44.
- [12]CHISWICK B.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J]. IZA Discussion Paper, 2008:35-68.
- [13]张卫国.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经济学和语言学比较的视角[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5):23-30.

- [14] 苏东水. 产业经济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7.
- [15] 何宏志. 发展语言产业,创造语言红利[J]. 语言文字应用, 2012(8):9-15.
- [16] 黄少安,苏剑,张卫国. 语言产业的涵义与我国语言产业的发展战略[J]. 经济纵横,2012(5):24-28.
- [17] 陈鹏. 语言产业的基本概念及要素分析[J]. 语言文字应用, 2012(8):16-24.
- [18] 陈鹏. 语言产业经济贡献度研究的若干问题[J]. 语言文字应用,2016(8):87-93.
- [19] 苏剑. 语言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定量估算[J]. 社会科学家,2014(4):57-60.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MAO Xianzhuang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School of Urban Econom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observes language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Language bears the economic quality of value, utility, cost and benefit, and als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capital, such as input, output and personal attachment. Based on the human capital theory and economics of educ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of economics and linguistics emerges—economics of language. The economic value and resources quality of language enables it develop into an industry.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the previous study on the defi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of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and the language industry, the paper tentatively gives a new definition of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and puts forward a workable and feasible method to define and classify the language industry, and finally discusses some issues in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the language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language; economics of language; language industry; economic contribution

汉语词汇语义构建的认知理据再探

——基于语料库的“火”的语义分析

马应聪

(河南大学 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河南大学 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用应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下的隐喻观、图式观和关联观来整合解释词汇语义网络构建的认知理据,揭示词汇意义的拓展和构建规律,以期为汉语词汇语义网络的动态构建研究探寻认知新模型。以汉语中“火”在CCL语料库中的2954条用例为语料,分析其语义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发现“火”的语义网络由原始意象图式与四个动态意象图式相互整合而成,不同意象图式之间基于关联性并通过隐喻关系整合形成语义网络。

关键词:词汇语义网络;隐喻观;图式观;关联观;“火”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16

中图分类号:H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79-06

一、引言

自Lakoff和Johnson最早对fire从认知隐喻的视角进行分析论述以来^[1],国内一些学者对汉字“火”的研究可散见于从概念隐喻的角度分析愤怒这一情感时“火”字的表达功能。如:袁红梅和杨春红提出将愤怒概念化为具体事物时就有了ANGER IS FIRE(愤怒是火)的隐喻表达^[2];赵春能和时维娜^[3]、陈明^[4]等在研究中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斯迪克江和伊布拉音从汉维语类比的角度谈到了该概念隐喻^[5]。但以上各篇论文观点和论述多有重合,均围绕ANGER IS FIRE这一情感隐喻展开讨论。赵静莲等通过《说文解字》的火部字探析中国的火文化,从文化的视角阐释了古人对“火”的认识^[6]。金花漫^[7]等对汉字“火”表达的情感进行了收集、归类和分析,以隐喻或转喻理论为指导进行分析,与之前的研究相比,他们将汉字“火”与火部字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对本文的研究有直接启发意义。

在我们所搜集的资料当中,迄今为止尚无对汉字“火”的语义网络形成理据的认知阐释。鉴于此,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尝试将认知语言学的认知隐喻观、图式观与关联观整合来阐释“火”的语义网络构建和发展过程,从而进一步揭示词汇语义的拓展规律,以期能对语言的意义研究的深层规律和理据做出尝试性的探析,并详细分析“火”的相关语料佐以论证。

二、认知隐喻观、图式观与关联观的整合研究思路

(一)理论观点回顾

自亚里士多德提出作为修辞手段的隐喻观点以来,隐喻的研究一直是哲学和语言学界古老而又长青的研究视点,也是各派研究观点的分歧点之一。亚氏将隐喻视为一种修辞手段,其后的大量追随者也认为隐喻是非正常的语言使用,属于文学、修辞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此期被称为传统隐喻研究时

收稿日期:2019-12-25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认知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生命册》中语言与中原文化模型的互塑作用研究”(2019-ZDJH-613);2018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语篇衔接与连贯理论在河南省公共研究生英语教学中的作用研究”(2018-JKGYB-0018)

作者简介:马应聪(1985—),女,甘肃靖远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

期。Lakoff 和 Johnson 首次提出了认知隐喻观,掀起了一场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隐喻研究热潮。随后, Lakoff 等学者在许多著作中详细考察和论证了隐喻在构建哲学、诗歌、政治,甚至在数学概念体系中的作用,进一步证明了隐喻是人类普遍思维方式和基本认知工具的论断。认知隐喻观认为,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它是人类抽象思维的最重要的特征,也使得人类对大部分抽象思维的解释成为可能,是人们认知客观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

图式(Scheme, Schema)是指人们在感觉、知觉和表象的基础上,把有关经验和信息加工组织成某种常规性的认知结构,能够较为长期地储存于记忆之中,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古希腊的哲学家,以及康德、巴特莱特、皮亚杰、菲尔墨等学者都对其做出了论述,当代认知语言学接受并发展了图式理论。Lakoff 和 Johnson 将“意象”和“图式”这两个概念首次结合而成“意象图式”,并将其应用到隐喻分析之中,初步形成了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的意象图式理论。他们又基于体验哲学再次详细论述了“意象图式”,认为其是在人们日常的感知互动中反复出现的、比较简单的动态样式,有基本和复杂之分。意象图式是人们认知客观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

《剑桥语言百科全书》给 relevance 的定义是:语言形式与客观外界的实体之间的关系^[7]。国内外很多学者曾从各个角度对 relevance 的概念进行了解释和研究。从语用学的视角对 relevance 进行的研究始于格莱斯的合作原则的关系准则。Sperber 和 Wilson 根据话语的注意焦点对其重新进行了定义解释,并从认知语用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关联理论(RT)^[8]。根据 Sperber 和 Wilson 的观点,人类的认知以最大关联为取向,语言的交际以最佳关联为取向。关联发展至此,也成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

综上所述,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思维方式和基本认知工具,使得人类对大部分抽象思维的解释成为可能。然而认知隐喻观发展至今也体现出了一些理论方面的不足,如隐喻究竟是基于什么进行的概念映射(mapping)?对此,我们认为,意象图式可以为英语的映射提供认知基础和知识的基本结构。同时,意象图式之间在认知上的关联性保证了映射的发生和有效性。以上理论回顾和思考构成本文构建 MSR 理论模型的理论依据。

(二)整合的思路和模型

基于以上回顾和分析我们发现,概念隐喻、意象

图式和认知关联都是人类认知客观外界的基本认知方式。本文假设,人类的认知活动存在基于意象图式的隐喻性投射,同时投射的依据为不同意象图式之间的关联性和相似性。在体验哲学的理论框架内,研究发现人类对客观外界以及对人类自身的认知基于“主—客—主”的认知模式,始于主客互动和认知主体的感知并形成相应的图式结构,本文中我们将其称为原始意象图式(primitive image schema, 简称为 PIS)。PIS 是通过体验互动及范畴化后最初形成的语义结构,是人类对客观外界的最初认知表征,是动态的。人类依据这些原始意象图式组织较为抽象的思维,而且随着人类认知的不断进步和发展,PIS 有可能会以动态意象图式 DIS(下文释解)的形式再次储存,也可能只是停留在认知的初始阶段不再传承。这里我们认为 Goldberg 的传承观同样适用于图式传承。

基于人类认知的范畴化本能,以 PIS 为进一步认知的出发点,通过对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和把握,主要是其间的相似性的把握,以隐喻性投射的方式,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就会产生不同的动态意象图式(dynamic image schema, 简称为 DIS), DIS_1 、 DIS_2 、 $DIS_3 \dots DIS_n$ 以松散的网状形式存储于人的认知当中。在这一过程中,认知推理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推理所依据的是认知的最大关联和不同认知域之间的相似性。

在 DIS 网络中,有一个 DIS 处于中心位置,具有该范畴的典型性特征,而且其他图式依据其拓展而来,这也是图式进行范畴化的过程。在这一范畴化过程中,典型的 DIS 经过选择等认知加工得以凸显(图 1 中粗体的 DIS 为被凸显成员)。这一松散的网状图式经过 DIS 间的关联性整合最后形成一个呈严密网状的完形意象图式(gestalt image schema, 简称为 GIS)。

GIS 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代表人类在一定时期里对某一或某些事体认识的最高水平,因此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整个认知过程是以隐喻性认知能力为理论假设的前提,以意象图式的方式运行,其中的每一个过程都必然地涉及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我们将其称为隐喻性的图式化关联,人类正是基于这种图式化的关联方式来认知和把握周围世界和人类自身。

以上认知过程即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和语言、意义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是我们整合的理论模式的基本框架。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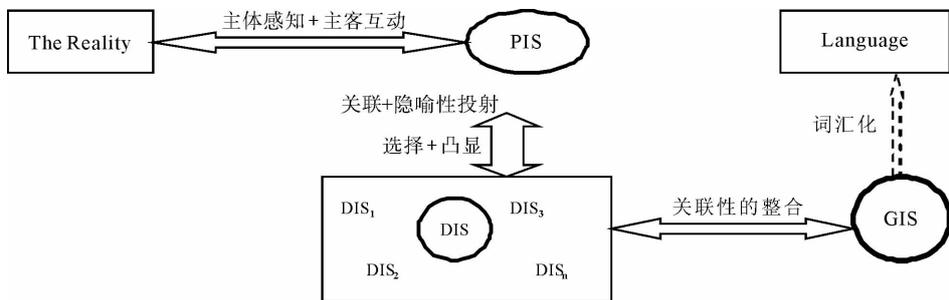


图1 整合理论的模型图

在上图整合性的理论模式中,隐喻性图式化推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所依据的理论细则主要有以下几点:1. PIS 是人类最初对事体的图式化认知;2. 推理基于 PIS 并依据 DIS 之间的相似性进行;3. 映合和推理不仅存在于不同 DIS 之间,也存在于构成一个 DIS 的不同成员之间;4. 原型 DIS 是基于人类范畴化的认知能力,通过选择在特定时期被突显出来的代表成员;可以是 PIS 的传承,也可以是新构建的某个 DIS;5. 原型 DIS 的构建和理解需辅以人类的百科知识;6. GIS 是通过不同 DIS 间的最大关联整合而成的图式网络。下文将据此分析汉语中“火”的意义拓展模型及其语义网络。

三、“火”的意义拓展模型及其语义网络的形成

《新华大字典》^[9]介绍了“火”的文字源流并列了其9条现在通用的释义,分别是:物体燃烧时发出的光和焰;指枪炮弹药,也比喻战争;比喻红色;比喻紧急;比喻愤怒和暴躁;古代兵制单位,十人为火;比喻旺盛兴隆;中医指外感致病因素的火邪;姓。2007年出版的还有两本词典:《新华汉语词典》^[10],所列释义与《新华大字典》相同;而《古代汉语大词典》^[11]的释义却有不同,略去了“指枪炮弹药,也比喻战争;比喻红色;比喻旺盛兴隆”三个义项,添加了“焚烧;古代五行之一;星名”三个义项。我们考查的其他三本字典分别是:《古今汉语词典》^[12],14条释义;《古代汉语字典》^[13],按词类将“火”的意义划分为4条;《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4],10条释义。由此可以看出,“火”的意义一直在发展,古今有别,综合考查共有17个义项。以下我们就基于上文介绍的整合的理论模式并结合相关语料来分析、探究“火”的意义拓展。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CCL)中有关“火”的记录共有98499条,我们从中每隔32条等距抽取了3%,即2954条进行了详细统计和定量分析,其中有23条是“火”在人名、地名中的用法,本文未加考察。

(一)PIS 的形成和“火”的原始义项

据考证“火”的甲骨文为“𤇑”,像火焰升腾之

形,是一个典型的象形文字。可见人类最初对“火”的认识来源于其形。根据本研究上文的整合理论模式,人类通过主客互动和主体感知,从感官所获得的感性资料开始认识客观外界,根据对火焰这一自然事物形状的认识,形成了“𤇑”这一抽象的表意符号,实现了将心理的认知表象通过命名的方式以语言形式的表达。这一命名过程充分体现了在认识客观外界时人的主观认知的作用,以及汉字构造的高度理据性。“𤇑”连同其表意功能——火焰和事物自身一同构建了该事物相应的原始意象图式(PIS),形成了人类体验互动以及范畴化后最初的图式化认知表征和语义结构。人类依据该原始意象图式组织较为抽象的思维从而开始拓展其语义结构。这也恰恰印证了上文理论细则1和2的相关表述。后来随着汉字的简化发展,“𤇑”逐渐被“火”所代替。语料分析的结果显示有约27%,即780条语句表达该义项。《韩非子·五蠹》中有此义项的相关记载:

(1)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

(二)不同 DIS 的构建和“火”的拓展义项

1. DIS₁——五行方位意象图式

《说文解字》^[15]火部记载道:火,燬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凡火之属皆从火。呼果切(huǒ)。Lakoff 和 Turner 指出“空间方位概念是人类最基本的身体经验,是人类与大自然相互作用形成的最基本的概念,也是人类最早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常见的概念,人类很多概念必须通过方位性隐喻来构建”。古人对“火”的认识亦是如此。段注记载:“与木曰东方之行,金曰西方之行,水曰北方之行。”可以看出,我国古人显然是将火的概念与方位、五行相结合,并将火归属于南方。至此,“火”就有了南方和五行之一这两个义项,引申出其第一个动态意象图式(DIS₁)。下例(2)是《淮南子·天文训》中“火”表方位概念的清楚记载:

(2)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东明,

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

徵,其曰丙丁。

“火”表五行之一的用法在语料中显示有 82 条之多。如例(3):

(3)人们总认为命属水火的人是怎么也走不到一起的。

五行指“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元素。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认为宇宙由这五种元素构成,元素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并将自然界和人体具有相似属性的事物或现象分为五类,分别归属于五行之中,运用五行规律解释和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变化。如表 1 所示。

表 1 五行属性归类分析

自然界				五	人体			
五季	五色	五气	五方	五行	五脏	五腑	五官	五志
春	绿	风	东	木	肝	胆	目	喜
夏	红	暑	南	火	心	小肠	舌	怒
长夏	黄	湿	中	土	脾	胃	口	忧
秋	白	燥	西	金	肺	大肠	鼻	哀
冬	黑	寒	北	水	肾	膀胱	耳	恐

传统的中国文化经常把五行和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人体器官、情感、颜色等联系在一起。中医理论中五行和脏腑、病症也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中医学运用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脏腑间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相互联系的规律,解释人类情感、人体脏腑组织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变化。因此,在“火”的五行动态意象图式中就延伸出了中医学中的外感致病因素的火邪,以及颜色范畴的红色、情感范畴的愤怒和暴躁这三个义项。其中愤怒和暴躁义项在现代汉语中使用较多,有 174 (6%) 条语料,以下分别表示相关义项:

(4)浙有土人,一指忽痛,……医谓火所致。(《五杂俎·人部》)

(5)风翻一树火,电转五云车。(唐朝元稹《感石榴二十韵》)

(6)凤姐听了,一腔火都发作起来。(《红楼梦》第六十七回)

古代天文学中,人们对星宿的认知跟季节和时令紧密联系。依据五行划分出时间的五季,并将“火”对应于夏季,同时“火”又对应于五脏的心,结合两者就引申出了“火”指二十八宿中的心宿,或称大火这一义项,例(7)中“七月流火”的说法就源于此。

(7)七月流火。(《诗·豳风·七月》)

至此,以五行为认知的基点,“火”的语义从对人体自身构造和情感的认识对自然界的客观范畴进

行了相应拓展。在这一过程中,不同范畴之间的相似性特征的映合和认知推理起着重要的作用,推理所依据的是认知的最大关联和不同认知域之间的相似性,符合本文理论细节 2 的提法。该图式所拓展出来的 6 个义项在语料中共有 330 条记录,占总体的 11%。

2. DIS₂——功能特征意象图式

依据 PIS 中“火”的表意:物体燃烧时发出的光和焰,以及其所表征的事物,古人对这一具体事物的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形状,进一步深入到了对其产生、功能、特征,甚至破坏力的认识。火焰是物体燃烧时所产生的,这点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已认识,将这一潜存于脑海当中的认知图式进一步拓展,探究火焰的来源,就产生了“火”表焚烧的义项。例如:

(8)人其人,火其书。(唐,韩愈,《原道》)

另外,古人对火的认识也深入到了它的光、热、烟、色,等等。《说文》火部记载:“炆,火光也。”“煠,火光也。”“熠,盛光也。”火之热,《说文·火部》^[19]:“焯,火热也。”“汞,小热也。”火之烟,火部“烟”“煠”二字均释为“火气也”,火气即火之烟气。另外,“焜”“熇”等字也与火之烟气有关。“焜,郁烟也。”“郁烟”即浓烟。“熇,火气上行也。”“焜”字是从烟的密集程度描述烟气的,“熇”则反映了火烟的行走状态。人们对火的功能特征等的认识使其引申出了火把、灯烛等照明用具、(发生)火灾、枪炮弹药三个义项:

(9)……夜半生其子,遂取火而视之。(《庄子·外物》)

(10)雅典的森林大火已蔓延了数日,火势一时间很难控制住。

(11)战争中如果一方火力支援不足,那必定要吃败仗的。

“火把、灯烛”等经间接的隐喻认知后比喻旺盛兴隆:

(12)这家店开张没多久生意就火了起来。

基于枪炮弹药这一义项,“火”又可转喻性地指代战争:

(13)未等和谈结束,双方就开火了。

结合已有的百科知识,战争往往使人联想到危险、紧张,甚至流血、伤亡,自然引申出紧急的表意,同时也与前文“火”表“红色”的义项相联系。《说文解字》(现代版)就将“红”解释为“火或血”的颜色。下例中“火”就表示“紧急”的意思:

(14) 复坠而不反, 火驰而不顾。(《庄子·外物》)

据我们分析 CCL 的语料显示,“火”在现代汉语中运用最多的是以上 7 个义项,有近 1821 条,约占 62%,其中与战争、火灾有关的义项使用最为广泛。

3. DIS₃——度量单位意象图式

我国古代早就有“结绳记事”之说,可见人们对于周围事物的认识除了借助自身的身体构造以及空间方位以外,借具体事物隐喻性地指称抽象概念也是最初的认知表征方式之一。度量单位就是其中一例。在古人对“火”之为物的光和热有了认识把握之后,就利用其来烤制食物,而对同在一起进行此项劳作的人也用“火”来计量。如下例所示:

(15) 十人为火,五人为团,皆有首长。

(《新唐书·兵志四》)

而在现代汉语当中,“火”的这一义项已不再被人们采用,代之以“伙”,我们分析的语料中也无此义项使用的记载。“火”同“伙”表同伴;由同伴组成的集体之义可从下例看出:

(16) 北界群贼一火,约二十余人。

(宋,苏轼,《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

4. DIS₄——特殊姓氏意象图式

“火”作为姓氏可独立构成一个图式,属于汉字的特殊用法,在此我们不对其做深入论述,语料中也无此项用法。

(三)原型 DIS 的构建和“火”的原型义项

王寅指出:“人类的认知基于体验,始于范畴化,先获得范畴,形成概念,概念系统是根据范畴组织起来的,因此范畴化是范畴和概念形成的基础,范畴和概念是范畴化的结果。”^[16]在以 PIS 为进一步认知的出发点,通过对事物之间相互关系尤其相似性的认知和把握,以隐喻性投射的方式构建不同 DIS 的过程中范畴化、推理和图式化始终是最主要的认知手段。所构建的 DIS 最初以松散的网状形式存储于人的认知当中。同样,随着认知的进一步发展,在 DIS 网络当中也会进行相应的范畴化的认知加工,使得某个具有该范畴的典型性特征的 DIS 被凸显出来成为原型 DIS。

依据整合的理论模型及其细则 4、5,在“火”的不同动态图式中功能特征意象图式与原始意象图式关系最为紧密,它直接传承(inherit)了 PIS 的部分特征,其他动态图式都是依据该图式拓展而来。同时语料分析显示(62%),该图式拓展出的义项在现代汉语当中使用最频繁。依据认知语言学基于用法(usage based)的观点“火”的图式网络中得以凸显

的原型 DIS 是其功能特征意象图式 DIS₂。

(四)GIS 的构建和“火”的语义网络

原型 DIS 的构建过程实质上是伴随着图式的范畴化和整合同时进行的,也就是完形图式 GIS 的形成过程,体现理论细节 6 所述。GIS 是通过不同 DIS 间的最大图式性关联整合而成的复杂图式网络。GIS 具有相对稳定性,代表人类在一定时期里对某一或某些事体认识的最高水平。人们最初对“火”的形状进行认知体验后形成了表征“火焰”这一具体事物的原始意象图式,进而在此基础之上通过了解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以及对其颜色、功能等特征的掌握,进一步引申拓展出了其他动态图式,不同图式之间通过关联性整合构建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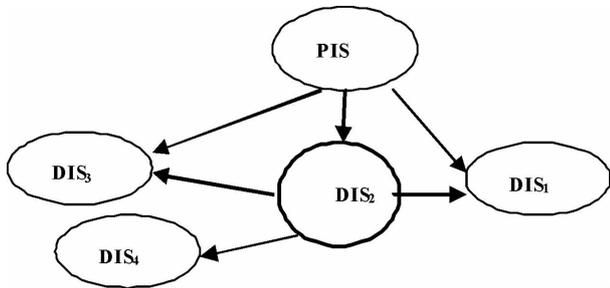


图2 “火”的完形图式网络

据此,“火”就形成了以“火焰”所构建的图式为原型,整合五行方位、功能特征、度量单位和特殊姓氏四个图式,构建起了其目前的完形图式,如图2所示。完形图式网络是形成于人们头脑中的认知结构,通过人类的词汇化认知加工产生“火”的不同义项表达。潜存于不同图式间的网络关系映射到语言和语义层面便形成了不同义项间的内在链接。“火”以“物体燃烧时产生的火焰”为原始义项,以其各种功能特征为基础,结合人们的百科知识,最终形成了由 17 个义项所构建的语义网络。

四、结语

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大框架,本文在回顾了概念隐喻观、意象图式观和认知关联的相关论点后发现,以上各个观点各自无法独立释解词汇语义网络形成的动态过程。基于此,本文采用认知语言学的整合思路,将概念隐喻观、意象图式观和认知关联整合构建了新的理论模式,并据其详细分析了汉语中“火”词汇语义的动态构建过程和理据。我们期望,本文对“火”的意义的个案研究能够为汉语词汇语义网络的动态构建过程提供合理的阐释,为未来汉语词汇语义的研究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2] 袁红梅, 杨春红. 英汉语中“愤怒”隐喻的认知对比与文化阐释[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8 (2): 31 - 36.
- [3] 赵春能, 时维娜. 英语中的“愤怒隐喻”[J]. 大学英语, 2007 (1): 78 - 80.
- [4] 陈明. 英汉“愤怒”情感隐喻的物质化映射系统[J].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2009(1): 55 - 59.
- [5] 斯迪克江, 伊布拉音. 谈汉语表示“愤怒”的概念隐喻[J]. 新疆大学学报, 2008(1): 157 - 160.
- [6] 赵静莲, 等. 从《说文》火部字透视中国火文化[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7(5): 75 - 77.
- [7] CRYSTAL 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Z]. CUP. 1997.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 [8]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86.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 [9] 周斌, 主编. 新华大字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10] 周斌, 主编. 新华汉语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11] 周伟良, 主编. 古代汉语大词典[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 [12] 杨自翔, 等主编. 古今汉语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13] 周斌, 主编. 古代汉语字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Z]. 5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15] 许慎. 说文解字[M]. 徐铉, 等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16] 王寅. 解读语言形成的认知过程: 七论语言的体验性: 详解基于体验的认知过程[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6): 53 - 5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Mandarin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 Extension: A Corpus - based Study of the Semantic Network of Chinese Character “Huo”

MA Yingco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From a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otiv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exical semantic network via integrating the views of metaphor, schema and relevance to reveal the potential rules of it and to explore the new cognitive model of online lexical semantic network construction. The study analyses the constructing and developing of the semantic network of Chinese character “huo” based on its 2954 instances collected from CCL.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semantic network of “huo” is developed by the metaphorical integration of the GIS and four different DISs based on their relevancy.

Key words: lexical semantic network; metaphor; schema; relevance; “huo”

Verschueren 语言顺应论 在英汉互译教学中的应用实证研究

成汹涌,何婷婷

(河南工业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Verschueren 语言顺应论视译事活动为连续选择及动态顺应的过程,具有极强实然操控性。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文本转移活动决定其自身动态性,译语文本在遵从源语旨意和风格基础上顺应目标语读者习惯和审美情趣而力图成为语用等值的产物。随机抽取河南省7所高校外(国)语学院128名翻译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被试对象,实证考察我国学习者在英汉互译活动中实施双语顺应的具体情况。研究表明,被试者在英汉文化背景顺应、结构客体顺应、文化与结构动态顺应以及顺应意识突显等方面的表现不容乐观,翻译教学处境堪忧,广大教师任重道远。

关键词: 顺应论;源语;目标语;翻译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17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0)01-0085-08

一、引言

译介因需要译者具备超强语言综合能力而被视为难度最大的语用活动之一,将其比喻为“戴着脚镣的舞蹈”毫不为过。翻译理论俯拾皆是,但真正能有效指导翻译教学实践的理论却凤毛麟角。Verschueren(2000)语言顺应论将译事活动看作是译者在源语语境和结构客体之间不断做出选择、反复顺应以适应译文读者文化背景需求和目标语结构变化从而最大限度满足交际双方需要的动态过程^[1],译事质量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顺应意识的优劣^[2]。一时间顺应理论似乎成为译界“灰姑娘”,国内撰写有关顺应论的思辨论文或专著铺天盖地,研究生学位论文囿于顺应理论研究的更是不计其数。遗憾的是,此类研究主要从理论层面诠释顺应论作用,相关实证成果凸显浅层性,应景性十足。为此,笔者对河南高校外(国)语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随机抽样,实证调查他们在践行顺应理论时暴露出的新问题、新情况,并尝试提出自己的拙见,以飨

广大读者。

二、理论基础

Verschueren(2000)认为运用语言交际的过程就是对语言进行连续选择的多变过程,这种选择必须彰显三大特性,即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其中顺应性是确保交际成功的关键。顺应论为语用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其一,译员顺利完成译事必须精准把握说话人身份、体态语、说话语调、听众反映,学会引古论今,谨慎处理源语文化背景,果敢选择适合目标语受众的译语,顺应文化语境,避免因文化空缺而造成信息交流失败^[3],这便决定译事活动必须顺应目标语受众的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4]。其二,翻译是跨文化间的文本转换,源语和目标语结构差别之悬殊促使译员对目标语做出结构性顺应调整^[5]。其三,既然语境和结构提供了顺应内容和范围,二者只有互为动态顺应方能帮助译员找准既符合源语文化背景又顺应目标语受众需求的平衡

收稿日期:2020-01-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语言原型模型视域下英汉不对称状标记性构式认知对比及习得研究”(19YJA740004)

作者简介:成汹涌(1966—),男,河南信阳人,博士,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外语教学与课程论。

点^[6],既是话语接受者又是话语传播者的译员必须意识到对源语和目标语做出某种选择的的目的和意义^[7]。其四,成功译事应建立在领会说话者与听话者语言表达差异基础上对交际双方会话含义的充分理解,经反复协商后选择适合交际双方的语言形式,使译语再现源语的全部意义,而且这种选择应具备突出的策略倾向性^[8]。为此,译员可通过选词、减词、增词、改变句型与词序等策略选择译语,或利用特殊译语标识,如大写、粗体、斜体等来突显特殊顺应过程,从而获得目标语受众认可。所以,成功译者需要对目标语结构及文化背景、译事场合、交际目的等进行有效掌控,就不同译事活动中的语境关系、语言结构、动态、意识突显四个方面做出相应的顺应变化。

三、研究设计

笔者从2018年9月开始,将事先设计好的问卷

表1 学习者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项目	调查细目	本科	学硕	MTI	合计
被试 (n, %)	发放问卷	100	100	100	300
	回收问卷	64	31	68	163
	回收率	64%	31%	68%	54.33%
	有效回收问卷	42	30	56	128
	有效回收率	65.6%	96.77%	82.35%	78.52%
性别 (n, %)	男	6/14.3%	5/16.6%	4/7.1%	15/11.8%
	女	36/85.7%	25/83.4%	52/92.9%	113/88.2%
年龄 (n, %)	15~20岁	1/2.4%	0/0%	0/0%	1/0.78%
	21~25岁	38/90.5%	1/3.3%	1/1.8%	40/31.25%
	26~30岁	3/7.1%	27/90.1%	55/98.2%	85/66.41%
	>30岁	0/0%	2/6.6%	0/0%	2/1.56%
专业 (n, %)	英美文学	2/4.8%	6/20%	0/0%	8/6.25%
	语言学	0/0%	21/70.1%	0/0%	21/16.41%
	教学法	0/0%	1/3.3%	0/0%	1/0.78%
	翻译	39/92.8%	2/6.6%	56/100%	97/75.78%
	其它	1/2.4%	0/0%	0/0%	1/0.78%

从表1可知:(a)被试者中女生占88.2%,男生仅占11.8%,显示我国学习外语人群中的这种“阴盛阳衰”现象^[9];(b)学硕和专硕年龄相近,26~30岁年龄段比例最高,分别为90.1%和98.2%。本科生年龄偏小,21~25岁年龄段所占比例为90.5%;(c)翻译专业优势明显,MTI占100%,本科生占92.8%,其次,语言学方向学硕占70.1%。

四、结果及讨论

(一) 汉译英顺应情况调查

例(1):请大家放心政府不会打白条的,款项会按时支付给你们。

此句重点考察被试者对“打白条”一词跨文化语境顺应的掌握情况。“打白条”是中国人常用的一种诙谐说法,即买方因无力支付卖方现金而开具

分发给河南省7所高校外(国)语学院在读全日制翻译方向本科生、学术型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简称学硕)及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简称专硕,即MTI)。问卷包含汉译英和英译汉各10个句子,调查顺应论在被试学生英汉互译实践中的应用情况,并设置相关细目记录被试者背景信息。问卷采取现场发放回收和邮寄回收方式,截止2018年12月底,共发放和邮寄问卷300份,收回163份,回收率54.33%。随后,笔者对回收问卷进行不完整剔除,最终敲定有效问卷128份,有效回收率78.52%。其中,本科被试有效卷42份,有效回收率为65.6%;学硕有效卷30份,有效回收率为96.77%;MTI有效卷56份,有效回收率为82.35%(详见表1)。

欠条,待有钱时再兑付,也可能永远无力兑付。英语没有现成对应词,选用英语通俗说辞IOU(=I Owe You),就容易明白了。为顺应“打白条”一词文化背景需求,此句应译为“Please rest assure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not issue IOUs, but instead you will be paid on time”。表2显示,三组被试均未能有效顺应此句英译要求,本科组更是全军覆没,无一例正确译文,学硕组和MTI组错误率分别达83.33%(n=25)和98.21%(n=55)。共性错误统计如下:(a)78位被试将“白条”错译成“blank paper”;(b)23位将“打”错译为“open”;(c)还有15人将“按时”误译为“in time”;(d)极少数本科生(n=6)将“请放心”误译为“please believe”。

表2 顺应论在汉译英中的应用调查

数据 项目	被试		学硕		MTI	
	本科		正确	错误	正确	错误
例(1)	0/0%	42/100%	5/16.67%	25/83.33%	1/1.79%	55/98.21%
例(2)	4/9.52%	38/90.48%	4/13.33%	26/86.67%	2/3.57%	54/96.43%
例(3)	6/14.29%	36/85.71%	2/6.67%	28/93.33%	2/3.57%	54/96.43%
例(4)	0/0%	42/100%	2/6.67%	28/93.33%	0/0%	56/100%
例(5)	0/0%	42/100%	1/3.33%	29/96.67%	0/0%	56/100%
例(6)	11/26.19%	31/73.81%	8/26.67%	22/73.33%	15/26.79%	41/73.21%
例(7)	18/42.86%	24/57.14%	11/36.67%	19/63.33%	26/46.43%	30/53.57%
例(8)	7/16.67%	35/83.33%	15/50%	15/50%	17/30.36%	39/69.64%
例(9)	20/47.62%	22/52.38%	16/53.33%	14/46.67%	7/12.5%	49/87.5%
例(10)	4/9.52%	38/90.48%	5/16.67%	25/83.33%	0/0%	56/100%

例(2): We are really indebted to you for your timely help.

这都是我该做的。

交际背景是对话灵魂,合适交际策略是实施成功交际的前提。译者只有精准把控交际语境真实内涵方可对目标语译文做出合理顺应。说话者用英语交流表示感谢时,听话者需结合上下文语境做出相应文化顺应才可正常交流,此时答语应是“With my pleasure”,“You are welcome.”或“It’s my pleasure.”等。若将该句直译为“This is what I should do.”就成了十足 Chinglish,此话一出,听话人会认为说话人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并非出自真心帮助,因此破坏了交际初衷。统计结果表明,能对答语做出正确顺应的被试寥寥无几,本科生占 9.52% (n=4),学硕占 13.33% (n=4),MTI 占 3.57% (n=2),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未能对源语做出顺应而死译为“It’s my duty to do so”,“This is my obligation.”或“It’s my responsibility to do so.”等。

例(3):—You have done a really good job.

—哪里,哪里,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该对话答语实为谦辞,符合中国人以贬低自己表示谦虚的文化特点^[10],暗示“我们对工作虽已尽力,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此句经顺应调整后若译为“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our work.”或“Our work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较为妥当。调查显示,三组被试错译率居高,本科生错译率为 85.71% (n=36),学硕 93.33% (n=28),MTI 96.43% (n=54)。被试将其错译为“Our work isn’t done well enough.”或“We haven’t done the work well.”等,外国人听到此类回答会产生质疑,既然知道工作没做好,为何不尽力为之呢?难道成心不想做好吗?最终导致交际失败。

例(4):人人都有老的那一天。

西方人认为人老皮肤变松弛应归咎于地球引力

影响,无人能摆脱此厄运,人人都会有因年龄增长而衰竭变老的那一天,英语有现成对应语“Gravity catches everybody”。但是,译语“Everybody will be old in time.”过于苍白无华,歪曲源语本意,听话者感到说话人似乎对人生老病死规律提出质疑。若译成“Everyone will die in time.”会让西方人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死亡”与“衰老”不是一回事。统计表明,除 2 名学硕被试者(6.67%)能顺应该句文化语境要求提供正确译文外,剩余包括所有本科生和 MTI 在内的被试均未能对源语做出成功顺应,要么将其译成“Everybody will be old in time.”,要么是“Everybody will die in time.”。

例(5):“三农”问题是事关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首要问题。

句中“三农”意指“农业、农村、农民”,英语没有直接对应译语,译者须增补信息顺应目标语结构需求,译出“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s the primary issue in relation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in our country.”合适译文。调查数据显示,三组被试中仅有 1 名学硕提供了正确译文,其余全部顺应失败。其中,19 名本科生未能对“三农”进行分译,将其笼统译为“three agriculture-related issues/problems”或“three issues of agriculture”,剩余 23 名本科生干脆将“三农”死译为“sannong”。学硕组 29 名被试者译出:“Sannong problems are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economy.”或“The issues related to agriculture are the first problems to be solved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等违背目标语结构客体的译文。MTI 也提供了“The three rural issues are the first important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economy.”或“The three problem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are the most primar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economy.”等顺应失当的译文。

例(6):这场改革对我们来说就是背水一战。

汉语成语“背水一战”源自汉朝大将韩信的一场经典战役,喻指在绝境之中为求活路而做最后博弈,亦用于比喻有决战性质的行动^[11]。目标语有“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和“to burn the boat”等意义貌似“背水一战”的表达形式,但前者意指“后背贴着墙”,表示“没有退路”或“情况危急”,后者意义完全对应于汉语“破釜沉舟”,虽有“置之死地”但未必“而后生”。所以,二者用在此处表示“背水一战”均不合适。“make-or-break”意为“不成则败”“生死攸关”“孤注一掷”,看似与“背水一战”无关,它却能精准诠释“背水一战”非成功不可、发奋图强力求最终胜利的内涵。顺应目标语文化背景需求将其译为“This reform for us is a make-or-break reform.”方显妥当。从调查情况来看,三组被试者误译率均超过70%,本科生73.81%,学硕73.33%,MTI 73.21%,错译为:“This reform is like our back against the wall”,“This reform to us seems like burning the boat.”或“This reform is our last attempt.”等。极少数被试能顺应源语寓意给出正确译文,即11名本科生(26.19%)、8名学硕(26.67%)和15名MTI(26.79%)。

例(7):无事不登三宝殿。

此成语意为平时没事不会登门造访,一旦登门必有要事相求。佛、法、僧为佛教“三宝”,“三宝殿”中的佛殿是佛教徒登场办佛事的地方,法殿指佛家珍藏经书的楼阁,僧殿即是和尚睡觉的禅房。这三处地方,外人不可随便进入,进出者均是佛门弟子。由于西方人大多信奉基督教,对佛教不甚了解,在英文中难以找到完全顺应的措词。若将其直译成“Don't go to the temple for no reason”,目标语受众会不知所云,译者必须对其源语文化背景做相应调整才能顺应目标语受众需求,顺应译文应是“I would not come to you if I had not something to ask of you.”或“I would not bother you if I were not in trouble now.”等。译语虚拟句式既显示说话人谦逊又不失所需帮忙之重要。数据显示,少数被试者能提供顺应该句文化背景的译文,本科生占42.86%(n=18),学硕36.67%(n=11),MTI 46.43%(n=26)。不少被试者将“三宝殿”死译为“sanbao temple”,误译出“I wouldn't go to sanbao temple for no reasons.”或“I wouldn't go to sanbao temple for no important things.”等令人啼笑皆非的译文。

例(8):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人在谈及一人当了官后和他/她有关之人也跟着沾光时,经常用到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字面意为“如果一人有得道面仙的机会,他/她全家包括鸡狗也会随之升天”,借“鸡犬”讥讽依仗权贵而升官发财之辈^[12]。汉文化中鸡狗“地位”不高,贬抑之意十足,但西方人对“狗”情有独钟,喜欢藉“狗”象征最真诚、最可靠朋友。所以,英文很难有完全对等习语,将其译为“Even the dog swaggers when its master wins favor.”(主人受宠,狗也风光)或许最能体现源语和目标语在文化和结构之间顺应的动态完美。数据表明,三组被试者对该句翻译的顺应处理区别较大,本科生和MTI误译率偏高,分别为83.33%(n=35)和69.64%(n=39),学硕组喜忧参半,正、误率各为50%(n=15)。误译多为“When a person gets to the top, all his/her friends and relatives get there with them.”或“When a person attains enlightenment, even his/her pets ascend to heaven.”或“Success is a relative term, which brings so many relatives subsequently.”等。

例(9):中国强大了,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可以扬眉吐气了。

成语“扬眉吐气”指扬起眉头、吐出怨气,借以表达人逢喜事精神爽。译者若将其直译为“to raise one's eyebrows and blow off steam”,目标语接受者不会明白;意译为“to feel with much pride and elation”,源语基本意思有了,仍令听者费解。如果译者顺应目标语文化需求,将“扬眉吐气”改译成“to walk with one's head held high”,形象生动,会收到良好顺应效果。因此,该句译文应为“China has been stronger, so we Chinese people really begin to walk with our heads held high on the global stage now”。数据显示,学硕、本科生翻译正确率(53.33%、47.62%)与错译率基本持平,MTI正确率(12.5%)远低于错误率(87.5%)。本科生错译为“The Chinese people can raise eyebrows and blow off steam on the world stage since China has been stronger now”,学硕“The Chinese people can raise their eyebrows and blow off steam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s China is stronger now”,MTI组“The Chinese people can feel with much pride and elation on the world stage because China is stronger now.”等。

例(10):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

成语“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出自孟子《孟子·告子上》,本意是说人们为得到一样东西,必须舍弃另

一样东西,不是说二者必然不可兼得。成语提醒人们在不能兼得时应学会如何取舍。若将其直译为“*One cannot have fish and bear's paw at the same time*”,目标语听者会不懂。但目标语文化中有“下金蛋的母鸡”典故,说是一个农夫家里养一只能产金蛋的母鸡,贪婪的主人急于从鸡身上获取更多金蛋便杀了这只鸡,令农夫失望的是,鸡肚子里全然没有所谓的金蛋。此典故或许稳妥地顺应了汉文化中“鱼”和“熊掌”之间这种微妙关系。通过文化因素重组,顺应目标语听众译文应是“*One cannot have both the egg and the hen at the same time*”。若联系西方人生活饮食习惯,选择译语“*You cannot eat your cake and have it, too.*”或“*You cannot sell the cow and drink the milk.*”也未尝不可。调查显示,极少数被试者给出正确译文,56位MTI全部译错,本科生

和学硕错误率分别达90.48%($n=38$)和83.33%($n=25$),多译为“*One cannot have fish and bear's paw at the same time*”。

(二)英译汉顺应情况调查

例(1): *The imported grain can only be cost-effective for China's coastal areas.*

出于对结构客体顺应的考虑,译者首先需将合成词“*cost-effective*”做拆分处理,分别为“成本”和“有效的”,否则,直译为“成本有利的”或“有成本效益的”就未能顺应汉语结构要求,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有鉴于此,此句译为“从成本上考虑,进口粮食只对中国沿海地区有利”较为妥当。表3统计结果显示,三组被试者正确顺应比例均不到30%,超过70%被试者将此句译成“进口谷物只对中国沿海地区有成本效益的”,听上去怪异荒诞,十分别扭。

表3 顺应论在英译汉中的应用调查

数据 项目	被试		学硕		MTI	
	本科					
	正确	错误	正确	错误	正确	错误
例(1)	11/26.19%	31/73.81%	8/26.67%	22/73.33%	15/26.79%	41/73.21%
例(2)	12/28.57%	30/71.43%	12/40%	18/60%	27/48.21%	29/51.79%
例(3)	22/52.38%	20/47.62%	10/33.33%	20/66.67%	1/1.79%	55/98.21%
例(4)	4/9.52%	38/90.48%	6/20%	24/80%	1/1.79%	55/98.21%
例(5)	16/38.10%	26/61.90%	22/73.33%	8/26.67%	40/71.43%	16/28.57%
例(6)	7/16.67%	35/83.33%	4/13.33%	26/86.67%	6/10.71%	50/89.29%
例(7)	0/0%	42/100%	0/0%	30/100%	6/10.71%	50/89.29%
例(8)	19/45.24%	23/54.76%	19/63.33%	11/36.67%	41/73.21%	15/26.79%
例(9)	26/61.90%	16/38.10%	16/53.33%	14/46.67%	40/71.43%	16/28.57%
例(10)	10/23.81%	32/76.19%	14/46.67%	16/53.33%	23/41.07%	33/58.93%

例(2): *Nobody is a full-time genius, but a part-time fool.*

该句旨在考察被试者对“*full-time*”和“*part-time*”的理解,以及能否对“*genius*”和“*fool*”在此处真实寓意做出正确顺应选择。句中“*nobody*”和“*but*”对比关系明显,句意即“*Anybody is NOT a full-time genius BUT a part-time fool*”。若先突显NOT和BUT在句中的对比连接作用,再做直译处理似乎句意更加清晰:“任何人都不是专职天才,而是兼职傻瓜。”换言之,再聪明之人也会犯糊涂,再笨也有精明的时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之人。长期受汉文化影响,中国人在正式场合说话讲究用四字格。该句经顺应调整后的译文应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或“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调查结果表明,极少数被试者提供正确译文,大部分未对“*genius*”和“*fool*”做合理顺应变通,直译为“天才”和“傻瓜”,本科生错误比例最高($n=30$, 71.43%)。三组被试者均不同程度将“*full-time*”和“*part-time*”死译为“全职的”和“兼职的”,本科组多达27人(64.29%)。

例(3): *The balance of China's current trade is thanks in part to economy in oil imports.*

此句旨在从两方面调查被试学生对英汉结构客体顺应的熟悉情况,摸清其是否理解“*economy*”的内涵。首先,英语呈静态、汉语显动态的特点决定了译员在翻译名词“*economy*”时,将其“经济、节约”本意顺应为汉语动词“减少”更符合汉文化习惯^[13];其次,表原因介词短语“*thanks to*”内涵“感谢”之意,将其顺应为汉语“多亏、幸亏”更妥。因此,该句正确译文应是“中国当今的贸易平衡一定程度上多亏了减少对石油的进口”。数据显示,本科生做得相对好一些,错误率为47.62%,两组研究生犯错率较高,分别为66.67%和98.21%,MTI仅有一人译对,大部分将“*economy in oil imports*”译为“石油进口经济”,未能对“*economy*”做出合理语境顺应。

例(4): *Talking the talk is not so good as walking the walk.*

同源结构“*to talk the talk*”和“*to walk the walk*”分别意为“光说不练”和“说干就干”。若将此句直

译为“只说不练比不上说干就干”,会让听者似懂非懂,俨然与汉语行云流水之风格极不相称,或许大家耳熟能详的译文“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更为适宜,而且尝试用汉语押韵去顺应英语尾韵。李克强在2013年一次中外记者会上曾谈到“(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现场口译就用到了这句堪称经典的译文。从被试者回答结果来看,绝大多数学生明白“to talk the talk”和“to walk the walk”含义,但对全句文化语境与结构客体之间的动态关系领悟不到位,顺应效果欠佳。三组学生犯错率均在80%或以上,本科生90.48%,学硕80%,MTI 98.21%,其中仅有1名MTI正确译为“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例(5): Don't shed crocodile tears over my misfortune, for I know you hate me.

西方传说,鳄鱼掉泪哭其所捕获动物以诱更多动物上当。因此,在西方,鳄鱼眼泪喻指伪装的同情,引申为一面伤害别人,一面装作悲天悯人。中国人更喜欢将“shed crocodile tears”顺应为汉语主谓式成语“猫哭耗子”,通常再和“假慈悲”三个字黏合在一起,形容看见别人有难假意同情,假装慈悲。此句被顺应调整后的译文应是“不要为我的厄运猫哭耗子假慈悲了,因为我知道你恨我”。坊间亦有“鳄鱼眼泪假慈悲”之辞,感性有余,理性不足,不宜采信。从调查数据来看,学硕和MTI顺应得较好,正确率分别达到73.33%和71.43%,本科正确率仅为38.10%,错译者将“crocodile tears”死译成“鳄鱼眼泪”。

例(6): Refreshments will be served after the seminar.

对该句被动结构的顺应处理是正确选择译文的关键。英语属物称化语言,表达客观事物如何作用于人的感知,让事物以客观口吻呈现出来,多用被动态^[14]。汉语是人称化语言,倾向于从自我角度用人称词叙述客观事物或描述人,多用主动结构,被动意义通过顺应转由主动式表达^[15]。该句正确译文应是“研讨会后又茶点供应”,无需强调由“谁”来“供应”。数据显示,三组被试错译率仍居高不下,本科生占83.33%,学硕86.67%,MTI 89.29%,绝大多数被试者未能对“去被动化”有效顺应。另外,竟然有19名本科生误判“refreshments”词义,暴露出我国专业大学生“专业不专”的突出问题。

例(7): The professor tried to explain his theory about modern poetry, but it was all Greek to his students.

习语“to be Greek to sb.”出自莎士比亚名剧《凯撒大帝》中的名言“For my own part, it was Greek to me”,意为“完全不懂,一窍不通”(= beyond one's understanding)。此句旨在考查被试学生的文化语境顺应能力,也是考查被试者使用文化顺应策略能力的典型个例,正确译文应是“教授试图阐明他的现代诗论,但学生们却一窍不通”。所以,译者能否成功顺应此句文化内涵是译好该句的关键。统计表明,仅有6位MTI被试(10.71%)正确译出此句。遗憾的是,本科生和学硕都交了白卷,如此多被试者选择放弃暴露出我国外语专业学习者对目标语文化的学习研究极不给力。

例(8): Mutual suspicion has become a lion in the way preventing their further teamwork.

该句旨在检测被试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熟稔程度,被试者在明白英文化中“lion”相当于汉文化中“虎”之后方能确保译语的动态顺应。此句正确译为“相互猜疑已成为他们继续深化团队合作的拦路虎”。问卷数据显示,三组被试者对此句的翻译顺应较前几句略好一些,本科生译文正、误率相当,分别为45.24%和54.76%,但学硕和MTI正、误率分别为63.33%、36.67%和73.21%、26.79%,错误率明显偏高。研究生对本句所蕴含中西文化差异掌握得比本科生好一些。有19位本科生将“lion”译为“拦路虎”,但多数(n=23)将其译为“狮子”“绊脚石”“最大障碍”等。有19名学硕和41位MTI将“lion”成功顺应为“拦路虎”,但仍分别有11和15名被试者将其误译为“雄狮”“阻力”“绊脚石”等。

例(9): All the engineers did not attend today's conference.

此句旨在调查被试者对英汉句法结构顺应策略的掌握情况,“all”和“not”是决定译者能否成功顺应目标语的关键。代词“all, both, every, each”等在否定句中均表示部分否定,且在句中位置不受限制。“All the engineers did not attend today's conference.”和“Not all the engineers attended today's conference.”是不同的两个表层结构但却属同一深层结构:“Part of the engineers attended today's conference”。该句译文因此应为“不是所有的工程师都出席了今天的大会”。统计结果表明,本科生、学硕、MTI分别有61.90%(n=26)、53.33%(n=16)、71.43%(n=40)的被试者能顺应合适句法结构并提供正确译文,但分别有38.10%(n=16)、46.67%(n=14)、28.57%(n=16)的被试者未能

准确把握该句真实含义,混淆了英语部分否定与全否定的用法区别,将部分否定误当成全否定“None of the engineers attended today's conference”,即“所有的工程师都没有出席今天的大会”。

例(10): Human beings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 animals.

此句译文的顺应处理需要译者具备英汉文化差异方面的基本知识,汉文化中“动物”一词不包含人,但英文“animals”包括一切“动物”,“人”也不例外。在“animals”之前添加“other”一词就是为了确保“其他动物”将“人”排除在外,这样即可完成英汉文化差异顺应调整转化。英汉互译经常借用“增词”或“减词”顺应策略,“增词”不“增义”、“减词”不“减义”是为了译文表达源语信息和风格不变,并使译文合乎表达习惯。因此,该句正确译文应是“人与动物不同”。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被试者因未能正确顺应英汉文化语境差异而将该句误译成“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三组被试学生中均有过半未能正确顺应该句结构客体,本科生误译率高达76.19% (n=32),学硕误译率53.33% (n=16),MTI误译率58.93% (n=33)。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有如下结论:首先,顺应论为互译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翻译是跨文化信息交流转换,谙熟中西文化差异是做好英汉互译的前提,译者须有强烈跨文化意识,使译事顺应源语和目标语认知环境,真正发挥译介在双语之间的沟通纽带作用。本研究中众多被试者的欠佳表现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他们对英汉文化背景顺应的失败。其次,互译必须顺应,顺应务必动态。文化语境和结构客体之间相互顺应是译事活动的灵魂,为突显译事顺应动态化,译者既要做到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宏观顺应,还要兼顾语言结构、语篇布局、语码和风格的微观顺应,二者相得益彰,不可偏废。本调查有不少被试者未能对源语与目标语各自语境关系和结构客体进行正确顺应而盲目死译源语信息,背离了跨文化交际目的和宗旨。再次,互译顺应策略需多样化。英汉文化及结构的正确顺应要求译员在面对多种选择情况下根据具体翻译层面恰当选择顺应策略,并从微观技巧上保障译事活动顺利实施。有许多被试者因顺应策略选择不当而导致译事失败。最后,互译顺应过程应具灵活多变性。研究表明,一旦翻译背景或目的发生变化,译文顺应方向就应随之变化,译者就需运用不同顺应手段,确保译事活动成功。因此,翻译不是提供唯一标准译文文本的简单活动,而

是不断调整顺应、动态履新、反复重组的过程,绝对顺应在一次译事活动中难以彻底实现,译者只有从翻译目的出发,判断顺应层面和形式,有意识选择翻译策略和技巧,顺应具体交际环境和客体,方可译出上乘顺应精品。

六、启示

本文实证调查了我国专业大学生和研究生在英汉互译中对顺应论的应用情况,希望对今后的翻译教学实践有一定启发。其一,教师自觉运用顺应理念培养学生的顺应意识是对学生翻译能力的基本要求。教师在设计课程和选用教材时既要顺应学生认知水平、语言基础、性格特征等,还要极力将顺应思想融入个人教学理念和言行当中,潜移默化影响学生、感染学生,将学生顺应意识的体现纳入评估其译作质量高低的标准之中。同时,教师有意识将顺应思想贯穿课堂内外,积极营造双语教学环境,鼓励学生亲身体会双语转换、选择过程中的动态顺应经历,帮其在翻译时做出正确顺应,提升译介质量。其二,学生认知心理和语言水平不尽相同,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的意识程度亦有差别,教师可将其意识程度粗略划分为低、高、潜三个等级,最大限度帮助其由低意识向高意识过渡直至具备最强潜意识并不自觉完成顺应选择最佳译文。本研究中大部分被试学生可能处于高意识状态,有强烈意识驱使其极力顺应语言结构和语境,少有死译、乱译现象出现,学生或许正是因为受这种高意识束缚的影响而难以做到自然、下意识地用最地道措辞顺应目标语。学生高、潜意识的转变养成非一日之功,需长期历练磨合且具超强语言领悟感知能力方见成效,这也是翻译教学之最终目的。教师不仅重视翻译实践,更应向学生系统介绍翻译理论,提高其理论素养,让其将顺应理念根植于个人潜意识翻译理念中,而不能仅囿于课堂训练的应景性需求,本研究中本科生的顺应表现总体不如研究生或许根源于此。其三,顺应论为译者提供更加开放视野又赋予其更多自由。教师不仅在课内外从语境、语言结构、动态、意识突显四个方面向学生渗透顺应思想,而且可借顺应论帮助自己创建从宏观设计到微观操作都有理论支撑和现实保障的新型翻译教学模式,切实提升翻译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 [1] VERS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2] 张春柏, 吴波. 从翻译课堂到翻译工作坊: 翻译精品课程建设的启示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1(2).

- [3] 曹群英. 顺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作用[J]. 外语学刊, 2007(6).
- [4] 李宏鹤. 顺应理论视角下的语用翻译[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3).
- [5] 王俊超. 语用顺应论拓展视阈下文学隐喻翻译模式新探:以鲁迅小说为例[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8(1).
- [6] 张绍全, 李晋妍. 顺应理论视阈中法律文本翻译过程的呈现效度[J]. 外语教学, 2016(4).
- [7] 宋志平. 翻译:选择与顺应[J]. 中国翻译, 2004(2).
- [8] 单谊, 戴劲. 新型“被XX”结构的顺应论解读[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3(3).
- [9] 鲍川运. 大学本科口译教学的定位及教学[J]. 中国翻译, 2004(5).
- [10] 成汹涌. 动机视阈观照下的译者行为特征趋向探究[J].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6(3).
- [11] 刘正光. 选择—顺应:评 Verschueren《理解语用学》的理论基础[J]. 外语学刊, 2000(4).
- [12] 熊学亮. 语用学和认知语境[J]. 外语学刊, 1996(3).
- [13] 王建国. 从语用顺应论的角度看翻译策略与方法[J]. 外语研究, 2005(4).
- [14] 杨俊峰. 语境顺应与语用翻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11).
- [15] 钱冠连. 语用学:语言适应理论:Verschueren 语用学新论评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1(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erschueren's 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

CHENG Xiongyong, HE Tingt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Verschueren's 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 claims that translation is a continuously selective and dynamic adaptation process, which has a strong reality control. Translation as a kind of cross-cultural text transfer activity determines its own dynamism, and translated text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source language intention and style should be pragmatic equivalents adapted to the target audience regarding their habits and aesthetic interests. As such, 128 randomly selected subjects from the foreign languages faculties of 7 universities at Henan participated in the empirical surve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Verschueren's adaptation in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mong translation-major learners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128 questionnaire sheets indicates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ubjects respecting E-C and C-E translation on cultural background adaptation, structural object adaptation, dynamic adapta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structural objects, and the salience of adaptation sense is unsatisfactory. Translation instruction career in future will be adventurous and toughly challenging.

Key words: adaptation theory; source language; target language; translation

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力的几点思考

苏 炜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党的基层组织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的基本单元,担负着教育、管理、监督党员和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等职责,党的工作最终要落实到基层党组织。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得以加强,战斗堡垒作用提升,但也有少数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并未得到很好发挥,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里从突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选好用好负责人、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相结合、弘扬奉献精神和完善考核保障等方面,探讨激发内在动因,增强以支部为代表的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力,更好地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关键词: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力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18

中图分类号:G647;D26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93-04

加强高校党建工作,是高校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问题的政治保障、思想保障和组织保障。高校有着人才、智力的优势,更有做好党建工作的基础。据有关材料统计,我国现有约2600所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党支部和学生党支部分别约为10万个,师生党员数量约达400万人,党员教职工人数占到了教职工总数一半以上。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基础,起着确保大厦安全可靠的决定性作用。党的基层组织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的最基本单元,担负着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党的工作最终要落实到基层党组织。在高校党建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学校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和院系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通过强化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增强服务意识,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和战斗堡垒作用,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提供坚强保障,引领教职工思想,服务学校中心工作,团结带动师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担负起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

一、增强基层党组织活力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高校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高校党委抓党建主体责任得到落实,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完善,战斗堡垒作用显著发挥,广大干部和党员精神面貌改善,干事创业精神和工作实效得以提升。但具体而言,高校中的少数党支部甚至党总支的作用发挥并不理想,还存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政治功能弱化,政治核心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个别基层党组织忽视其政治核心作用,政治引领不强,政治功能没有得到发挥,只是简单地完成上级党组织要求的学习教育工作,战斗堡垒作用没有形成,甚至存在软弱涣散的情况。个别党员党性不强,缺乏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党员身份意识较弱,亮明我是共产党员的勇气不足,没有在普通岗位上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部分党员重视学术技术方面的发展,认为只有教学科研等业务工作才是实事、硬任务,能给自己的职务晋升带来直接好处,而党务工作是软要求、为虚功,个人得不到直接的实惠。

二是组织力弱化,党组织生活存在形式化问题。个别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不强,团结凝聚作用弱化,没有把党建工作放到应有的重要位置,重业务工作轻

收稿日期:2019-02-29

作者简介:苏炜(1962—),男,吉林长春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长期从事课程思政及意识形态工作的教学与研究。

党建工作,甚至以业务工作代替党务工作,没有很好地把党建工作与学校事业发展和教学科研工作相结合,两张皮现象明显。党内政治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规定,“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不严肃,效果不明显,有简单化、走过场等现象。

三是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思想认识不足,对做好党务工作的投入不够。个别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做好基层组织工作的思想认识不到位,承担党务工作热情不高,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的意识不强,缺乏搞好党建工作的热情。有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党务工作业务不精,做好党务工作的本领不够,缺乏责任意识,不愿担当、不敢担当,缺少工作主动性和自觉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不强,工作方式方法缺乏创新。

影响高校部分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从激发内在动因,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力出发,探讨加强以党支部为代表的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

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具体体现在基层党组织的号召力、吸引力、影响力和向心力的大小。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力的目的在于不断强化党的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提高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和全体党员政治思想觉悟和模范带头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受到群众认可和欢迎,能带领广大教职工完成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任务。

提升基层党组织活力是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有效途径,可以从政治功能的强化、组织力的形成、党组织负责人的选用、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和党员积极性的调动等方面入手,实现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力的提升。

二、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力的措施

(一)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

组织力是一种合力,是组织内各个方面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整体力,是设计组织结构和配备组织资源的能力,是组织结构力和组织文化力的综合体现。^[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严谨科学性的严密组织体系。近百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期都可以确保党的高度集中和稳定团结,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效抵御外界干扰破坏和各种不良影响,从而保证组织作用的发挥。

政治功能是一个政党的本质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and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先进性和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追求,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党性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最本质的区别。突出政治功能是提升组织力的关键,是组织力实现的前提。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发挥得如何,是否有效落实上级党委的决策部署,是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直接反映。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建设,是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基础。高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本质特征,把从严治党落实到基层党组织,落实到每一位党员,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政治方向,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员意识,确保党员在思想政治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自觉担起政治责任,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突出高校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要做到思想引领、鼓舞士气和凝聚力量,把教职工思想行动统一到完成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工作上。

党的领导作用是通过思想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来实现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2]“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3]对教职工思想的领导是党对高校领导的一项重要工作,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要体现在思想引领上,通过思想引领统一教职工思想和行动。高校的根本目的是育人,教职工是人才培养的具体实施主体,高校基层党组织要坚定教职工的“四个自信”,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团结带领广大教职工努力工作,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

鼓舞士气、凝聚力量是基层党组织的重要工作。基层党组织直接面对的是教职工个人,对存在各种思想问题和遇到工作生活困难的教职工,要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和组织优势,及时做好思想工作,化解矛盾,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大力弘扬正气,传播正能量,增强教职工的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在平凡岗位上做贡献的热情。

(二)选好用好基层党组织负责人

毛泽东同志指出,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

是决定的因素。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是基层党组织的第一责任人,在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发挥上起着重要作用。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政治站位高度、工作主动性与责任心,是影响基层党组织活力的重要原因。

选用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首先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陈希同志在《培养选拔干部必须突出政治标准》中谈到过,选拔党的干部,毫无疑问要突出政治标准,这是政党的政治属性决定的,是保证政党团结统一、实现政治主张和政治目标的必然要求。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必须是政治上的放心人,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能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团结群众,自觉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勇于担当,敢于负责,懂规矩守纪律,自觉做到廉洁自律。

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要精通党务工作。高校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应把党务工作作为重要业务工作来做,成为党务工作专家,开创性做好党务工作。高校是人才的聚集地,高校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还应是学术技术专家,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具有足够的权威和示范作用,形成在党务工作和教学科研工作中的双带头。

高校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队伍建设和教学科研骨干队伍建设要一同抓。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优势,处理好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和学术技术骨干结合培养的关系,在学术技术骨干中培养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激励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成为学术技术骨干。教育部党组颁布的《关于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高校既要注重把符合条件的学术带头人培养选拔为教师党支部书记,又要注重把有丰富党建工作经验的教师党支部书记培养成为学术带头人,并以此实现高校基层党建工作与教学科研工作双促进、双提高。

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的作用不能忽视。高校党委要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把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队伍,构建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核心作为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重点。重视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使用培养,加强理论武装,提升政治能力、履职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大局观念,形成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力量。

(三)把基层党建工作落到实处

基层党组织是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把工作落实到服务中心工作和建设队伍这两个核心任务上来。

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党建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中心工作、推动中心工

作。中心工作能否得到有效落实,是检验基层党组织党建服务和保障作用的重要指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这充分说明二者的重要性和特殊关系。

高校基层党组织工作效果如何,关键要看党建工作是否服务了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学校工作。高校作为育人单位,基层党组织要带领广大教职工落实党委决策部署,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交流等开展工作,实施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学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处理好党建工作与一般业务工作的关系,做到党建工作与一般业务工作同谋划同布置同落实。把学校核心工作和重点任务作为党建工作与一般业务工作的结合点,制定有效的考核措施,把党员在日常工作中的表现和基层党组织所在单位的一般业务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党建工作考核,发挥党员在日常工作中的模范带头作用,促进党建工作与一般业务工作的有机融合。

高校基层党组织在建设队伍方面,首先是建设一支坚强的基层党员队伍,成为完成教学科研工作的核心力量,关键时顶得上,急重任务攻得下,还要建设一支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党员为骨干的教职工队伍,把广大教职工的力量凝聚到学校发展上,汇聚到教学科研工作上来。

深刻认识新时代高校承担的育人使命,准确把握新时期教职工队伍思想、业务和工作状况,掌握受教育对象的新特点,创新高校基层党组织工作方式方法,把基层党组织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创新党员学习和党组织生活方式。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和传媒载体提高党员学习教育效果,开展问题研讨、事例分析等符合高校特点的组织活动,提高基层党组织生活质量。

(四)大力弘扬奉献精神

奉献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共产党人的重要精神特质和先进性的必然体现。党章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讲奉献是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任何时期、任何时候都要理直气壮地弘扬奉献精神,做到走在前,作表率。

“我们党近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赤诚奉献的历史。”“我们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赤诚奉献,体现在推动历史变革的伟大成就上,通过一个个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展

现。”^[4]进入新时代,要赋予奉献新的时代内涵,每位党员都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做到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甘于奉献,无怨无悔,求真务实,把工作做到极致,在平凡岗位上取得不平凡的成绩。

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形成充满正能量的精神激励环境,建立完善的褒奖制度,大力表彰先进,宣传感人事迹,用身边的人感动教育身边的人,产生激励干事创业的无形力量。

(五)完善绩效考核和保障机制

绩效考核是对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管理的一种有效方法。合理制定考核标准,将基层党组织党务工作与所在单位一般业务工作合并考核,使党务工作与教学科研工作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客观准确评价基层党组织工作和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职责完成情况,改进评价方式,提高考核结果反映实际工作情况的真实性,避免画勾投票等简单测评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用好考核结果,使绩效考核真正起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调动基层党组织和成员的工作积极性。

完善党务工作者技术职务晋升渠道。建立专职党务工作者技术职称系列或在技术职称晋级中充分考虑党务工作业绩,确保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专心做

好党务工作。加强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培养工作,完善干部选用机制,重视党务工作履职经历,使优秀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及时走上更重要的工作岗位。

三、结语

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力是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个方面,侧重激发内在动因,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离不开“严”与“治”,要坚持严字当头,做到真抓严管,长严长管,各级党组织要把治理落到实处,自觉担负起主体责任,各级纪委担负起监督责任,执纪问责,保障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有效形成。

参考文献:

- [1] 王华. 从六个方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8(3): 79-81.
- [2]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435.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94.
- [4] 丁薛祥. 大力弘扬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J]. 秘书工作, 2018(7): 4-1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Reflections on Invigorating of the Primary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 Wei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As the basic unit for implementing the policies, guidelines, and decision-making arrangem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primary party organizations of the CPC assumes a great many of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cluding the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Party members, as well the organization, publicity, cohesion and serving of the masses. The work of the Party will be ultimately carried out by the primary party organization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imary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en strengthened, and their vanguard roles have been enhanced. However, a few primary party organizations have not given full play to their roles yet, with urgent problems pending the final solutions. He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lighting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enhancing organizational power, selecting and using responsible personnel, combining party building work with central work, promoting dedication, and improving assessment guarantees, the article explores motivations that stimulate internal forces,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vitality, and give better play to the role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imary party organizations; vitality

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研究

王琦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发展规划处,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协同创新是促进高校、企业、政府等创新要素整合的一种科技创新新范式,探析运行机制是协同创新高质量开展的关键。高校应从动力机制、激励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协同创新运行机制,实现重大科技创新。

关键词:协同创新;运行机制;高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19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097-05

一、引言

协同创新是解决教育、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不紧以及科研资源配置分散、封闭、低效等问题的重要途径,对提高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科研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在构建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与内涵框架基础上^{[2][3]},进一步探讨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尤其是从高校角度分析协同创新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对高校弥补高层次人才紧缺的短板,提升创新能力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现状

协同创新的驱动力研究视角经历了由整体^[4]向个体^[5]的转变,整体上的三种驱动力是科技、市场和文化,但具体到高校的个体上时,其动力因素又包含自身特点。高校顺利开展协同创新,应充分发挥其中的积极因素避免消极影响,才能使高校的协同创新机制发挥最大效应。现有研究从动力机制^{[6][7]}、组织机制^{[8][9]}、利益机制^[10]等角度讨论分析了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给出完善的对策建议。但多数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来考虑,论述了运行机制与协同创新的作用关系,但对微观具体事务的管理则较少涉及,对于为什么需要这些机制以及怎样建立这些运行机制没有进行深入讨论,讨论较多的都是应然方面的,对实然方

面的涉及较少。

高校协同创新随着外界环境不断变化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其运行机制研究也需要不断深入,需进一步丰富理论探析和推动实践发展。本研究将透析高校协同创新的本质与内涵,提出和构建较为全面的高校协同运行机制,探索高校创新能力全面提升的新路径。

三、构建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

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是指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协同主体在协作过程中所涉及环节的运行原理和相关制度。根据协同创新的实践和系统性原理,为了高质量完成协同目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构建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动力机制、激励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保障机制。

1. 动力机制

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要建立有效的动力机制,进而提高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等各协同主体参与协作的积极性。首先,科学技术是推动高校协同创新的主要驱动因素。随着科学研究走向深入,每一个新的科技发现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技术作支撑,单靠个体的能力很难在科研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其次,市场是高校协同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当高校或科研院所研发某一项市场急需的技术时,也希望能够与企业合作,利用企

收稿日期:2019-12-07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河南科技智库调研课题“河南高校开展协同创新弥补高层次人才短缺研究”(HNKJZK-2019-46B)

作者简介:王琦(1965—),男,河南南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发展规划处教授,研究方向:教育理论。

业的优势,尽快使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第三,文化是高校协同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高校和地方文化深层次融合发展能够形成双方都认可的特色文化,实现高校和地方社会双赢发展。第四,利益驱动因素。不管是地方政府、企业,还是高校或科研院所,虽然他们所追求的利益点不同,但他们参与协同创新的一大动力都是来自利益。最后,实行社会价值因素。进行科学研究进而为社会服务是高校的社会任务之一,也是高校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任务。企业也承担着为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责,从这种意义上说,开展协同创新活动是高校和企业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

2. 激励机制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创新能力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在我们国家正在开展的协同创新工作中,应该引进激励措施,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开展协作,协同创新,实实在在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

知识产权是对科研成果、发明专利、计算机著作等在法律上的承认,是对科研工作者的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不管是高校、科研院所还是企业,都非常重视自己研发产品的产权。通过产权激励,可以从根本上激励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进行创新,进而使协同创新成为常态,推进协同创新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为提高我国创新水平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为了共同目的协作而开展的协同创新,各协同主体可以在协作过程中互通有无,利用对方的优势,弥补自身的不足,实现共赢。一方面,高校或科研院所可以利用企业的设备、资金、市场敏锐度等优势,开展科学研究,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在协作过程中利用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科研知识、科研人才以及先进的理论知识,指导企业走在业界前列。

文化具有激励作用,尤其是具有凝聚力的文化,其激励作用更为显著,比如硅谷文化对硅谷人的激励,使硅谷一度成为世界高科技中心。如果我们能够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发现并构建一种各协同主体都认可的协同创新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对创新主体的激励作用将会比简单物质激励要强大得多。在文化的激励作用下,各协同主体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发力,实现协同创新,推进创新能力的提升。

在协同创新整个过程中,仅靠各协同主体自己

的优势,仅靠他们对外在条件尤其是市场需求的把握,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政府不给予政策支持,不给他们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在当今时代,协同创新是不可能顺利进行下去的。具体来说,政府可以制定并推行一系列政策,比如税收优惠、简化办事程序、开设绿色通道等,为协同创新开路,大力推动各协同主体进行创新。同时,政府还可以对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进行资金支持,减免贷款利息或无息贷款,财政补贴或经济补助等措施,激励他们大胆进行创新研究。

3. 风险分担机制

所谓风险,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失败的可能性。在高校协同创新过程中当然也存在失败的可能性,即也存在风险。对高校协同创新的风险进行管理,探索协作过程中风险发生的大小、发生的时间、发生的概率等风险因素,就是风险分担机制,具体包括风险分担的主体、风险分担的客体以及风险分担的方法。

风险分担的主体,就是指在协同创新过程中承受和分担风险的机构或组织。因为主要是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进行协作,协同创新,所以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就是协同创新过程中风险分担的主体。高校或科研院所主要开展科研工作,进行知识创新,企业则运用这些科研成果,实现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为创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

风险分担的客体,其实就是指高校协同创新过程中各协同主体所遭遇的不同风险。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高校协同创新过程中可能遇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首先是技术风险,在协作过程的各个阶段都可能存在技术创新失败的可能性,技术突破历来就很难,出现失败是正常的。其次是市场风险,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不管是对企业,还是对高校,都存在很大风险,即企业所生产出来的成品,高校所输送的毕业生,已经不为市场所需,已经是过时产品,等等。第三是资金风险,当今世界,做任何事情离开资金支持可以说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在任何一个环节如果没有资金支持,创新工作随时有可能停止甚至破产。最后是道德风险,这里主要是指信用风险,在协作过程中,任何一个主体如果仅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做出的违背其他主体的事情,进而出现破坏协同创新的可能性。

风险分担的方法,就是指在协同创新过程中,依据什么原则或标准,如何将风险分配给高校、科研院所或企业。对于协作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风险,要加

强各方的责任意识,因为技术创新随时会出现失败或失误。在协作过程中,不管是企业还是高校,都要做好市场调研,协同主体之间要保持信息畅通,互通有无,这样方可减少市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对于可能出现的资金风险,一方面要加强监督,强化制度,严格按照财务制度进行资金使用;另一方面,对于创新基金,专款专用,垂直管理,做到不流失一分钱。对于协作过程中各协同创新主体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应该在协作之前制定好相关制度,确保信息对等公平,各协同方恪守信用承诺,促使协作方精诚合作,尽可能避免出现信任危机。

4. 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是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能够建立协作关系的前体和基本动力。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如何分配利益,对于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进一步开展创新工作,是否有动力继续合作,协同创新能否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利益的分类,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但是,基本上都认可这样一种划分方法,即把利益分为无形利益和有形利益。所谓无形利益,就是不能直接用货币量化的利益。在协作过程中产生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商标、荣誉、信息等都属于无形利益。所谓有形利益,就是在协同创新过程中获得的直接成果、产品以及实实在在的收益。对于利益的分配,应该事先根据各协同方在创新活动中的贡献大小制定利益分配办法,并由各合作方签字认可,一定要公平,不能存私心,否则直接影响协作关系是否能正常维持。

在分配利益时,公平合理至关重要。具体到协同创新主体的利益分配,主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协作过程中所有资源都是共享的,对于参与的协同方,都有权力获取资源使用资源。其次,参与协作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其身份是平等的,权力是一样的,因此,只要参与协同创新,都有权进行利益分配,任何人任何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他们的这些基本权利。在协同创新过程中,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都是参与主体,都有权进行利益分配。但是,还是应该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即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在协作过程中,你创造的多,贡献的多,理应得到的多。如果在整个过程中,你无所事事,想不劳而获是不可能的。不管你创造的是有形产品还是无形价值,只要有所贡献,就可以得到报酬,可以进行利益分配。

5. 保障机制

为了促使高校协同创新有序健康开展,需要制

定相关政策激励各个协同主体同策同力,推进协同创新深入发展,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

外部保障机制,主要是为了确保协同创新高质量完成任务,政府对协同创新做出的一系列制度政策,提供协同创新所必需的设备条件和相关资源,激励各个协同创新主体积极参与创新。高校协同创新,不仅仅是高校或科研院所自己本身开展的活动,而是与企业或地方政府合作,共同进行的创新活动,它是一个由多个主体参与的比较复杂的创新行为,因此,政府需要出台配套的政策甚至是法律来保障协同创新的正常运行,为协同创新构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调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科研积极性,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我国在协同创新方面的法律建设,仍处于初始阶段,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问题有:第一,维权成本很高,而侵权成本太低;第二,知识产权法、商标法普及不够,很多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第三,部分相关法律法规可操作性差。因此,鉴于我国科技创新水平低下的现状,迫切需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协同创新健康开展。最为重要的是,加强并落实高校或科研院所科研制度,制定高校协同创新激励制度或政策,为高校或科研院所开展协同创新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措施。同时,出台知识产权法、商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司法解释,保护科研工作者的劳动成果,激发他们创新积极性。

对于高校协同创新,不但要在法律层面给予保障,更要在政策层面给予具体的支持。如果能够出台一些政策倾斜于协同创新,并且政府督促措施的落实,就能够大大促进高校、科研院所或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高校协同创新,就是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或地方政府为了某个共同目的开展协作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各个参与方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因此,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沟通机制非常必要。高校通过与企业充分深入的沟通,可以了解企业需求和市场动向,进而可以根据社会需要有目的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这样,科研目的清晰,科研任务具体,可以调动科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推进科研进度,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通过充分的沟通,企业可以了解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科研能力、科研队伍和他们的科研优势,进而据此提出他们可以研发出的产品,这样对于双方来说都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和风险。

人才尤其是高端科研创新人才是高校协同创新是否成功的关键。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国非常重视人才,

重视人才的培养,重视人才的引用,重视人才的发展。我国历来就很重视人才的培养,设立有“长江学者”“黄河学者”“万人计划”“千人计划”等荣誉称号,奖励那些在科研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激励科研工作者不断进行科研创新。进入 21 世纪以来,为奖励在科技创新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或单位,国家又专门设立了五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即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由国家主席签署并颁发证书和奖金。这足以看出我们国家对科研人才的高度重视。2018 年国家对国家科学技术奖奖金标准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每人奖励 500 万元提升到每人 800 万元。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协同创新,推进高校协同创新,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要重视培养科研人才,还要使现有科研人才协同,即各个协同主体可以共享人才。制定人才共享机制,确保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实现人才共享共用,做到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不浪费人才资源。具体到高校协同创新,目前中国高校的教师大部分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他们作为国家科研创新人员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培养新一代科研人才方面,却遇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普遍的是,很多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教学实践能力欠缺,无法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通过教学传授给学生,导致现在很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普遍缺乏动手能力、缺乏创新能力、缺乏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因此,高校一定要加强对新进教师的教学能力培训,提升他们的教学水平。高校教师要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不能一味地给学生传输知识,而不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推行新的教学理念,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大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真正提高高校毕业生的质量,为创新活动培养大批后继人才。

作为高校协同创新的主体及中坚力量,高校在高校协同创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无可取代,因此要想推进协同创新的发展,就要不断高校自身的治理能力。只有高校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提高了,才能提升其知名度,高校教师或学生创新能力提升了,高校的科技水平提高了,才有更多企业愿意与其合作,才有更大的吸引力。首先,建立完善科研激励制度。所制定的科研激励制度,要能够起到提高教师和学生搞科研的激情,并能够激发他们持续进行科学研究。支持教师和学生进行学术交流,包含校内学术

交流以及校外学术交流,不但鼓励同专业学术交流,还鼓励跨专业学术交流,拓展教师和学生的研究视角,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激发他们的科研热情,推进创新的发展。其次,建立科研团队管理制度。在现有管理制度基础上,不断完善高校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的科研团队管理制度,打破传统的不利于协同创新的制度,建立跨学科跨学院跨学校跨单位的科研团队管理制度,能够使不同单位的科研人才,不同专业的人才,不同学科的人才,为了共同的发展目的,协作起来,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共同推进协同创新高质量发展。最后,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要考察高校协同创新发展过程、确定协同创新发展计划,必须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只有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才能更科学地考核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工作绩效,对协作过程中的科研人员、科研团队、研发产品等进行评价。这套科学的评价制度主要能够考核以下几个方面工作:教学能力、科研能力、科研信用、创新质量、贡献程度、人才培养、科学普及应用、创新程度、研发产品的竞争力等。

在高校协同创新过程中企业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企业为科研协作提供设备、资金和人力资源,共同研发,合力推进科研成果转化,生产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在当今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为了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速度,推进高校协同创新,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提高自身的治理能力,提高管理协同创新的能力。首先,企业要转变观念。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是信息时代,是互联网时代,企业,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要想发展,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必须拥有先进的核心技术,必须引进高水平的科学创新人才,必须进行科学研发才能生产出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才能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现实情况是,大部分企业缺乏高端的科研人才,更不能开展高水平的研发活动。因此,企业要转变以前单打独斗的观念,打开大门走出去,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协作关系,充分利用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科研优势,共同进行科学研究,根据市场信号共同研发,共同创新。其次,建立风险规避机制。在高校协同创新过程中,企业可能面临五大风险,即政策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合作风险和技术风险。其中对企业考验最大的是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政府能不能一贯支持协同创新,能不能出台切实可行的政策,对于企业来说具有很大的导向标作用。企业本身就是市场这个大海中遨游的个体,市场风云变幻,风险极大,企业能否在市场生

存,直接影响协同创新的成败,因此,企业一定要建立一套科学可行的风险规避机制,避免协同创新的失败。

四、结束语

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突破美国贸易战封锁的重要手段之一。高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水平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作为协同创新的重要一环可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贡献重要力量。本研究从高校创新能力提升出发,将高校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主要归纳为动力机制、激励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保障机制,并探析了每种机制的特点,以此找寻加快弥补高层次人才短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 [1] 张力.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意义和政策走向[J]. 教育研究, 2011(7):20-23.
- [2] 陈劲, 阳银娟. 协同创新的基础理论与内涵[J]. 科学学, 2012(2):161-164.
- [3] 何郁冰.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模式[J]. 科学学研究, 2012(2):7-16.
- [4] 陈劲, 阳银娟. 协同创新的驱动机理[J]. 技术经济, 2012(8):8-13,27.
- [5] 李祖超. 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探析:基于高校创新主体的视角[J]. 国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动态, 2013(11):81-84.
- [6] 夏红云. 产学研协同创新动力机制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 2014(6):21-24.
- [7] 于兆吉.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动力机制研究[J]. 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0):385-389.
- [8] 李爱彬, 经曼. 2011 协同创新中心组织管理模式与机制研究[J]. 现代教育管理, 2016(8):50-55.
- [9] 项杨雪, 梅亮, 陈劲. 基于高校知识三角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实证研究:自组织视角[J]. 管理工程学报, 2014(3):104-114.
- [10] 陶丹, 朱德全. 产学研协同创新中产出分享利益分配方式的优化路径[J]. 统计与决策, 2017(7):38-42.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Operating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Lead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WANG Qi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Department,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a new paradigm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at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ve elements such as universities,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s, while analysis of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is the key to high-qualit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o achieve maj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universities should build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from the aspects of motivation mechanism, incentive mechanism, risk sharing mechanism, benefi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Key word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perating mechanism; university

新时代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与社会工作的契合性研究

孙 慰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党委组织部,北京 100024)

摘要:新时代高职院校肩负着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历史使命,针对当前高职院校育人工作存在的问题,尝试将社会工作融入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之中,详细分析两者在服务理念、服务对象以及服务方法等方面存在契合性的基础上,提出“四融合”的实践路径,以此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关键词: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社会工作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20

中图分类号:G642;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102-05

在强化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道路上,加强高职院校育人工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对象,如何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的专业化、系统化、科学化水平是新时代高职院校育人工作急需思考的问题。本文拟运用社会工作方式方法介入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以求创新高职院校育人工作新路径,进一步开拓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的新局面。

一、问题的提出

(一)新时代的客观要求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等,提出全面推进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工作部署,深刻阐述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及要求。新时代高等院校要始终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等

“九个坚持”为统领,构建全新育人格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新时代赋予高等院校育人工作的重要历史使命。

(二)新形势的客观需要

从国外大环境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逐渐转为软实力的较量,西方的思想意识形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冲击着我国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企图通过思想渗透夺取思想阵地,此时也直接冲击着大学生所接受的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2]。从国内市场环境来看,生产技术革新、工业机器人以及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会导致整个制造产业对人才规格的需求产生革命性变化,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高职学生的精神生活中来,在这种形势下,高职院校育人环境的严峻性更为凸显。

(三)新对象的客观需求

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教育人才是所有高校育人工作者的初衷和使命。当前高校学生以“00”后为主力军,这就意味着新时代高校育人工作的主体为“00”后大学生。与此同时,作为以培养高技能专业技术型人才为主要办学方向的高等职业院校,育人工作服务对象更为特殊。高职院校的学生大多是

收稿日期:2019-12-25

作者简介:孙慰(1986—),女,北京人,公共管理硕士,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党委组织部讲师。

三、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与社会工作契合的内在逻辑

(一)服务对象契合

青少年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不满18周岁的为未成年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规定共青团团员年龄在14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2年墨西哥圆桌会议上提出青年为15至34岁年龄组人口。社会学将青少年看作是人社会化的一个必经阶段,认为“青年是从依赖成人的童年到能进行独立的、负责的成人活动的过渡”。我国国内较早开展社区层面青少年服务的社会工作机构将青少年服务对象的年龄界定为14岁至25岁。2018年标志着新世纪2000年出生的第一批孩子已经年满18周岁,可见无论从哪个层面对青少年的年龄进行划定,高职院校的在校学生都是属于青少年范畴内,此时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的对象也正是该批“00”后的孩子们。

青少年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实务领域,是将青少年作为工作和服务对象,通过运用关于青少年成长和发展的规律,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的理念、理论、方法和技巧,来最大限度地挖掘青少年的潜能,促进其全面健康发展,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的专业活动^[3]。著名心理学家艾德沃特对青少年时期身心状态进行了具体描述,以青少年开始至青少年结束,从生理、情绪、人际、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进行分析,通过针对青少年的特点,了解其需要,重点开展服务。

因此高职院校育人工作和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具有契合性,两者从本质上都是在做“青少年”服务工作,通过提供专业管理或服务,进一步激发青少年自我发展、自我成长的潜能,助力青少年成长发展。

(二)服务理念契合

从哲学上讲价值观体现了主客观之间的价值关系实质,即客体对于主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以及对主体发展的推动作用,价值观正确与否直接关乎个人与社会的发展。体现在教育工作中,则是指育人工作的实施,对学生与社会的生存及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所谓社会本位是指教育工作的实施,更注重以全体学生为对象的教育管理,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需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制定高校育人工作的实施内容,

因高考失利或自身能力学习不足,甚至有厌学情绪而被迫选择高职教育,这些学生学习基础相对薄弱,分析问题能力、思维能力有所欠缺,部分学生功利性较强,对“有用”的知识就学,“无用”的知识就拒绝听课。还有部分学生羡慕考入本科院校的同学,对自己的高职学历有些自卑,并错误的将原因归为外部环境,而不是自身努力程度不足,妄自菲薄,沉迷于网络游戏等不能自拔。正是因为高职院校育人对象的特殊,使得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从本质上不能等同于其他普通高校育人工作,而是需要结合当今国内外新形势,遵循高职教育规律,依照高职学生特点开展育人工作。

二、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的现状

(一)育人理念的滞后性

首先,高职院校仍存在重管理、轻服务、偏教育的理念,对待成绩优良学生予以更多关注,没有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其次,在教育管理环节,仍存在师生脱节、教与学脱节、教学管理与学生管理脱节等情况,学生、教师、教育媒介三者不能很好实现联动效应;第三,在育人内容层面,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尚未构建课程育人、科研育人、管理育人、资助育人、文化育人等全方位育人体系,未能根据客观实际及时更新充实育人内容;第四,在育人渠道层面,尚未充分发挥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及校外实践等功效。

(二)育人对象的多重性

首先,当今高职院校育人工作面对的都是“00”后出生的孩子,年龄在18至23岁之间,这一时期正是一个人一生中心理和生理变化最大的时期;其次,学生群体成分复杂,既有城镇子女,又有农村孩子;既有本地学生,也有外地生源;既有家庭条件殷实的富家子弟,也有经济拮据的贫困学生;第三,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参差不齐,有的思想先进,能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的则缺乏远大理想,得过且过,目标迷茫。基于以上学生的多重特点,高职院校开展育人工作时面临更大难度。

(三)育人队伍的非专业性

当前高职院校从事育人工作的主体以辅导员和班主任为骨干,每名辅导员至少要负责150名至200名学生,在工作中更多陷入烦琐的事务性工作,存在以管代教、以管理者为中心的情况,在开展育人工作中更多的是从学校的角度去考虑和解决问题,更多地强调解决问题,而忽视了再解决问题中与学生做深入细致的沟通,站在学生立场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一步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在此种情况下,个人的兴趣与需求处于次要位置^[6]。社会工作价值观受到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集体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成为一种系统的、成熟的引领社会工作者从事专业实践的指南,在我国社会工作价值观不仅借鉴国际上社会工作发展的经验,同时也体现着我国具体国情,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接纳和尊重、注重民主参与及个人和社会发展相结合为具体内容,体现着利他主义,并以“助人自助”为核心理念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在此中更加重视学生个体的发展,通过帮助有特殊问题的学生个体,增强学生解决问题能力,从这一点上来说社会工作价值观更倾向于个人本位,所谓个人本位是指教育工作的实施要以满足个人的需求作为基础,立足于个人兴趣与需要这一核心,组织推动各项教育活动的开展,以保证个体在接受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实现最高程度的完善及发展。

当然无论是社会本位还是个人本位,两者在教育价值观和社会工作价值观中并不是完全割裂开来,教育价值观只体现社会本位,社会工作价值观只体现个人本位,事实上两种本位都有所体现,只是侧重点不同。而且就目前我国教育状况来说,随着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的高速发展,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各自正在逐渐发生转变,两者都在寻找一种途径以达到平衡状态,最终实现有机融合。因此,笔者认为以上两种价值观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在功能上不但没有竞争关系,反而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作为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的主体,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教育工作的服务者,社会工作者也是社会服务的提供者,两者都是在践行服务工作价值观。从这个角度讲,新时代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与社会工作两者在服务理念上具有契合性,两者具有相似的核心理念和职业操守,“育人”即“助人”,并最终实现“自助”,从而动新时代社会建设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三) 服务方法契合

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师生在校园环境中学习和生活所形成的,与社会和时代密切相关的具有校园精神和人文环境的一种特殊文化,是新时代高校育人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载体。一般而言,校园文化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行为的文化。良好的校园文化具有积极的目标、价值、需求引导,规范行为举止、规章制度约束、道德制约的制约功能以及熏陶感

染功能,通过校园文化中的校风和校训等呈现出来的观念形态的文化,能深刻影响和感染每位学生,以获取更好的育人效果。社会工作非常重视社会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如生态系统理论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布朗芬布伦纳认为自然环境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影响源,发展的个体处在从直接环境到间接环境几个环境系统的中间,其中每个系统都与其他系统以及个体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个体发展。也就是说对于开展高职院校育人工作来说,要注重多重环境对学生个人的影响,如学生个人所在家庭的微观系统、所在学校的中观系统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宏观系统都需要全面进行分析,可见无论是校园文化建设还是生态系统理论,两者都是在强调环境对人的重要作用力。除此之外,社会工作的其他理论都对更好地开展高职院校育人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如优势视角理论,可以促使教育管理者以积极视角看待高职院校学生,相信学生个人具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认识自身拥有的潜在能力,从而解决问题。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角度讲,注重从学生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以及多种需求的急缓程度入手,及时分析了解学生内心想法,从而提升教育管理工作的有效性。从阿德勒的自卑理论角度讲,自卑感是与生俱来的,教育管理者需要帮助有此情况的困难学生加强科学认知,加强思想引导,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将不利因素转成为生活学习上的推动力,从而使人获得更好的发展。可见,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与社会工作在专业方法上具有契合性,通过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对进一步增强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专业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故高职院校在开展育人工作中可以借鉴社会工作领域中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以及专业方法,进一步突出“育人”即“助人”的服务理念,并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自助”根本目标。

四、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与社会工作的契合路径分析

为了更好地实现高职院校育人工作和社会工作的融合,笔者在两者“契合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四融合”路径,以求进一步指导高职院校育人工作实践。

(一) 理念融合

在之前的论述中,高职院校育人工作和社会工作都是在做“人”的工作,都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但高职院校育人工作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在育人工作中更多的是以学校为出发点,以学校规章制度为保障机制,以在学生是否遵

守学校规章制度为判断标准,更加突出对学生的管理,而忽视了对学生服务的理念。将社会工作“助人自助”服务理念融入其中,将人道主义精神更好地吸纳到现有的理论体系中,构建以人为本,回应需要,接纳和尊重,平等待人等为核心内容的育人工作价值观,强调对学生的尊重与理解,把学生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以学生需求为本”“以学术能力为本”“以学生素质为本”和“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把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育人工作的最高目标;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其合理的需要,考虑到高职学生的年龄特征、时代特征,从学生的内在需求出发,引导学生把自身的成才目标与学校的教育目标统一起来,把教育管理与服务体系结合在一起,构建新型师生关系和育人理念。

(二) 主体融合

面对繁杂而艰巨的工作任务,巨大的工作量使得辅导员在工作过程中更多的完成学生管理的各种问题,角色定位仅为管理者,经常站在学校的角度去考虑和解决问题。将社会工作者的多重角色融入其中对高效开展育人工作具有积极助推作用。一是教育者角色,一方面是教育实施者不再赘述,重点其同时也是受教育者,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辅导员队伍也需要不断提升自己、充实自己,通过多层次、多主题、多形式的校内外培训进一步掌握教育原则、方法,提升工作能力。二是协调者角色,在实际工作中还应协调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及时做好上传下达,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校建设,增强相互了解,减少分歧,进一步培养学生主人翁意识和健全学校民主决策机制建设。三是资源链接者角色,对学生最熟悉的莫过于辅导员,辅导员对学生的个人情况了解比较全面,这样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对学生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指导,辅导员要调动校内外各种资源,如积极和学生家长联系,了解学生的历史情况,又能将学生在校情况及时反馈家长,形成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合力;另一方面,根据高职教育特点开展校企合作,充分利用校外资源,加强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最终通过资源链接形成合力,共同做好高职院校学生育人工作。

(三) 过程融合

一是准备阶段。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是高职院校育人工作顺利开展的首要任务。在本阶段,辅导员者要充分了解高职院校学生的总体情况,制定学生个人在校期间的表现档案。通过提供带有“温度”的专业支持,进一步建立与学生的信任关系,让学生能够对教育管理工作开展的意义以及各

自角色的定位建立正确认知。二是资料收集阶段。本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全面系统的收集每个学生的基本材料。全面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是个案工作开展的基础环节,收集的资料越全面,越有利于辅导员从整体把握学生的问题,包含学生的思想状态、日常表现、同辈关系、家庭情况等;方式方法可以多样化,如以辅导员沟通、同学之间谈话以及借助标准化量表作为手段,对学生的理解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进一步加深与学生联系感情,从而做出整体性评估,帮助学生明确下一步服务方向。三是制定计划阶段。此阶段由辅导员与学生共同讨论确定服务方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工作计划以达成目标。制定介入目标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短期目标,分阶段完成并达成长期目标,在此过程中需要双方共同协商,且以尊重学生的意见为原则,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增强自我效能感。计划还要保持适度灵活性,尽可能多设想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否则一旦受阻很容易产生挫败感导致放弃。四是服务开展阶段。此阶段是开展育人工作的最重要的核心环节,一方面辅导员要直接帮助学生,深化自我认识,拓展潜能,提升其解决问题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间接环境的改善,结合生态系统理论“人在环境中”的理念,关注个体学生与周围环境、资源的联系,通过改善学生的周围环境以促进其更好地适应环境。五是评估阶段。在专业服务工作结束以后进行的效果评估和工作评价,是专业化服务必不可少的工作步骤,是检验育人工作成效的重要环节。以目标的实现程度、学生满意程度以及人力物力的资源投入效率等作为评估指标,为持续性开展教育管理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 方法融合

社会工作有三大专业方法,即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及社区工作方法,在实践中也有不少通过借鉴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介入学生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如我院社会工作教研室副教授刘春霞曾针对如何运用社区社会工作方法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开展研究^[5],也有针对厌学、心理困难等问题学生为服务对象,运用小组工作介入高职生抗逆力提升开展研究^[6](刘东乔),运用小组工作介入高职院校单招厌学问题研究^[7](赵振羽)等等,整体来讲,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介入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研究成果还是比较丰富,但仍缺乏科学体系的建立。笔者认为在高职院校开展育人工作中,可以针对育人内容的不同、学生实际要解决的问题等情况运用不同的社会工作方法。从学院大层面来讲,更适用于

社区工作方法,高校是具有特定的地理区域、一定数量的学生、具有相似的生活方式、具有共同信仰的社会集体,符合社区的构成要件,学生作为“社区居民”居住其中,高校作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者,更应侧重于优势资源的整合,进一步增强学生成员归属感,包括高校硬件资源(教学楼、图书馆、实训室)、软件资源(师资队伍、教学质量、学科建设)、理念建设(班风校风、校园文化)等,通过机制建设与活动开展,进一步提高学生对该社区的认同感,激发参与社区建设、关心社区发展的积极性。从系部建设、班级建设来讲,更适用小组工作方法,倾向于某一特定能力的提升,以10人左右学生构成小组单位,通过小组的内聚力、成员之间的影响力构成小组内动力从而推动小组内成员能力的提升,如九江Z高职院校通过小组工作介入高职生抗逆力提升问题,对学院296名学生进行抗逆力水平测试,之后招募10名高职生进行心理干预,通过小组工作方法介入有效提升了小组成员的抗逆力水平。个案社会工作方法,即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方式,对个人提供心理调整和环境改善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此种方法更适用于针对学生个体开展个别化服务,针对每一个学生的特殊情况和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增能工作。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苟小亮以高职顶岗实习生为服务对象,运用个案工作方法,顺利帮助该群体完成角色转换^[8]。

五、结束语

事实证明,在党和国家全面推进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在面对新时代客观要求、新形势客观需要、新对象客观需求时,鉴于社会工作与高职院校育人工作在服务理念、服务对象以及服务方法等

方面存在契合性内在逻辑,此时将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和技巧运用到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中,通过理念融合、主体融合、过程融合、方法融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价值理念的创新、理论视角的创新以及具体方法的创新。当然,要进一步论证本文所提论点的有效性,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予以尝试和探索,进一步推动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的创新研究。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17-10-28.
- [2] 徐友辉,何雪梅,罗惠文. 高职院校学生教育管理创新研究[M]. 四川: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12.
- [3] 陆士楨,王玥. 青少年社会工作[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4] 胡焯丹. 论教育价值观的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和谐融合[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14).
- [5] 刘春霞. 以社区社会工作方法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J]. 学习论坛,2015(9).
- [6] 刘东乔. 身心灵视角下小组工作介入高职生抗逆力提升的研究:以九江Z高职院校为例[D]. 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19.
- [7] 赵振羽. 高职院校单招招生厌学的小组工作介入研究:以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为例[D].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8.
- [8] 苟小亮. 高职顶岗实习生角色冲突个案工作介入研究[D].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Consistency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Work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SUN Wei

(Party Committe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Bei Ji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oral education. Aiming 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du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research attempts to integrate social work into the education work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in terms of service concept, service object and service method, it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e path of “four integrations”, 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ducation work; social work

教育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路径探析

肖志玲,徐 胜

(湖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摘要:教育供给侧改革为高等教育贡献了理念、思维和方法,也驱动着高校积极改革创新,解决教师队伍建设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匹配的结构矛盾。高校应立足新时代高等教育变革,强化顶层设计和系统衔接,优化教师队伍建设的供给体系,不断创新有利于高素质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在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实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提供坚强的智力保障。

关键词:教育供给侧改革;教师队伍建设;优化供给;创新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21

中图分类号:G420;G6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107-05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系统思维和问题导向,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期发展主线。教育供给侧改革是供给侧理论在教育领域的重要运用,体现的是供给与需求的内部结构性变革,契合了当前高等教育由外延式向内涵式发展转型的整体趋势。作为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高校教师队伍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自身建设需要着重解决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匹配的结构矛盾。因此,借鉴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理念、思维和方法,对于破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难题、推动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教育供给侧改革及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义

随着高等教育日益从注重规模、数量转变到注重结构、质量和效益,教育供给侧改革亟待通过一系列深刻的体制机制改革,厘清教育主体之间的责任边界和管理机制,优化教育资源与服务的供给方式,“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1]。现有的教育供给体系决定了政府、学校都是教育的主体,而不同的教育主体面临的改革任务不同,关注点也各有侧重。其中,高校端供给侧改革的重心是“加强供给能力建设,即扩大有效人才供给,提升人

才培养结构和质量对人才市场变化的适应性”^[2]。对于高校而言,教育供给侧无论怎样改革,要想确保人才供给的效果,都必须依靠教师队伍去实施、去实现。因此,教育供给侧改革呼唤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积极改革创新。

在新时代高等教育变革的驱动下,“面对人民群众更加迫切对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向往,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既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一项根本性的民生工程”^[3]。作为推动高校转型发展的核心力量,教师队伍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思想创新和文化遗产等重要功能都需要通过教师队伍来实现,他们不仅是高校办学目标的承担者、办学质量的提升者、办学特色的践行者,而且是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简称《意见》),站在强师兴国的战略高度,明确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对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出总体部署。教师队伍在教育供给侧改革中承担着重要职责,对推动高校持续健康发展起着支撑和保障作用。优化教师资源供给,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高校加强内涵

收稿日期:2019-12-16

作者简介:肖志玲(1972—),女,湖北孝感人,硕士,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

式发展的关键。

二、教育供给侧改革凸显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困境

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优化教育供给体系,使之更好地与需求端相匹配。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就必须锻造一支政治可靠、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协同育人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高校如何引才、育才、用才,让优秀教师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一方面要求教师队伍回应社会需求的自我提升,另一方面需要教师队伍培养与供给的改革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才培养规模和质量不断攀升,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人民群众在教育方面的获得感明显增强,人才队伍素质全面提升。高校毕业生已经成为我国新增人力资源最重要的发动机,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特别是通过“985”工程、“211”工程、“双一流”建设的实施,我国高校的办学理念、科研成果、教师队伍、人才培养质量不断优化。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千人计划”“万人计划”、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级教学名师等等成为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许多高校不断完善人才引进、培养、激励、使用的体制机制,顺应人才发展和社会发展需求。

但也应该看到,在高等教育加速发展的同时,部分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需求与供给之间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衡状态:有些高校要么过于重视需求侧,教师想要“吃什么”就“喂什么”,“缺什么”就“给什么”,忽视了教师综合素质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使得教师队伍建设缺乏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在引领教师发展自身合理需要方面着力不够;要么仅重视供给侧,将主要资源集中配置在教师教学、科研能力的培养上,忽视了教师群体对价值实现和全面发展的内在需求,造成教师队伍建设供给被功利性、事务性的目的所裹挟,影响了教师队伍建设的实效性、系统性和长效性。

此外,部分高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思想观念落后、人才管理粗放、体制机制僵化等问题,“重学历轻能力”“重身份轻岗位”“重资历轻业绩”“重引进轻培养”“重增量轻存量”“重个人轻团队”“重称号轻使用”等现象仍较突出,高层次人才匮乏、国际化程度不高、人才创新活力和动力不足仍是制约众多高校发展的瓶颈;为了吸引人才,部分高校盲目引进,互挖人才,人才攀比、引而不用等现象还比较普遍,“高校人才军备竞赛”与“职业跳槽教授”并存,人才恶性竞争加剧^[4]。这导致高校人才成本

急剧增长,无助于学科发展,一定程度上还打击了现有人才的工作积极性^[5]。同时,部分高校还没有从思想上行动上顺应高校内涵发展所需的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教师队伍建设现状与高校内涵式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高校应对内涵式发展的自适应能力问题,高校的办学理念还未与时俱进,教师队伍建设与办学规模、办学空间、办学层次还有待匹配和适应;二是统筹兼顾问题,教师队伍建设的分类管理及其与高校发展定位、人才培养规格、学科建设特色没有真正实现同步建设、统筹推进;三是平衡协同发展问题,不同地区、不同高校之间以及高校内部不同院系之间教师队伍建设的工作理念、方式方法的不平衡、不协同的问题还比较突出^[6];四是教师的核心素养问题,教师的核心素养,说到底就是适应高等教育改革以及成为卓越教师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从根本上说,我国大学与实践一流大学最大、最核心的差距是师资水平整体性、绝对性的差距”^[7];五是优秀教师的成长机制问题,教师遴选和培养机制、保障机制、共生机制尚不健全。因此,坚持教育供给侧改革,就必须科学分析教师队伍的突出问题,突破僵化、老化、固化的思维模式,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

三、教育供给侧改革促进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途径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8]坚持教育供给侧改革,落实党管人才主体责任,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全面提升人才管理服务水平,是加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促进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障。

(一) 谋大局,落实党管人才主体责任

高校党委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决策者和领导者,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道路自信的关键。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党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的职能,为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定指针、谋大局。

一是强化高校党委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高校党委要树立科学人才观,以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为契机,加强教师队伍综合研判,认真做好专门研究,积极探索党管人才的实现路径和体制机制。党委书记、校长谋划学校发展时必须优先谋划人才发展,带头抓好人才工作,不松手、不懈怠,把支持教师发展落实到高校发展的方方面面。建立学校党政负责人为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结合高校的发展战略、办学定位、学科和教师队伍建设现状,定期研究教师队伍建设项目。对于涉及人才工作重大事项、人才队伍建设规划、高层次人才引进和调出等重大议题,需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大力摒弃那些不合时宜、束缚人才成长和作用发挥的观念、制度、政策,着力破解教师队伍建设项目中的难点问题和体制障碍。进一步强化高校党委在人才工作中的政治责任,完善党委领导、上下联动、协调有力、整体推进的大人才工作格局。

二是强化人才工作规律意识和责任意识。人才工作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高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学校党委既要把握高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原则,以德领才、以德润才,用当其时、用人所长;同时还要了解市场经济规律特别是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和价值规律,以社会需要为参照,科学定位教师需求、市场供求和学校发展需要。打破体制障碍,善于放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善伸援手;承认劳动差别,尊重人才价值,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9]。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明确各级党政负责人是教师队伍建设项目第一责任人,科学配置人才工作资源,构建校领导、学校中层干部和学院党政负责人、学科带头人引才育才的多级责任制。对任人唯亲、浪费人才、埋没人才、造成人才大量流失的单位,要认真调研摸底,经查属实的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三是强化学术委员会和专家教授的学术担当。学术委员会作为高校最高学术机构,应与学校行政管理划清界限:行政部门负责学校的日常运行,学术事务则由学术委员会评估。学术委员会要在教师队伍建设项目规划、学术评价、制度构建和资源配置中发挥学术决策作用。同时,专家教授应充分体现学术担当精神,积极发挥他们在人才评估、举荐、培养、使用等方面的作用,引领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突破以往线性管理模式,不断完善对高层次人才遴选、申报、评价、考核和职称评审、岗位聘任的“同行评议”制度。

四是强化教师教书育人的光荣感使命感。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师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时代重任。法国大文学家雨果的名言用在教师身上毫不为过:“花的事业是尊贵的,果实的事业是甜美的,让我们做叶的事业吧,因为叶的事业是平凡而谦逊的。”学校要引导教师做理论学习的先

遣队和政治上的明白人,明确教师的政治底线和纪律红线,遵守“学术无禁区、讲台有纪律”,在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方面丝毫不迁就不退让。提高教师开展“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学科思政”的意识和能力,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增强价值判断、选择、塑造的能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和教书育人的能力,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二)促改革,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教师队伍建设的着眼点在供给端,只有创造、提供新供给,才能适应、满足新需求。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项目中,提高教师队伍供给质量,是决定教育供给侧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激励机制,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要求高校站在新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布局中,全面梳理教师队伍建设的制度设计和系统衔接,建立健全教师发展保障制度,不断创新有利于优秀教师成长发展的体制机制。

一是创新教师聘任制度改革。强化岗位聘任意识,科学设置岗位,构建以分类管理和预聘—长聘—专聘为核心的教师队伍管理体系,设置预聘岗位、长聘岗位和专聘岗位;以科学有效的制度督促受聘教师提高政治素质、业务素养和师德水平,形成公平竞争、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教师管理机制。实行分类指导和分类考核,在当前通行的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成果推广型等四类教师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类别,制定不同岗位分级聘用条件和岗位职责,体现不同岗位不同侧重和需求。建立高层次人才长周期聘任和评估论证制度,建立专职科研队伍建设机制和项目聘用制人员管理模式。鼓励高校加大聘用工程背景和行业企业工作经历的教师引进力度,支持兼职聘用高水平专家学者和优秀企业家到高校担任学生指导教师。

二是创新人才梯队引进培养机制。大力实施高端人才引进工程,制定可行的人才评价体系和富有挑战性的人才工作目标,注重引才与引智相结合,长聘与短聘相结合,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将学术精湛、创新能力强、业绩突出的人才不拘一格吸引过来并发挥作用,以优质的教师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组织效益;对特殊高端人才注意把握“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完善柔性引才模式,拓展个人引进、团队引进和特殊引进三种路径。严格教师选聘入口关,实行

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双重考察,将教师入职岗前培训和助教制培养作为教师开展教学的必备条件。以人为本,搭建教师成长培育多元化平台,满足教师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需求,实现教师研修和终身学习的常态化。制定青年英才开发计划,通过青年教师导师制、教育培训等个性化培育方案,特别是将学术基础扎实、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人才重点培养;对精英人才和重点团队实施人才特区政策,重点培养、大胆使用,将他们推上学术核心位置,充分尊重他们在团队构建、成员遴选、考核使用等方面的意见,便于他们带领团队承担大项目,出大成果。在有条件的二级学院可分类分步扩大学院在引进、培养和使用、评聘等方面的自主权限。着力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打通国内高校之间乃至国际高校之间交流互访、学术研讨、观摩考察零障碍、常态化途径,为高校教师创造更多更优质的学习机会,大力提升教师职业发展能力。

三是创新人才开发配置和评价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加大激励,严格考核。积极构建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社会多方参与的师德监督体系,将师德建设作为高校教育质量督导评估的重要内容,将师德考核作为教师年度考核和评优评先的核心因素。建立健全教师聘期考核激励机制和教师聘用、晋升、流转通道。根据本校事业发展和教师发展需求,充分发挥职称评审正面引导的“指挥棒”作用,加快提升青年教师学历层次、实践能力和国际化水平,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鼓励教师潜心研究、长期积累;综合考评教师在的社会服务工作和在政策咨询、智库建设等方面的贡献,完善多元化的职称晋升体系。在教师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方面,可以弱化教师年度考核的层次指标,以师德师风和教学科研业绩量为主。强化聘期考核,在师德合格的基础上,侧重不同类型不同层级教师教学科研业绩标志性成果。这样既克服教师重科研轻教学问题,又避免科研上的“短平快”行为。完善PI团队运行机制,通过人才、项目、基地的有机结合,构建多元融合、协同创新的团队运行机制。

四是创新薪酬制度改革。政府应进一步放宽绩效工资总量控制,逐步扩大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高校应充分发挥收入分配制度的杠杆作用和激励机制,建立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以“按劳分配、责酬一致;绩效优先,兼顾公平”为基本原则的关系合理、机制健全、调控有力、秩序规范的考核体系、多元薪酬分配机制和收入增长机制,进一步激发教师成

长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现有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之外,与多元化用人模式相对应,积极探索年薪制、项目制、聘期制、协议制等多元多种薪酬分配方式。同时,逐步推动薪酬分配重心下移,下放二级单位分配自主权,加大二级单位二次分配力度,有效推动校院两级科学管理^[10]。

(三) 优环境,全面提升教师管理服务水平

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云:“人才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人才能不能引进来、能不能留得住、能不能干得成,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能否想人才所想、急人才所急,做好全方位服务,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帮助实现教师价值的最大化。

一是夯实“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高校要倡导“教师主体、人才第一”的氛围,突出教授治学、学术至上,赋予高层次人才学术活动决定权、学科梯队用人权、项目经费支配权和团队成员考核评价权。培植“追求真理、追求科学、崇尚学术、勇于创新”的校园文化,不断增强教师的职业光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时时、事事、处处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二是围绕“人才链”构建“服务链”。高校应以全方位服务,构建高层次人才认同且有归属感的运行机制,为人才引进和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制订更加优惠的教师引进激励政策,出台更多接地气、有吸引力的务实举措,积极推动引人政策落地见效。积极为人才潜心干事提供人性化的服务,围绕人才落户、社会保障、子女就学、配偶安置等实际问题,实行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务,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工作和生活困难,解除教师的后顾之忧。

三是提升教师管理服务质量。实施管理干部能力提升工程,打造一支信念坚、品行好、业务精、作风实、服务优的管理服务队伍,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将管理寓于服务中。特别是针对教师硬性管理出现的问题,本着能放尽放、能活则活的原则,提供柔性服务,让教师心情舒畅地发挥作用。建立学校领导联系高层次人才和对接大型企业制度,定期深入高层次人才工作室,与他们交朋友,现场办公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主动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带领高层次人才赴联系的大型企业推进校企合作,促进成果转化,引导高层次人才做教学示范者、科研示范者、行为示范者、责任示范者。

四是加强资源科学配置。高校资源有限,在开源节流的同时,要把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在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这一刀刃上。特别是要加强人才和团队

的实验室建设、工作生活条件建设,加强有针对性的资源配置。在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时,应贯彻“以岗定薪、优劳优酬、业绩导向”的工作基调,绩效分配向一线教师倾斜,向为学校人才培养和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倾斜。

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需要高校下大力气祛除痼疾沉珂,开拓强师之道。只有坚持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建立科学、规范、制度化的教师管理服务体制和运行机制,才能引好才、育好才、用好才、聚好才,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实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提供坚强的智力保障。

参考文献:

- [1] 庞丽娟,杨小敏. 关于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和建议[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10):12-13.
- [2] 何晓芳,宁桂玲,孟长功. 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矛盾:以工科教育为例[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8(4):96-102.

- [3] 张烁. 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大国良师怎样炼成[N]. 人民日报,2018-09-06.
- [4] 张洪. 构建高校党管人才创新机制[J]. 人民论坛,2016(23):107-109.
- [5] 夏云,戴绯. 基于成本效益评价的高校教师人力资源配置优化[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9(3):328-332.
- [6] 郭俊.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高校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探析[J]. 河南教育,2017(8):17-19.
- [7] 罗儒国.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教师发展的困境与突围[J]. 当代教育与文化,2019(3):76-83.
- [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11.
- [9] 张玉象,胡军华. 习近平党管人才原则新探[J]. 新疆社科论丛,2017(3):17-21.
- [10] 李晓东,顾正娣. 新时代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探索[J]. 中国成人教育,2018(9):140-143.

(责任编辑 许峻)

On the Ways to Build Teacher Tea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Supply - side Reform

XIAO Zhiling, XU Sheng

(College of Marxism,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68,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supply - side has contributed ideas, thinking and method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t also has driv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to actively reform and innovate, focusing on resolving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between supply - side and demand - sid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ase themselves on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strengthen top - level design and system connection, optimize the supply system of teachers' team construction, and constantly innovate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 quality talents. While promoting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also provides a strong intellectual guarantee for the goal of training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Key words: educational supply - side reform; teacher team building; optimizing supply; innovative path

MOFs 材料对 CO₂ 的吸附分离研究进展

李玉玲, 赵雅雯, 王承祥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 主要介绍近年来金属-有机框架(metal-organic frameworks, MOFs)材料对 CO₂ 吸附分离方面的研究进展, 着重探究了对 MOFs 材料进行金属位点和有机配体的修饰后, 对 CO₂ 吸附分离性能的影响, 并对现阶段 MOFs 材料所具有的不足之处进行分析, 展望 MOFs 材料应用于 CO₂ 吸附分离的未来发展, 以期对 MOFs 材料气体吸附分离性能有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 金属-有机框架材料; CO₂ 的吸附分离; 研究进展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22

中图分类号: O641.4; O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0)01-0112-05

近年来, 过量的化石燃料燃烧和树木的砍伐导致大气中 CO₂ 浓度急剧增加, 全球平均温度升高, 引发冰川融化, 旱涝频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由于禁止 CO₂ 过量排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完成的, 所以人们采用多种方法对 CO₂ 进行吸附分离和催化转化^[1]。目前用于降低 CO₂ 浓度的方法有开发可循环的新能源来代替传统的化石能源和以 CO₂ 为起始原料将其转化为有用的化工产品两种方法。后者较典型的方法包括低温蒸馏法, 电化学吸附法, 化学吸附法, 物理吸附法, 以及膜分离法等^[2]。在这些方法中, 物理方法能耗小但效率低, 化学方法高效但在吸收解吸的过程中能耗较高, 大量使用吸收剂, 损耗严重, 且会产生二次污染^[3]。因此开发新的可循环吸附材料对 CO₂ 进行吸附和分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金属-有机骨架材料(MOFs), 又称多孔配位聚合物, 是由无机金属中心(金属离子或金属簇)和有机配体自组装形成的具有三维周期性网状结构的晶态多孔材料^[4]。其结构多样, 易于设计, 具有较高的孔隙率和比表面积, 金属位点开放, 具有化学可修饰性, 在气体分离和储存、药物传递、多相催化、传感、储能等方面^[5-12]的应用非常广泛。除了上述优

点之外, MOFs 材料所具有的规则孔道结构对客体分子的扩散十分有利, 所以对气体的吸附分离和储存是 MOFs 材料最早被提出时的最主要应用方向, 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用 MOFs 材料对 CO₂ 进行捕集、利用、封存的技术(CCUS), 不仅可以高效降低 CO₂ 的浓度, 而且可以将其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化合物, 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本文简要综述了近年来 MOFs 材料对 CO₂ 的吸附分离性能方面的研究进展, 重点综述的是构成 MOFs 材料的金属和有机配体的修饰, 对 CO₂ 的吸附分离性能的影响。

1 MOFs 材料的修饰方法

对 MOFs 材料进行修饰的方法主要分为对金属位点和有机配体进行修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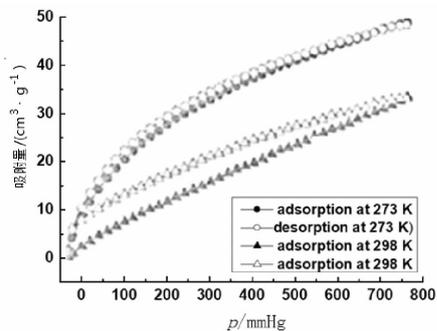
对金属位点进行修饰所依据的原理是: 一般情况下 MOFs 材料中金属原子的配位模式处于饱和状态, 金属原子配位客体分子, 因空间原因或者人为干扰将这些客体分子活化去除后, 会产生开放金属位点或者不饱和金属位点, 这些金属位点可以提高材料整体对气体的吸附分离能力。不稳定的金属位点因金属自身的原因, 通常情况下具有一定的路易斯酸性或碱性, 根据酸碱中和原理, 与 CO₂ 等酸性气

收稿日期: 2019-12-12

作者简介: 李玉玲(1979—), 女, 河南信阳人, 博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的研究。

体会产生较强作用力,进而提升 MOFs 材料的 CO₂ 吸附分离性能。

对有机配体进行修饰所依据的原理是:有机配体主要是以苯环或氮杂环结构连接节点,通过直接合成或后合成的方法把官能团引入 MOFs 材料的主体框架中。这里的官能团主要包括酸性(如 -OH, -SO₃H),碱性(如 -NH₂, -NH, -N),以及其他官能团(如 -NO₂ 或者具有位阻效应,手性选择性的复杂官能团),其中显碱性的官能团对显酸性的 CO₂ 气体表现出极好的吸附能力和选择性,以亚氨基、氨基、芳香族氨基和脲基等效果最为突出。



1.1 对金属位点进行修饰

周振^[13]首先通过一系列的反应制得有大 Π 共轭效应的 H₄TCPE。再将 H₄TCPE,六水合硝酸镍和 L-脯氨酸与 N,N'-二甲基甲酰胺/水溶液混合,得到金属-有机纳米管状化合物 Ni-TCPE1。随后把 L-脯氨酸用量增大两倍,即可得到三维框架化合物 Ni-TCPE2。这两种化合物具有开放金属位点,CO₂ 与裸露的金属位点之间的偶极-四极相互作用,为 CO₂ 化学转化提供了合适的活性位点和反应的空间。测定不同温度下两种化合物对 CO₂ 的吸附曲线(如图 1),直观体现出了两种修饰后化合物良好的 CO₂ 吸附性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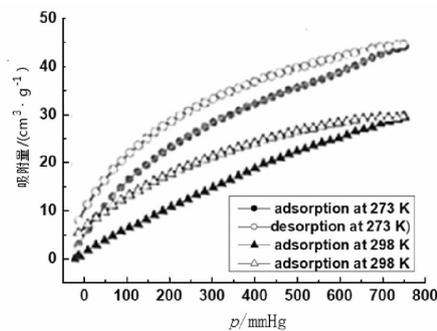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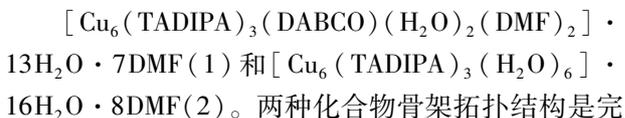


图 1 Ni-TCPE1(左)和 Ni-TCPE2(右)在 273K 和 298K 时 CO₂ 的吸附曲线

刘兵^[14]把金属有机多面体当作超分子构筑模块,采用溶剂热法,将硝酸铜作为金属源和 H₄TADIPA 以自组装的形式合成了两种含典型 MOP-1 笼状结构的 PMOFs 材料,结构式分别为



两种化合物骨架拓扑结构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其配体的扭曲角度不一样(如图 2),这主要是因为化合物 1 中的两个铜之间存在 DABCO 配位,DABCO 的存在使化合物 2 的骨架密度和孔隙率明显大于化合物 1,故化合物 2 比化合物 1 的 CO₂ 吸附能力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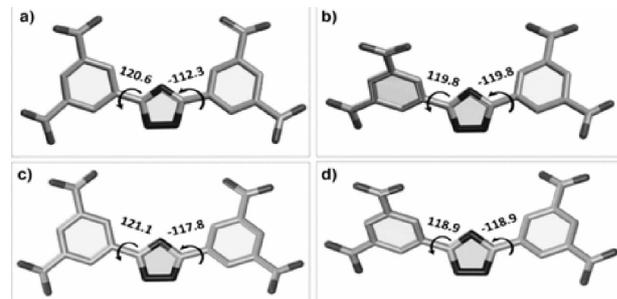


图 2 化合物 1 和化合物 2 的有机配体扭曲角度示意图

张新鲁^[15]根据已有文献合成了具有微孔结构的 UTSA-16,并用该物质作为母体,用离子交换的方法制备出一系列 M-UTSA-16(M:Li,Na,K,Rb,

Cs),用 PXRD, TGA, ICP, BET 等手段对这些材料的性质进行表征,结果显示:K-UTSA-16(如图 3)对 CO₂ 表现出最大的吸附量,在环氧化物与 CO₂ 生成环状碳酸酯的催化转化反应中,Li-UTSA-16 显示出最高的催化滑移和循环稳定性(如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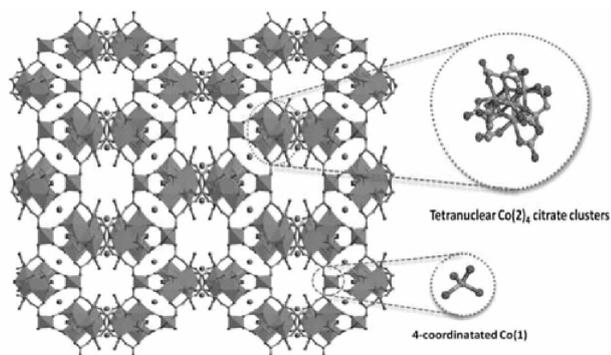


图 3 K-UTSA-16 的结构图

1.2 对有机配体进行修饰

高碧轩^[16]分别选用吡嗪、联吡啶、4,4'-偶氮吡啶、1,2-双(4-吡啶基)乙烯和 N-(4-吡啶基)异烟酰胺五种柱撑配体,利用溶剂扩散法制备出五种 CPL 系列多孔 MOF 材料,测定 CPLs 对 CO₂ 等单组份气体静态吸附性能。结果显示,CPLs 的孔径与 CO₂ 尺寸相近,因此具有较高的 CO₂ 吸附量和吸附分离选择性(如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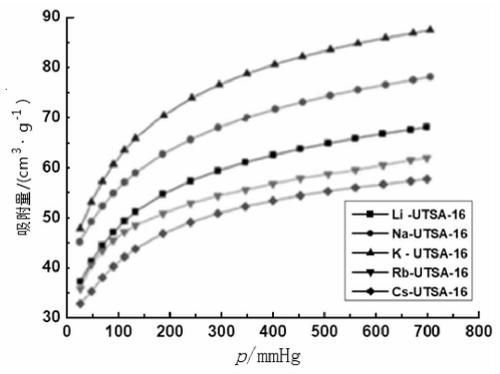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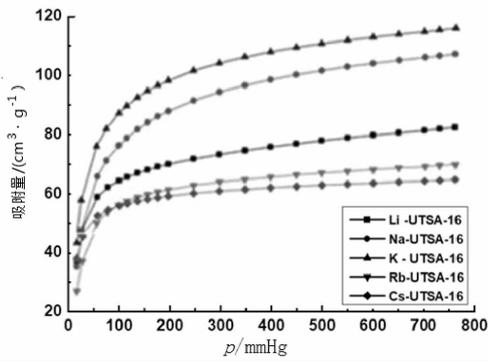


图4 M-UTSA-16与CO₂在273K(左)和298K(右)的反应吸附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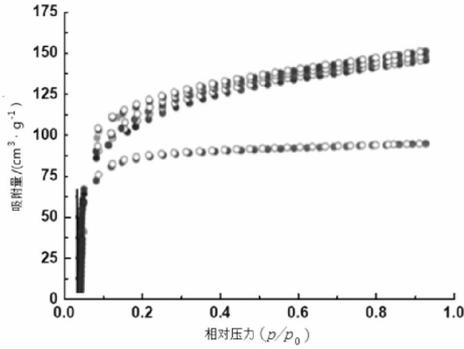


图5 5种CPL系列多孔MOF材料在-78°C下对CO₂的吸附等温线

兰健文^[17]等人利用溶剂热法制备了两种具有较高活性的多孔MOFs催化剂(如图6),并探讨了其对CO₂的催化转化作用。一种是以硝酸镍作为金属盐,咪唑和羧酸作为有机配体合成的Ni-MOF

催化剂。通过一系列的表征发现,该Ni-MOF对CO₂表现出良好的吸附性能,吸附量为59.5cm³/g。另一种是以硝酸锌作为金属盐,三聚氰胺(MA)和2-噻吩羧酸(H₂tdc)作为配体合成的多孔Zn-MOF催化剂。进行一系列表征后发现,该催化剂吸附性能极其优异,吸附量可以达到108.9cm³/g(如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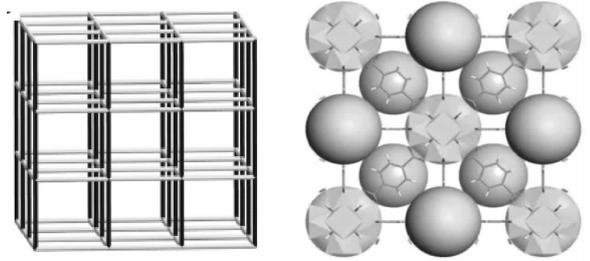


图6 Ni-MOF(左)和Zn-MOF(右)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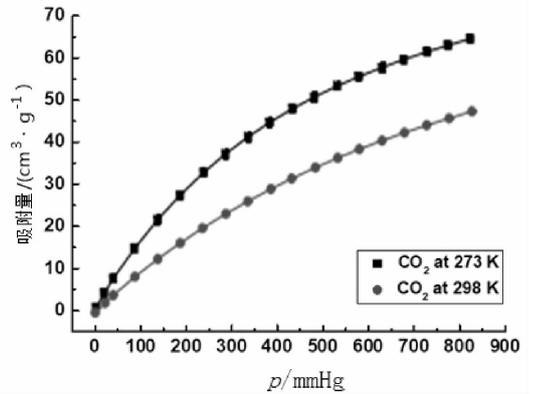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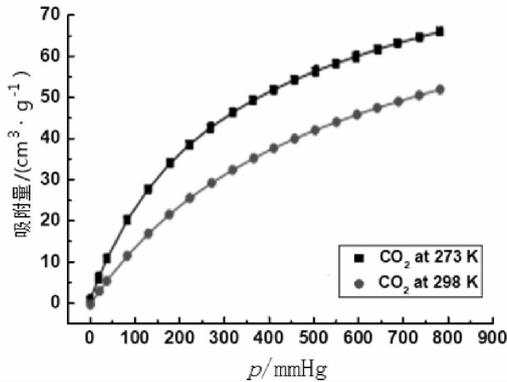


图7 Ni-MOF(左)和Zn-MOF(右)对二氧化碳的吸附曲线

汪书天^[18]等制备出了三种有显著吸附性能差异的MOFs材料Cu-BTC, MIL-68(In)和Uio-66,其中锆系MOFs材料Uio-66具有较高的配位数(如图8),故其具有良好的二氧化碳吸附作用。之后又对Uio-66及进行配体的氨基改性,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表明,加入一定量的乙酸调节剂时,改性后的氨基产品尺寸均一,形貌规整,对比之前的Uio-66样品二氧化碳的吸附能力明显提高,但其热稳定性有所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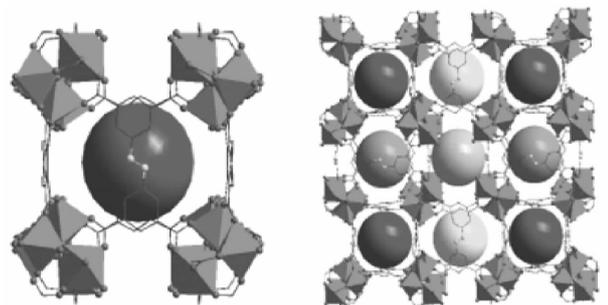


图8 Uio-66中Zr₆次级结构单元(左)与其3D结构图(右)

周猷^[19]等人利用硝酸钴和 3, 3', 5, 5' - 偶氮苯四甲酸有机配体以及硝酸铜和 H₄CDDA 有机配体进行反应,用溶剂热法合成具有立方晶系的金属有机框架材料 Co₃ABTC 和有三种不同孔道结构的金属有机框架材料 [Cu₂(L)(H₂O)₂] · (DMF)₈(H₂O)₄(ZJU-12)。因 Co₃ABTC 中有三个形成了

次级结构单元的 Co 原子,通过羧酸与有机配体连接构成三维多孔结构,故该物质在活化之后,对二氧化碳气体的分离表现出良好的性能。后一种物质相较前一种物质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其工作容量相当于前一种物质的三倍,具有更好的 CO₂ 吸附分离能力(如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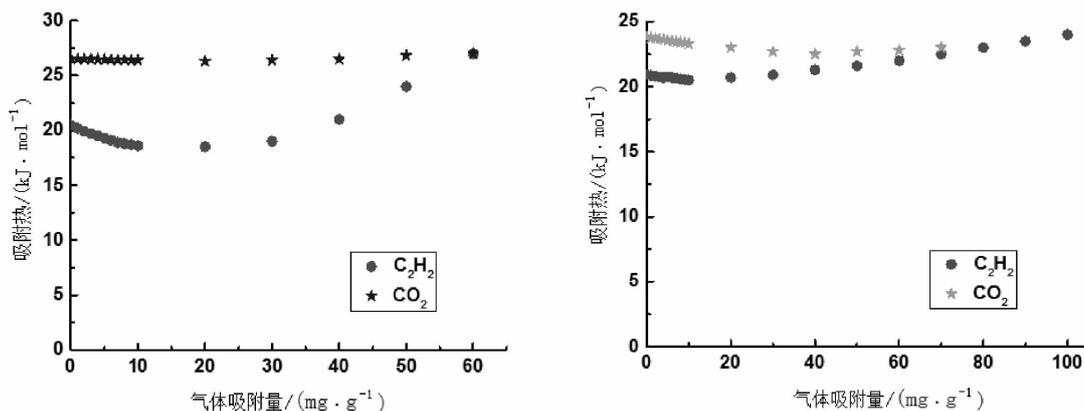


图 9 Co₃ABTC (左)和 ZJU-12 (右)对乙炔和二氧化碳的等温吸附能图

2 MOFs 材料存在的问题

MOFs 材料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其稳定性并不理想,稳定性主要包括水稳定性、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三种。关于水稳定性,大部分 MOFs 材料虽不溶于水,但是其在水或者水蒸气中并不能稳定存在,所以不能用于催化含水或水蒸气的反应;关于热稳定性,普通的 MOFs 材料在 500℃ 以上的高温下是不能稳定存在的,所以不能用于催化较高温度的反应;关于化学稳定性,大部分的 MOFs 材料在强酸、强碱或强还原性环境下结构会遭到破坏进而失活。当前对 MOFs 材料的研究仍处于基础阶段,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3 结论与展望

修饰后的 MOFs 材料被广泛应用于气体的吸附分离中,但是 CO₂ 在热力学上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惰性气体,相对其他气体吸附分离较为困难,用 MOFs 材料对 CO₂ 气体进行吸附分离仍具有局限性。未来可以重点探究对 MOFs 材料进行有目的的调控和改性,定向得到目标产物。对 MOFs 在气体吸附分离方面的实践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蒋梦蝶. 若干阴离子柱撑超微孔材料的制备及其气体分离性能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 2018.
 [2] 李修. 胺基功能化的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 2017.
 [3] 赵倩,冯东,汪洋,等. 配位不饱和金属-有机骨架材料

吸附 CO₂ 的研究进展[J]. 化工进展, 2017, 36 (5), 1771 - 1781.

[4] 原洋. 氮杂环羧酸配体 MOFs 材料的构筑及性质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 2019.
 [5] HUANG Y B, LIANG J, WANG X S, et al. Multifunctional Metal - Organic framework Catalysts: Synergistic Catalysis and Tandem Reactions [J].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2016, 46, 126 - 157.
 [6] CHANG Z, YANG D H, XU J, et al. Flexible Metal - Organic Frameworks: Recent Advances and Potential Applications [J]. Advanced Materials, 2015, 27 (36), 5432 - 5441.
 [7] LI Y L, ZHAO Y, WANG P, et al. Multifunctional Metal - Organic Frameworks with Fluorescent Sensing and Selective Adsorption Properties [J]. Inorg. Chem. 2016, 55, 11821 - 11830.
 [8] LI Y L, ZHAO D, ZHAO Y, et al. Synthesis, structure, and magnetic and catalytic properties of metal frameworks with 2, 2' - dinitro - 4, 4' - biphenyldicarboxylate and imidazole - containing tripodal ligands [J]. Dalton Trans. 2016, 45, 8816 - 8822.
 [9] LI Y L, ZHAO Y, KANG Y S, et al. Syntheses, Structures and Sorption Properties of Metal - Organic Frameworks with 1, 3, 5 - Tris (1 - imidazolyl) benzene and Tricarboxylate Ligands [J]. Cryst. Growth Des. 2016, 16, 7112 - 7119.
 [10] LI Y L, HUA J A, ZHAO Y, et al. Metal - organic frameworks with 1, 3, 5 - tris (1 - imidazolyl) benzene and dicarboxylate ligands: Synthesis, anion exchange and gas adsorption [J]. Microporous and Mesoporous Materials, 2015, 214, 188 - 194.

- [11] WANG Y F, WANG L P, LI Y L, et al. Three Cd(II) complexes based on pyridine containing mercapto-triazole and aromatic multi-carboxylates: Syntheses, structures and luminescent properties [J]. Journal of Molecular Structure, 2018, 1173, 612-619.
- [12] WANG Y F, WANG L P, LI Y L, et al. Four Zn/Pb Complexes based on Pyridine containing Mercaptotriazole Ligand: Syntheses, Structures and Luminescent Properties [J]. Journal of Inorganic and General Chemistry, 2018, 644, 1164-1171.
- [13] 周振. 四羧酸配体构筑的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及其催化转化二氧化碳研究[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7.
- [14] 刘兵. 基于路易斯碱位点四齿羧酸桥联配体 MOFs 材料的构筑及吸附性能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8.
- [15] 张新鲁. 碱金属调控 UTSA-16 的制备及在二氧化碳转化和一氧化碳氧化中的应用[D]. 南昌: 南昌大学, 2018.
- [16] 高碧轩. 柱撑型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的制备及其气体吸附分离性能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8.
- [17] 兰健文. Ni-或 Zn-MOFs 的制备及催化 CO₂ 固定转化合成环状碳酸酯[D].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7.
- [18] 汪书天. MOFs 材料催化 CO₂ 甲烷化反应的研究[D]. 天津: 天津大学, 2018.
- [19] 周猷. 四羧酸构筑的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气体吸附分离性能的研究[D]. 杭州: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18.

(责任编辑 姚虹)

Advances in Adsorption and Separation of CO₂ by MOFs Materials

LI Yuling, ZHAO Yawen, WANG Chengxiang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Scienc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recent advances in the adsorption and separation of CO₂ by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are reviewed. The effects of metal sites and organic ligands modification on the adsorption and separation of CO₂ were investigated. The shortcomings of MOFs materials at present are analyzed,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OFs materials used in CO₂ adsorption and separation is prospected in order to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gas adsorption and separation performance of MOFs materials.

Key words: metal-organic framework materials; adsorption and separation of CO₂; the research progress

圆红冬孢酵母脂肪酸合酶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康 静,刘玉青,胡焕焕,丰慧根

(新乡医学院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摘 要:对圆红冬孢酵母脂肪酸合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构建系统进化树。利用 MEGA7.0 软件构建出系统进化树,应用 ProtParam, ProtScale, TMHMM, SigalP, Kinasephos, PredictNLS, NPSA 和 SMART 等生物信息学方法,分别对蛋白质的理化性质、跨膜区、信号肽,以及核输出信号、二级结构和结构域进行预测。结果表明,该脂肪酸合酶在进化过程中相对比较保守,是亲水性蛋白;它存在跨膜结构;它没有信号肽但有核输出信号;它的二级结构有多个 α -螺旋与延伸链;它有 6 个保守结构域。

关键词:圆红冬孢酵母;脂肪酸合酶;油脂合成代谢;生物信息学分析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23

中图分类号:S4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117-04

基于生物质转化生产的生物柴油是当今最为理想的可再生燃料之一^[1]。圆红冬孢酵母(*Rhodospiridium toruloides*)是目前研究较多的高产油脂菌种,作为生物柴油的原料,与藻类或植物生物柴油相比,它可在胞内积累油脂、类胡萝卜素等^[2],它不仅是清洁能源,更具有可持续生产微生物类脂和工业化广泛应用的潜力。该菌株经酯交换产生生物柴油^[3],但反应速率慢,反应体系中过多的甲醇和副产物甘油还会影响脂肪酶的活性及稳定性^[4]。对圆红冬孢酵母油脂代谢中的关键酶脂肪酸合酶(Fatty acid synthase, FAS)的结构特征及理化性质进行预测,可以为下一步构建产油工程菌奠定基础,也为生物柴油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原料油脂资源和废弃物的再利用提供新的思路^[5]。

1 材料与方法

1.1 FAS 基因序列的 Genbank 检索

在 NCBI 的 Genbank 数据库中检索圆红冬孢酵母脂肪酸合酶,其基因序列编码为 XM_016415817.1,氨基酸序列编码为 XP_016272387.1。

1.2 FAS 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及预测

1.2.1 构建系统进化树

在 NCBI 数据库中检索 20 种生物 FAS 氨基酸

序列,利用 MEGA7.0 软件对 20 种生物相应的氨基酸序列进行遗传距离的分析,构建出 FAS 的系统进化树。

1.2.2 使用在线生物信息学预测工具

ProtParam:对 FAS 进行理化性质的预测,如分子量、等电点、原子构成、氨基酸组成、摩尔消光系数、半衰期、脂溶指数等;ProtScale:对 FAS 进行亲水参数的预测;TMPred:对 FAS 进行跨膜区域的预测;SigalP:对 FAS 进行信号肽的预测;PredictNLS:对 FAS 进行核输出信号的预测;SOPMA 和 PredictProtein:对 FAS 进行蛋白质二级结构折叠类型的预测分析;SMART:对 FAS 进行蛋白质结构域的预测与分析。

2 结果

2.1 FAS 进化树的构建

使用邻位相连法(Neighbor-joining, NJ 法)构建 FAS 的系统进化树,如图 1 所示。将 20 种 FAS 的氨基酸序列对齐后,使用软件 MEGA 7.0 构建系统进化树。由图 1 可知,该 FAS 与红酵母属的菌种都具有较高同源性,且进化位置上也比其他菌种要高。

收稿日期:2019-12-15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161202210404)

作者简介:康静(1980—),女,河南巩义人,博士,新乡医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微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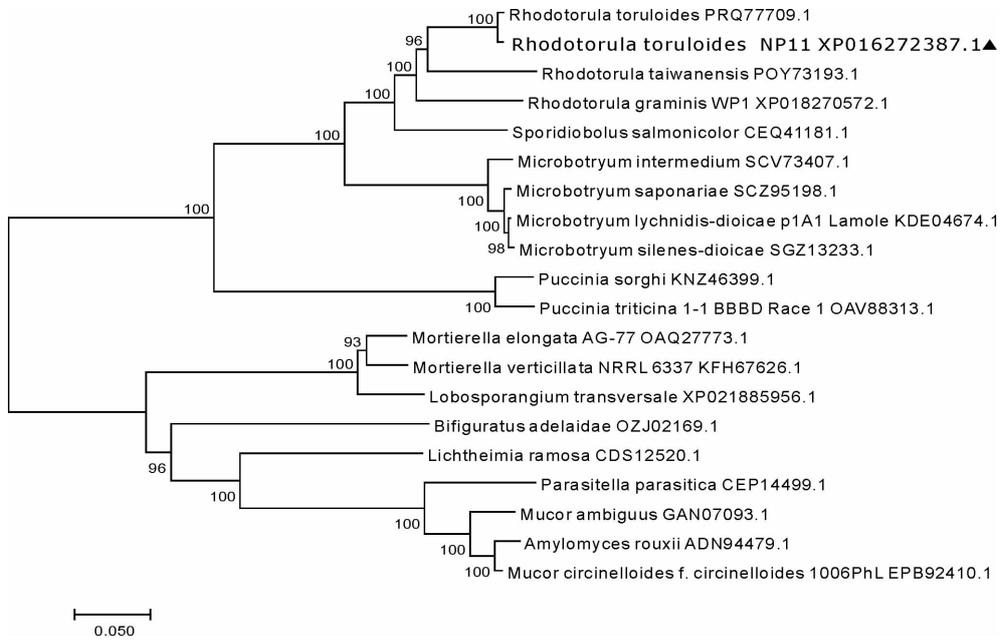


图1 圆红冬孢酵母 FAS 系统进化树

2.2 氨基酸的组成

利用在线软件 ProtParam 对该 FAS 编码的氨基酸组成进行初步预测分析。如图 2 所示,预测结果:该 FAS 编码区的氨基酸数目为 2928 个,其中含量较多的氨基酸为 Ala(311 个,10.6%),Leu(260 个,8.9%)和 Gly(250 个,8.5%)。该 FAS 氨基酸中,带正电的总数残基/酸性氨基酸(Arg + Lys = 320)少于带负电的总数残基/碱性氨基酸(Asp + Glu = 338)^[6]。它还含有 17 个半胱氨酸,说明该蛋白可能具有二硫键。它没有 Pyl(O) Sec(U)(B)(Z)(X) 氨基酸。该 FAS 的氨基酸组成分别为:Ala(10.6%),Arg(4.5%),Asn(3.0%),Asp(5.0%),Cys(0.6%),Gln(4.0%),Glu(6.5%),Gly(8.5%),His(1.9%),Ile(5.4%),Leu(8.9%),Lys(6.4%),Met(2.3%),Phe(3.5%),Pro(4.9%),Ser(6.7%),Thr(6.1%),Trp(1.1%),Tyr(3.1%)以及 Val(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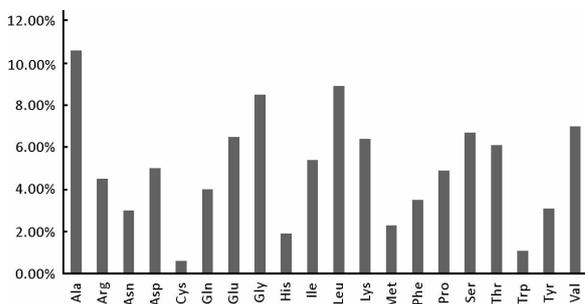


图2 圆红冬孢酵母 FAS 的氨基酸组成分布图

2.3 蛋白质的理化性质

利用在线软件 ProtParam 对 FAS 理化性质的各

个参数进行初步预测分析,得到结果如下:该蛋白的原子构成为 $C_{14186} H_{22484} N_{3858} O_{4275} S_{84}$, 原子总数 44887, 相对理论分子量为 318178.90 道尔顿, 理论等电点 pI 值为 6.39。对于该蛋白的摩尔消光系数 (Molar Extinction Coefficient), 以 $M^{-1} cm^{-1}$ 为单位, 在水中 280nm 处测定。假设该 FAS 所有的胱氨酸残基以半胱氨酸的形式出现, 即形成二硫键, 此时该蛋白的消光系数值为 $312590L/(mol \cdot cm)$, 0.1% 浓度 (1g/L) 的吸光度 (A₂₈₀) 为 0.982; 假设二硫键全部打开, 该蛋白的消光系数值为 $311590L/(mol \cdot cm)$, 0.1% 浓度 (1g/L) 的吸光度 (A₂₈₀) 为 0.979^[6]。当其成熟肽 N 端为 Met 甲硫氨酸时, FAS 的估计半衰期在体外哺乳动物网织红细胞为 30h, 在酵母体内半衰期大于 20h, 在大肠杆菌体内半衰期大于 10h。该蛋白的不稳定系数为 38.47, 可知该 FAS 为稳定蛋白 (定义当蛋白质的稳定系数 < 阈值 40 时, 其在溶液中性质稳定)。该蛋白脂肪指数为 86.64, 亲水性为 -0.199。对于蛋白质的疏水性/亲水性, 定义为氨基酸序列中全部氨基酸的亲水值总和与氨基酸数量的比值。负值越大亲水性越好, 正值越大疏水性越强。该 FAS 亲水性负值, 表明此蛋白为亲水性蛋白。

2.4 疏水性分析

蛋白质疏水性/亲水性的预测和分析是进行蛋白质二级结构预测及功能域划分的一个必要过程^[6]。运用在线软件 ProtScale 来预测该 FAS 氨基酸序列的疏水性/亲水性。由图 3 得预测结果: 该 FAS 多肽链中, 第 2316 位的氨基酸 Arg (R) 具有最

低分值 -3.178, 第 1919 位的氨基酸 Gly (G) 具有最高分值 2.400。依据氨基酸分值越低亲水性越强, 分值越高疏水性越强的规律, 可以看出第 2316 位的 Arg 亲水性较强, 第 1919 位的 Gly 疏水性较强。整个肽链中亲水性氨基酸多于疏水性氨基酸, 因此整个多肽链表现为亲水性, 可判断该 FAS 是亲水性蛋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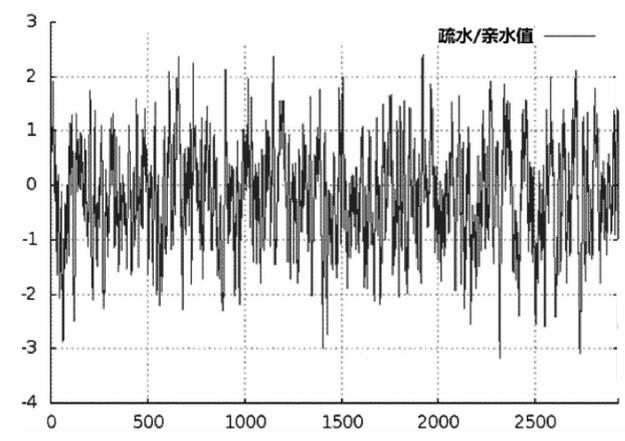


图3 FAS 疏水性预测分析结果

2.5 FAS 跨膜预测

用 TMpred 工具对该 FAS 氨基酸序列的跨膜结构域进行预测。横轴为氨基酸位置, 纵轴为跨膜预测得分值, 定义预测分值低于 500, 显示不具有跨膜结构。从图 4 中可得, 对该 FAS 氨基酸序列跨膜的预测分值有多个超出 500, 因此推测该蛋白具有跨膜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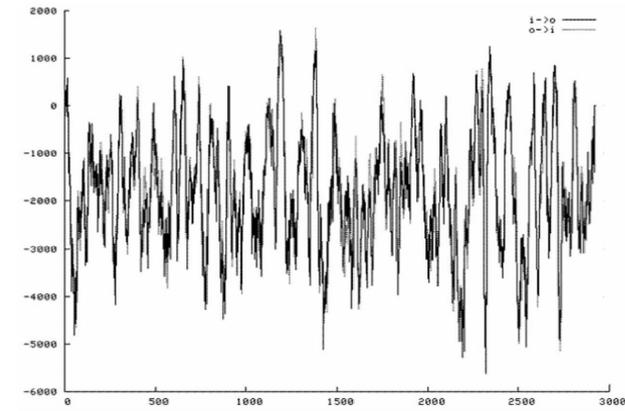


图4 FAS 跨膜预测结果

2.6 信号肽分析

使用 SignalP 对该 FAS 进行信号肽预测, 得出该 FAS 的 Signal peptide probability 预测值为 0.167, 小于临界值, 未发现信号肽序列 (图 5), 因此推算该 FAS 为非分泌性蛋白 (Non-secretory protein)。

2.7 FAS 核输出信号分析

使用 PredictNLS 进行核输出信号预测。从图 6 中可得该蛋白的核输出信号 (nuclear export signal, NES) 分值中有超过阈值的, 因此可以认为该蛋白质具有核输出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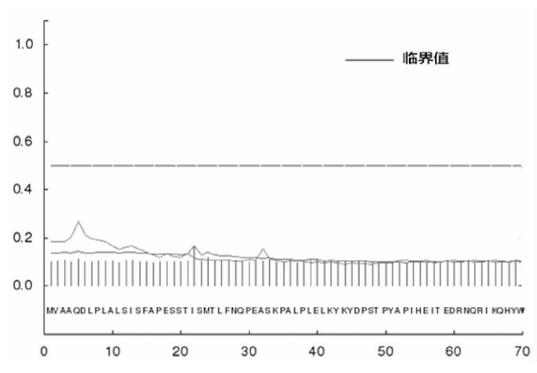


图5 FAS 信号肽预测图

因此可以认为该蛋白质具有核输出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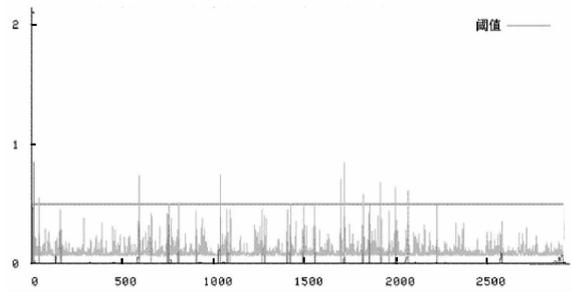


图6 FAS 的核输出信号预测结果

2.8 蛋白质的二级结构分析

对该 FAS 的二级结构进行预测, 结果显示该 FAS 可能包含的二级结构及各个数据分别为 α -螺旋 1302 个, 占 44.47%; β -折叠 418 个, 占 14.28%; β -转角 184 个, 占 6.28%; 无规则卷曲 1024 个, 占 34.97%。 α -螺旋及无规则卷曲是 FAS 二级结构中最大量的结构元件, 而 β -折叠和 β -转角则散布于整个蛋白质中。

2.9 蛋白质的结构域分析

利用 SMART 软件在线预测该 FAS 的结构域, 分别是位于第 87 到第 210 位氨基酸以及第 364 到第 480 位氨基酸的脱水酶 (Dehydratase) 结构域, 位于第 495 到第 872 位氨基酸的乙酰转移酶 (Acetyl transferase) 结构域, 位于第 2218 到第 2444 位氨基酸以及第 2541 到第 2662 位氨基酸的酮酰合酶 (Ketoacyl synthase) 结构域, 位于第 2812 到第 2924 位氨基酸的 4'-磷酸泛酰巯基乙胺基转移酶 (Phosphopantetheinyl transferase, PPTase) 结构域。

3 讨论

脂类作为生化大分子的一员, 可以说它已经不仅仅是组成微生物细胞膜的重要部分, 还是生物体细胞内许多重要生化反应的参与者和调节者。它构成了细胞的完整性并参与了免疫防御机制^[7,8]。

生物油脂作为一种生活中的保健食品, 其反应作

用已经有较多学者进行研究。随着不断出现的各种多不饱和脂肪酸(GLA, EPA, DHA, AA)在抗肿瘤、抗衰老、降血脂、降糖等方面作用的逐步研究,微生物油脂的应用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和值得期待的前景^[9]。

在对新能源的开发中,生物柴油作为主要能源备受瞩目。它作为与现有石化柴油非常相似的能源,是将甘油三酯转酯化得到的脂肪酸甲脂(或乙脂),其原料可再生产,且属于清洁能源,成本上也不用经常更换和清洗发动机,其分析方法也多种多样,因此受到广泛关注^[10]。目前生产生物柴油的原料主要为植物油或废弃食物油,其生产依赖植物油资源。

在适宜条件下,某些微生物可在体内积累单细胞油脂,例如细菌、酵母和藻类等,尤其是产油脂酵母生长速率快,油脂含量高^[11]。圆红冬孢酵母产生的油脂具有与植物油类似的脂肪酸组成,是生物柴油生产的潜在替代品。它作为脂滴细胞生物学和可持续化学生产的模型具有巨大潜力。利用生物发酵的方法生产脂肪酸及其衍生物被认为是一种可再生且环境友好的生产模式^[12]。

本实验对圆红冬孢酵母油脂代谢生化反应中重要的脂肪酸合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通过研究该蛋白的理化性质及结构特征,以便预测其在油脂代谢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为下一步构建产油工程菌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刘洪迪. 细胞自噬对圆红冬孢酵母油脂积累的影响[D]. 大连:大连工业大学,2017.
[2]孙文怡. 基于农杆菌介导的圆红冬孢酵母遗传重组系统

的研究[D].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7.
[3]SINGH G,JEYASEELAN C,PAUL D, et 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iodiesel produced by acidic transesterification of lipid extracted from oleaginous yeast *Rhodospiridium toruloides*[J]. 3 Biotech,2018,8(10): 1-13.
[4]黄凤洪,危文亮,郭萍梅. 我国生物柴油原料选择与制造技术发展对策[C]//2008 中国生物质能源技术路线标准体系建设论坛论文集,2008(6):157-162.
[5]刘泽君. 圆红冬孢酵母发酵生产微生物油脂的研究[D]. 天津:天津科技大学,2013.
[6]俞海洋,陈伟,倪德群,等. 肠道病毒71型六安地区分离株VPI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及B细胞表位预测[J]. 安徽医科大学学报,2012,47(3):233-240.
[7]BINENBAUM Z,KLYMAN E,FISHOV I. Division-associated changes in membrane viscosity of *Escherichia coli*[J]. Biochimie,1999,81(8-9): 921-929.
[8]BOGDANOV M,DOWHAN W. Phospholipid-assisted protein folding: phosphatidylethanolamine is required at a late step of the conformational maturation of the polytopic membrane protein lactose permease[J]. EMBO J,1998,17(18): 5255-5264.
[9]RATLEDGE C. Fatty acid biosynthesis in microorganisms being used for Single Cell Oil production[J]. Biochimie, 2004,86(11): 807-815.
[10]邓利,谭天伟,王芳. 脂肪酶催化合成生物柴油的研究[J]. 生物工程学报,2003(1): 97-101.
[11]王琦. 圆红冬孢酵母(*Rhodospiridium toruloides*)21167菌株产油脂的研究[D]. 中国海洋大学,2012.
[12]高教琪,段兴鹏,周雍进. 酵母细胞工厂生产脂肪酸及其衍生物[J]. 生物加工过程,2018,16(1): 19-30.

(责任编辑 姚虹)

Bioinformatic Analysis of Fatty Acid Synthase from *Rhodospiridium Toruloides*

KANG Jing, LIU Yuqing, HU Huanhuan, FENG Huigen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3,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atty acid synthase of *rhodospiridium toruloides* and constructs the phylogenetic tree. The phylogenetic tree was constructed by using MEGA7.0. Bioinformatics methods containing ProtParam, ProtScal, TMHMM, SigalP, Kinasephos, PredictNLS, NPSA and SMART, are used to predict its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transmembrane domains, signal peptides, nuclear export signals, the secondary structure and domains. The result shows that fatty acid synthase is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i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it is the hydrophilic protein; it has transmembrane structure; it has no signal peptide export signal, but it has nuclear export signal; its secondary structure has multiple α -helix and extended chains; it has six conserved domains.

Key words: *rhodospiridium toruloides*; fatty acid synthase; oil anabolism; bioinformatic analysis

一种基于中值滤波和小波变换的 图像去噪处理算法研究

关雪梅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基础课教研部, 辽宁 大连 116052)

摘要:图像中存在的噪声会影响到后续的模式识别、边界检测、边界提取、分割图像等图像处理过程,因而必须要采用一定的方法来降低图像的噪声。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基于中值滤波和小波变换相结合的组合滤波方法来消除图像中的噪声,经过实验论证,此种组合滤波方法在消除混合噪音的同时还可以很好地保留图像中的细节和边缘信息,比单一的小波变换方法和中值滤波方法去噪效果要好。

关键词:中值滤波;小波变换;图像去噪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24

中图分类号:TP39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121-04

1 引言

数字图像在传输和处理过程中,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各种干扰,形成图像中的噪声,影响图像质量。为了达到后续图像处理所要求的清晰度和准确度,需要在进行模式识别、边界检测和提取,以及分割图像之前进行图像噪声消除。数字图像噪声消除是图像处理的第一步,在图像处理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根据噪声的性质可以把图像噪声分为两类:椒盐噪声和高斯噪声。图像处理领域去噪比较理想的算法有中值滤波法、神经网络滤波算法、邻域平均法及小波变换法等等。采用中值滤波方法对含有椒盐噪声的图像进行处理时,可以很好地保留图像的细节特征,所以受到广泛的使用,但中值滤波对高斯噪声的效果不是很明显,抑制性能弱。数字图像小波变换是采用数学方法来处理图像的新方法,它是一个数值逼近的问题,将母函数扩展和平移到新的函数空间,按照准则找出最佳的逼近方法,从而实现原始图像信息与噪声信息的区分^[1]。由于小波具有多分辨率分析等特性,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小波变换与中值滤波方法相结合的方法来消除图像中的噪

声,达到了很好的图像去噪效果,优于以往传统图像去噪方法。

2 中值滤波图像去噪算法

中值滤波是非线性滤波方式的一种,它的思想是用邻域像素周围所有像素的中值替代当前像素点的像素值。由于中值滤波方法在图像计算处理过程中无须统计数字图像的特征,因而数据处理比较方便。在一定的条件下,比线性滤波处理方法可以更多一些保留图像细节、抑制图像模糊,对消除图像干扰和扫描图像噪声更实用有效。但对于细节较多的图像,尤其是点线和尖顶细节较多的数字图像不适合采用此方法。

中值滤波算法是在1970年由Tukey提出的一种一维滤波器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起来的。中值滤波算法的基本原理是将数据邻域点内的中值替代该邻域中一个点的值,它采用的滤波器是基于次序统计的,从而实现信息恢复,它是一种非线性的典型的滤波器^[2]。使用中值滤波器进行数字图像处理要预先设计一个窗口滤波,窗口遍历图像上的每一个像素,将窗口中各个点的中值替换窗口中中心点的值。滤波器窗口可选取多种形状,圆形、方形、十字形和

收稿日期:2019-12-28

作者简介:关雪梅(1976—),女,满族,辽宁大连人,硕士,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基础课教研部计算机基础教研室教授,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图像处理。

线性等,形状不同的窗口图像滤波效果也不同。在进行去噪处理时要合理选择窗口,窗口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图像中值滤波器在最大化保存边界信息去除噪声的效果。

中值滤波算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1) 设定目标窗口,找出窗口的中心点,获得该点在原图像上的重合形式。

(2) 在目标窗口中移动图像逐步扫描。

(3) 将目标窗口下的数据排序,获取中间数据信息,赋值给窗口中心点。

3 小波变换图像去噪算法

图像小波变换去噪方法是将时域或空域上含有噪声的图像数据信息转换到图像小波域上,形成多层的小波系数。对小波系数的特点进行分析,参照小波基的特征,找到更适合图像小波变换的新方法对小波系数进行处理,然后进行图像的逆变换,最终得到消除噪声后的图像。

采用小波变换消除图像噪声的方法是通过变尺度的小波变换性质来处理图像数据信息,突出集中处理性能。当数字图像信息能量数据集中在少数小波变换系数上,则小波系数的取值要高于变换小波域内能量分布于大部分图像噪声的小波系数值。在图像处理领域中常用的消除噪音方法有非线性小波变换阈值消噪方法、基于小波域相关性的消噪方法以及模极大值消除噪音方法。本文主要是针对小波变换阈值去噪进行研究。

3.1 小波去噪的基本原理

小波变换是由傅立叶变换演变而来的,它具有时频性、去相关性和多分辨率分析等特点,处理高斯噪声的效果极为明显,这一点优于中值滤波。经过小波变换分解后的图像噪声数据一般都集中在图像的高频部分,这样就更好为消除图像噪音奠定基础。鉴于数字图像中的噪声数据一般都汇集在次低频、次高频和高频子带处,尤其是高频子带^[3],将图像中高频子带的小波系数设为零,再将次低频和次高频系数采取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从而实现图像噪声的有效清除。

利用小波变换消除图像噪声的基本思想是经过小波变换的数字图像形成含有图像重要信息的小波系数,数量少幅值大,尤其是噪声对应的幅值较小。根据不同的尺度调整合适的阈值,将大于这个阈值的小波系数保留,小于这个阈值的小波系数设置为零,这样可以更好地对数字图像的噪声进行有效的控制。然后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小波的逆变换,最终得到经过滤波后的重构图像。经过小波的分解与

重构,就可以达到消除图像噪声的目的。

消除图像噪声的过程如下:①选择合适的分解层次和小波变换函数对图像进行小波分解。②将经过处理后的数字图像进行小波变换,采用自适应的小波系数处理方式,边界信息的小波系数维持不变,其余信息小波系数采用模糊软阈值的处理方法。③采用数据量化的系数进行小波重构。④将小波系数进行小波逆变换,获取消除噪声的图像。

3.2 小波阈值去噪方法

设定合理的小波基,进行数字图像小波分解,明确需要分解的层数和阈值,然后将分解后的每层系数采用阈值化运算,图像小波系数处理后采用逆变换的方法重构数字图像,从而获得消除噪声后的图像。通常分为软阈值和硬阈值两种方法,目前软阈值应用范围较广。以下是软阈值函数模型:

$$m_{\delta} = \begin{cases} 0, & |M| \leq \delta \\ \text{sgn}(M)(|M| - \delta), & |M| \geq \delta \end{cases}$$

在上式中 δ 为估计阈值, M 为图像小波系数, m_{δ} 是经过软阈值函数计算后的小波系数。使用软阈值函数进行图像重构后,去噪效果较好,与硬阈值函数处理图像比较起来振铃现象缩减,但在进行图像平滑的过程中也丢失了一些细节和边界数据,对图像的质量造成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软阈值和硬阈值的特点,设计了一种实用的新的阈值函数,具体如下所示:

$$m_{\delta} = \begin{cases} \text{sgn}(m)k \sqrt{|m|^2 - \left(\frac{\delta}{m}\right)^k} \delta^k, & |m| > \delta \\ 0, & \text{其他} \end{cases}$$

上式可以依据小波系数自动调整 k 参数, $k = 2c$, 其中 $c = [10d]$, 其中 d 为小波系数百分比,它是阈值 δ 的两倍。阈值 δ 一般采用 Visushrink 通用阈值, $\delta = \sigma \sqrt{2 \log(H)}$, σ 为含有噪音信息的标准方差,离散数据的长度为 H 。由于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噪声的方差是不可预先估计的,所以在进行实际阈值计算时要将受污染的噪声方差估算在内。

4 小波变换和中值滤波相结合的图像去噪算法

采用中值图像滤波方法进行消除图像噪声的优点是有效地保留数字图像的细节数据,能够很好地去除脉冲噪声和随机噪声,并且在窗口的选取上更加简单灵活^[4]。时频局部化的特性是小波变换所具有的较好的特性,可以有效地消除图像中的高斯噪声。现实世界中产生的噪声一般都是混合噪声,消除混合噪声可以采用混合去噪的方法。

数字图像中往往灰度突变的像素为图像噪声部分,拥有空间的不相关和高频率的特性。数字图像

在进行小波变换后分别获得图像的高频和低频部分,其中图像混入和细节噪声为图像的高频部分,边界轮廓为图像的低频部分,因而消噪的过程也就是量化处理图像高频信息的过程。

图像小波变换函数是多样化的,进行图像处理可以有多种选择,选择不同的小波函数直接影响到小波变换的最终处理效果。同时在进行小波变换图像处理中也要关注小波的层数,层数分解的越多,则消除噪声的频率范围就越丰富。但在分解层数增加的同时也会导致在去噪过程中信息数据的损失加大,所以层数选择要恰当合理。在进行图像小波去噪时,怎样进行分析噪声系数来消除并抑制噪音成为关键。在进行去除噪音的过程中更好的降低系数信息是数字图像处理领域中人们在一直探讨的问题。

在数字图像中存在的噪声大部分为混合噪声,我们可以采用更有效的滤波方法,如小波变换和中值滤波相结合的图像去噪方法^[5]。先采用中值滤波方法进行椒盐噪声滤波,然后选取小波阈值进行图像消噪处理,消除图像中含有的高斯噪声,这样可以充分展现两种去噪算法的优势,更好地消除图像中的噪音。以下是详细的算法处理过程:

- (1)采用 3×3 窗口对图像进行中值滤波去噪处理。
- (2)对 中值滤波处理后的图像采用 `coif4` 小波基进行 3 层分解,处理后的小波系数和尺度系数组成一个系数向量 M 。
- (3)将 阈值函数进行改进,将改进后的函数对 M 进行处理,使结果与之前的向量 M 之差尽可能地小。
- (4)采用 新生成的 M 系数向量进行小波数据重构。

通过这种组合方法去除图像噪音,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点,既能够较好地去除噪声,又能够保持其边缘特征。

5 实验分析

可以用均方根误差和信噪比两组数据来对消除图像噪音的方法进行评价。

5.1 消除图像噪音效果评估参数

设 $H_n(x, y)$ 为含有噪音的图像, $H_p(x, y)$ 为消除噪音后的图像, $H(x, y)$ 为无噪音图像,则 RMSE (均方根误差) 和 SNR (信噪比) 可以表示如下:

$$SNR = \log \frac{\sum_{x=1}^M \sum_{y=1}^N H_p^2(x, y)}{\sum_{x=1}^M \sum_{y=1}^N (H_p(x, y) - H_n(x, y))^2}$$

$$RMSE = \sqrt{\frac{\sum_{x=1}^M \sum_{y=1}^N [H_p(x, y) - H(x, y)]^2}{M \times N}}$$

在数据处理中,SNR 的大小会影响平滑效果的好坏,越大效果越好;RMSE 可以看出同一背景下不含有噪音的图像与消除噪音后图像之间的差异度, RMSE 越小,图像越会接近不含有噪音的图像,图像消除噪音的结果也越好^[6]。

5.2 数字图像去噪效果实验分析

我们选取 50 幅图像作为实验案例来分析研究采用中值滤波和小波变换方法消除图像噪音的效果,同时再与普通小波去噪和中值滤波去噪进行对比,从而验证算法的优越性。实验的过程中选取高斯噪声和椒盐噪声对原始图像进行处理,将灰度等级设为 256 级,采用不同去噪方法效果评估如表 1。

表 1 去噪方法参数效果对比

去噪方法	高斯噪音			椒盐噪音		
	SNR	RMSE	TIME (seconds)	SNR	RMSE	TIME (seconds)
小波去噪	1.9222	14.1124	1.8141	2.6590	8.6112	1.5695
中值滤波去噪	1.9371	14.3757	0.7821	2.6553	2.9820	0.9695
本文方法去噪	1.9376	14.3391	14.2511	2.6565	8.3686	14.5951

从实验数据可以看出,中值滤波进行图像去噪处理,在信噪比低的情况下会使图像实现平滑效果,但对于处理后的图像会失去很多数据信息,造成图像不是很清晰;采用小波方法来消除图像噪音,效果虽然好,但处理后的图像比较模糊。采用中值滤波和小波变换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数字图像滤波,两个滤波器组合使用对椒盐噪声和高斯噪声的图像处理效果较单一地使用中值滤波消除图像噪音或小波变换消除图像噪音效果要好。其中图像小波变换处理方法具有多分辨率的性质,可以很好地区分图像中的噪声部分和不同频域的数据信息,很好地保留图像的基本信息,这样就比传统的滤波方法具有优势。本文采用的中值滤波和小波变换相结合的方法来消除数字图像中的噪音,在进行消除噪音的同时还可以很好地保留图像中的细节部分,而且信噪比相差不大。

在实验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消除噪声和目标位置信息留存等因素,经过针对 50 幅图像去除噪音方法的比较分析,实验结果验证了采用中值滤波和小波变换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图像去噪,效果良好。

以下是其中一组图片的实验去噪对比结果,使用本文采用的组合去噪方法处理后的图像质量得到明显提升,见图 1。



图1 含噪图像



图2 中值滤波去噪



图3 小波去噪



图4 本文组合去噪

6 结束语

为了实现在消除图像噪声的同时更完整地保留图像的边界信息,组合滤波方法将是未来数字图像处理降噪的研究发展方向。本文对图像处理中传统的消噪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分析出传统去噪方法的弊端所在,提出一种新的组合去噪方法,并与单一的图像去噪方法进行对比实验,实验结果说明本文提出的组合去噪方法在消除图像噪音后明显地改善了图像清晰度,为下一步数字图像的处理奠定基础。

采用小波变换与中值滤波相结合的方法来消除图像噪音,实现了平滑去噪效果的同时不削减图像的原始信息,满足时间复杂度的要求,优于单独使用某一种方法进行平滑去噪处理。经过 50 幅数字图像的数据处理对比分析,验证了采用中值滤波和小波变换相结合去噪方法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 [1] 倪林. 小波变换与图像处理[M].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0.
- [2] 刘国宏,郭文明. 改进的中值滤波去噪算法应用分析[J].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10, 46(10): 187-189.
- [3] 蔡德尊. 基于小波变换的图像去噪算法研究[D].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1.
- [4] 颜兵,王金鹤,赵静. 基于均值滤波和小波变换的图像去噪技术研究[J]. 计算机技术与发展,2011,21(2):51-53.
- [5] 杨帆. 数字图像处理及应用[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 [6] 任重,刘莹,刘国栋等. 改进的小波双阈值双因子函数去噪[J]. 计算机应用,2013,33(9):2595-2598.

(责任编辑 吕志远)

An Algorithm for Image Denoising Based on Median Filtering and Wavelet Transform

GUAN Xuemei

(Basic Cour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Liaon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Dalian, Liaoning 116052, China)

Abstract: The noise in the image will affect the subsequent image processing processes such as pattern recognition, boundary detection, boundary extraction, image segmentation, etc. Therefore, certain methods are used to reduce the noise of the image. In this paper, a new combined filtering method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median filter and wavelet transform is proposed to eliminate the noise in the image. Through the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this filtering method can not only eliminate the mixed noise, but also retain the details and edge information of the image, which is better than the single wavelet transform method and median filtering method.

Key words: median filtering; wavelet transform; image denoising

比例边界计算机有限元算法理论及研究发展分析

余芝轩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2)

摘要:比例边界有限元法(Scaled Boundary Finite Element Method, SBFEM)是由 J. P. Wolf 以及 Chongmin Song 基于有限元(FEM)和边界元(BEM)提出的一种计算机半解析的数值方法。研究表明:在用计算机处理应力奇异性和无限域的问题上,SBFEM 相比较于传统的有限元方法具有很大的优势;对 SBFEM 的理论基础、坐标变化等方面做了系统的阐述,并对目前该方法的研究情况和应用领域做了介绍。

关键词:比例边界有限元;有限元;应力奇异性;无限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1.025

中图分类号:TU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1-0125-04

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不断出现,人类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所面临的工程日益复杂,越来越多的数值计算方法正在被人们所提出、接受以及研究。对于每一种数值计算方法,计算精度、计算效率以及适用范围往往都是研究的重点。

计算机结合比例边界有限元法是由 John. P. Wolf 和 Chongmin Song 提出的一种结合了边界元和有限元诸多优点的数值计算方法^[1]。目前已有学者对此种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工程领域进行了应用,并且和传统的数值计算方法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对于某些工程实际问题,相比较于边界元和有限元,此种方法可以显著地减少计算时间,提高计算精度^[2-3]。

2 比例边界有限元法的理论基础

对于二维弹性静力学来说,应力 $\{\sigma(x,y)\}$ 和体积力 $\{p(x,y)\}$ 在域内任一点应满足如下关系:

$$[L]^T \{\sigma(x,y)\} = \{p(x,y)\} \quad (1)$$

这里 $[L]$ 是线性微分算子。

应变 $\{\varepsilon(x,y)\}$ 和位移 $\{u(x,y)\}$ 的表达式如下:

$$\{\varepsilon(x,y)\} = [L] \{u(x,y)\} \quad (2)$$

而应力与应变的关系表达式如下:

$$\{\sigma(x,y)\} = [D] \{\varepsilon(x,y)\} \quad (3)$$

其中 $[D]$ 是弹性矩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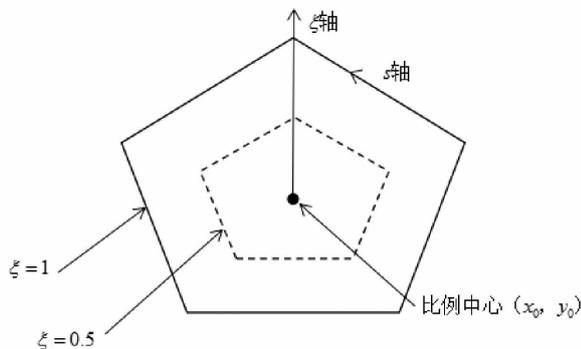


图1 比例边界有限元坐标系

在推导比例边界有限元方程时,需在比例中心 (x_0, y_0) 建立相应的坐标系。比例中心可以在对所有边界可见的前提下放在域内任意位置^[4]。比例边界元的坐标系包括径向坐标 ξ 和环向坐标 s 。径向坐标规定,在比例中心处 $\xi = 0$,在边界上 $\xi = 1$,域内其他地方取 $0 < \xi < 1$;环向坐标指沿着边界逆时针方向的距离。

笛卡尔坐标下的点 (x,y) 可以由 ξ 和 s 表示为:

收稿日期:2019-11-26

作者简介:余芝轩(1967—),女,湖北英山人,硕士,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与计算机应用。

$$\begin{aligned} x &= x_0 + \xi x_s(s) = x_0 + \xi [N(s)] \{x\} \\ y &= y_0 + \xi y_s(s) = y_0 + \xi [N(s)] \{y\} \end{aligned} \quad (4)$$

运用雅克比矩阵变化,可得:

$$\begin{Bmatrix} \frac{\partial}{\partial \xi} \\ \frac{\partial}{\partial s}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frac{\partial x}{\partial \xi} & \frac{\partial y}{\partial \xi} \\ \frac{\partial x}{\partial s} & \frac{\partial y}{\partial s}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frac{\partial}{\partial x} \\ \frac{\partial}{\partial y} \end{Bmatrix} = [J(\xi, s)] \begin{Bmatrix} \frac{\partial}{\partial x} \\ \frac{\partial}{\partial y} \end{Bmatrix} \quad (5)$$

其中,雅克比矩阵

$$\begin{aligned} [J(\xi, s)] &= \begin{bmatrix} \frac{\partial x}{\partial \xi} & \frac{\partial y}{\partial \xi} \\ \frac{\partial x}{\partial s} & \frac{\partial y}{\partial s} \end{bmatrix} = \\ \begin{bmatrix} x_\xi & y_\xi \\ x_s & y_s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x(s) & y(s) \\ \xi x(s)_s & \xi y(s)_s \end{bmatrix} \end{aligned} \quad (6)$$

在 $\xi = 1$ 的边界上,式(6)的 $[J(\xi, s)]$ 将变成 $[J(s)]$,且 $[J(s)]$ 只与边界上的节点坐标有关,矩阵形式为:

$$[J(s)] = \begin{Bmatrix} x(s) & y(s) \\ x(s)_s & y(s)_s \end{Bmatrix} \quad (7)$$

$$\text{即 } [J(s)] = x(s)y(s)_s - y(s)x(s)_s \quad (8)$$

结合式(5)和(6),可得:

$$\begin{aligned} \begin{Bmatrix} \frac{\partial}{\partial x} \\ \frac{\partial}{\partial y} \end{Bmatrix} &= [J(\xi, s)]^{-1} \begin{Bmatrix} \frac{\partial}{\partial \xi} \\ \frac{\partial}{\partial s} \end{Bmatrix} = \\ \frac{1}{|J(\xi, s)|} \begin{bmatrix} \xi y(s)_s & -y(s) \\ -\xi x(s)_s & x(s)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frac{\partial}{\partial \xi} \\ \frac{\partial}{\partial s} \end{Bmatrix} \end{aligned} \quad (9)$$

其中,

$$\begin{aligned} |J(\xi, s)| &= x(s)\xi y(s)_s - y(s)\xi x(s)_s = \\ &\xi [x(s)y(s)_s - y(s)x(s)_s] = \xi |J(s)| \end{aligned} \quad (10)$$

将式(10)带入式(9),可得:

$$\begin{aligned} \begin{Bmatrix} \frac{\partial}{\partial x} \\ \frac{\partial}{\partial y} \end{Bmatrix} &= \frac{1}{\xi |J(s)|} \begin{bmatrix} \xi y(s)_s & -y(s) \\ -\xi x(s)_s & x(s)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frac{\partial}{\partial \xi} \\ \frac{\partial}{\partial s} \end{Bmatrix} = \\ \frac{1}{|J(s)|} \begin{Bmatrix} y(s)_s \\ -x(s)_s \end{Bmatrix} \cdot \frac{\partial}{\partial \xi} + \frac{1}{\xi |J(s)|} \begin{Bmatrix} -y(s) \\ x(s) \end{Bmatrix} \cdot \frac{\partial}{\partial s} \end{aligned} \quad (11)$$

对于二维的线弹性问题,

$$[L] = \begin{bmatrix} \frac{\partial}{\partial x} & 0 \\ 0 & \frac{\partial}{\partial y} \\ \frac{\partial}{\partial y} & \frac{\partial}{\partial x} \end{bmatrix} \quad (12)$$

将式(11)代入(12),可得:

$$\begin{aligned} [L] &= \frac{1}{|J(s)|} \begin{bmatrix} y(s)_s & 0 \\ 0 & -x(s)_s \\ -x(s)_s & y(s)_s \end{bmatrix} \cdot \\ \frac{\partial}{\partial \xi} + \frac{1}{\xi |J(s)|} \begin{bmatrix} -y(s) & 0 \\ 0 & x(s) \\ x(s) & -y(s) \end{bmatrix} \cdot \frac{\partial}{\partial s} \end{aligned} \quad (13)$$

其中,令

$$\frac{1}{|J(s)|} \begin{bmatrix} y(s)_s & 0 \\ 0 & -x(s)_s \\ -x(s)_s & y(s)_s \end{bmatrix} = [b^1(s)] \quad (14)$$

$$\frac{1}{|J(s)|} \begin{bmatrix} -y(s) & 0 \\ 0 & x(s) \\ x(s) & -y(s) \end{bmatrix} = [b^2(s)] \quad (15)$$

将式(14)和(15)代入(13),可得:

$$[L] = [b^1(s)] \frac{\partial}{\partial \xi} + \frac{1}{\xi} [b^2(s)] \frac{\partial}{\partial s} \quad (16)$$

同时,令

$$\begin{aligned} [B^1(s)] &= [b^1(s)] [N(s)], \\ [B^2(s)] &= [b^2(s)] [N(s)]_s \end{aligned} \quad (17)$$

采用如下的虚功原理表达式进行相应的变化和推导:

$$\begin{aligned} \int_v \{\delta \varepsilon(x, y)\}^T \{\sigma(x, y)\} dV - \int_s \{\delta u(s)\}^T \{t(s)\} ds - \\ \int_v \{\delta u(x, y)\}^T \{p(x, y)\} dV = 0 \end{aligned} \quad (18)$$

对式(17)进行相应的积分和运算,可得到比例边界有限元下关于 $\{u_h(\xi)\}_{\xi\xi}$ 、 $\{u_h(\xi)\}_\xi$ 、 $\{u_h(\xi)\}$ 以及系数 $[E^0]$ 、 $[E^1]$ 、 $[E^2]$ 的 Euler - Cauchy 位移平衡微分方程,并可得到相应解为

$$\begin{aligned} \{u_h(\xi)\} = \\ c_1 \xi^{-\lambda_1} \{\varphi_1\} + c_2 \xi^{-\lambda_2} \{\varphi_2\} + \dots + c_i \xi^{-\lambda_i} \{\varphi_i\} \end{aligned} \quad (19)$$

其中, c_i 代表的是每一种独立的位移模式对于方程解的加权系数, $-\lambda_i$ 则表示了对于径向坐标的比例因子。

通过对方程自由度数的翻倍,可构建一个关于不同模式下的位移以及节点力的特征方程并进行求解。

对于式(19)中的 c_i ,一般通过在边界上 ($\xi = 1$) 的方程 $\{c\} = [D_1]^{-1} \{u_h\}$ 来求得.并最终可以得到位移和应力的表达式分别为:

$$\{u_h(\xi, s)\} = [N(s)] \sum_{i=1}^n c_i \xi^{-\lambda_i} \{\varphi_i\} \quad (20)$$

$$\{\sigma_h(\xi, s)\} =$$

$$[D] \sum_{i=1}^n c_i \xi^{-\lambda_i-1} [-\lambda_i [B^1(s)]] + [B^2(s)] \{\varphi_i\} \quad (21)$$

3 比例边界有限元法研究进展

比例边界有限元法(SBFEM)是一种基于计算机有限元方法,并且结合了有限元和边界元诸多优点的较为新型的数值方法。相比较于边界元,比例边界有限元同样只需要在边界上进行离散,但它针对边界元无法生成对称刚度矩阵的问题做出了相应改进。目前,已有研究和工程实践表明,比例边界有限元对于解决应力奇异性问题以及无限域问题,相对于传统的有限元方法来说具有很大的优势。对于应力奇异性问题,比例边界有限元法不需要进行额外的处理。在无限域问题上,由于SBFEM只需在边界上进行离散,从而可以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通过更少的自由度数来提高计算效率,减少计算时间^[5]。Hauke Gravenkamp、Carolin Birk 和 Chongmin Song 在 2015 年对弹性导波在带有缺陷的无限域板中的传播进行了模拟,并在建模效率和计算精度这两方面将模拟结果与传统有限元在同等条件下的模拟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在精度相同的情况下,比例边界有限元的建模效率可以提高两到三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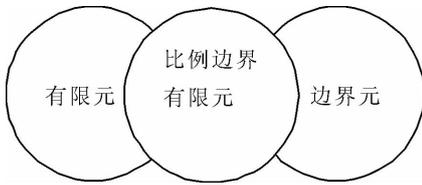


图2 比例边界有限元关系图

除此之外,比例边界有限元在裂缝问题的处理上也有独到的优势,其可以通过将比例中心设置在裂尖上来解决应力奇异性的问题。而且裂缝位置的变化以及裂缝深度的改变也仅需要进行少量的网格重划分即可完成,相比较于有限元法来说大大减少了工作量。Hauke Gravenkamp、Jens Prager、Albert A. Saputra 和 Chongmin Song 对 Lamb 波在带有裂缝板中的传播进行了模拟,并在自由度数(DOF)、误差(Deviation)和运行时间(CPU)这三个方面对SBFEM与传统有限元的模拟结果进行了综合比较,结果表明在误差率一致的情况下,比例边界有限元的自由度数仅有传统有限元法的 5.88%,运行时间仅有传统有限元法的 1.50%。从以上工程实例可以得知,在裂缝问题的模拟以及计算过程中,比例边界有限元的计算效率相比较于传统有限元法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

正是由于比例边界有限元法(SBFEM)在各种工程实际问题中得到了不断的应用并且相比较于传统有限元方法在某些方面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所以近年来,比例边界有限元法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研究、应用以及发展。

比例边界有限元最初是用来计算无边界介质的动力刚度矩阵,然后 Chongmin Song 和 J. P. Wolf 又用此方法对多项异性材料进行裂缝分析^[6]。随后,在此前工作的基础之上,J. P. Wolf 和 A. J. Deeks 对比例边界有限元的原理以及坐标变化做了系统的阐述,即推导了从笛卡尔坐标系到径向、环向坐标系的转变,且进一步拓宽了其适用范围。随后 Chongmin Song 对静力学问题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矩阵函数计算方法,并表明此种计算方法具有更高的计算精度^[5]。大连理工大学的林皋院士和他的博士生杜建国将比例边界有限元应用于计算坝面动水压力,通过对二维以及三维的动水压力进行计算,并且和有限元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发现,比例边界有限元可以在提高计算效率、减少工作量的同时减小计算误差^[7]。Hauke Gravenkamp 和 Albert A. Saputra 等人首次将比例边界有限元应用于模拟兰姆波在带裂缝板中的传播,结果表明对于裂缝问题,比例边界有限元在计算误差减小、计算时间大幅度缩减的同时,计算模型仍然具有比有限元少的自由度数^[8]。之后,Hauke Gravenkamp 和 Carolin Birk 等人继续模拟了弹性导波在任意边界的带缺陷条形板中的传播并推导出了动力刚度矩阵^[9]。Ean Tat Ooi 和 Chongmin Song 等人又提出一种基于比例边界的多边形网格划分方法,和以往的研究对象均是线弹性材料不同,此方法对弹塑性材料进行了模拟、分析,从而大大拓宽了比例边界有限元方法在未来的应用领域^[10]。此后,陈灯红和戴上秋等用比例边界有限元做了土体-结构交互作用的动态断裂分析,并且得出了相对于传统方法更加准确和有效的计算结果^[11]。

4 总结

本文针对目前一种较新型的数值计算方法——比例边界有限元法(SBFEM),对其理论基础、坐标变化等方面做了推导,对比例中心的选取及适用范围做了详细的阐述。目前已有研究以及相应的工程算例在计算精度、计算效率等方面将SBFEM和传统的有限元方法进行了比较。计算结果表明由于SBFEM仅在边界上进行离散,具有降低维度、减少自由度的特点,故可以在提高计算效率的同时减小计算误差。

随着研究的深入,比例边界有限元法在解决应力奇异性、无限域以及裂缝问题上已不断地显示出良好的适应性、便利性和快捷性。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在工程领域的不断应用,结合计算机比例边界有限元法会在今后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参考文献:

- [1] Song C, Wolf J P. The scaled boundary finite - element method - alias consistent infinitesimal finite - element cell method - for elastodynamics [J]. *Comput. Methods Appl. Mechan. Eng.* 1997, 147: 329 - 355.
- [2] Deeks A J, Wolf J P. Stress recovery and error estimation for the scaled boundary finite - element method [J]. *Int. J. Numer. Methods Engrg.* 2002, 54: 557 - 583.
- [3] Deeks A J, Wolf J P. An h - hierarchical adaptive procedure for the scaled boundary finite - element method [J]. *Int. J. Numer. Methods Engrg.* 2002, 54: 585 - 605.
- [4] Hauke Gravenkamp, Jens Prager, Albert A. Saputra and Chongmin Song, The simulation of Lamb waves in a cracked plate using the scaled boundary finite element method [J].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12: 1359.
- [5] Chongmin Song. A matrix function solution for the scaled boundary finite - element equation in statics [J]. *Comput. Methods Appl. Mech. Engrg.* 2004 (193): 2325 - 2326.
- [6] Chongmin Song, John P. Wolf, Semi - analytical representa-

tion of stress singularities as occurring in cracks in anisotropic multi - materials with the scaled boundary finite - element method [J]. *Computers&Structures*, 2002 (2): 183 - 197.

- [7] 林皋, 杜建国. 基于 SBFEM 的坝 - 库水相互作用分析 [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2005 (5): 723 - 729.
- [8] Hauke Gravenkamp, Jens Prager, Albert A. Saputra and Chongmin Song, The simulation of Lamb waves in a cracked plate using the scaled boundary finite element method [J]. *J. Acoust. Soc. Am.* 2012 (9): 1362 - 1366.
- [9] Hauke Gravenkamp, Carolin Birk, Chongmin Song, Simulation of elastic guided waves interacting with defects in arbitrarily long structures using the Scaled Boundary Finite Element Method [J].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2015, 295: 438 - 455.
- [10] Ean Tat Ooi, Chongmin Song, Francis Tin - Loi, A scaled boundary polygon formulation for elasto - plastic analyses [J]. *Comput. Methods Appl. Mesh. Engrg.* 2014, 268: 935 - 937.
- [11] Denghong Chen, Shangqiu Dai, Dynamic fracture analysis of the soil - structure interaction system using the scaled boundary finite element method [J]. *Engineering Analysis with Boundary Elements*, 2017, 77: 26 - 35.

(责任编辑 吕志远)

Analysis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Scaled Boundary Finite Element Method

YU Zhixuan

(Huanggang Polytechnic College, Huanggang, Hubei 438002, China)

Abstract: Scaled Boundary Finite Element Method (SBFEM) is a computer semi - analytical numerical method proposed by J. P. Wolf and Chongmin Song based on 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 and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BE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BFEM is particularly advantageou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FEM in situation involving stress singularity and unbounded domains.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its theoretical basis, coordinate changing and current research applications.

Key words: scaled boundary finite element method; finite element method; stress singularity; unbounded domains